

编号 D(三) 23  
3  
政治学院资料室(军)

[苏] 约·拉弗列茨基著

# 格瓦拉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2 1486 0

# 格 瓦 拉 传

[苏] 约·罗·拉弗列茨基著

*Gorschie*

07



上海人民出版社

*Иосиф Ромуальдович Лаврецкий*

**ЭРНЕСТО ЧЕ ГЕВАРА**

«Жизнь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

Серия биографий основана

в 1933 году М. Горьки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72

根据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72年版译出

**格 瓦 拉 传**

〔苏〕约·罗·拉弗列茨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5 字数 285,000

1974年9月第1版 197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 11171·60 定价: 1.15 元

**内 部 发 行**

## 译者的话

本书是关于格瓦拉的一部传记性著作。最初由苏修《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连载，后经作者作了一番增删，由苏修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笼时间正是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九七二年访问苏联前夕，因此，它完全是适应苏修反革命政治需要的。

本书作者拉弗列茨基，是苏修的一个作家。此人自称是“古巴通”。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苏修几乎每年都要派他去古巴活动。他还到过拉丁美洲其它一些国家。一九六一年，他曾与人合写过一部论述古巴历史和风俗文化之类的书。

作者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国际上已出现了不少关于格瓦拉的书，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写和评论格瓦拉，反映出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作者声称，他自己写这部书是为了对抗某些观点的。他说：“在一大批有关格瓦拉的书，包含着各类的虚构和偏见”，“尤其是许多美国作者的肮脏的

胡说八道，必须坚决予以回击”。这反映了苏修在古巴及拉美地区同美帝的激烈争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苏修叛徒集团头目米高扬曾特地接见了作者，就古巴革命和格瓦拉之死发表了一通谬论。作者如获至宝，录于全书之末，作为结尾。

全书包括四个主要部分：格瓦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参加古巴游击斗争的情况；古巴革命政府成立后他的政治、外交和党务活动；他在玻利维亚进行的游击战，以及他的最后死亡。书中着力描述格瓦拉的“崇高理想”、“英勇行为”和所谓“自我牺牲精神”，把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打扮成“共产主义战士”；把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由于执行一条错误路线而导致的惨败，说成是由于年轻、缺乏经验，甚至把它归结为所谓在拉丁美洲“展开有效的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大肆兜售“和平过渡”的一套破烂货。本书还把拉美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污蔑为“分裂了反帝力量”；恶毒地攻击拉美的马列主义者为“分裂分子”；吹嘘拉美的一些修正主义党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宣扬格瓦拉等古巴领导人与苏修叛徒集团之间如何亲密无间，苏古关系如何好；并借叙述格瓦拉生平的机会，连篇累牍地修

谈苏修对古巴的“无私援助”，把新沙皇这个明火执仗的强盗装扮成古巴人民的“恩人”。我们把这本毒草书翻译出来，正是为了便于人们了解新沙皇是怎样看待古巴、怎样看待格瓦拉的，他们在拉丁美洲推行的又是一条什么样的反革命路线。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复旦大学外文系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部分同志。书中所引用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言论及著作，凡能找到西班牙文原著的，我们均参照原著译出。限于水平，译文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 目 次

一、走向“格拉玛”号的道路·····	2
1. 最初的几步·····	2
2. 性格的培养·····	32
3. 一次失败了的战斗·····	55
4. “格拉玛”号·····	84
二、马埃斯特腊山区·····	110
1. 战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	110
2. 游击队的日常生活·····	139
3. 经由圣克拉腊到达哈瓦那·····	167
三、誓死保卫祖国·····	202
1. 在革命的狂飙中·····	202
2. 社会主义世界·····	237
3. 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员·····	265
4.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279
四、《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297
1. 神秘的失踪·····	297
2. 尼阿卡瓦苏河畔的营地·····	331
3. 战斗又打响了·····	359
4. 在街垒的那一边·····	397
5. 革命事业永垂不朽·····	418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平事业年表·····	444
主要参考书目·····	449

# 格 瓦 拉 传



## 一、走向“格拉玛”号的道路

### 1. 最初的几步

问：“您是哪个民族的人，什么血统？”

答：“您知道，大家都知道，我生于阿根廷。”

——引自一九五九年九月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同墨西哥《永久》周刊记者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二月的一个傍晚，我们坐在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在哈瓦那近郊米拉马尔的一幢别墅的会客室里。会客室很宽敞，桌旁坐着唐·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阿尔维托和我。我们在回忆着切的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阿尔维托的妻子胡莉亚（委内瑞拉人）也不时参加进来。

窗外哗哗地下着热带的暴雨。雨水象急流似地倾泻在别墅上。电光闪闪，透过百叶窗。雷声隆隆，仿佛附近什么地方正在打炮。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在这样的大雨天待在屋里是多么好啊；要是一个人在崇山峻岭中，或者在榛莽遍布的旷野里遇到这种滂沱大雨，会怎么样呢？

学者们说热带是可悲的。其实热带也是可怕的。在热带生活很困难,而且往往有危险。在这里,要想维持生计,也需要勇敢、顽强、钢铁般的意志、机智,当然还要有运气。

切的父亲年近七十,中等身材,外表端庄,戴一副玳瑁边眼镜,两只狡黠的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带着拉普拉塔居民所特有的口音,一听就知道他是阿根廷人。跟所有的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一样,他常常使用“切”这个感叹词。专家们肯定说,“切”这个字是阿根廷人从印第安人的瓜拉尼语中借用来的。在瓜拉尼语中,“切”的意思是“我的东西”。但在潘帕斯草原居民的嘴里,随着语气和上下文的不同,“切”表示多种多样的“人类激情”:惊讶、喜悦、悲伤、温存、赞同、抗议。

唐·埃内斯托的儿子埃内斯托·格瓦拉因爱用这个感叹词,古巴的起义者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切”。久而久之,这个绰号成了他战斗的化名,同他的姓名融合在一起了。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他叫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推翻巴蒂斯塔以后,格瓦拉出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他在新发行的钞票上签署的名字就是“切”,这可气得反革命分子七窍生烟。

已经是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了,有一次人家问他对自已的新名字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对我来说,‘切’这个名字表示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事情只能是这样。我原来的姓名只是属于个人的微不足道的东西。”

唐·埃内斯托对我说:“要弄清我儿子是怎么成为切

少校，成为古巴的一位领导人的，又是什么东西促使他到玻利维亚的山里去的，就得拉开往事的帷幕，介绍一下家祖的情况。一开头我就要说：在我儿子的血管里，流着爱尔兰造反者、西班牙征服者、阿根廷爱国者的血液。显然，好动的家祖的有些特点遗传给切了。他性格中有一种使他爱好远途旅行、惊奇冒险和新思想的东西。

“我自己年轻时就是个片刻都坐不定的人。起初，我在阿根廷同巴拉圭交界的边陲省份米西奥内斯省有一座马黛茶<sup>①</sup>园。后来我在科尔多瓦、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国其他城市承建房屋。我创办了几个建筑公司，常常弄得关门大吉。就这样我没有积攒到一点财产。我没有靠牺牲别人来赚钱的本领，所以别人靠牺牲我发了财。但是这点我倒不懊悔。要知道，生活中主要的东西不是金钱，而是纯洁的良心。尽管我的财运向来不佳，但是我的子女（我有五个孩子）全都受过高等教育，都可以算是有出息的人吧。不用说，最使我引以为荣的还是埃内斯托。他是真正的男子汉，名副其实的战士。”

我们喝着挺浓挺浓的热咖啡，这是胡莉亚照委内瑞拉的办法煮的。

“可惜我无法用马黛茶款待你们，”阿尔维托说，“由于该死的封锁，要从阿根廷弄点马黛茶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在阴雨连绵的夜里，这种浓咖啡也是不坏的饮料，要是桌上除了这瓶‘特级’酒以外，还有一瓶俄国的伏特加酒就更好了。”

胡莉亚非难似地瞧着我们，因为她丈夫有肝病，医生

<sup>①</sup> 马黛茶即巴拉圭茶。——原注

不准他喝酒。

阿尔维托辩解说：“说老实话，我就爱喝点儿。切就不爱喝酒。他很早就把那香喷喷的治哮喘病的烟卷抽上癮了，到了古巴他就爱抽雪茄烟。他肯定说，这种雪茄烟救了他的命，气喘才没有发作。他是真正了解上等雪茄烟的妙用的，几乎抽个不停。”

唐·埃内斯托继续讲下去：“是这样，年青人，我已经说过，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历史。您是历史学家，这对您会更有用处。在巴蒂斯塔被打倒、切成了名人以后，报上开始报导他的消息，各种各样的谎言都有。有些新闻记者甚至怀疑他是不是阿根廷人。还有些人断言他是俄国人，冒充阿根廷人。但是我们是阿根廷人，而且是道道地地的阿根廷人；在我们这个欧洲移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象这样道地的阿根廷人已经不那么多了。从我这一系来说，切是第十二代阿根廷人，从母系说，是第八代。比我们更‘古老的’阿根廷氏族，在我国恐怕是不容易找到了。先从我们的祖先讲起。按照西班牙习俗，我们有两个姓。照父姓我姓格瓦拉，照母姓姓林奇。我父亲的远祖是西班牙人，还是在殖民时代迁居阿根廷的。<sup>①</sup> 他们定

① 切本人对自己的家系毫不在意，如果提及，也只是用戏谑的口吻。1964年有一位叫玛丽亚·罗萨里奥·格瓦拉的夫人从卡萨布兰卡写信问切的祖先出生于什么地方，切回答说：“同志！老实说，我完全不知道我这一族出身于西班牙的哪一部分。不消说，我的祖先很早就一手在后、一手在前\*离开那里了。如果我现在没有把双手保持那个样子，那只是因为这种姿势不舒服。我不认为你和我近亲，但是，如果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你就愤慨得发抖，那么我们就是同志。这才是更重要的。——原注

\* 西班牙谚语，意即“一贫如洗”。——译者

居在同智利交界的门多萨省，务农为业。您当然知道，在上世纪初，门多萨省是我们的救星何塞·德·圣马丁将军的部队的根据地。在他的领导之下，推翻了西班牙在阿根廷的统治。圣马丁的部队从门多萨进军智利，驱逐了那里的西班牙人，接着又解放了秘鲁总督区的首都利马。就在这时候，阿根廷爆发了内战。圣马丁被迫引退。在西蒙·玻利瓦尔和苏克雷元帅指挥下的哥伦比亚军队完成了解放秘鲁的事业。

“阿根廷的内战在一八二九年结束，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将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攫取了政权。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富裕的畜牧主们的走狗。他残酷无情地杀害反对他的人，毁灭了整个整个的家庭，霸占了他们的财产。他执政达二十三年之久。

“一八四〇年，我祖父胡安·安东尼奥和他的兄弟何塞·加夫列尔·格瓦拉为了躲避罗萨斯的迫害，从门多萨逃往智利瓦尔帕来索城。罗萨斯没收了他们的田产。同他们一起逃往智利的，还有他们的邻居弗朗西斯科·林奇中尉。他父亲林奇-阿兰迪亚上校被暴君下令杀害了。林奇的田产也落到了罗萨斯手里。

“林奇家族在阿根廷的这一支人的始祖，是爱尔兰人帕特里克，或者象我们称呼的，帕特里西奥，他参加了反对英国统治的解放斗争，得罪了不少英国人。他们追捕他，他逃到西班牙，又从西班牙逃到了阿根廷，或者用当时对阿根廷的叫法，逃到了拉普拉塔联合省<sup>①</sup>。他在这里跟一个有钱的欧洲人的后裔（门多萨一个大畜牧庄园的女继承人）结了婚。这是在十八世纪的下半叶，还在西班

牙人统治时期。

“请记住，年青人，弗朗西斯科·林奇是我外祖父。现在听我说下去。弗朗西斯科·林奇为了谋个工作，跑遍了智利，到过我们这个大陆的梢梢头——麦哲伦海峡。后来他满怀希望到邻国秘鲁去了，在那里得了霍乱。他从秘鲁跑到厄瓜多尔，又在那里染上了天花。最后他从厄瓜多尔回到了瓦尔帕来索，跟格瓦拉兄弟俩重逢。

“那时候，很多阿根廷流亡者——罗萨斯的政敌——都住在瓦尔帕来索。其中有作家：多明戈·萨米恩托和巴托洛梅·米特雷，他们后来先后出任阿根廷总统；还有胡安·包蒂斯塔·阿尔维迪，他是我国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之一，是法国空想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他们在当地的报刊上揭露罗萨斯的罪行，谋划反对他的秘密活动。可是当时罗萨斯还稳坐在总统的宝座上，推翻他的意图并没有成功，结果反而牺牲了一些有胆量的人。

“一八四八年初，有一天林奇和格瓦拉兄弟俩同萨米恩托正一起坐在瓦尔帕来索的咖啡馆里，谈论阿根廷最新消息的当儿，他们的同胞何塞·卡雷亚斯突然跑来，报告了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卡雷亚斯建议立即动身到那儿去。有了钱这个‘玩意儿’，才能武装爱国者，推翻罗萨斯。

---

① 拉普拉塔联合省系阿根廷独立战争时期的国家组织形式。1810年由西班牙拉普拉塔总督区改组成立。包括今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等地区，共十四省。1816年由图库曼议会正式宣布联合省脱离西班牙而独立。1811年、1815年、1825年，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先后分出，建立独立国家。1826年，改称阿根廷联邦共和国，是现在阿根廷共和国的前身。——译者

“咖啡馆的那些常客对卡雷亚斯的建议各有各的看法。萨米恩托说：‘你们还没来得及到加利福尼亚，金矿就给采光了，只好两手空空地回瓦尔帕来索。’

“可年青人总是轻举妄动，不肯思前顾后的，深知世故的老辈人的劝告对他们有什么用呢！林奇和格瓦拉兄弟俩害了‘黄金热’，打算立即动身到加利福尼亚去。

“没过几星期，未来的百万富翁们就乘上了双桅帆船，向旧金山驶去，在一八四八年冬，平安到达那里。顺便说一句，当时到那里去的还有许多智利人。关于他们在异国的遭遇，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他的歌剧《华金·穆列塔的生活和灭亡》中告诉了世人。

“在旧金山发生的那种情景非笔墨所能形容。这个城市里塞满了各个国家、各色人种和各种民族的采金者。过了一个时期，我们的航海家才总算卖掉了他们的双桅帆船，前往心向往之的萨克拉门托峡谷；他们深信，无数的财宝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不过他们没有全到萨克拉门托去。林奇留在旧金山了。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叫埃洛伊莎·奥尔蒂斯年轻的智利女人（她是英国水手恩德里奇的未亡人），爱上了她，跟她结了婚。把年轻的妻子留在旧金山，自己到金矿去呢，还是带她一起去？两者都无异于冒险。林奇是个道地的骑士，他决定留在旧金山碰碰运气，从此大走红运。他在旧金山开了一片叫做‘加利福尼亚之美’的酒吧间。对他来说，这个酒吧间才是金矿。他发了财……

“林奇和埃洛伊莎·奥尔蒂斯结婚以后，在加利福尼亚生了一个女儿叫安娜。年青人，请记住，安娜·林奇·

奥尔蒂斯就是我母亲，也就是切的祖母。”

“那么格瓦拉兄弟俩的情况怎样呢？”

“噢，这是一部真正的《奥德赛》<sup>①</sup>！胡安·安东尼奥和何塞·加夫列尔·格瓦拉实在不走运。八成是命里注定的：我们家不该成为百万富翁。他俩在萨克拉门托峡谷里弄到的一个地段，原来‘空空如也’。他们横翻竖掘了年把工夫，淘洗了几吨矿砂，结果全是白费气力：那里的金子还装不满这只高脚酒杯的杯底！俗话说得好，否极泰来。虽说我们的采金者弄得精疲力竭，心里很恼火，回到了旧金山，林奇却热情地收留了他们，让他们在‘加利福尼亚之美’酒吧间工作。他们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当地贵族唐·吉列尔莫·德·卡斯特罗，这人是西班牙大公佩拉尔塔的孙女婿。佩拉尔塔当过新西班牙（即现在的墨西哥）的总督，美国佬就是从他手里把加利福尼亚夺去的。吉列尔莫·德·卡斯特罗拥有很多地产，连科罗拉多州的大峡谷都是他的。

“年青人，不要以为我在东拉西扯，不要以为这跟您感兴趣的问题没有关系。恰恰相反。您马上就会相信，吉列尔莫·德·卡斯特罗和他的夫人（佩拉尔塔总督的外孙女）跟鄙人，也就是说跟切有最直接的关系。唐·吉列尔莫满心喜欢格瓦拉兄弟俩，把他在现今圣迭戈市附近的‘圣洛伦索’大畜牧场委托给他们管理。他没有看错人，因为我的祖父和叔祖对畜牧业很在行。格瓦拉兄弟俩接受唐·吉列尔莫的聘请，也没有打错算盘，特别是我祖父胡安·安东尼奥还另外得到了好处，因为真正的幸

① 古希腊叙事诗名。——译者



福正是在那儿，在‘圣洛伦索’牧场，等待着他。他在那儿跟唐·吉列尔莫的独养女孔塞普夔认识了。这两个年青人彼此爱上了。既然爱上了，就自然结为夫妻。至少在淳朴的古代是这样。唐·吉列尔莫能把女儿嫁给一个西班牙血统的阿根廷人，感到挺高兴。这桩婚姻使我祖父成了吉列尔莫·德·卡斯特罗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包括大峡谷在内。一开头我就说过，连大峡谷在内的全部土地，后来都被美国当局用欺诈手段霸占去了。我们家跟美国当局打了很久的官司。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偏袒美国当局，最后还要我们付诉讼费，在当时来说，数目大得惊人。话又说回来，我们并不因此而感到惋惜。要知道，如果当时把这些土地都归还给我们，说不定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会截然不同，也许就不会成为一个为美洲的自由而捐躯的英雄的少校，而成为一个在什么地方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公子哥儿，这样，世上又会多一个寄生虫……

“您大概已经猜到我祖父胡安·安东尼奥和我祖母孔塞普夔生了一个儿子吧。是的，确实是这样。他是在美国出世的，名叫罗伯托。他就是我父亲。所以他跟我母亲一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有时历史会给我们作出什么样的出人意表的安排啊！为了让我能到世上来，我父亲罗伯托·格瓦拉，这位胡安·安东尼奥和孔塞普夔·德·卡斯特罗的儿子，竟娶了弗朗西斯科·林奇和埃洛伊莎·奥尔蒂斯的女儿安娜·林奇为妻子。他俩成亲是在我祖父结婚二十六年以后了。

“我们阿根廷有这样一句谚语：‘凡是猪猡总有死

期。’罗萨斯的丧钟也敲响了。一八五二年，恩特列里奥斯省省长胡斯多·何塞·德·乌尔基萨将军起来反对他。暴君的所有政敌，乃至全体人民，都同乌尔基萨将军联合在一起。罗萨斯被打倒了，阿根廷上空又吹起了自由之风。这个好消息一经传到旧金山、加利福尼亚，我祖父便携同叔祖立即准备返回家园，什么也阻挡不住他。他这个真正的西班牙骑士，懂得男子汉的最高职责就是为祖国效劳。

“他们匆匆地作了几天准备，很快就乘船从旧金山到达瓦尔帕来索，翻越过安第斯山脉，来到了故乡门多萨。新政府立即把被罗萨斯这个暴君夺去的田产归还给格瓦拉兄弟俩。他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常规。

“您一定会问：‘加利福尼亚之美’酒吧间的老板弗朗西斯科·林奇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就要谈到。林奇在异国又待了整整二十五年。是什么原因？现在谁弄得清楚呢。也许是他舍不得丢掉他的酒吧间，也许是由于家室之累。可不是，他的妻子唐娜·埃洛伊莎替他生了不多不少十七个孩子。但是加利福尼亚毕竟是加利福尼亚，祖国终究是祖国。尽管唐·弗朗西斯科·林奇的十七个孩子全是在美国生的，但这位前阿根廷军队的中尉还是抑制不住地想回来，回到故土潘帕斯草原。在七十年代，他把酒吧间拍卖了，带着一家大小回到了祖先的土地上，回到门多萨，重又住进了祖传的庄园，同他的朋友格瓦拉兄弟俩为邻。

“我祖父和叔祖怀着什么样的喜悦心情欢迎林奇归来，是不难想象的。当时我父亲罗伯托年满二十六岁，而

林奇的长女安娜比我父亲大一岁，还没有出嫁。好象两个人都在等待这次会面。他们结了婚，生了十一个孩子。鄙人，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排行第六。

“我父亲罗伯托·格瓦拉学的是土地测量。他在政府中担任过相当显要的位置：国家国界测定委员会主席，负责测定同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些邻国的边界。他总是跑来跑去，同我们的邻国进行谈判。可以说，阿根廷现在的边界是在他直接参与下勘定的。

“年青人，现在请允许我谈几句自己的情况吧。我读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建筑系，但是为了谋生起见，曾几次辍学。我祖父过去的那些庄园一个也没有传给我。他除了我父亲，还有许多子女，而我的父母，我已经说过，有十一个孩子。这就是我们不靠地租生活的原因。这也不是坏事，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成为寄生虫。”

“唐·埃内斯托，请问一下，阿根廷著名作家贝尼托·林奇，就是写《‘佛罗里达’的兀鹰》这本书的作者，是您的亲戚吗？顺便告诉您，这本书已经译成俄文<sup>①</sup>。”

“贝尼托是弗朗西斯科·林奇的孙子，我的表兄弟。总而言之，我的亲戚多得很，而且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富有的，小康的，聪明的，愚笨的，有名的，无名的，革命的和反动的。我的表兄弟林奇海军上将还当过阿根廷驻古巴大使，这是在我儿子到古巴之前不久的事情。在林奇家甚至还有德国籍的旁系亲属。我的一个姨母——唐·弗朗西

<sup>①</sup> 贝尼托·林奇(1885--1951)：其所著《‘佛罗里达’的兀鹰》一书的俄译本，于1963年由莫斯科“文艺书籍出版社”出版。——原注

斯科的女儿，嫁给了她的音乐教授，一个德国人，因而‘破坏了’我们的家系。这对夫妇的子孙成了希特勒这个狂人的信徒。我永远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势不两立的敌人。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女都同意我这些观点。早在三十年代，我一家人就积极参加过阿根廷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排犹主义的运动，参加过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声援盟国的运动，尤其是声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的运动，当时我们特别同情自由法国。

“我妻子塞莉亚·德·拉·塞尔纳-德·拉·略萨，也和我一样，出身于阿根廷的古老氏族。我同她是在一九二七年结婚的。我们甚至还是远亲呢。

“塞莉亚的叔叔胡安·德·拉·塞尔纳娶的是我姨母，唐·弗朗西斯科·林奇的一个女儿。塞莉亚的父亲，胡安·马丁·德·拉·塞尔纳律师，是作为阿韦利亚内达市的奠基人载入阿根廷史册的。阿韦利亚内达市邻近布宜诺斯艾利斯，现在是大工业中心，拥有我们那些著名的屠宰冷藏联合企业。所谓‘我们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说的，因为这些企业受‘斯威夫特公司’、‘阿摩尔公司’和其他阿根廷和美国公司所控制。但是我并不怀疑，这些屠宰冷藏联合企业总有一天会变成阿根廷人民的财产，阿根廷人民早已有权把它们收回了。

“应该提一下，在我妻子塞莉亚的那个氏族中也有一个西班牙大公。您别以为她或者我特别以此为荣。然而也不能忽视事实。”

“唐·埃内斯托，用俄国俗话说：‘歌曲里的词儿是没

法删的。””

“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说的那位大公就是西班牙驻秘鲁的最后一任总督何塞·德·拉·塞尔纳·伊诺何萨将军。就是他的军队在阿亚库乔<sup>①</sup>附近令人难忘的会战中被哥伦比亚元帅苏克雷击溃的。”

“唐·埃内斯托！何塞·德·拉·塞尔纳将军的名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阿亚库乔》<sup>②</sup>一文中提到过，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描写了历史性会战的详细情节，这次会战结束了达十五年之久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但并不感到惊奇，要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所不知的学者，对他们那个世纪的至为重大的事件都很关心。使我们爱国者争取独立的斗争大功告成的阿亚库乔会战，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注意。

“不过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我妻子塞莉亚吧。她是个独立自主的人，根本不把我们贵族阶级的那套繁文缛节放在眼里，尽管她是在教会寄宿学校受的教育。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关心政治，对各种问题都要发表自己大胆独到的见解。要知道，伏尔泰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是在耶稣教徒那里读书的，而其结果大家都已知道。说到宗教，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塞莉亚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子女，从来都不上教堂。塞莉亚在青年时期就参加过主张男女平权的运动，争取妇女

---

① 阿亚库乔系秘鲁的一个省，该省的一个主要城市亦称阿亚库乔。文中所提到的那次会战就是在该城附近进行的。——译者

② 《阿亚库乔》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译作《艾阿库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72—173页。——译者

享有选举权。她是阿根廷头一批驾驶汽车的妇女中的一个，甚至敢于违反一切规章在佛罗里达街上驾车行驶，这条街是只准步行的人走的；她也是头一批剪辫子、在银行支票上签上自己名字的妇女中的一个。在那个时代，她的行为激恼了贵族，她被认为是一个古怪偏执的女人。可是我喜欢她身上那种使别人不以为然的東西——她的智慧，她那独立自主、热爱自由的性格。

“我们是怎么开始我们的共同生活的呢？塞莉亚继承了在米西奥内斯省的一座马黛茶园。我们便搬到那里去住，想把它变成一座模范庄园。当时马黛茶价格很高，怪不得有人称它为‘绿色的金子’。我购买了一些最现代化的机器，想减轻季节工——采茶工人——的劳动。

“阿根廷人是极其喜欢马黛茶的，喝马黛茶喝得很多，就象其他民族喝浓茶或咖啡一样。我儿子也是个马黛茶癖。我们的诗人费尔南·席尔瓦·巴尔德斯称颂这种令人惬意的、对健康有益的饮料，说：

发苦的马黛茶啊，  
你身上有着男子粗糙  
而结实的掌印。  
你到处伴随着我，  
无论我高兴还是伤心……  
我只消呷你一口，  
就可破愁解闷，  
消灾降福，  
家中太太平平。

“马黛茶让人们得到欢乐和愉快，但给种植工人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痛苦。

“马黛茶园工人处于被压迫者、苦役者的地位，茶园主操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可以为所欲为地毒打他们，甚至把他们打死。他们的工资不是现钱，而是一些票证，凭票证到东家开的铺子去购取次等食物和杂货，东家乘机以高价向他们销售质量低劣的货物。而且还用酒精毒害他们，铺子里有的是酒精。工人们任何有组织的反抗，都遭到茶园主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我头一件事就是取消票证，用现金支付工人的工资。我还禁止在茶园里出售酒精。我立刻就树了好些敌人，他们都是附近的茶园主。起先他们都以为我是疯子，可是后来他们断定我神经正常，便开始叫我共产党人。就我的政治倾向而言，我当时是激进主义者，激进公民联盟的拥护者。这是民主主义的政党，它的领导人是当时执政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总统，他做过许多于国家有益的事情，主张独立的外交政策，遵守宪法。那些茶园主威胁说要收拾我。当时在米西奥内斯是一片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现象。地方当局、警察局都掌握在茶园主手里。我并不是胆小鬼，但我无权拿塞莉亚去冒险。我打定主意迁往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打算在那里开一爿马黛茶加工厂。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切在那里出生，早产一个月。为了表示对我尊敬起见，塞莉亚替他取名叫埃内斯托。在家里我们叫他泰泰。

“我打算在罗萨里奥开办工厂的计划，结果告吹了。这时正好发生世界经济危机。阿根廷的经济本来是为纽

约和伦敦所左右的，因此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对外贸易锐减，我国的原料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猛跌，许多商行破产，出现了失业现象。我弄不到所指望的贷款，不得不放弃当厂主的计划，重返米西奥内斯的茶园。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同着塞莉亚和泰泰一起到游泳池去游泳。塞莉亚是游泳能手，非常喜欢游泳。那天天气凉爽，刮着尖利的冷风。突然之间，泰泰猛咳起来，喘不上气。我们立即送他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下来，肯定孩子患了哮喘病。也许是他着了凉，也许是先天性的，因为塞莉亚小时候也患过这种病。

“当时医生们对哮喘病还毫无办法。现在医生们肯定哮喘病是过敏性反应。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医生们唯一能给我们出的主意，就是变换气候环境。我们选择了科尔多瓦。科尔多瓦山峦起伏，是我国最‘有利于健康的’省份。那里的空气清新洁净，弥漫着针叶树的芳香，这被认为是对健康大有裨益的。我们毫不惋惜地拍卖了我们的茶园，在阿尔塔格拉西亚那个小地方买了一座房子。阿尔塔格拉西亚靠近科尔多瓦市，在海拔两千公尺的高度上。我开始承包建筑房屋的工作，塞莉亚看护患病的泰泰。

“从一九三〇年五月二日这倒霉的一天起，他的哮喘病几乎每天发作，说得准确点，每夜发作。我睡在他的小床旁，只要泰泰一开始喘气，我就把他抱在手里，摇啊哄的，直到发作过后，衰弱不堪的孩子睡着了为止。而他睡着，往往要到天快亮的时候。

“在泰泰之后，我们又生了四个孩子：塞莉亚（为了表



示对我妻子尊敬起见而取这个名字的)、罗伯托(为了表示对我父亲的尊敬)、安娜·玛丽亚(为了表示对我母亲的尊敬)、胡安·马丁(为了表示对我岳父的尊敬)。他们都和泰泰一样,受过高等教育。两个女儿成了建筑师,罗伯托当律师,胡安·马丁任设计师。他们顺顺当当地长大了,没有给我们增添特别的麻烦。

“泰泰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他甚至不能上学读书。他母亲在家里教了他两年。不错,他四岁就开始读书,从那时起,他就手不释卷。有人告诉我,说他甚至在玻利维亚战斗的时候,尽管处在敌人的追击之下,不时受哮喘病的折磨,还是想方设法读书。

“他读些什么书吗?怎么跟您说呢?什么书都读。我们夫妇俩,就是说塞莉亚和我,都是爱书如命的,我们家里有一个很大的藏书室,有几千本书,这是我们家的主要装饰品,是我们的主要财产。其中既有古典作品——从西班牙作品到俄罗斯作品,也有历史、哲学、心理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有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书。阿根廷作家的作品,可以举出的有何塞·埃尔南德斯、萨米恩托等人的著作。还有一部分是法文书。塞莉亚精通法文。她教泰泰学的就是法文。

“不用说,切也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他特别喜爱的作家。童年时他喜爱萨尔加里、儒尔·凡尔纳、大仲马、雨果、杰克·伦敦。后来他醉心于塞万提斯、阿那托尔·法朗士。他读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的作品。当然啰,他也读过当时拉丁美洲最流行的社会小说——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厄瓜多尔作家豪尔

赫·伊卡萨、哥伦比亚作家何塞·欧斯塔西奥·里凡拉写的小说,这些小说描写了印第安人的痛苦生活、庄园和种植园里工人的奴隶劳动。

“切自小就爱好诗歌,读过波特莱尔、魏尔伦、加尔西亚·洛尔加、安东尼奥·马恰多的诗作,喜爱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他能背诵许多诗,自己也写过诗……不消说,我儿子并不自认为是诗人。有一次,他称自己是永远也不会成为诗人的革命者。他在给西班牙共和主义者诗人莱昂·费利佩(费利佩的诗集《鹿》,他一直放在床头)的信中,称自己是‘不会有成就的诗人’。古巴诗人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曾多次谈起,切同古巴永别以前不久,曾向他借过一本西班牙文的诗集,从中摘录了聂鲁达《再见吧!》这首诗。

“我儿子直到牺牲都没有一刻离开过诗歌。大家知道,在他的背包里,跟那著名的《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一起还发现了一本笔记本,那上面抄有他喜爱的诗歌。因此,我们的英雄马丁·菲耶罗的话是完全适用于切的:

我和歌儿一起出生,将和它一起死亡,  
我曾和它一起到处流浪,  
我将和它一起去见上帝,  
也将和它一起被埋葬……<sup>①</sup>

“切还酷爱绘画,熟悉绘画史,水彩画也画得不错。”

---

<sup>①</sup> 《马丁·菲耶罗》是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的一首闻名于阿根廷和乌拉圭的长诗名。——原注

我打断了唐·埃内斯托的话头：“我听说，切不喜欢现代派绘画。有一次，他去参观一个欧洲国家的现代派画展时，向记者声明：‘对不起，对于现代派绘画我无可奉告，因为我根本不懂。也许它有它的意思，不过超出了我的理解力。’”

“我儿子最喜爱印象画派。他对象棋也是入迷的。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他参加过比赛和循环赛。只要他打电话给家里，对他妻子说：‘我去会面了’，她就知道切去跟朋友们下象棋了。

“可是他对于音乐却一窍不通，根本听不出好坏，连探戈同华尔兹都分辨不出来。他不会跳舞，这在阿根廷人中间是罕见的。要知道，阿根廷人个个都自以为是了不起的舞蹈家，即使事实上并非如此。”

“唐·埃内斯托，我听说切当了工业部长后，人家要求他对新唱片的质量发表意见，他回答说：‘我对音乐谈不出任何意见，在这方面我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

“这象他说的话。他从来不以承认自己的缺点为耻。他爱嘲笑别人身上的缺点，但对自己也不宽容。他是善于自我批评的，我甚至可以说，他对自己是无情的。有些人认为这是个性怪僻、自我卖弄的表现。其实使他具有这种精神的原因远要严肃和深刻得多，这原由就是他极其真诚，对说谎做假、繁文缛节、市侩哲学毫不妥协，而真诚往往使凡夫俗子感到惊讶诧异。凡夫俗子认为凡是不象自己的人就是疯子，或者是刁猾的人，爱装假的人，会玩骗局的人。有些为切写传记的人，想出弗洛伊德的潜在意识复合体来解释他的各种在他们看来是反常的行

动，认为哮喘病对于他的性格和革命世界观的形成起决定作用。这一切都是不严肃的。

“产生革命者的，不是疾病，不是生理上的缺陷，也不是某种精神因素，而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和人追求正义的天生的志向。

“泰泰不仅仅酷爱象诗歌和艺术这样‘轻松的’东西。绝对不止这些。他还擅长数学和其他精密科学。我们甚至以为他将来会成为工程师，但是，大家知道，他选择了医生这行职业。也许这倒是因为他自己有病或者他外祖母(塞莉亚的母亲)得了不治之症的关系吧。他热爱外祖母，外祖母也非常喜爱他。外祖母是生癌死的，塞莉亚也一样，死于癌症。不过这是后话。

“我们让泰泰，还有我们其他的孩子，从小就养成爱好各种体育运动的习惯。泰泰尤其爱好体育运动，对体育也同对待他所从事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样专心到忘我的程度，并不因为有病而稍打折扣。他好象要努力证明，尽管他患了那该死的哮喘病，但是他不仅能做跟他同岁数的人所做的一切，而且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多更好。还是在做中学生的時候，他就加入了当地的‘了望台’体育俱乐部，在足球预备队里踢球了。他是个出色的球员，但不是俱乐部的基本队员，因为比赛时他常常会发哮喘病，不得不离开球场，去用吸入器治疗。他打过橄榄球(这种球全是用气力的动作，是勇敢而有气力的人打的)，练过骑马术，对高尔夫球甚至滑翔运动都入过迷，但骑自行车无疑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主要爱好。他在赠给他的未婚妻奇奇娜(玛丽亚·德尔·卡尔门·费雷拉)的照片上写道：‘脚

踏车之王献给奇奇娜的崇拜者们。’”

“唐·埃内斯托，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儿子的名字第一次在报纸上出现就跟自行车有关系吧？”

我翻阅自己的笔记本，找到了那条从一九五〇年五月五日阿根廷的《画报》上抄录下来的启事，把它念给切的父亲听：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三日。‘米克朗’摩托自行车商行的代表先生们！兹将‘米克朗’牌摩托自行车一辆寄交你们检修。我曾骑着这辆车子旅行四千公里，行经阿根廷十二个省。在整个旅途中，车子功能极好，未发现些微毛病。希你们寄还我时仍有此种功能。’签名是：‘埃内斯托·格瓦拉·塞尔纳’。”

“泰泰作这次旅行的时候已经是大学生了。‘米克朗’商行出于做广告的目的，送给了他一辆“米克朗”牌的摩托自行车，而且还补贴他一部分旅行费。

“决不能说他是—一个不爱出门的人。在做大学生的时候，他当过阿根廷货船上的水手，航行过一个时期，到过特立尼达岛、英属圭亚那。后来他又跟格拉纳多斯一起周游了，说得更确切些，徒步走遍了半个南美洲。”

“泰泰干这样冒险的事儿，再加他的身体又不好，您不担心吗？”

“那还用说，每逢这样的情况，我和塞莉亚总是焦急不安，痛苦万分。可是我们把我们的担惊受怕放在心里。我让自己的孩子养成独立自主的精神，我坚信，这在将来对他们会有帮助的。再说，要劝阻他们不干年青人所那么乐于去干的所谓冒失行为，反正是不可能的。我至今

还记得，有一次泰泰和罗伯托从家里溜了出去，竟不知去向。当时泰泰十一岁，罗伯托只有八岁。我们以为他们在附近的森林里迷了路，到森林里去找他们，又把他们失踪的情况报告警察局。过了几天，有人在离开科尔多瓦八百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他们，原来他们悄悄地钻进了一辆卡车，给捎到那里的。可是泰泰青少年时代的冒险事情给我们增添的焦虑，跟后来等待着我们的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每收到他描述麻风病院的信件，心里就忐忑不安。他和格拉纳多斯漫游南美各国期间常到麻风病院去‘作客’。有一次他从秘鲁写信告诉我们说，他和阿尔维托乘着麻风病人送的木筏沿着亚马孙河顺流而下了，就是说，到最荒凉偏僻的地方，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去了。他预告说：‘如果过一个月你们得不到我的信息，那就是说，要末是鳄鱼把我们吞掉了，要末是野蛮的印第安人把我们吃掉，将我们的头烤干，卖给美国游客了。那时候你们到纽约卖纪念品的小铺子里去找我们勇敢的脑袋吧。’当然，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儿子，知道他是用他所特有的‘阴郁的幽默’笔调给我们写信的，因为他很自信，并且深信一切都会顺利地对付过去的。尽管如此……要知道，他下一封信不是过了一个月，而是过了两个月才收到！

“后来……他从墨西哥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说他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部队，到古巴跟巴蒂斯塔作战去了，说老实话，当时我没有勇气一下子读完这封信。塞莉亚怕我神经吃不消，把信的内容简要地对我说了一下。接着两年没有任何消息，如果不把阿根廷记者豪尔赫·

里卡多·马塞蒂的报导算在内的话。一九五八年四、五月间，马塞蒂到马埃斯特腊山去过一趟，带回了同切和菲德尔的谈话录音。马塞蒂出版了一本描写这些会见的书，叫做《战斗的人与哭泣的人》。然而报纸却不止一次地报导起义者被巴蒂斯塔击败的消息；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都叫我们为儿子的命运提心吊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巴蒂斯塔制度垮台的前夕，我们全家人团聚在一起迎接新年。我们的心情都不大好，因为关于古巴的事态，电台所广播的消息矛盾百出，而对于切的情况我们只知道他在圣克拉腊城外的战斗中受了伤。声援古巴人民委员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展行动，这个委员会甚至同菲德尔的大本营有无线电联系。但是这种联系靠大不住，常常中断。古巴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

“除夕晚上，一家人都到齐了，没有别的人好等了，大约十一点钟光景，突然有笃笃的敲门声。我们开门一看，只见门槛上有一封信，是谁送来的，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信封里有一张纸条：‘亲爱的老人们！自我感觉极好。用掉二，还剩五。我继续在工作。音信稀少，今后还会是这样。但是你们指望上帝是阿根廷人吧。我紧紧拥抱你们所有的人，泰泰。’他总是说，他象猫一样有七条命。‘用掉二，还剩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受过两次伤，还有五条命储备着。

“我们给这封突如其来的信弄得又惊又喜。可是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夜里，这并不是唯一的意外事儿。不到十分钟，又有人悄悄投给我们一只信封，里面是一张明

信片，上面画了一朵红玫瑰，写的是：‘祝圣诞节和新年幸福！泰泰自我感觉极好！’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五九年元旦，马塞蒂和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来看我们，把巴蒂斯塔逃离古巴的消息告诉了我们。过了一星期，一月七日（当时起义军已经解放了哈瓦那），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安排了一桩叫切喜出望外的事情，从哈瓦那派了一架飞机来接我们。我因为焦虑成疾，卧病在床，塞莉亚乘飞机到哈瓦那去了。当她在机场上拥抱住儿子的时候，她忍不住放声大哭。这在她还是生平头一次。

“一个月以后，我也乘飞机来到了哈瓦那。切在飞机的舷梯旁迎接我。我问他现在想不想再献身于医生这一行。他回答说：

“‘我可以把医生这个衔头送给你做纪念。至于我今后的计划，我也许留在这儿，要不然到别的地方去继续战斗……’

“这个‘别的地方’，大家知道，他选择了玻利维亚。但是我们一家人并不知道他在那儿战斗，虽然报纸上报导过这方面的消息。一九六七年一月初，泰泰寄了一封信给我们，信封上贴的是阿根廷邮票。信是写给我的，却是为了祝贺我姐姐贝亚特里斯（泰泰所喜爱的姑母）的生日。信是这样写的：

唐·埃内斯托！

穿过罗西南特<sup>①</sup>的蹄子扬起的灰尘，举着准备

---

① 罗西南特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唐·吉珂德》一书主人公唐·吉珂德所骑瘦马的名字。——译者



刺向追踪我的巨敌的长矛，我急忙给你们发出这封近乎精神感应的信，遵照礼仪祝贺新年，并拥抱你们所有的人。但愿您的姐姐在热爱她的亲戚的团聚之下迎接她的十五岁生日，望她稍微想到她那不在场的、多愁善感的骑士，他希望比上次更快地看到你们大家。这就是我的一些具体愿望，我把这些愿望托付给按照魔王的意志在征途上遇到我的流星。

再见。

倘若我再也见不着你……

你的儿子

“信的最后两行是用意大利文写的。信的风格是切常用的那种类乎诙谐剧的‘密信’的风格：贝亚特里斯不是年满十五岁，而是八十岁。从各方面看来，这封信是通过塔妮亚送来的，她负责切的部队同外界之间的联络。

“这是从我儿子那里来的最后的音信……”

“切读书怎么样，他是不是个好学生？”

“他天资聪明，很有才华，但不是优等生。我已经说过，头两年是在家里读的。后来他开始上阿尔塔格拉西亚的中学，但由于健康情况中途休学过好几次。一九四一年，他满了十三岁，便进了科尔多瓦市内以德安·富内斯（他是了不起的牧师，独立运动的参加者）命名的国立中学，塞莉亚每天驾了旧汽车接送他。四年以后，到了一九四五年，泰泰中学毕业。就是在这一年，我们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泰泰进了大学医学系。”

“唐·埃内斯托，我问了很多问题，大概使您很累了吧，可是还有一个对我很重要的问题。青年时代的切的政治观点是怎么形成的，是在什么事件、因素、现象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大学生时代他有没有参加过政治运动，在这方面发表过什么意见？”

“许多记者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那些无聊文人就这个题目写过大量子虚乌有的东西，就象写到有关切的一切事情一样。至于他在父母家里生活的那个时期的政治观点和他的爱憎，下面我会谈到。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我和塞莉亚坚决反对寡头政府和军人政府。自从一九三〇年，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总统被推翻，阿根廷的头号‘大猩猩’——夸口要使国家避免共产主义的乌里武鲁将军上台以来，这两种政府就换来换去。此后乌里武鲁由胡斯托将军取而代之，在胡斯托之后，两个寡头——有亲英情绪的奥尔蒂斯和有亲德情绪のカ斯蒂略——统治了国家一个短时期。一九四一年，卡斯蒂略由三个披着将军服的‘大猩猩’——劳松、法雷尔和拉米雷斯——组成的‘三头政治’推翻了，此后庇隆上校又伙同他的老婆埃维塔·庇隆取代了他们。一九五六年，以洛纳尔迪和阿兰布鲁为首的军政府把庇隆赶下了台。往后的事情我不谈了，因为泰泰早在一九五三年就离开了阿根廷，正如后来事实所证明的，是永远离开了。

“影响阿根廷的生活的，除了纯粹的国内政治事件，还有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我国的经济同伦敦商业区和纽约华尔街有密切关系，因此这些国家所发生的一切，都使我们感到休戚相关，使

我们感到忐忑不安。第二，阿根廷相当大一部分居民是移民或者移民的后裔，基本上是从意大利和西班牙迁来的。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德国殖民区，还有许多犹太人、波兰人、叙利亚人、英国人。而各民族的人，对他们或他们父母出生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都有鲜明强烈的反应，这是很自然的。第三，我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总是对法国心向往之。巴黎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作家、演员、美术家的麦加。因此我们对法国的命运也总是很关心的。

“另一方面，苏联发生的事情，我们大家也很感兴趣。我们有自己的阿根廷共产党，它尽管受到当局的残酷迫害，但仍然积极地行动。一般说来，社会主义思想在阿根廷是传播得相当广泛的。早在上世纪末，在我们那里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它的创始人胡安·胡斯托第一个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西班牙文。在阿根廷过去和现在出版了许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的藏书中有很多这一类的书。但是写文章谈论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不仅有朋友，而且有敌人，他们的立场正好和朋友相反，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当时在这方面帮了他们大忙的是希特勒、佛朗哥和墨索里尼，现在呢，大家知道，干这种肮脏勾当的是美国佬。由于这种种原因，阿根廷的报纸广泛地报导了国外事件，我可以说，甚至比报导国内生活事件更广泛。这一切就让泰泰能够了解最重大的世界政治事件。

“我打算全面地培养自己的子女。因此他们的同年人经常出入我家，其中既有科尔多瓦的富家子弟，也有工

人的孩子，还有共产党人的子女。比如说，泰泰跟诗人凯塔诺·科尔多瓦·伊图布鲁的女儿内格丽塔做过朋友；伊图布鲁是塞莉亚的妹夫，当时他是赞同共产党人的思想的。”

“唐·埃内斯托！我曾经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过。一九三七年初，在马德里，我的朋友，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介绍我同伊图布鲁认识，伊图布鲁也是去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

“真所谓天涯何处不相逢。你提到西班牙提得正是时候。西班牙内战在阿根廷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在我国有支援西班牙共和国委员会，我和塞莉亚曾千方百计地协助过这个委员会。我们的子女都尽力卫护共和派。我们同胡安·冈萨雷斯·阿吉利亚尔博士是邻居，也是莫逆之交；他是西班牙共和国的内格林政府副总理。共和国失败以后，他流亡阿根廷，侨居在阿尔塔格拉西亚。我的孩子同冈萨雷斯的孩子成了朋友，他们在同一个学校里读书，后来又进了科尔多瓦的同一个中学，塞莉亚每天用汽车把他们和泰泰一起送到学校去。泰泰还跟他的同年人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巴拉尔成了朋友。费尔南多的父亲是共和派，在同法西斯分子作战时牺牲了。我还要提一下著名的共和国将军胡拉多，有一个时期，他是冈萨雷斯家里的座上客。胡拉多常到舍间来，把内战中的波折，佛朗哥分子及其同盟者——意大利人、德国人——的兽行，讲给我们听。这一切对泰泰、对他未来的政治观点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用说，我们全家和我

们的朋友们都热烈地同情盟国，同情俄国，衷心希望击溃轴心国，为红军的胜利而感到高兴。斯大林格勒会战给我们的印象是很强烈的，在这次会战中，德军遭到了惨败。当时统治阿根廷的庇隆，同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顾盟国的压力，同轴心国保持外交关系。阿根廷到处都是轴心国的特务和间谍，他们拥有秘密电台。当局不仅不制止他们的破坏活动，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掩护他们，协助他们。我们则是盟国的朋友，尽力揭露法西斯特务。我也曾参加过这样的行动。泰泰是知道这种情况的，他总是要求我让他当助手。

“我和塞莉亚都是积极反对庇隆的。塞莉亚在科尔多瓦举行的一次示威游行中破口大骂庇隆，高呼反对庇隆的口号，甚至被捕了。一九六二年，她参加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又被警察局拘留；过了一年，她从古巴刚回到国内就立即被捕了，给关在监牢里好几个星期。

“在庇隆统治阿根廷期间，成立了许多反对独裁的地下战斗组织。我也参加过一个在科尔多瓦地区行动的这种组织。在我们家里制造炸弹，用于举行反对庇隆的示威游行时对付警察。这一切都是当着泰泰的面干的。有一次他对我说：‘爸爸，要末你答应我做你的帮手，要末我独立行动，参加另外一个战斗组。’我只得答应，好控制他的行动，这样可以使他免遭失败和不受警察的迫害。

“在那几年，泰泰是个民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他对当时的政治斗争虽不是抱冷眼旁观的态度，却仍然有点独善其身的味道。他仿佛是为了将来进行更激烈、更有决定意义的战斗而保

重自己。

“当然啰，我考虑到他的疾病，不动员他更积极地去参与政治，但也丝毫不阻止他去参与政治。当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在哪种场合该怎么行动也是他自己决定的。”

我又翻阅自己的笔记本，找到了我抄录下来的一封信，这是切在一九五九年推翻巴蒂斯塔以后不久写给费尔南多·巴拉尔的。我把这封信读给唐·埃内斯托听：

“‘亲爱的费尔南多！我知道你对我个人有怀疑，怀疑还是不是我，但是事实上我已不是那个你所了解的我了。从那时以来，已经许多岁月过去了，从昔日那个哮喘病患者和个人主义者身上留下来的唯有哮喘病而已。我听说你结婚了，我也结了婚。我现在有两个孩子，但我依然是个爱冒险的人，然而我如今冒险追求的却是正确的目标。请代我以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陈迹的名义向闾府致意，并请接受切兄弟般的拥抱，切是我的新名字。’

“这么说来，切在青少年时期认为自己是个人主义者和爱冒险的人了？”

“这大概是不错的，”唐·埃内托斯表示同意。

已经夜阑人静。暴雨停止了。我向唐·埃内斯托告别。他是一个如此诚挚爽直、和蔼可亲的人，他儿子切跟他一模一样。

## 2. 性格的培养

由于环境的关系，大概也由于自己的性格，我开始周游美洲大陆，从此对它很熟悉……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的妻子胡莉亚又给我们每人端来了一杯香喷喷的浓咖啡，这已经是第十杯了，但是我们还要长谈几个小时方得睡觉呢。阿尔维托答应讲给我听，他同切的友谊是如何建立的，讲给我听他们一同周游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形。

阿尔维托已在古巴报刊上发表过这方面的回忆录，但是读回忆录同听阿尔维托亲口叙述，滋味是截然不同的。

泰泰在他的大学或者中学的朋友中，可以引为至交的人，是寥寥无几的。切跟和他年龄相仿的人不同，他不修边幅，总是穿着揉皱的上装、破旧的大皮鞋，头发蓬乱。当时他那个圈子里的年轻阿根廷人却都是些花花公子，都是以擦得明亮如镜的皮鞋和抹得光可鉴人的头发为荣的。

切跟他们不同的还有他的个性。切的个性很强，富有辛辣、锋利的幽默感。那么是什么把这些青年吸引到切那里去的呢？看来是他的精神品质：骑士风骨、随时愿意救同伴于急难的精神、浪漫主义、丰富的想象力以及

勇气,而其中最富有吸引力的说不定就是他的勇气。他虽然身患痼疾,但是在各种比赛、游戏和青少年的娱乐中,不仅能做到“象大家一样”,而且还胜过了大家。然而同时又有一堵无形的墙壁把他和朋友们隔开,决不是每一个同他友好的人都能够越过这堵墙壁的。为什么?莫非因为在这堵墙壁背后隐藏着一个诗人的灵魂(我们都记得他一生酷爱诗歌),隐藏着一个吃尽了不治之症苦头的孩子的稍微受过刺激和伤害的心灵。只有切初恋的情人奇奇娜和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才是例外,他们两人是能够越过这堵墙壁的。

对于切说来,有这样两个例外是合乎规律的,因为象切这样的青年只允许两种人越过保护他的那堵墙壁。一种人就是他所爱的姑娘,这种姑娘往往在性格上和精神气质上和他迥然不同;另一种就是这样一类朋友,这种朋友在各方面和他背道而驰,然而同时却并不侵犯他的精神世界,并不侵犯他精神上的独立性,并不希望充当他精神上的教师、庇护人或者象经常发生的那样充当不讲友谊、只要求盲目服从和无条件忠诚的精神上的暴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极端却能成为莫逆之交。

我们很少从切本人那里得知奇奇娜跟他的关系,不过如果我们相信她的一个妹妹写的回忆录和其他资料,那么切是爱她的,并且打算同她结婚。奇奇娜是科尔多瓦一个最富有的大地主的女儿,象阿根廷人所说的,出身于最高级的“牛阀”门第。她有年轻的泰泰所缺乏的一切:健康得令人羡慕的身体,惊人的美貌,贵族小姐的优雅娴静的风度以及一笔巨产。科尔多瓦“名门望族”的



子弟都纷纷向她求婚。

然而切应邀到奇奇娜家去参加晚会时，却一如平日，头发蓬乱，穿着褴褛的上装和破旧的鞋子；他的外表，还有他指斥当地势利小人以及他们政治上的偶像时所讲的尖刻讽刺的话，都使得这帮人大惊失色。

是什么使切如此有恃无恐呢？是奇奇娜的爱情。切在第一次周游南美回国之后，曾建议她放弃父亲的牛，忘却她的财富，跟他一起旅居国外。他想到委内瑞拉的麻风病院去工作，同他的朋友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一起医治麻风病人，就象从前阿尔伯特·施韦泽<sup>①</sup>所做的那样，切对这人的功绩是十分景仰的。

然而奇奇娜是一个平凡的姑娘，用一种平凡的爱情爱着切。她曾经打算做他的妻子，不过是有条件的，要他留在她身边，确切地说，要他附属于她。他想迁居委内瑞拉密林，献身于医治麻风病人的事业，这种唐·吉珂德式的计划，她觉得是感人肺腑的，高尚的，但完全是不现实的。于是崇高的、诗情画意的人生观和卑下的、庸庸碌碌的人生观，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切和奇奇娜，不论谁都不肯让步，便和和睦睦地分道扬镳了，她去缔结她的美满姻缘，而他则动身上路，从此与过去一刀两断。

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或者象他的朋友们所称呼他的米阿尔<sup>②</sup>，比泰泰大六岁。是什么使泰泰和米阿尔

① 阿尔伯特·施韦泽(1875—1965):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神学家、音乐家、传教医师，曾在非洲行医。1952年，得诺贝尔和平奖金。——译者

② “米阿尔(Mial)”系“米阿尔维托(Mi Alberto)”的简称，意为：“我的阿尔维托”。——译者

亲近起来的呢？我一边倾听阿尔维托讲述，一边思忖，阿尔维托有新颖的独到见解而且富有强烈的求知欲，大概正是在这两个方面，使他和泰泰意气相投的吧。此外，阿尔维托是在麻风病院中工作的，唯有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和浩然正气的人，才会选择这种职业。何况，这个大慈大悲的人又是个乐天达观、热爱生活的人，这就使他和哥拉·布勒尼翁<sup>①</sup>十分相象，而且连外貌也酷似哥拉·布勒尼翁。阿尔维托，这位现在正和我作着长谈的人，所以能使切对他心向往之，最主要的不就是他的这些特点吗？

然而，我们还是让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自己来谈吧：

“我们是三弟兄：我、托马斯·弗朗西斯科和格雷戈里奥·帕特里西奥。我们出生在科尔多瓦省南部一个叫埃尔南多的小镇上。我本来已经在大学的药学系毕业，但是当一名药剂师的这种前程并不能使我神往，而麻风病的治疗问题却吸引了我，我就又在大学里读了三年书，成了一名生物化学家。于是一九四五年我就开始到离科尔多瓦一百八十公里的一家麻风病院中工作。

“早在一九四一年，经我弟弟托马斯的介绍，我就和切认识了，当时切还只有十三岁。切和托马斯是‘德安·富内斯中学’的同班同学。切和我都嗜好读书，热爱大自然，这就使我们建立了友谊。我成了格瓦拉家的常客。他家有一个极好的藏书室，我可以随意阅读其中的图书，就象它是我自己家中的一样。切有争论癖，我们往往就某

---

<sup>①</sup> 哥拉·布勒尼翁是法国现代作家罗曼罗兰在1918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一书的主人公。——译者

个作者彻夜争论，直争到嗓子发哑。

“我和我的两个兄弟一有闲暇就到科尔多瓦瑰丽如画的郊区去，象鲁滨孙一样露宿野外。切差不多总是跟我们一起去的，他的父母也乐意放他出门。山区的清新空气能使他的哮喘病不常发作，而走长路又锻炼了他的身体，养成他刻苦耐劳的习惯。不用说，当时医生都以为哮喘病患者过多消耗体力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这些医科大学生的见解却不一样，我们认为运动是医治这种痼疾的良药，切的父母也赞同我们的看法。切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迅速理解了生活的一切奥秘。他学会了怎样用树枝搭窝棚和怎样迅速地生旺篝火。后来他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的时候，这一切都用上了。自然，那时候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许多年以后他会把年轻鲁滨孙的经验用于打游击。

“不消说，我们当时都已经知道了十九世纪初我们的爱国者曾经为反对西班牙人而打过游击，已经知道了在墨西哥爆发革命的时候，农民领袖潘乔·比利亚和查巴塔也从事过游击战，已经知道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桑地诺将军曾领导尼加拉瓜人进行了反对美国干涉者的战争。我们当时还听到了中国开展游击战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游击队在德军后方所建树的功绩，使我们钦佩不已。但是那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包括切在内，曾预料到我们这里也会有打游击的可能。然而这丝毫也不意味我们当时对政治斗争袖手旁观，恰好相反，我们全国的大学生无不积极参与政治斗争。我们认为自己是反帝和反法西斯的战士，开展了反对庇隆的斗争，组织罢工

和示威游行，同警察进行搏斗。

“科尔多瓦是阿根廷重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在我国有‘博学多才的科尔多瓦’之称。城里有一所美洲最古老的大学（建于一六一三年），此外还有一个自然博物馆，一个规模巨大的动物园和一所艺术学院。这个城市还以其爱好自由的传统而闻名。一九一八年，在我们那所大学的校园内，在反帝的口号下，爆发了要求进行大学改革的革命学生运动，后来这个运动席卷了拉丁美洲所有的大学。一九三〇年，在科尔多瓦建立了一个以著名政论家德奥多罗·罗加为首的有影响的团体，这个团体曾勇敢地反对警察的镇压和法西斯主义。除此而外，还有象支援苏联委员会等其他许多进步组织在我们城里积极开展活动。

“我本人也参加过反对庇隆的大学生运动，一九四三年，我由于参加了抗议警察侵犯我们大学校园的示威游行，和几个大学生一起被捕。我的弟弟托马斯和切都到警察局来探望我，我请他们带领中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要求立刻释放被捕的大学生。老实说，切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说：‘你怎么啦，米阿尔，上街？为了让警察用警棍揍你的脑袋瓜吗？不，好朋友，要是有人给我一支手枪，我才上街！’

“我至今还记得他另一次类似的回答。我们在漫游南美各国途中，到了秘鲁，曾去参观过印加人的古城马丘皮克丘。我们游览了马丘皮克丘一圈以后，来到一所古庙的场地上（相传印加人的祭司就是在这所古庙中用人做祭品的），一边喝着马黛茶，一边沉入了幻想。我对切说：‘你听我说，老朋友，让我们留在这儿吧。我要娶一个

印加族的印第安贵族姑娘做妻子，并且宣布自己是皇帝，开始统治秘鲁；而你呢，我就封你做宰相，我们一起来发动一场社会革命。’切回答说：‘你是个疯子，米阿尔，不费一枪一弹，就干不成革命！’”

“阿尔维托，请您把这次旅行讲得更加详细些。”

“我早就想访问南美各国，我们虽说是这个地区的居民，可是那时对这个地区的情况却不很了解。我们倒还是对西班牙、法国或者美国的生活和事情，比对近在身旁的邻国的事情知道得多一些。除此而外，我出于个人职业上的原因，对这次旅行怀有浓厚的兴趣：我想访问各个邻国的麻风病院，了解它们的工作状况，然后说不定可以写一本有关麻风病的著作。

“自然，我是没有钱作这样一次旅行的，然而我却有‘交通工具’，一辆旧摩托车，我不断地修理这部车子，希望把它修好。至于膳食开支，我倒不怎么担心。我可以做做临时工，也可能得到我的同事，各个麻风病院医生们的调剂。

“我的‘马’可以用来旅行的一天，终于来到了。那时格瓦拉家已经迁居布宜诺斯艾利斯，切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医学系读书，并且在一家研究过敏性反应的研究所里实习，这个研究所的所长是阿根廷著名学者皮萨尼博士。那时格瓦拉家的家境相当困难，所以切同时还在市立图书馆当管理员，挣些额外收入。每逢假期他就到科尔多瓦麻风病院来探望我，他对麻风病的新疗法很感兴趣，在我实验时，他就帮助我。

“一九五一年九月间，有一天，切又来看我，我听了弟

弟托马斯的主意，邀请切在我所计划的旅行中做我的同伴。

“切自幼就梦想旅行。他有一种天性，就是渴望了解周围的现实，并且主要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亲自的接触去了解。他很想了解他的同胞阿根廷人——不但是首都的，还有边远省份的——以及农民、雇农和印第安人是怎样生活的，很想了解祖国的风貌是怎么样的。他想亲眼看看祖国广袤无垠的草原——潘帕斯草原，祖国的崇山峻岭以及遍布棉花种植园和马黛茶园的炎热的北部地区。当他看到了这一切后，他就会明白仅仅这一点见闻是不够的，还必须去看看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去了解这个大陆上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希望和忧患；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能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来解答一天比一天更厉害地折磨着他的那个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改善这个大陆上人民的生活，怎样才能使他们摆脱贫困和疾病，怎样才能把他们从地主、资本家和外国垄断组织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无怪切喜出望外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不过他要我推迟一些时候出发，等他期中考试结束之后再走，那时他正在读医学系的毕业班。切的父母并不反对他随我出国旅行，条件是我们外出不得超过一年，好让切回国参加毕业考试。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在我们的‘马’身上装载好一应日常用品、行军帐篷和被子，佩上自动手枪，背起照相机，就动身上路了。我们顺路去向奇奇娜告别，她交给切十五块美元，托他捎一件镶花边的连衫裙给

她，切则送给她一只叫‘坎·贝克’（意为“归来”）的小狗。我们又去向切的父母告别。再也没有什么事要我们在阿根廷耽搁了，我们就出发到智利去，这是我们旅途中第一个要去的国家。我们途经切的祖先居住过的门多萨省时，访问了几个庄园，考察了我们的高楚人<sup>①</sup>是怎样驯马，怎样生活的。后来我们拐向南去，以便离开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sup>②</sup>远些，因为我们那辆破旧的两轮‘罗西南特’<sup>③</sup>是爬不过这么高的山峰的。我们真是吃足了苦头，摩托车经常抛锚，需要修理。与其说我们骑摩托车旅行，还不如说我们扛摩托车走路。

“一路上我们不是在田野里就是在森林中露宿，这要看我们当时到了什么地方而定。一日三餐就比较麻烦了。我们离开阿根廷时带的几个钱，在最初几天就不知不觉花光了，连奇奇娜的十五美元也用来买吃的东西充饥了，在这以后，我们就不得不‘汗流浹背’，挣钱糊口。我们在饭店里洗碗盂，替农民治病，充当兽医、装卸工、搬运工、水手，在各个村子里修理收音机。麻风病院成了救命的绿洲，我们急于想到麻风病院去，就象穆斯林急于想到麦加去一样。到了麻风病院，我们不但可以不再饥肠辘辘，而且还可以获得精神食粮，因为我们可以同当地的同行交流经验，了解到许多自己感兴趣的和有益的东西。研究和治疗麻风病这个问题愈来愈吸引住了切，他象我

① 高楚人系阿根廷的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混血种人。——译者

② 安第斯山脉纵贯于阿根廷和智利之间，其最高峰为阿空加瓜山，介于阿根廷的门多萨省与智利之间。——译者

③ 两轮“罗西南特”系谑称摩托车。“罗西南特”请参阅25页注①。——译者

一样，不怕麻风病人，也不厌恶他们。相反，这些被亲人和社  
会所遗弃的不幸的人的外貌引起了  
他最深切的同情，他决心献身于  
医治麻风病人的事业。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我们到达智利的特木科城，第二天，当地的《南方日报》发表了关于我们的报导。切牺牲后不久，一九六七年十月，《格拉玛报》又重新发表了这篇报导。”

“我有这篇报导的全文，”我对阿尔维托说。这时可爱的胡莉亚面带心领神会的忧郁笑容又给我们端来了滚烫的浓咖啡，为了让阿尔维托歇一会儿，静静喝完这杯咖啡，我就朗读起《南方日报》的报导来。这篇报导是这样写的：

### 两位阿根廷麻风病专家

#### 驾摩托车周游南美

生物化学博士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先生，偕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医学系毕业班大学生埃内斯托·格瓦拉·塞尔纳先生，于昨日到达特木科，他们拟驾摩托车周游拉丁美洲各主要国家。

两位摩托车旅行者于十二月二十九日从科尔多瓦省出发开始旅行，经由门多萨和萨尔塔，通过边境居民点佩乌利亚，进入智利。他们业已访问佩德罗布埃、奥索布罗和瓦尔迪维亚等地，于昨日从瓦尔迪维亚驾自备摩托车抵达特木科。



### 两位麻风病专家

两位博学的外宾系麻风病及其并发症的专家，他们深知他们本国的麻风病状况，该国约有三千麻风病人，分别在塞里托斯、迪亚曼特斯、罗德里格斯、科尔多瓦和波萨达斯的麻风病院中接受治疗。

他们亦曾参观过巴西的若干所医院，巴西是此类病人百分比最高的国家。

### 有兴访问复活节岛

格拉纳多斯先生和格瓦拉先生自费旅行，旨在了解南美各国卫生事业的状况，尤其希望访问拉巴努伊<sup>①</sup>的智利麻风病院。我们这两位医生在到达瓦尔帕来索后，拟拜会复活节岛友好协会诸领导人，洽商有否可能访问我国遥处太平洋中的该岛屿的麻风病院。

这两位正在旅行的学者计划在委内瑞拉完成他们的远征。

格拉纳多斯先生和格瓦拉先生在特木科逗留一天后，于今晨继续他们的行程，赴康塞普西翁城。

阿尔维托笑了。

“真是的，这条新闻够胡闹的啦！不用说，我们并没有去过巴西。不过复活节岛我们倒是想去的，但是到了瓦尔帕来索（一百年前切的祖先就是从这里启程到加利福尼亚去淘金的），有人告诉我们，要等半年才有轮船开

<sup>①</sup> 当地居民称复活节岛西南部为拉巴努伊，有时亦指全岛。——译者

往复活节岛，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同托尔·海伊厄达耳<sup>①</sup>竞赛的念头，实在遗憾。不说，复活节岛在切一生的经历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同他后来在玻利维亚的那段历史有关。

“我们从瓦尔帕来索出发，继续我们的路程，不过已经不是骑摩托车，而是徒步行走，或者搭乘顺路的交通工具，要不就做‘黄鱼’，逃票乘坐火车或轮船。我们那辆两轮罗西南特在离圣地亚哥不远的地方就咽气了。随便怎么修理也不能使它起死回生，于是我们只得伤心地同它永别，替它筑了一个象窝棚的‘坟墓’。我们跟它的遗骸诀别之后，就继续赶路。

“我们徒步走到了丘基卡马塔铜矿，这个矿属于美国‘布拉登铜公司’。当晚，我们就在矿警的宿舍里过夜。

“我们在秘鲁亲眼目睹了克丘亚语族和埃马拉语族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他们受尽地主和政府当局的压迫和剥削，生活极度贫困；他们为了解饥而吸高根<sup>②</sup>，从而都中了高根毒。印加人古代文化的遗迹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历尽艰险到达了库斯科，切在库斯科的图书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点，津津有味地读着描写古代印加帝国的书籍。我们还在马丘皮克丘风景如画的遗迹中间度过了好几天，遗迹规模的宏大，使切惊叹不已，以至于打算为研究印加人的历史而献出自己的一生，我甚至和他打趣，称他为考古学家。

---

① 托尔·海伊厄达耳(生于1914年)；挪威资产阶级人种志学者和航海家。——译者

② 高根是一种灌木树叶，含有高根硷。——原注

“切兴奋地朗诵起巴勃罗·聂鲁达献给印加人神圣古城的那些诗句来：

我在树木的残骸中间，  
登上大地的危梯，  
走到你，马丘皮克丘面前，  
你深藏奥秘，石磴直接云天。  
你是前人最后的一座城砦，  
他们虽然已经长眠，  
但是他们的寝衣，  
并没有把大地本来的面貌遮掩。  
那里，闪电和人忽隐忽现，  
犹如两道耀眼的平行线。  
你是黑夜旋风中的摇篮，  
石城的始祖，  
兀鹰的桂冠，  
披着漫天朝霞的灿烂珊瑚，  
沉埋在砂土中的石铲。”

我讲给米阿尔听，去年苏联作家斯米尔诺夫访问了秘鲁，马丘皮克丘也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所写的秘鲁随笔中，就有一段专门描写这一“秘鲁奇迹”的。我把这段描写译成西班牙文，读给米阿尔听：

“我们古代的祖先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少叫人叹为观止的劳动和艺术的遗迹。在喜马拉雅山，在帕米尔高原，或者就在这里科迪勒拉山脉的层峦叠嶂之间，未始不能

找到一片浑沌未开、蔚为壮观的山景，而且丝毫也不比马丘皮克丘逊色。然而，马丘皮克丘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地球上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胜地，正是因为人的工力与大自然的庄严雄伟浑为一体了。当你意识到无论是这座古城，无论是这架巨大的石梯都是由跟你一样的人建成的，这些人与巍峨的山岭和无底的深渊相比，虽然渺小，但毕竟还是战胜了它们，这时你就会产生一种突然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感觉，这是一种出乎意外的异样的感觉。似乎有一根无形的，然而却是结实得割不断的长线，蓦地从这些印加人的状似盒子的石屋和神庙中，从高耸入云的石梯上延伸下来，连结着你们，现代的人，连结着乘坐喷气式飞机翱翔在云端里的人，连结着已经进入宇宙空间、登上了月球的人，连结着洞察了原子核奥秘的人。多少世纪以来，这根长线绵延不绝，并将继续牵引着人们走向遥远未来的某个地方。于是你们就会为大地的儿子，为人类，为自己属于人类而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从而瞬息之间就使你的心灵充溢了真正的幸福。即使为了这一点，为了这种因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而激起的幸福的自豪感，我们时代的人也应该感谢失而复得的印加人的古都，秘鲁的奇迹——马丘皮克丘。”

米阿尔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朗读。等我读完后，他说道：

“苏联作家的观感，同我们游览马丘皮克丘时的体会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觉得这座死气沉沉的古城其实生气勃勃。马丘皮克丘的存在本身，使我们对各民族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马丘皮克丘建造者的后裔早晚

会挣脱自古以来奴役人的枷锁。我们当时对于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同时我们还浮想联翩，想象着印第安人的大军如何在新的图帕克·阿马鲁<sup>①</sup>的统率下（至于我们自己，不消说，是这支大军的积极战士），终于唤醒了古老的秘鲁，使它迈向幸福自由的生活……

“我们离开马丘皮克丘后，就向遥远的深山进发，到了瓦姆博村，走访了那里的一所麻风病院，这所病院是具有献身精神的学者、秘鲁共产党党员乌戈·佩斯切博士创建的。他接待我们十分热情，把他治疗麻风病的方法一一介绍给我们，还为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秘鲁洛雷托省圣巴勃罗城附近另一个医治麻风病的重要中心。

“我们到达圣巴勃罗城可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乌卡亚利河畔的普卡尔帕村，我们设法乘上了一艘船，一直乘到了位于亚马孙河畔的伊基托斯港。六十年代，秘鲁的第一支游击队就是在这个地区开始活动的。我们在伊基托斯不得不耽搁了一段时间，因为切显然由于气候太潮湿，常吃鱼腥，发起病来。他的哮喘病使他呼吸极端困难，因而只得住进当地医院休养。不过切的钢铁意志使他既战胜了疾病的发作，又克服了我们一路上遇到的重重障碍。

“应该说，切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旅伴，他说话厉害，甚至尖刻，跟他作伴，是不会寂寞的。一路上我和他常常为了一点小事骂架甚至争吵，不过他象我一样不记仇，很快就冷静下来，又和和睦睦、同舟共济地旅行，直到下

<sup>①</sup> 图帕克·阿马鲁是印第安人的领袖，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揭竿而起反对西班牙人的统治。——原注

一次发生‘冲突’。虽然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理想的伙伴。他尽管身患痼疾，还是同我象亲兄弟一般分挑旅途中的重担，从不借口有病原谅自己而避重就轻。遇到困难，他表现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羡慕；如果他着手办一件事，非要办好才肯歇手。

“伊基托斯的医院很快就治好了切的病，不久，我们重新上路，沿着亚马孙河顺流而下，向圣巴勃罗进发。

“圣巴勃罗麻风病院的医生都亲切地接待我们，把实验室供给我们使用，邀请我们参加对病人的治疗。我们开始试验心理疗法，设法为麻风病人消愁解闷。我们组织了麻风病人的足球队，安排体育比赛，同病人一起去捕捉猴子，跟他们谈心，海阔天空，什么都谈。我们对这些不幸的人的照料和同志式的态度，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紧张度。病人真诚地留恋我们。他们为了多少对我们表示点谢意，替我们扎了一条象‘康-提基号’<sup>①</sup>那样的木筏，好让我们乘着这条木筏，到达我们旅途中的下一个目的地累提西亚。这是哥伦比亚的一个港口，也位于亚马孙河畔。

“在我们离开圣巴勃罗的前一天，由男、女和儿童麻风病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乘船到码头来同我们告别，我们那条木筏就停在码头边上。麻风病人为了对我们表示敬意，给这条木筏起名叫‘马姆博-探戈’。探戈，您是知道的，是阿根廷民间舞蹈，而马姆博则是秘鲁民间舞蹈，起这么个奇怪的名字，大概是借以象征阿根廷人和秘

---

① “康-提基号”是挪威人种志学者和航海家海伊厄达耳在1947年从南美秘鲁航海到大洋洲波利尼西亚时所乘木筏名。——译者

鲁人的友谊。天下着雨，但麻风病人的热情并不因此减退，为了对我们表示敬意，他们先唱了几支歌，然后有三个病人相继致告别词，他们讲得不太有条理，但却出自肺腑。接着我致答词，我非常激动。我跟切一样，舍不得离开这些善良的普通人，我们在圣巴勃罗逗留的时间虽然不长，却跟这些病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第二天，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我们把几件零星什物装上‘马姆博-探戈’，就沿着雄伟的亚马孙河向累提西亚顺流而下。河水把我们送向前去。切拍摄了许多照片，并且学我的样，每天记日记。我们欣赏着两岸花木繁茂的热带景色，可真是糟糕，竟‘错过了’累提西亚，而且始终没有发觉，一直等到我们的‘马姆博-探戈’已经停泊到巴西境内的一个大岛旁时，方才发觉这一点。再乘木筏回去，要木筏逆流而上，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只得把‘马姆博-探戈’换了一艘小船，还把我们仅有的一小笔储蓄全部贴了上去。

“结果，当我们到达累提西亚时，不但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口袋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我们那种潦倒不堪的模样自然而然引起警察局的怀疑，所以，不久我们就锒铛入狱了。这一回，阿根廷足球队的声望拯救了我们。原来警察局长是个足球迷，当他知道我们是阿根廷人的时候，他就要我们答应做当地足球队的教练员，作为释放我们的交换条件。这个足球队将要参加地区的冠军赛。后来‘我们的’足球队赢得了冠军，那些足球迷为了表示谢意，替我们买了飞机票，飞机一路顺风把我们送到了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

“当时哥伦比亚由劳雷亚诺·戈麦斯总统执政，用暴力统治着这个国家。军队和警察悍然发动战争，镇压不肯驯服的农民。每天都有不合政府当局心意的活动家被杀害；监狱中塞满了政治犯。波哥大警察局也‘殷勤地’接待了我们：把我们抓了起来，扔进牢房。我们只得答应立刻离开哥伦比亚。我们熟识的几个大学生凑了点盘费给我们，于是我们就乘公共汽车到同委内瑞拉交界的边境城市库库塔去。然后从库库塔登上两国的界桥，越过边境，到达委内瑞拉的圣克里斯托巴尔城。后来，我们又从这个城市出发，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四日一路平安到达加拉加斯，这是我们旅途的终点。切在到达加拉加斯前一个月，满了二十四岁。

“现在，我们应当回阿根廷去了，但是我却决定留在委内瑞拉，不但因为加拉加斯麻风病院聘请我在该院担任一项我很感兴趣的工作，而且还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了胡莉亚。我就同切商量，他一个人怎样才能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我们如同往常身无分文，但是就象在整个旅途中那样，幸运之神又向我们微笑了。切在加拉加斯偶然遇到了一个远亲，这是一个贩卖良种马的生意人，他用飞机把跑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空运到美国的迈阿密，中途在加拉加斯停歇。到了迈阿密后，他又在当地采购拉大车的马匹，把它们空运到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城出售，然后，空飞机就飞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建议切跟随他的那批马一起从加拉加斯飞往迈阿密，然后从迈阿密经马拉开波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甚至答应给切一些零花钱。切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我同切就在七月底分手



了。切答应考完以后，拿到了医生证书，就回加拉加斯，同我一起在麻风病院中工作。然而这个计划却注定是无法实现的。一直等到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我才在哈瓦那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办公室里和已经担任银行行长的切重新见面。这一天是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

“切在迈阿密逗留了整整一个月。他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不过他答应替奇奇娜买的那件镶花边的连衫裙还是给她买了。他在迈阿密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在当地的图书馆里消磨时间。讲到这里，有关我们旅行的故事就结束了。

“一九五二年八月，切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读书，一面准备毕业论文，题目是过敏性反应问题，一面准备毕业考试，要考的科目有十二项之多。他在这上面一共花去了五个月的时间。他急于想离开大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拖到下一个学年毕业，他就不得不按照新的规定参加‘正义主义’的考试，所谓正义主义是庇隆的一种社会政治主义，而他显然是厌恶这种主义的。

“一九五三年三月，切终于拿到了皮肤科医生证书，证明他是皮肤病学的专家，但是他还不能认为自己是个自由的人，他被征入伍。切不愿意到‘大猩猩’的军队里去服役，就洗起冷水澡来，用这样的方法催他的哮喘病发作，发病以后他就到医师委员会去检查，经委员会鉴定，他不适合服兵役。

“现在他真正成为自由人了，他面前有好几条道路任他挑选：他可以在祖国当医生，或者回到加拉加斯，因为那里的麻风病院曾聘请他去当医生，月薪八百美元。可是，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切作了另一种决定，看来，这是他命里注定的。”

“请告诉我，阿尔维托，您和切在加拉加斯分手以后，跟他通过信吗？”

“他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们通过信。我那时深信他会回到加拉加斯来的。后来，他第二次周游拉丁美洲的时候，从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写过一张明信片给我，内容只有一句话：‘小家伙！我到危地马拉去了，以后再写信给你。’从此我们的联系就中断了，直到巴蒂斯塔被推翻以后，我才寄了一封信到哈瓦那去给切，他很快就回了信。他在回信中说，他当初曾经打算同菲德尔一起到加拉加斯来的，因为他病倒了，所以没有来成。这下轮到切急于想到古巴去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迟迟没有动身。一九六〇年，切又写了一封信来，写信的日期是五月十三日，他邀请我们迁居古巴。切在信中问我：‘你能否料到，你所熟悉的那个爱讲空话和喜欢喝马黛茶的人，竟变成了一个为了事业的利益而不倦地工作的人。’

“是的，革命使泰泰变了样，使他成了一个钢铁战士和不知疲倦的劳动者。这一点，当我们在一九六〇年终于来到自由之岛同泰泰会面的时候，就完全相信了。如今，他知道了在青年时代折磨他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他没有改变的只有一点：对于生活上的享受仍旧象从前一样漠然置之，淡泊得很。他总是以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对待他所享的盛誉和声望。他虽然身为革命领袖，身为政府部长，却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斯巴达式的俭朴的生活方式，经常自觉地不让自己过哪怕是最起码的舒适生

活。在人类的一切嗜好中，他大概只占有三种：抽烟，看书和下棋。

“切说过不止一次，一个革命的国务活动家应该过禁欲的生活方式。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许多国家的大多数官员，尤其是那些高官厚禄的人，他们生财有道，盗窃国库，贪污受贿，住在讲究的别墅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一九六〇年，我们迁居古巴，遵照切的建议，在圣地亚哥安家落户，我在当地的大学医学系教书。切对我们说：‘要生活得朴素，别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然，我们并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切的《游击战》一书出版的时候，他送了一本给我，并且写了这样的题词：‘我希望你此生能够闻到火药味和听到人民投身斗争的呐喊声，这是体验强烈的激情的一种升华形式，而这种激情不但不比我们当初在亚马孙河上所体验过的激情逊色，甚至更为有益。’

“切离开古巴之前，又送了一本书给我，而且也题有赠言。他对我说，他要走了；至于到哪儿去，去干什么，当然没有告诉我，我也没有问他。他的赠言是这样几句话：‘我不知道该送些什么东西给你留作纪念。我责成你去从事经济工作，去砍甘蔗。我的住所重又长出了两只脚，出外流浪。而我的睡梦<sup>①</sup>是没有国界的，至少要到枪弹开口讲话的时候……有朝一日，当硝烟消散的时候，定居了的吉卜赛人啊，我等待你来。拥抱你们大家，包括托马斯在内。切’。”

<sup>①</sup> 此词在西班牙语中，还可作“幻想”、“理想”及“睡眠”解。——译者

我问阿尔维托：“使得切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去领导游击运动，除去政治原因外，有没有切个人方面的原因呢？”

“切向来言行一致。他不叫任何人去做他自己所办不到或者任何时候都不打算做的事情。他认为个人的榜样所起的作用并不比空谈理论来得小。在我们许多国家中，个人的榜样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这儿理论家，尤其是‘咖啡馆里的战略家’，向来多的是，可是真正的实干家却很少。然而切是实干家。当年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他不但参加战斗，而且还医治伤员，挖掘战壕，建造小型工厂，直到亲自搬运货物。他既尽了一个指挥员的职责，也尽了一个普通战士的职责。切担任工业部长以后，仍然保持了这样的本色：他参加工地劳动、亲自给轮船卸货、开拖拉机、砍甘蔗。

“从外表上看，他有时显得很严厉，甚至有点粗暴，但是我们，他的朋友们，却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多么关心人，多么富有同情心。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切的那些亲密的同志、朋友和追随者，都以切为榜样，在拉丁美洲许多地方纷纷举起游击战的大旗，当他们中间有人牺牲时，切总是非常难过。有一次，切伤心地对我说：‘米阿尔！当我坐在办公桌旁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却因为不善于运用我的游击战理论正在作出牺牲。’

“他临走以前对我说：‘我永远不会吃了败仗逃回来，与其吃败仗，我宁愿死。’这可不是讲漂亮话。”

阿尔维托从书架上拿下一本切写的《游击战》。

“切是在一九六〇年写这本书的，献给古巴的另一个

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卡米洛已经不幸牺牲。他是  
由卡马圭乘飞机到哈瓦那去的途中遇难的。他的座机也  
许被反革命分子击落了，也许是由于反革命分子暗中破  
坏而在海洋上空炸毁了。

“切在《游击战》的献词中讲：‘卡米洛是我们身经百  
战的战友，是菲德尔在战争的困难时刻所信赖的同志，而  
且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他总是把牺牲精神作为  
考验自己的品格和锻炼部队素质的一种手段……但是，  
我们不应把卡米洛看作是一个孤单的英雄，仅凭他那天  
才的冲动作出了惊天动地的功绩，而应把他看作是人民  
本身的一分子。人民过去培育卡米洛，正如现在培育许  
多英雄、烈士和领导人一样，是经过在严酷条件下所进  
行的战斗反复挑选出来的。

“‘我不知道卡米洛是不是晓得丹东<sup>①</sup>关于革命运动  
的名言：“勇敢，勇敢，更勇敢。”但不管怎样，他以自己的行  
动实践了这句名言；不仅如此，他还给游击队员增添了其  
他一些必要条件的要素：能正确而迅速地分析当时的形  
势和对未来所要解决的问题能事先加以深思熟虑……

“‘他的个性特点就是性格开朗和尊敬人民相结合，  
而正是这一点有时被人遗忘，或未被人所理解，也正是这  
一点使他所固有的一切都打上了卡米洛的烙印。很少有  
人在自己的每个行动上能够留下这样可贵的标记……

“‘卡米洛的忠诚好象是对宗教信仰那样虔诚的。他  
既忠于菲德尔本人（因为菲德尔无与伦比地体现着人民

---

<sup>①</sup> 若尔日·雅克·丹东系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之一，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译者

的意志),也忠于他的人民……

“‘谁杀害了卡米洛?’

“‘是敌人杀害了他,敌人之所以杀害他,是因为想要他死亡……而且他自己的性格也是他致死的原因。卡米洛素来不把危险放在眼里,他把危险当作消遣,戏弄它,嘲笑它,逗引它,操纵它。在这位游击战士的思想中,没有什么阴影可以阻止他的行动或改变他的原定计划。’

“切所描述的卡米洛的一切,也可以说就是切自己的写照。在这段文字中,只消把卡米洛的名字换成切的名字就足够了,您就能看到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和同志的逼真的形象了。

“切就是这样的人。他只可能是这样的人。”

讲到这里,阿尔维托就住口了。旭日的光芒穿过百叶窗射了进来。

我收拾起笔记。

胡莉亚来了,她也是彻夜未眠。

我们喝完最后一杯浓咖啡,就分手了。

### 3. 一次失败了的战斗

我是在危地马拉方才成为革命者的。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他对帝国主义充满了深仇大恨,并且极其藐视它,这不仅因为他具有

高度的政治觉悟，而且因为不久前，当武装的雇佣兵扼杀危地马拉革命时，他曾在危地马拉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者罪恶滔天的侵略行径。

——菲德尔·卡斯特罗

这个口袋里揣着皮肤科医生证书的二十四岁的阿根廷人，究竟向往什么？他为自己选定了些什么目标？为什么又这么匆忙地再度离开祖国？他本人帮助我们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切在古巴革命胜利后曾多次极其坦率地——坦率得到了对自己毫不留情的地步——谈起，他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以前，也就是他在墨西哥把自身的命运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以前，他是个怎样的人。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切在哈瓦那向古巴的医生们发表演说时说道：“我刚研究医学时，在我的思想武库中，并没有我现在作为革命者所持有的观点。我象所有的人一样，希望有所成就，立志成为一个出名的研究家，想通过不懈的劳动，做出一番事业来，以造福人类，但这种志愿只不过是追求个人的成就而已。我象大家一样，是自己环境的产物。”

格瓦拉的转变，发生在他和格拉纳多斯一起旅行期间。他在周游南美太平洋沿岸各国，参观访问铜矿、印第安人的村庄和麻风病院时，是什么最使他感到惊讶？最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陆上，一方面，农民、印第安人、普通劳动者一贫如洗，过着暗无天日的生

活，并且十分落后，而另一方面，那些剥削、掠夺和欺骗广大人民群众的上层人物却贪污腐化、骄奢淫逸。

切在演说中继续说：“我看到人们没有钱替儿童治病，我看到人们由于长年忍饥挨饿，受尽苦难，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以至于做父亲的连孩子死了都只看成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于是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还有一项任务，其重要性并不比成为出名的研究家或者对医学作出重大贡献来得小，这项任务就是去援助这些人。”

然而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才能援助这些人呢？为了改善他们的境况，把他们从无权地位和贫苦生活中拯救出来，使他们享受充分的权利，成为他们自己的命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的真正主人，又应当做些什么呢？

办些慈善事业，“零敲碎打”地进行逐步的改良吗？这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在切之前就尝试过了。但是他们的改良主义活动反而使许多国家益发遭到外国垄断组织的奴役。不！为了改变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命运，使他们从贫困无告和任人宰割的处境下挣扎出来，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只有一个办法，一条出路，那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将邪恶连根拔除。切在首次周游拉丁美洲各国以后，正是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然而他当时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进行这样的革命，关于这个问题，他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模糊的地方；但是尽管如此，他却已经下定了这样一个决心：如果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什么人发动这样的革命，那么他将是这场革命的战士。因此，一九五三年七月，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尔格拉诺”车站，同父母



和朋友们告别时，对他们说，“一个美洲士兵向你们告别了”，正是表达了这个决心。

有个叫丹尼尔·詹姆斯的美国人写了一部切的传记；他为了讨好那些下令杀害切的人，就千方百计歪曲并贬低切的形象，在他所著的那本书中故作天真地问：“为什么象埃内斯托·格瓦拉这么一个高瞻远瞩、追根究底的人不去研究一下其他国家？那些国家正在采取，或者说至少也在试行采取其他的途径——和平的途径。如果他出于对美国的仇恨，无法平心静气地研究美国社会，那么何不研究一下瑞典或以色列之类的国度？那些国度正在进行的社会实验同他的一套想法是比较接近的。为什么他的视野超越不了死气沉沉的单一经济的化身拉丁美洲？为什么他年纪那么轻，思想就已凝固，而不考虑其他实验，也不考虑人类一些老问题的其他答案？”

丹尼尔·詹姆斯提出了这些打动人心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作出回答。因为答案只能是：切之所以选择社会革命这条道路，正是因为数十年来美帝国主义者们在拉丁美洲推行了奴役和专横的政策。美国垄断组织、银行和托拉斯霸占了拉丁美洲各国的主要资源。美国五角大楼、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把干涉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生活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统治集团不仅害怕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害怕任何认真的资产阶级改良措施，因为这种改良措施触犯它们垄断组织的利益，使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破财。

华盛顿对任何改良的尝试都报之以经济制裁和武装

干涉。对于改良主义者，即使是属于最温和的派别，华盛顿也要命令那些专门受过政变训练的“大猩猩”将其颠覆，要不就以讹诈、恫吓或者小恩小惠使之“就范”。例如古巴的希泰拉斯和哥伦比亚的盖坦这样采取独立自主立场的政治活动家，就是由华盛顿下令杀害的；委内瑞拉的加列戈斯这样的开明总统是由华盛顿下令推翻的。而象智利的冈萨雷斯·魏地拉和阿根廷的庇隆这样的“改良主义者”则分别“就范”了；至于象秘鲁的奥德利亚这样效忠于五角大楼的“大猩猩”则上台执政。数十年来，当地的暴君们为了讨好华盛顿和金融寡头，就迫使共产党员以及其他为本国人民的真正的民主和幸福而斗争的战士转入地下，把他们囚禁在恶臭的牢房中，加以拷问和残杀。这一切，年轻的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格瓦拉，正象同他年龄相仿的人、他的同志和朋友一样，全都看到，全都 know。然而，他们从中得出的结论却并不相同。未来的切作出了唯一正确的结论。他明白，要伸张正义必须改变社会制度。

不能说这个结论是切个人的发明，在他之前很久，共产党人就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依据，发出了这样的号召。不消说，年轻的埃内斯托是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的，不仅如此，他也读过他们的敌人的著作。他在资产阶级刊物上看到的不仅仅是对苏联和共产党人的赞扬，确切点说，还有对他们的诽谤和关于他们的最荒诞的谣言。因此有不同的道路可以供他选择。那么是什么促使他选择了革命呢？促使他选择革命的是他亲身的经历和他要为颠沛流离的人服务的良好愿

望。

这是否就意味着，这位未来的革命战士在“贝尔格拉诺”车站跟亲人告别时，就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呢？根本不是。通往共产主义，有各种各样的道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共产主义是灯塔，一开始就替他们照亮了从黑暗王国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而另一部分人，首先必须痛苦地改变对一切重要事物的看法，克服民族局限性，克服他们的环境使他们必然具有的那些偏见和自我中心论，从而放弃旧有的理想，然后才能走向共产主义。埃内斯托·格瓦拉却同中等阶层的其他许多代表人物截然不同，并未背上至死不改的习惯和顽固不化的观点的沉重包袱，否则的话，这种包袱就会使他象隔着中国的长城一般，无法理解新的革命思想了。他正是从推翻这类习惯和观点开始他的精神生活的。不过，积极的纲领在他心里是缓慢地形成和逐渐地成熟的。所以这位未来的革命战士目前还要动身前往加拉加斯，同他的朋友格拉纳多斯一起去医治麻风病人。

切既然要去加拉加斯，那么为什么不到轮船码头或飞机场去，而要到火车站去乘开往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sup>①</sup>的火车呢？他向他的亲属和朋友们解释，他选择这样一条不寻常的路线去委内瑞拉，是因为没有钱购买飞机票或者轮船票。的确，他的钱包并不富足，所以他就搭乘阿根廷人称之为“送奶车”的火车。这种火车每个小站

---

① 玻利维亚的法定首都是苏克雷，而实际上的首都则是拉巴斯。拉巴斯是政府和立法机关的所在地。——原注

都停，通常总有一些农场主从那里把一桶桶牛奶装上火车。不过，象他这样一位医生，到了加拉加斯以后，每月都可拿到八百美元可观的薪金，就不能向什么人借两百美元乘飞机或轮船直赴委内瑞拉吗？不，这里边总有些地方不能自圆其说。到底是哪些地方呢？

切所以要去玻利维亚，是因为他从未到过那个国家，而遍访拉丁美洲各国，是他早已立下的志愿。不过在吸引切到玻利维亚去的不是古代印第安人庙宇的遗址，甚至也不是饥饿和贫穷的克丘亚语族的印第安人，而是玻利维亚的革命。他迫不及待地要亲眼去看看这场革命。

人们称玻利维亚为“坐在黄金宝座上的乞丐”。这个国家拥有不可胜数的地下资源：石油、锡、黄金，然而这一切宝藏都为外国垄断组织所霸占；外国的垄断组织从开采这些矿藏中获得巨额的利润。而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贫穷，愚昧，深受疫病的痛苦，都中了高根毒。这个国家以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种人为主的数百万居民的生活水平，直到不久以前，仍旧是世界上最底的，而儿童的死亡率却是最高。

五十年代以前，外国除了锡和石油垄断组织的经理以外，很少有人对玻利维亚感到兴趣。这个国家的首都拉巴斯位于海拔四千米左右的高原上，几乎是欧洲人所无法攀登的，有“外国人的坟墓”之称。六十年代初，玻利维亚作家路易斯·卢克西奇写道，外国人难得到玻利维亚访问，就象难得到中非的密林或西藏去访问一样。外国人所以把玻利维亚视为畏途，不仅由于它的自然气候，

还由于它的政治气候。那里平均每年发生两次“革命”，而且照例出现十分严重的流血事件。

不妨看看瑞典现代作家阿图尔·伦德奎斯特是怎样描写玻利维亚首都的，他写道：“几条陡峭的街道通往穆里略广场，广场四周是总统府、政府大厦和大教堂。路灯的柱子好象是专门用来吊死总统和部长们的。如果你们嗅觉灵敏，就能识破隐蔽在城郊街道上的一个个秘密出口，所有的大人物，在最后关头，都携带国帑或者大量现金，通过这些出口溜之大吉。矿工们则经常在口袋里装满甘油炸药，在这个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并在这里向政府递交最后通牒。常常发生这样的事：矿工们把政府活动家们撕成碎片，或者一枪把他们打死，然后把尸体从阳台上扔到石子路上。”

这个不平凡的城市不能不引起这位爱好新奇事物的年轻的阿根廷医生的兴趣。玻利维亚首都两极分化的现象虽然吸引着他，但他不是为这一点而去的，他是想亲眼去看看这个国家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一九五二年四月九日，玻利维亚又一次爆发了革命，按次序来说，这是第一百七十九次革命。这次革命同以前发生的一百七十八次革命不同，的确推动了本国历史前进。矿工和农民都参加了这次革命。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获得了政权，这个党的领袖帕斯·埃斯登索罗出任国家总统。新政府把锡矿都收归国有，虽然付给了外国公司大量的赔偿费；新政府还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建立了由矿工和农民组成的民兵。这些措施不管其局限性有多大，仍然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许多有进步倾向的知识分

子和政治活动家，纷纷去玻利维亚取经。埃内斯托·格瓦拉也学他们的样，在去加拉加斯时，特地取道拉巴斯。

切在玻利维亚会见了政府的代表人物，访问了矿工新村和印第安人的山村。他甚至在这个国家的新闻和文化局以及主管土改的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

不消说，即使在玻利维亚，切对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古迹也还是感兴趣的，因此他参观了的的喀喀湖畔提阿瓦纳库地区印第安人的那些神话般的庙宇遗址。切是个摄影迷，他在这里拍摄了几十张从前印第安人膜拜火星神维拉科查神的庙宇“太阳门”的照片。

在玻利维亚，就象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印第安人的古代世界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似魔力的作用；而沉默寡言的、驯服的、同时却是威严的印第安人本身，也象以往一样吸引着他，使他入迷；可是玻利维亚的革命却使他大失所望。这首先是因为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居民印第安人，仍旧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勉强才能生存下去，跟很久以前西班牙征服者统治他们时并无不同。

他对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感到不满和不信任。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活动家不想把革命进行下去，相反却急于刹车，使革命半途而废。他们对华盛顿奴颜婢膝，许多人贪污纳贿，敲诈勒索，从事投机买卖。狡猾的政客把持了工会。至于共产党，直到一九五〇年才成立，还来不及对这个国家的劳动群众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不，玻利维亚革命的时机还没有到来。那么当时，埃内斯托·格瓦拉有否料到，在不远的将来，他命中注定要回到这里来，为这些印第安人——古代强大的印加人部落

的后裔，进行战斗，而且，也正是在这里，将结束他那短促的，然而却是光辉的革命生涯呢？当然，他没有料到。但是他一九五三年对这个国家的访问、游历和研究，以及他当时对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有所“察觉”这一点，对于他后来毅然决然地回到这片高原上来是有一定关系的。

切在拉巴斯结识了庇隆的政敌，年轻的阿根廷律师里卡多·罗霍<sup>①</sup>。罗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曾躲到危地马拉的大使馆内避难。这就使他决意到危地马拉去。

当时，危地马拉的执政者是哈科沃·阿本斯总统；在中美洲的国务活动家中间，象阿本斯这么勇敢是绝无仅有的：他竟然有胆量把拉丁美洲人斥之为“绿色魔鬼”和“他娘的果品公司”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在阿本斯之前担任危地马拉总统的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是个有民主倾向的哲学教授，曾在阿根廷侨居过一段时间，所以有许多阿根廷朋友。其中有些人给罗霍出了几封介绍信。罗霍指望凭这些介绍信能在危地马拉安顿下来。他劝切跟他一起到这个国家去。

切同意做罗霍的旅伴，不过只结伴到哥伦比亚为止。切对玻利维亚革命失望之余，对罗霍这么称赞危地马拉政府，很不以为然。他没有改变初衷，还是想到加拉加斯去，米阿尔正在那里的麻风病院里迫不及待地等候着他。

---

<sup>①</sup> 里卡多·罗霍是个资产阶级政客。切死后，罗霍卑鄙地利用他同切有过的一段交往，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谣言，反动报刊曾予以广泛传播。——原注

罗霍是乘飞机去秘鲁首都利马的。而格瓦拉则和一个叫做卡洛斯·费雷尔的阿根廷大学生，乘公共汽车绕过位于玻利维亚和秘鲁交界处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湖的的喀喀湖，来到了切上次旅行时曾经游历过的库斯科。库斯科的边防警卫队员把他们当做危险的煽动分子加以拘留，但是后来又把他们释放了，只是没收了他们所携带的有关玻利维亚革命的书籍和小册子。不久，这两个旅行者就到达了利马，同罗霍会合。

秘鲁的局势并不使人乐观。华盛顿的喽罗，暴君奥德利亚，统治着这个国家。监狱里塞满了政治犯。在利马逗留过久是危险的。于是罗霍、费雷尔和格瓦拉设法筹措了一些旅费，就乘公共汽车沿太平洋岸前往厄瓜多尔。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他们越过了秘鲁国境，进入厄瓜多尔。

他们三人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市向哥伦比亚领事馆申请护照，领事答应签发，不过要他们首先出示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飞机票。哥伦比亚刚又发生了一次政变：罗哈斯·皮尼亚将军推翻了暴君劳雷亚诺·戈麦斯。领事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人搭乘象公共汽车这样的大众化交通工具在他国内旅行，是不安全的。

要是这三名旅行者身边有飞机票，当然会乐意拿出来给这位领事看的，可是他们盘费有限，买不起飞机票，于是只好另走门路。他们手头有一封智利社会党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替他们开的介绍信，介绍他们去见瓜亚基尔的一位社会主义活动家，这人是当地的名律师。他给他们弄到了三张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从瓜亚基尔去巴拿



马的免费轮船票。“绿色魔鬼”常常愿意向贫穷的大学生作些施舍，以证明它“心地善良”……

罗霍心不死，仍然劝格瓦拉同他一起到危地马拉去。他的劝说对切发生了作用，但也可能是报上纷纷发表美国即将出兵干涉危地马拉以推翻阿本斯的消息对切起了作用，总之，切答应不去委内瑞拉，——至少是暂时不去，而改赴危地马拉，并且写了一张仅有一行字的明信片给米阿尔，把这事通知了他。这一行字的内容读者都知道了。

可是这一行人到了巴拿马却分道扬镳了：罗霍继续去危地马拉，而格瓦拉和费雷尔却耽搁了下来，因为他们俩的盘费已经用光。为了哪怕能到达邻近巴拿马的哥斯达黎加，格瓦拉卖掉了他全部的书籍，接着还向当地的一家杂志投稿，发表了几篇描写马丘皮克丘和秘鲁其他名胜古迹的文章。尽管这样，盘费还是凑不齐。他们只好搭乘过路车辆前往哥斯达黎加首都圣约瑟。格瓦拉搭乘的那辆大卡车穿过热带暴雨区时翻了车，他的两条腿和左手都摔伤得很厉害，后来他的左手很久不能自由伸屈。

到了十二月初，埃内斯托·格瓦拉和他的阿根廷朋友已经在圣约瑟的大街小巷上漫步了。圣约瑟是拉丁美洲国家中人口最少的一个国家的首都，当时这个国家的人口仅一百万左右，但是就政治热情而言，这个国家丝毫不亚于其余的国家。

当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许多国家的政治流亡者都云集在圣约瑟。他们在这里进行密谋，策划政变，准备

革命，筹建进行远征的解放军，讨论政治计划、纲领和宣言。他们在当地的酒吧间和咖啡馆里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唇枪舌剑地进行争论，而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再向前进展了。

当时的哥斯达黎加总统也就是现任总统何塞·菲格雷斯。他是一个咖啡种植场主，曾于一九四八年领导过推翻特奥多罗·皮卡多政府的暴动。他加于皮卡多的罪名是后者同情共产主义。然而菲格雷斯并非一般的反动派，他的理想是所谓“第三条道路”，即资产阶级民主制。菲格雷斯谴责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独裁制度，对于这些国家中希望夺取政权的各种人都加以支持。其中不少人当时就侨居在圣约瑟。由菲格雷斯创立的所谓加勒比海特种军团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参加这个军团的都是些猎奇的人、政治流亡者、冒险家和普通的雇佣兵。其中有多米尼加人、尼加拉瓜人、古巴人、危地马拉人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共和派人士；在佛朗哥元首获胜以后，有不少西班牙的共和派人侨居拉丁美洲。

在圣约瑟，格瓦拉会见了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党魁罗慕洛·贝坦科尔特。

贝坦科尔特早年曾一度追随过共产党人。现在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自己在青年时代犯下的这一“罪行”。这个变节者、政客、蛊惑家，想劝格瓦拉相信，在美国统治集团中似乎也有人关心拉丁美洲民主的发展。他断言，没有美国资本的参与，拉丁美洲就不可能取得进步。

格瓦拉一眼就识破了这个口蜜腹剑的“民主主义者”

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果然，贝坦科尔特在一九六八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后<sup>①</sup>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国内采取残酷的恐怖手段，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把共产党撵入地下。

格瓦拉对于贝坦科尔特不仅极其反感，而且深恶痛绝。

可是他对于在圣约瑟认识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多米尼亚人胡安·博什，却十分欣赏。博什是位有才华的作家，著有不少描绘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祖国人民的痛苦和忧患的真实而优秀的短篇小说。许多年来，他在拉丁美洲周游列国，揭发暴君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把他的祖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变成中世纪刑讯室的滔天罪行。博什对美帝国主义者不抱任何幻想。美帝国主义者曾不止一次把海军陆战队开进他的祖国“整顿秩序”和确保他们的盟友和同伙“加勒比海豺狼”特鲁希略的地位。后来，胡安·博什也出任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但是他的下场跟崇拜美国的贝坦科尔特截然不同，这位老作家和爱国者，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精心训练出来专门从事刽子手这一行业的“大猩猩”们所颠覆。

在圣约瑟，格瓦拉还会见了一些古巴人，他们都是反对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地下斗争的参加者。

许多年以后，到了一九六三年，切在同古巴《世界报》

---

① 据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国概况》讲，贝坦科尔特是在1958年12月当选委内瑞拉总统的，于1963年底下台。1968年12月当选总统的是该国基督教社会党总书记拉·卡尔德拉，而不是贝坦科尔特。

——译者

记者谈话时讲起，他在十一岁上第一次对古巴发生了兴趣。那时古巴的一位象棋大师何塞·劳尔·卡帕布郎卡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少年格瓦拉是个狂热的象棋迷，自然对卡帕布郎卡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使格瓦拉对古巴发生兴趣的，可以说，也只有这一件事。也许，格瓦拉在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玻利维亚途中，曾在报上看到过一段消息，报导有位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年轻律师率领一批勇士，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城攻打“蒙卡达”兵营而没有成功。我们所以说“也许”，是因为切本人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谈起过这件事。何况他当时即使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也未必会特别加以注意的。青年同警察发生冲突，在拉丁美洲各国是早已司空见惯的了。再说，切当时又怎能料到正是美国人厚颜无耻地称之为“我们的殖民地”的古巴岛，正是这个美国的糖罐，不久以后将成为革命战争的战场，成为西半球第一个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国家，并且正是他本人将注定在这些事件中起杰出的作用呢？

况且，格瓦拉在圣约瑟遇到的第一批古巴人，能讲给他听的无非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士们攻打“蒙卡达”遭到了失败，其中许多人英勇牺牲，幸存下来的都被捕了。不错，这些战士都是英勇的小伙子，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但是有什么用呢？他们要同武装到牙齿而且又有美帝国主义作为后台的巴蒂斯塔军队搏斗，是力不胜任的。要知道关于当时的古巴有这么一种说法：“这是个永远太平无事的国家”，言下之意这个岛国看来已被牢牢地捆在北部巨人的马车上了，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变故。

总而言之,当时大家瞩目的中心,并不是囚禁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兄弟劳尔以及“蒙卡达”一战中的其他英雄的古巴,而是危地马拉,黑云正越来越浓密地笼罩着这个国家。据报纸透露,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和刑事犯,在危地马拉邻邦洪都拉斯的独裁者(这人曾担任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法律顾问)的庇护下,麇集到洪都拉斯,由准备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的“杀人专家”教授他们杀人技术。危地马拉的一名中校卡斯蒂略·阿马斯被指派为雇佣军头目。这人在一九五〇年曾发动暴乱企图推翻阿本斯政府而没有得逞,便逃到洪都拉斯。他在洪都拉斯投靠了“绿色魔鬼”。为此,美国人每月赏给他十五万美元,供他招募雇佣兵和购买武器之用。武装干涉的筹备活动完全是明目张胆的,而且华盛顿官方还恬不知耻地声称,这项活动是在它的赞许和支持下进行的。

应当快点到危地马拉去。一九五三年末,埃内斯托·格瓦拉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阿根廷人结伴,乘坐公共汽车,由圣约瑟出发,去圣萨尔瓦多,再由圣萨尔瓦多搭乘过路车辆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危地马拉共和国的同名首都危地马拉城。

危地马拉城位于海拔一千八百米的山地上,是中美洲最“高”的首都,附近有好几座火山。这个城市曾不止一次被地震毁坏。城内大都是小巧的平房,隐没在绿荫丛中。所有的公园里都有许多鸣禽啼鸟,其中有一种珍禽,叫帖桑特列鸟,外表很象麻雀,可是鸣声极其悦耳,有“百音鸟”之称。危地马拉的象征也是鸟,是一种叫做格查尔

的鸟，这种鸟娇小玲珑，尾羽修长，五彩缤纷，十分美丽，但是把它关进笼子就会死去。

格瓦拉立刻就爱上了这个城市。他觉得这个城市的空气清新得就象阿根廷的山城阿尔塔格拉西亚一样。他手头有几封介绍信，介绍他去见危地马拉的活动家。此外，他在利马的一个熟人还替他写了封给秘鲁女革命家伊尔达·加德亚的介绍信。伊尔达是一个混血儿，她的血管里流着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血液，毕业于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经济系，是被秘鲁独裁者奥德斯亚将军宣布为非法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左翼积极分子。伊尔达在危地马拉的全国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中工作，她象许多左派政治流亡者一样，拥护阿本斯政府。切在一幢叫做“塞万提斯”的公寓里找到了伊尔达。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侨民全都居住在这幢公寓里，于是切也就在这里下榻。

伊尔达·加德亚跟格瓦拉一样，游历过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爱好艺术，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观点和爱好很快就使这两个年青人亲近起来。

伊尔达·加德亚在她的回忆录中谈到这位年轻的阿根廷医生给她的印象时，说：

“埃内斯托·格瓦拉医生才同我作了几次交谈，我就对他的智慧、一丝不苟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知识非常叹服……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手头还有医生证书，如果留在国内，名利地位之类本来是唾手可得的，就象我们这些国家内一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那样。可是，他却迫不及待地到最落后的地区去工作，甚至分文不

取地替老百姓治病。不过，最使我钦佩的还是他对医学的态度。他曾十分气愤地讲给我听，他在南美各国旅行时所亲眼目睹的我们人民的贫穷状况和极不卫生的居住环境。我至今记得很清楚，我们曾因此而讨论过克朗宁<sup>①</sup>的《城堡》和描述医生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其他作品。埃内斯托从这些作品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些国家的医生，不应该是享有特权的专家，不应该为统治阶级效劳，不应该为那些无病呻吟的人去发明一些既吃不好又吃不坏的药品。如果这样做，自然可以名利双收，可是我们国家有觉悟的青年专家是否应当去追求这些东西呢？

“格瓦拉医生认为做一个医生必须献身于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而这个观点又必然促使他去谴责我们这些国家内为寡头政治所操纵的政府系统，美帝国主义对我们这些国家的干涉一直在变本加厉。”

格瓦拉在危地马拉城又遇到了一些古巴侨民，他们都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友。其中有绰号叫“涅哥”的安东尼奥·洛佩斯·费尔南德斯、马里奥·达尔毛、达里奥·洛佩斯等人。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格拉玛”号的远征。他们把古巴战士反对暴君巴蒂斯塔的英雄事迹讲给格瓦拉听。他们希望危地马拉革命能改变加勒比海地区的力量对比，使其有利于巴蒂斯塔的反对者，并帮助他们推翻这个可恶的暴君。当时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来到危地马拉的流亡者也都抱着这种希望，因为他们各自的国家无不处在暴君的统治下，而这些暴君都是美帝国

<sup>①</sup> 克朗宁：英国作家，生于1896年，《城堡》是他的主要著作。——译者

主义的忠实仆从。

看来，格瓦拉在危地马拉找到了个人幸福和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渴望积极参加危地马拉革命，在危地马拉革命中当一名战士，拿出行动来，为老百姓做些有益和有用的事情。要知道，他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不远千里到这个国家来的。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能达到目的。

总之，埃内斯托·格瓦拉是到危地马拉来参加革命的。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哈科沃·阿本斯政府为了保卫危地马拉的民族利益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个政府通过议会制订了土地改革法，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五十五万四千公顷，其中包括“他娘的果品公司”的土地十六万公顷，并经其力争，使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一倍，此外，这个政府还遵循民主和自由的原则。这些措施使华盛顿统治集团勃然大怒。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的主要助手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股东。而杜勒斯手下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凯波特·洛奇<sup>①</sup>又同“他娘的果品公司”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这个凯波特·洛奇在约翰逊当总统时出任美国驻西贡大使，竭力主张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后来又代表美国在巴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谈判。而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当了美国总统派到罗马教皇那里去的私人代表，结束了他外交官兼间谍的生涯。

---

<sup>①</sup> 此人的姓名应为亨利·凯波特·洛奇；原书作约翰·凯波特·洛奇疑有误。——译者



当时美国政府派了著名的间谍和破坏工作者约翰·普里弗伊出任驻危地马拉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推翻阿本斯。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话来说：“普里弗伊早先曾经担任驻希腊大使，因此很清楚共产党人的策略。他很快就能对阿本斯政府的性质作出毫不含糊的结论。”

那么这个老牌间谍究竟作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他在阿本斯政府被颠覆以后，才透露说：“我立即看出这个人(阿本斯)的思想和谈吐都象共产党人，假使说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公开表现出来，那么今后是会表现出来的。我把这个看法报告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而他呢，报告了艾森豪威尔总统。”

自从普里弗伊将其看法报告美国政府之后，美国的反动报刊便开始对“共产主义的”阿本斯政府大加攻讦。美国的报刊用“危地马拉是中美洲的红色前哨”、“加勒比海已成为共产主义的内湖”等等带有挑拨性的通栏大标题混淆视听，企图使人们相信，危地马拉似乎已经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并且几乎要危及强大的金元帝国的生存了。

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开始明目张胆地叫嚷要推翻阿本斯。约翰·普里弗伊大使在《时代》周刊上声称：“美国决不容许在得克萨斯和巴拿马运河之间产生一个苏维埃国家。”负责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凯波特·洛奇肯定危地马拉政府是靠“克里姆林宫的津贴”过日子的，是“莫斯科的傀儡”，他断言这种局面将很快结束。讨伐队这个角色自然由卡斯蒂略·阿马斯为首的雇佣兵来充当，上面提到的约翰·普里弗伊就同阿马斯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那么阿本斯政府果真是“共产主义”的吗？绝对不是。阿本斯是个职业军人，还是在暴君豪尔赫·乌维科（这人的绰号叫“加勒比海的拿破仑”）执政时期就在军事学院毕业，成绩优良。一九四四年，阿本斯参加了推翻乌维科的军事政变，后来就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自由派政府中任国防部长。一九四五年，阿雷瓦洛总统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苏联无论是在阿雷瓦洛执政时期，还是在阿本斯执政时期，都没有在危地马拉设立大使馆，正象危地马拉过去也从未在莫斯科设立过大使馆一样。

一九五〇年秋，阿本斯上校当选危地马拉总统。他获得二十六万七千张选票，而他的几个对手总共才获得十四万张。凡是主张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都支持阿本斯。年轻的危地马拉劳动党（即共产党）也支持阿本斯竞选总统。然而当时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势力非常有限。它是在一九四九年才成立的，一共只有几百名党员。在国民议会五十六个议席中，它仅占四席。

阿本斯政府虽然是进步的，然而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具有这种政府所固有的动摇和犹豫。何况参加这个政府的还有一些明显的保守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象格瓦拉这样一位坦率地道出了自己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年轻阿根廷医生，难以在危地马拉立足甚至几乎无法立足，也就不足为奇了。

格瓦拉向卫生部长自荐，愿意去危地马拉最边远的地区佩腾湖热带丛林中的印第安人村社当医生。他还表示，除此而外的其他任何工作，只要有利于革命的，他都

愿意去做。但是政府官员对待这位年轻的阿根廷人的申请却十分冷淡，要他首先交验他的医生证书，而办理这个手续是十分复杂的，至少需要花一年时间。

格瓦拉必须设法挣到几个小钱以便维持一日三餐。于是他就给当地的报刊写写简讯，沿街兜售书籍，就靠做这些工作所偶尔挣得的钱来勉强糊口。伊尔达开玩笑说，这些书他看的比卖掉的多。他还跟危地马拉劳动党的青年组织爱国主义劳动青年团进行合作，背着背囊去危地马拉各个地方旅行，研究印第安人中玛雅人的古代文化。

格瓦拉当时所有的朋友都指出，他是一个爱好争论的人。他那时同他的朋友们主要争论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依靠什么力量，才能把拉丁美洲人民从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从剥削制度和贫穷生活中解放出来。他的朋友们都是年青人，渴望发生变化，渴望斗争。他们常常就阶级斗争、土改的必要性、工人阶级的作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反复争论，争得连嗓子都哑了。

但是格瓦拉跟他当时的某些朋友不同，他不仅争论，而且还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在危地马拉结识的一位古巴革命家马里奥·达尔毛回忆说：“那时他已经树立了相当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仔细地研究了马克思和列宁。读完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文献。”

危地马拉局势急转直下，使得格瓦拉极其不安。在这个国家内到处都是美国的间谍和特工人员。格瓦拉就

曾经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了美国的所谓研究拉美各国共产主义的著名“专家”罗伯特·亚历山大教授。

当时，格瓦拉对他的旅伴说：“外国佬可真多呵，真多呵！依你看，他们钻到这里来有什么目的？他们说是在来考察，其实却是按照美国情报机关的指示来搞间谍活动的。”

美国政府准备给桀骜不驯的危地马拉套上“紧身衣”。一九五四年三月，由于华盛顿坚决要求，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召开了第十届泛美会议。福斯特·杜勒斯在会上指控危地马拉实行共产主义。在杜勒斯的压力下，会议不顾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反对，通过了一项反对共产主义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核准了它对危地马拉的武装干涉。

阿本斯坚决否认他同共产主义或者共产党人有任何来往，而且还举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同苏联也毫无联系。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阿本斯在致共和国国会的咨文中写道：“即使是最善于探听内情的人也无法否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苏联都从未干涉我们的内政，也从未以武装干涉威胁过我们。”

不过，阿本斯并不反对共产党人，也不反对苏联。正是这一点，华盛顿的头子不能原谅他。一条沙丁鱼竟敢不听鲨鱼的话！香蕉国竟敢向它的君主山姆大叔挑衅！这是对“神圣的”门罗主义的闻所未闻的破坏，对于阿本斯政府的行为只能加上这样的罪名。当华盛顿深信任何威胁和经济制裁对阿本斯都已经起不了作用时，就决定放出一批鹰犬来对付他。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由美国间谍所武装和训练的阿马斯匪帮，从洪都拉斯侵入危地马拉，占领了几个边境村庄，开始屠杀阿本斯政府的拥护者。武装干涉者的军用飞机也开始轰炸首都和该国其他战略据点。

武装干涉者的兵力总共只有八百名雇佣兵，其中危地马拉人仅占两百名，其余都是外国人。而阿本斯政府却拥有一支六千到七千人的军队。但是在武装干涉初期，政府军却避免同雇佣军交战，撤退到了内地。

阿本斯总统指望和平解决争端，他就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诉，要求武装干涉者立即撤退。在安理会上，苏联代表支持危地马拉的申诉案。他发表声明说：“危地马拉遭到了从陆上、海上和空中的武装袭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桩彻头彻尾、明目张胆的侵略事件：是对中美洲的一个主权国家危地马拉的公然进攻，而危地马拉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因此安理会有责任和义务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制止侵略，这是安理会责无旁贷的事，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代替安理会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安理会却无视危地马拉和苏联的坚决要求，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对危地马拉的侵略。

危地马拉的劳动人民呼吁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抵抗雇佣军，要求发给武器，组织民兵，动员全国人民保卫祖国。政府虽然拒绝武装人民，但是在群众的压力下，还是作了让步，下令军队把雇佣军逐出国境。危地马拉军队随即转入反攻，把雇佣军匪帮打得一败涂地，雇佣军的残部抱头鼠窜，逃回洪都拉斯。

雇佣军的溃败使华盛顿惊慌失措。美国中央情报局、

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所策动的对民主危地马拉的侵略，眼看就要成为泡影，对此美国“公司”是不会原谅他的仆从的。当时，美国垄断组织的喉舌《纽约先驱论坛报》曾发表一篇评论谈到了这一点，评论讲道：“危地马拉政府军计有六千人，都是按美国方式训练的。如果这支军队打败了反共战士阿马斯，那么它将对美国陆军部长感恩不尽。五角大楼的领导人现在可以看到了：在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政府中保留一个军事顾问团，是一种多么大的讽刺。如果起义者遭到失败，美国顾问应予全部召回。”

阿马斯在华盛顿的靠山们对于评论中的暗示是心领神会的。他们看到，把希望寄托在雇佣军身上显然打错了算盘，便改而利用他们的那些代理人（这些人在此之前一直伪装拥护阿本斯总统），狂热地准备用军事政变的手法推翻阿本斯。在这次战役中普里弗伊亲自出马，扮演主角。他写了一份最后通牒，由高级军官们将其递交阿本斯。他们迫令阿本斯辞职，威胁他说，如果不肯辞职就要将他推翻。这些阴谋家们为了遮人耳目，答应尊重“全体公民的自由和生命”，继续同雇佣军斗争。阿本斯顶不住这股压力，竟没有征求一下支持他的各党派的意见，便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辞去总统职务，把政权拱手让给危地马拉武装部队司令迪亚斯上校，自己则到墨西哥大使馆中避难，很快就从那里出国了。迪亚斯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禁危地马拉劳动党，逮捕这个党的领导人，然后就让位给普里弗伊的走卒蒙松上校；不久，卡斯蒂略·阿马斯率领雇佣军重又侵入危地马拉，于是蒙

松又把政权让给阿马斯。几天之后，阿马斯这个刚刚上台的独裁者就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首都，受到了各色各样的反动派、当地的大主教和普里弗伊的欢迎。而在此之前，那里早就开始大规模屠杀已经倒台的阿本斯总统的拥护者了。

在这些对于危地马拉来说异常严酷的日子里，埃内斯托·格瓦拉在做什么呢？他象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一样，强烈希望拿起武器，为保卫阿本斯总统的政权而战斗。他呼吁建立民兵，武装劳动人民，用断然措施来对付那些密谋政变的反动派。但是他的呼吁就象其他头脑清醒的人所发出的类似的呼吁一样，并未得到反应。因为阿本斯指望靠军队把雇佣军解决掉，他相信军官们是忠于他的。

据伊尔达回忆，“格瓦拉曾请求派他到战区去，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于是他就到城市防空小组去找些事做做，每遇空袭就帮助这些小组工作，此外还搬运武器……”

无论什么样的工作，格瓦拉都不鄙弃。马里奥·达尔毛证实说：“他同爱国主义劳动青年团团员一起，出生入死，在发生火灾和敌机轰炸时，担任警卫。”

这个年轻的阿根廷人一再号召危地马拉人起来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而战斗，自然就引起了密切注视危地马拉首都事态发展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的注意。美国暗探局把格瓦拉载入了开列着“危险的共产党人”名字的黑名单，暗探局计划在推翻阿本斯以后就立即把黑名单上的人全部干掉。阿根廷大使得悉这件事后，连忙赶到“塞万提斯”公寓，告诉这位同胞，他正面临生命

危险，并建议他运用到大使馆避难的权利。卡斯蒂略·阿马斯进入危地马拉后，格瓦拉就住进阿根廷大使馆。在阿根廷大使馆中避难的还有其他同情阿本斯的阿根廷人以及古巴人和一些危地马拉人。这批人分成两个派别：一派是“民主主义者”，一派是共产党人。格瓦拉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毫不犹豫地靠拢后者。

阿根廷大使建议格瓦拉用公费返回阿根廷。但是格瓦拉无意回到庇隆执政的阿根廷去。他宁愿去墨西哥，因为他的那些古巴朋友和其他拉丁美洲朋友都到墨西哥去了，准备换个地方继续斗争，并没有丧失在新的地方取得胜利的希望。既然现在还有这样一些勇敢的人幸存下来，既然他们深信不可能办到的事也可能办到，那么还不是毫无前途的。

危地马拉事件在切的思想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决定阿本斯政府命运的屈指可数的几天中，切在政治上成熟了。他又一次通过亲眼目睹的事实，深信阴险而残酷的美帝国主义者是主要的敌人；深信他们反苏反共无非是借以掩饰他们的罪行；深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在军界有其忠实的代理人；深信一场真正的人民革命必须摧毁这种军事机器，并建立人民的军队来代替它；末了，他深信必须武装人民，因为只有战斗的人民才能在同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胜利。

切的这种进步，美国间谍机关是发觉了的。后来，美国暗探局着手为战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友们立档时，在他们心目中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无疑是一个经历过“危地马拉革命”的革命



者。

一九五八年四月，阿根廷记者豪尔赫·里卡多·马塞蒂去马埃斯特腊山区访问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士们。在他访问的人中间就有切。马塞蒂问他的这位同胞：有关菲德尔·卡斯特罗搞“共产主义”的传说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切回答说：

“菲德尔不是共产党员……人们首先以为是我在搞共产主义。凡是来过马埃斯特腊山的美国记者，没有一个不盘问我在危地马拉共产党内干过些什么活动。他们认定我是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党员，而他们的根据无非是我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哈科沃·阿本斯上校的民主政府的坚定的崇拜者。”

“那么你在阿本斯的政府中担任什么职务呢？”马塞蒂追问道。

“没有，没有担任任何职务。不过当北美开始侵犯这个国家时，我曾试图组织一批象我这样的年青人，起来反击这帮‘果品’冒险家。当时危地马拉应当战斗，可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进行战斗。应当反抗，可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进行反抗。”

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切曾不止一次在演说和书信中回忆他的“危地马拉时期”。他在一九六〇年所作的一次演说中说：

“在长途旅行以后，我到了危地马拉，阿本斯的危地马拉。我本来打算写些札记，以便制订革命医生的行动准则。我打算弄清楚，要当一个革命的医生，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可是这时开始侵略了。这场侵略是由‘美国联

合果品公司’、美国国务院、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它们其实是三位一体——以及它们的一个叫做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傀儡策动的，现在这个傀儡已经进棺材啦！<sup>①</sup> 它们的侵略得逞了，因为当时的危地马拉人民还没有达到今天古巴人民的这种成熟程度。我只得离开危地马拉，确切点说，我只得逃出危地马拉……那时，我懂得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当一个革命的医生，首先需要的是革命。至于个人奋斗，纯洁的理想，渴望为最高尚的理想献身以及在美洲的某一穷乡僻壤单枪匹马地去反对阻挠历史前进的敌对的政府和社会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为了干革命，就必须做古巴现在所做的事：动员全国人民；人民在运用武器和运用从斗争中所取得的团结方面的经验的时候，就会认识武器的意义和人民团结的意义。”

是不是只有革命的医生才需要人民的支持呢？不，不只是革命的医生才需要。任何一个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战士，只有投身到全国人民的斗争中去，只有争取把一切反帝的和反对各种压迫的力量统统团结起来，才可能有所成就。也是在一九六〇年，切给在美国当记者的一个自己人写了封信，所谈的正是这一点。切在信中讲道：“我曾经在阿本斯的危地马拉待过。阿本斯敢于起来抵抗殖民主义，可是结果却成了北美垄断资本家侵略的牺牲品。我在危地马拉的经历使我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要当一个革命者，首先需要有革命存在。”

---

<sup>①</sup> 卡斯蒂略·阿马斯是在1955年被他的一个保镖暗杀的。——原注

玻利维亚革命半途而废，危地马拉革命遭到失败，然而真正的革命还在前头，迎接这场革命的时刻快要来到了……

#### 4. “格拉玛”号

在墨西哥一个凉爽的夜晚，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相识了。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谈话谈的是国际政治问题。就在当夜几个钟点后，等到拂晓时，我就成了未来的远征军的一员。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阿根廷驻危地马拉大使，费了很大的周折才获得危地马拉新政府的准许，让切离境。这位大使又为他所保护的人向墨西哥大使申请到了入境签证，替切买了一张去墨西哥城的火车票，把他送到郊区的火车站乘上了火车。

列车行驶得同一年前格瓦拉去拉巴斯时所乘的“送奶车”一样缓慢。它吃力地穿过浓密的热带灌木丛，向前行去，有时傍着太平洋岸，有时又远远离开了太平洋。一路的车站上，冷冷清清的，只有士兵在来回巡逻，使人想起这个国家正在戒严。

那么切在看见这些巡逻队时，想些什么呢？很可能他是在想，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它在这个国家的傀儡又一

次取得了胜利。这种事情在这类“香蕉国”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在暴君的蹂躏下，人民流了多少鲜血啊。

纵然如此……纵然人民群众似乎接二连三地遭到挫折、失败、叛卖，他们的希望似乎接二连三地遭到幻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人民，就是那些不久以前还遍体鳞伤、血流如注、受尽折磨的人民，重又向他们自古以来的敌人冲去，虽然他们明知不消多久，他们的反攻又会遭到失败的。看来，人民中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革命火种，尽管他们会遭到千万次挫折，但是这种火种最终必然会把他们引向胜利。如果有一批英明而勇敢的领袖的话，那么人民就可能提前取得胜利。阿本斯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不过他在经受考验的时候却表现软弱，所以他的政府就轻而易举地被人颠覆了。

格瓦拉的思路被一阵怯生生的敲门声打断了。一个矮小得简直象个小孩子一样的男人，拎着一只小手提箱走进了格瓦拉所乘的卧车的单间。进来的人自我介绍说：

“鄙人叫胡利奥·罗伯托·卡塞雷斯·巴列。”

过了不到半小时，这位旅伴就把他简单的经历统统告诉了格瓦拉。他是个初出茅庐的记者，危地马拉劳动党党员，现在正躲避追捕，逃到墨西哥去。

“叫我帕托霍好了，”他对切说。“这是危地马拉土话，意思是‘小个子’。”

帕托霍比切小几岁，以后成为切的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仅次于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帕托霍作为共产党员，必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尽管遭到了失败，他还

是坚信他的理想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古巴革命胜利以后，帕托霍为了他的祖国的自由，回到危地马拉，拿起枪杆，上山战斗。后来，他牺牲了。切特地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切在悼文中谈到帕托霍是个聪明、机智、富有进取心的坚强的共产党员，并且指出，危地马拉事件使帕托霍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切写道：“革命使人纯洁，使人完美。这就象有经验的老农改良农作物一样，剔除其缺点，而发扬其优点。”

帕托霍象切一样爱好诗歌，并且自己也写诗。这也是使他们接近的原因。切在上面提到的悼文中说，帕托霍离开古巴前把他写的诗集留给了切。切在悼文中援引了帕托霍写给他女友的一首诗：

收下吧，  
这只是我的一颗心，  
用你的手把它捧紧。  
等到天亮，  
松开手，让它晒晒太阳。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埃内斯托和帕托霍抵达墨西哥城。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他俩在这个城市中都举目无亲。

切和帕托霍结识了一批波多黎各侨民，这事完全出于偶然。他们在寻找栖身的地方时，有人给他俩指点了波多黎各人胡安·胡亚尔韦的寓所。这人果真租给了他们一个小房间。胡安·胡亚尔韦是国民党的著名活动

家。波多黎各国民党一贯主张波多黎各独立，因为这个岛国自一八九八年被美国佬侵占后，就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了。这个党的一些活动家想促使社会舆论注意波多黎各人贫穷的状况，有一次趁华盛顿召开国会会议，去会场打了几发冷枪。于是这个党在波多黎各和美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党的领袖阿尔维苏·坎波斯被判处长期徒刑，囚禁在美国一个关押苦役犯的监狱中。

这些波多黎各革命者不可能不博得格瓦拉这个阿根廷人的好感。虽然他们总共寥寥数人，却敢于反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敢于向它宣战，并随时准备为此而殉难。他们对自身事业的正义性所持有的坚定的信念，他们的理想、勇气、真诚和热情，以及尽管在当时他们毫无获得成功的希望却仍然全力以赴的这种精神，都是令人钦佩的。所以对他们抱有好感，还因为他们并不是那种只会夸夸其谈地讲些空洞而漂亮的革命词句的人，而是实干家。至少他们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而是真正的人，如果有必要，他们就准备拿起武器为他们的自由而战斗。

胡安·胡亚尔韦的寓所里还住着一个政治流亡者，这人就是年轻的秘鲁人刘乔（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刘乔念念不忘在秘鲁发动革命，他是当时统治秘鲁的独裁者奥德利亚上校不共戴天的政敌，他的理想是鼓动印第安群众起来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后来他成为古巴革命的拥护者，并在秘鲁一个山区领导过一支游击队。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在同“突击队”作战时不幸牺牲，所谓“突击队”就是由美国特工人员精心教练

出来对付游击队的特种部队。

胡亚尔韦的大家庭，尽管是好客的，却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

不过青年人是不把吃饭问题看得很重的。

切在回忆当初的情况时，说：“我们两人那时的处境非常困难……帕托霍一文不名，我总共只有几个比索。我买了一架照相机，于是我们就到各个公园里去偷拍照片。然后由一个墨西哥人，帮我们把这些相片洗印出来，因为他有一间小小的洗印暗房。我们走遍了墨西哥城，向顾客们推销我们拍摄的那些很不高明的相片，因而熟悉了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我们为了劝人家买下我们的相片，不知费了多少唇舌，说了多少好话，比方：我们拍摄下来的这个孩子多么可爱啊，为了这么一个迷人的孩子，花一个比索不消说是值得的，等等。有好几月的工夫，我们就是靠了这桩买卖糊口的。我们的生活多少上了点轨道……”

切写成了一篇文章，篇名叫《颠覆阿本斯目击记》，可是他为了谋得一个记者的职位而作的努力，却都落空了。

这时，伊尔达从危地马拉来了。她同切结了婚。如今切不仅要关心自己，还要关心妻子，因此不得不找个工作做做。于是切又重操旧业，替当地一家出版各类社会问题书籍的“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当书贩，沿街兜售这个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然而，切是一个很不称职的书贩，他同出版商争论这些书籍的内容所花去的时间，比上街去卖书的时间还要多。

切始终是个书迷。为了有机会看到新书，有一回，他应募到书籍展览会去当守夜人，一到夜里就“狼吞虎咽”地读着一本又一本书。末了，他总算考进了市立医院，在这家医院过敏性反应科内工作。有一段时间，他在国立墨西哥大学医学系任教，后来又转到心脏病学研究所从事科学研究。他还得到了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的允许，让他在该院的实验室内用猫进行实验。这些猫他是向一个老婆子买来的，一个比索一只。

当时墨西哥的政治气氛并不能激起切任何强烈的希望。一十年代，推翻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反动政权的墨西哥革命<sup>①</sup>早已声息全无。上台执政的是所谓新资产阶级，他们唯利是图，用假革命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来掩饰他们所干的勾当。他们敞开国门，听任美国资本侵入墨西哥。左翼力量发生了分裂，因而分崩离析。共产党经常遭受迫害，没有足够的实力把一切进步力量统一起来，进行强大的反帝革命运动。

切热爱墨西哥，热爱它的劳动人民，热爱它的艺术家和诗人，热爱它古老的印第安文化，热爱它瑰丽如画、花木繁茂的自然景色和山区清新洁净的空气，这种空气对于切时常要发作的气喘病来说是一剂良药。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五日，伊尔达生了个女儿。为了表示对母亲的尊敬起见，给婴儿取名小伊尔达。切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接见墨西哥《永久》周刊的记者时谈到：“当我的女儿在墨西哥城出生时，我们本来可以让她根据母

---

<sup>①</sup> 指1910年在墨西哥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次年推翻了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译者



亲的国籍登记为秘鲁人，或者根据父亲的国籍登记为阿根廷人。两种做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当时只不过是暂居墨西哥的旅客。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决定让她入墨西哥籍，表示对墨西哥人民的感激和尊敬。正是他们在我们遭到失败而流亡的困难时刻收容了我们。”

切在墨西哥认识了反对巴蒂斯塔的古巴作家和政论家劳尔·罗亚。劳尔·罗亚在推翻巴蒂斯塔后，出任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他在回忆他同格瓦拉初次见面的情况时，说：“一天夜里，在切的同胞里卡多·罗霍家里，我认识了切。切刚从危地马拉来。他在危地马拉平生第一次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反帝运动。在我们见面时，运动的失败还使他感到十分痛心。

“切那时不但外貌看上去年轻，实际上也是年轻的。他当时的形象，我至今记忆犹新：长着一头浓发，天庭饱满，下巴显得刚毅有力，目光炯炯，十分锐利，笑声爽朗，脸庞由于节制饮食而显得苍白，呼吸由于气喘病而显得迫促，但是举止却十分从容，讲起话来不徐不疾，侃侃而谈，他的头脑很清醒，才思很敏捷，而且也很有胆识……

“那时他刚到心脏病学研究所过敏性反应科工作。我们议论了阿根廷、危地马拉和古巴的问题，而且是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分析这几个国家的问题的。早在那时，切就已经超越了欧洲裔民族主义者狭隘的视野，站在全大陆性的革命者的立场上来判断问题了。”

这位阿根廷医生和其他许多侨民不同。那些人所担忧的仅仅是自己祖国的命运，而切所考虑的与其说是阿

根廷，不如说是整个拉丁美洲；他竭力在寻找拉丁美洲的“薄弱环节”。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切那次在同罗亚交谈时，虽然已经知道了古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看来却并不认为古巴就是这个环节。

切只有在遇到那些已经行动起来的人，遇到那些不作无谓争论，而是号召立即斗争的人之后，才会在所有拉美国家中，特别重视古巴。他先认识了劳尔·卡斯特罗，后来又认识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这就使他开始重视起古巴来了。

一九五五年六月底，有两个古巴人到市立医院门诊，正巧遇到埃内斯托·格瓦拉医生值班，由他来替他们看病。他认出其中一个是在危地马拉时的朋友涅哥·洛佩斯。这次意外的重逢使他们俩都喜出望外。涅哥告诉切说，他那些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同志都遇大赦出了狱，如今正来墨西哥城会合。他们在筹划对古巴的武装远征。这倒是一桩真正的事业！切表示对此很有兴趣，于是涅哥建议介绍他去认识认识劳尔·卡斯特罗。

几天之后，切就同劳尔·卡斯特罗会晤了。劳尔谈了“蒙卡达”的那段历史；谈了巴蒂斯塔大兵们大肆屠杀的兽行；谈了对他的哥哥菲德尔的审讯；谈了他哥哥在法庭上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这次演说后来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为题而闻名于世；谈了他们在松树岛监狱中所受的苦难；最后还谈了他们要把打倒暴君巴蒂斯塔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那么他们彼此间的印象又怎样呢？事后，切在谈到劳尔时，说：“我觉得这个人和其他人不同，至少他讲得比

别人好。除此之外，他还善于思考。”

劳尔对切也感到满意。他立刻就看出这个人对于正在筹划中的远征是很有用处的。切有“危地马拉经历”，而且又是个医生。他们两人约定，由劳尔介绍他去见菲德尔，一两天内菲德尔就要从纽约到墨西哥城来了。

当时，菲德尔在美国向古巴侨民筹募资金，作为未来远征的经费。在纽约的一次声讨巴蒂斯塔的集会上，菲德尔在发表演说时宣称：“我可以完全负责地告诉你们，一九五六年我们要做自由人，否则就成为殉难者。”

这个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把握，他所信赖的是什么呢？他所信赖的，首先是对巴蒂斯塔深恶痛绝的祖国人民以及他们大无畏的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古巴的整个历史过程中，他们已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这种精神，作出了表率。在上一世纪，古巴人为了求得独立，难道不是战斗了将近半个世纪吗？难道不正是他们在一九三三年推翻了十恶不赦的独裁者马查多吗？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巴蒂斯塔穷凶极恶，正是说明他害怕人民。

其次，菲德尔所信赖的是他的追随者们，他们都参加了他所缔造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进攻“蒙卡达”兵营的日子），一定会全力支持他的，除此而外，他还信赖广大的同情者。这些人大都是大学生、中等学校高年级生、年轻的工人、职员和手艺人。他们虽然没有政治经验，甚至没有明确的纲领，可是却有一种极其可贵的品质：他们忘我地热爱祖国，对巴蒂斯塔切齿痛恨。

菲德尔是这些年青人所一致公认的真正的领袖。当

时他跟追随他的人一样，也还是个年青人。他有雄辩家的口才，钢铁般的意志，气宇轩昂，浑身是胆。他极其熟悉古巴历史，对于现代古巴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也了解得十分透彻。他确切知道应该同什么样的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当初，他在法庭上发表《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演说时，就曾极其令人信服地谈到了这一点。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在埃姆帕朗街49号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萨雷斯家里会晤的。玛丽亚·安东尼娅是古巴人，丈夫是墨西哥人。她十分同情年轻的爱国者。她的一个兄弟伊西多罗，参加了反对巴蒂斯塔的地下斗争，曾在这个暴君的拷问室中受过野蛮的酷刑。他侨居墨西哥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玛丽亚·安东尼娅把她小小的寓所提供给她使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他们的司令部。玛丽亚·安东尼娅还供应他们膳宿。寓所中塞满了床垫、行军床、各式各样的书，甚至武器。他们制定了一整套出入这个寓所的暗号和暗语。一有秘密工作者到来，隔壁小铺的老板，他是玛丽亚·安东尼娅的朋友，就会发出信号。

菲德尔抵达墨西哥城的日子正巧是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这一天是阿根廷独立日。劳尔告诉菲德尔，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阿根廷医生，那人曾参加过危地马拉事件，他建议菲德尔跟那人见见面。

菲德尔和切在第一次会晤时谈了些什么呢？根据切提供的资料，谈的是国际形势。不消说菲德尔还向切介绍了他的各种计划和他的政治纲领。

菲德尔对他的新朋友说：“我们将在奥连特省开始战

斗行动。奥连特省是古巴所有省份中最富有战斗力、最革命、最爱国的一个省。在这个省内，我的同志和朋友最多。我们当初想攻下的‘蒙卡达’兵营就是在这个省内。很久以前，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也正是在这个省内首先开始的。在这场斗争中，奥连特省的居民血流得最多，牺牲最大，他们的英雄主义也表现得最突出……这一可歌可泣的史诗的气氛，直到今天还笼罩着奥连特省。当东方开始发白时，公鸡报晓的啼声，就会象号角一样把战士们唤醒，当太阳升到覆满青松翠柏的山岭上空时，就会使人觉得亚拉或者拜雷<sup>①</sup>的一天重又来到了。”

菲德尔后来指出，在他们初次见面时，“切的革命思想比我更成熟。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他的修养比我更高。他当时是一个比我更先进的革命家。”

切后来也谈到了他第一次见到菲德尔时，菲德尔所给予他的印象，切说道：

“我跟菲德尔谈了整整一个通宵。天亮前，我已被编进未来的远征军，担任军医。其实，我曾两次周游拉丁美洲，目睹了拉美的种种情况，而且还亲历了危地马拉的结局，因此要动员我参加革命，不管反对的是哪一个暴君，都用不着费什么唇舌。何况，菲德尔给予我的印象是，他是个非凡的人物，具有解决最复杂的问题的能力。他怀有坚定的信念，深信一旦向古巴进军就一定能够到达；一旦到达古巴，他就一定能够开始斗争；而一旦开始斗争，他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他的乐观主义也感染了我。我

<sup>①</sup> 亚拉和拜雷是爆发古巴独立战争的两个城市名。——原注

认识到应当有所作为，应当采取具体的措施，应当进行斗争。停止呻吟，开始行动的时刻来到了。”

不过起初，切的乐观主义中还夹杂着相当大一部分怀疑主义。他在推翻巴蒂斯塔以后，回忆说：“当我刚刚和起义军的指挥员认识时，对于能不能取得胜利是怀疑的，最初把我同这位指挥员结合在一起的是我幻想冒险的浪漫主义。当时我想，为了这么崇高的理想，战死在异国的海滨浴场上，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那么切所说的崇高理想是什么样的理想呢？我们可以从《菲德尔颂》一诗中找到答案。这首诗是切在第一次见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领袖以后不久写的，公开发表则是在切牺牲之后。这首诗中意义最大的是下面两节，现直译如下：

一旦你大声疾呼，  
要求土改、正义、面包和自由，  
那时我们也将同你  
肩并肩地提出同样的要求。

一旦国有化的利箭射中了那头野兽，  
那么野兽就只得去舐它的伤口，  
而我们却同你  
肩并肩地、自豪地抬起头。

第一节讲的是实施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到当时为止，“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所有文件上都没提

到过；第二节讲的是把美帝国主义者的财产收归国有，关于这一点到当时为止，也从未讲起过，至少从未公开讲起过。不过，尽管如此，菲德尔在当时就已经跟切一样，怀有这些“崇高的理想”了，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切和菲德尔会晤之后，过了一些时候，阿根廷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庇隆倒台，流亡国外。新政权建议侨居国外的庇隆的政敌们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于是罗霍和其他住在墨西哥城的阿根廷人便纷纷准备回国。他们劝切也踏上归途，但是切拒绝了。因为他不相信在当时的条件下阿根廷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如今他的全部心思都挂在一件事上了，那就是行将开始的对古巴的远征。

不过这次远征目前还只是一个计划而已。要把这个计划付诸实现，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要筹集一笔款子，而且是一笔巨款；要把参加未来的远征的人在墨西哥集中起来，要保证他们的膳食；要对他们加以考查，并确保他们处于秘密状态。要把他们编成一支部队；要对这支部队加以训练，使得它会打游击战；要购买武器和船只；要确保古巴岛本土能对这支部队提供支援。除此而外，还要做千百桩大小不等的东西。而这一切又都必须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去做的，必须避开巴蒂斯塔的暗探和多米尼加暴君特鲁希略手下的特务。特鲁希略唯恐反对巴蒂斯塔的起义一旦成功，就会蔓延到他的世袭领地上来。

借外国的地方组建远征军的这种做法，人们乍一看去，很可能认为是异想天开的冒险举动。然而古巴、安的列斯群岛或者中美洲的人民却决不会有这种看法。早在

十九世纪为独立而斗争的时期，古巴爱国者就曾借助美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组建过这类远征军。在本世纪四十年代，也有过几支武装的远征军，从危地马拉出发，讨伐多米尼加的暴君特鲁希略。而尼加拉瓜独裁者索摩查的政敌则是从哥斯达黎加攻进尼加拉瓜的，委内瑞拉暴君戈麦斯的政敌是在特立尼达岛组成讨伐戈麦斯的起义远征军的。所有这些远征军内都有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人参加，他们并不都是冒险家，其中也有不少为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人。

因此，菲德尔在墨西哥筹建远征军以及阿根廷人格瓦拉参加这支远征军，都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以说是符合古老的传统精神的。

从各方面来看，菲德尔当时的计划是，当远征部队在圣地亚哥附近登陆时，他的战友、年轻的秘密工作者弗兰克·派斯便率领拥护菲德尔的人在圣地亚哥城发动起义，拿下这个城市。这就能使巴蒂斯塔政权土崩瓦解。

在墨西哥筹建远征军时，看来并没有考虑到要把马埃斯特腊山区作为起义者的主要根据地。不过，也并没有排除进行持久的游击战的可能性，而且还认为正是应当训练未来的起义者学会打游击。

为此需要物色到一个精通游击战的专家，由他来向远征部队战士教授游击战的艺术。必须教会战士们运用游击战的战术和各种策略，并且对他们进行体育训练，使他们能够适应游击生活。

玛丽亚·安东尼娅把她家的一位朋友，一片不大的印刷厂的厂主，墨西哥人阿尔萨西奥·巴内加斯·阿罗



约介绍给了菲德尔。于是他的印刷厂便开始印制“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流通券、宣言和其他文件。阿尔萨西奥同时还是个拳击运动员。菲德尔知道这一点后，就聘请他负责对未来的“格拉玛”号远征军的战士们进行体育训练。阿尔萨西奥欣然同意。他开始带领古巴人到山峦起伏的郊区去作长途行军；教他们日本式的柔道，并且还特地为他们租了一个健身房，进行田径运动。阿尔萨西奥回忆说：“除此之外，还有人给小伙子们上课，讲授地理、历史、政治形势以及其他课目。有时候，我也跟小伙子们一块去听课。小伙子们还常常去看战争电影。”

阿尔萨西奥对于这支远征军来说，虽然是个有用的人，但是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却帮不了忙。因为有关游击队员的事，他除了听他祖父讲起过潘乔·比利亚的丰功伟绩之外，就一无所知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终于找到一位他所需要的专家。这人是前西班牙军队的上校，叫唐·阿尔维托·巴约。这位上校，即使在西班牙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一八九二年，他生于古巴一个西班牙侨民的家里，童年时代就随父母回到了西班牙。后来他在军事学校毕业，加入外籍兵团，去摩洛哥作战，在这以后，他又当了飞行员。唐·阿尔维托在从事军队工作的同时，还从事文学创作：他以士兵生活为题材，写过不少诗歌和短篇小说。西班牙爆发内战后，唐·阿尔维托·巴约便毅然站到人民一边，勇敢地同佛朗哥分子作战。他曾参加过对佛朗哥叛乱分子所霸占的马利奥尔卡岛的登陆战，并曾领导过游击小组和游击队的训练工作。西班牙共和国

亡国以后，阿尔维托·巴约起初在他的出生地古巴侨居，开办了一所私立数学学校。但是不久以后，他就迁居到墨西哥经商，开设了一爿家具工厂，并且入了墨西哥籍。同时他还兼任军事航空学校的教官，时常以“科班出身的专家”身份参加推翻中美洲某个香蕉共和国的独裁者的活动。一九五五年，阿尔维托·巴约在墨西哥城出版了一本名叫《游击战一百五十题》的别出心裁的教科书。这是一部论述游击战科学的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读了这本书不仅可以学会怎样部署埋伏、炸毁桥梁、制造手榴弹和定时炸弹，而且还能够学会怎样挖掘地道越狱潜逃，怎样发动飞机的马达和驾驶飞机，甚至还能够学会……各种各样的鸟叫虫鸣！总而言之，读了这本书就可以了解游击战艺术的奥秘。

不消说，由这样一位专家来执教，对于未来的起义者来说，实在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菲德尔·卡斯特罗并没有费多少唇舌就说服了这位上校、诗人、飞行家、游击战和特工活动的专家接受训练未来的起义者的这个光荣任务；这些未来的起义者将把他们的祖国，同时也是阿尔维托·巴约的祖国，从巴蒂斯塔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一开始，阿尔维托·巴约为了表明自己确有真才实学，索价很高，提出要他讲授他的学问，就必须付他十万墨西哥比索（将近八千美元）的酬金，可是后来答应只消一半就可以了。但是结果巴约上校不仅分文未取，反而还卖掉了他那爿家具工厂，把所得的钱统统赠送给他的学生们，因为他毫不怀疑他们必定会取得胜利！

不久，唐·阿尔维托·巴约冒称萨尔瓦多的政治侨

民，以两万六千美元的代价，向过去潘乔·比利亚游击队的一个战士埃拉斯莫·里维拉买下了“圣罗莎”田庄。这个田庄离首都三十五公里，处在榛莽遍布的崇山峻岭之间。参加菲德尔的队伍的人，其中包括埃内斯托·格瓦拉在内，都转移到了这个基地。

菲德尔指派切到巴约上校的这所“大学”中去“负责干部工作”，实际上就是任命他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游击营的指挥员。

于是对未来的游击队员的紧张的训练工作就此开始了。为了保密起见，巴约被称作为“英语教授”。巴约不辞辛劳地、顽强地训练那些受他监护的人，对他们十分严格。他要求他们遵守最严格的纪律、锻炼身体、戒酒，使他们过一种几乎象僧侣一样的生活。巴约天天自早到晚地教练他的学生们：教他们射击、看地图、伪装和奇袭，教他们制造炸药、投掷手榴弹、执行警戒，以及运载武器、背包和营帐，并且不论在白天还是晚上，不论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要他们作令人疲惫不堪的长途行军。

切以高度的责任感、十分认真地学习游击战的科学。正如他在此后的文章中所讲的那样，他自从听了巴约上校的最初几堂课以后，便对能够战胜巴蒂斯塔这一点不再存任何怀疑了。切是遵守纪律的模范。“英语教授”交下来的作业，他完成得最出色。巴约上校是给他的学生打分数的，切总是荣膺满分——10分。这位前西班牙共和国军队的上校在提到切时怀着敬意说道：“他是我最有才能的学生。”

切不仅是个学员，而且还兼任教师。作为军医，他教

他的同学们医治骨折、包扎和注射。而且他还甘愿充当“实验用的兔子”，供同学们实验。因此在实习注射的过程中，他先后被扎过一百多针，每个同学都在他身上注射过一针或几针。

切在“圣罗莎”还起了政治委员的作用。古巴人卡洛斯·贝穆德斯在回忆切的时候，说：“我跟他一起在‘圣罗莎’田庄学习时就知道了他的为人。他一贯是最勤奋努力的，一贯怀有最崇高的责任感，随时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次，我拔牙后出血不止，他来替我止血，于是我们就认识了。那时我还识字不多，他就对我说：‘今后我教你识字，帮助你弄明白课文的内容……’有一天，我们一起上街去，他忽然弯进一家书店，他当时手头钱很少，可是却统统掏了出来，替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绞刑架下的报告》，一本是《青年近卫军》。”

格瓦拉在“圣罗莎”这所游击学校中的另一个同学达里奥·洛佩斯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为了进行政治教育，切亲自挑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送进图书馆。”

菲德尔·卡斯特罗很少到“圣罗莎”去，筹备远征的事情忙得他不可开交：他要筹措经费和武器，要派遣和接待往来古巴的通讯员，要同反对巴蒂斯塔的各种各样派别进行政治谈判，还要写文章、呼吁书和指令。

训练部队的工作以全速进行。巴约对他的学生很满意，答应在一九五六年年中以前就结束训练。而在古巴，巴蒂斯塔则照旧横行霸道，警察对反对暴君的人施以酷刑，蒙难者的尸体被扔到街头或海里。独裁者巴蒂斯塔成了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他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断绝了邦交，查禁了古苏友好协会，迫使人民社会党（古巴共产党人的政党）完全转入地下，派出了一帮为企业主效劳的暴徒霸占了工会。美国资本家在古巴到处活动，干尽坏事，军队里有美国军官，警察局里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反共和反苏的宣传甚嚣尘上，古巴名副其实地成了美国佬的殖民地。这就无怪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为了巴蒂斯塔这一系列“英勇”行为而公然宣称他是“自由和民主的”可靠的“保卫者”，也无怪美国大使加讷竟毫不害羞地把这个独裁者，这个臭名昭著的盗窃国库的贪污犯和纳贿者，捧为古巴历来的政治家中“最廉洁的人”。

然而，古巴人民远远没有绝望。古巴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以及大、中、小学生日益积极地投身到反对暴君及其主子的斗争中去。地下刊物揭发了巴蒂斯塔的滔天罪行。人们日益频繁地举行反对这个政权的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和罢工。独裁者不得不关闭了全国所有的高等学校。他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头面人物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法，企图用这个来获得他们的支持，对教会则频送秋波，甚至还异想天开，动手在哈瓦那港入口处建筑一尊巨大的基督像。他在演说时总要大谈进步、大谈民族的幸福和爱国主义，甚至还要引用何塞·马蒂作为例子，这毫无疑问是对为民族独立而献出了生命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何塞·马蒂的侮辱和亵渎。但是，不论残酷的恐怖手段，不论社会性的蛊惑宣传，不论政治阴谋，不论美国国会的议员们为吹捧他而唱的赞歌，不论古巴红衣主教阿特亚加和其他天主教主教的祝福仪式，都无法阻止这场反对过去的中士、现在的将军和自封的国家总统富尔亨西

奥·巴蒂斯塔的运动日益壮大。

所有这一切，菲德尔都是了如指掌的。他尽了一切可能来尽快地完成远征的筹备工作。

然而无论是巴蒂斯塔的特务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都没有打瞌睡。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墨西哥侦缉局的警官们在首都的一条街上逮捕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随即就冲进玛丽亚·安东尼娅的寓所，并在那里布下了伏兵，逮捕了所有进入这个寓所的人。同时警察局也袭击了“圣罗莎”田庄；抓走了切和他的几个同志。报章杂志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报导了把古巴的阴谋家们逮捕归案的消息。自然，巴约<sup>①</sup>这个游击战“教授”的名字也在报上出现了。

古巴报纸为了讨好暴君起见，在报导这一消息的同时，竟谎称墨西哥警察局已拿到了证据，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墨西哥—苏联文化协会的秘密领导人。

后来真相大白，原来是巴蒂斯塔特务贝内里奥混进了秘密工作者的队伍，大逮捕就是这个卑鄙的家伙一手造成的。

六月二十六日，墨西哥《至上报》公布了被捕者的名单，其中就有埃内斯托·格瓦拉·塞尔纳的名字。这家报纸把他说成是危险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煽动分子”，早先曾经几乎以“莫斯科代理人”的身份在阿本斯总统治下的危地马拉活动过。

---

<sup>①</sup> 古巴革命胜利后，巴约回到了古巴。1965年，他在古巴去世。——原注

玛丽亚·安东尼娅回忆说：“逮捕我们以后，就把我们关进了‘米格尔·舒尔茨’监狱，这是一个专门拘留侨民的地方。我在那里遇见了切。他穿一件廉价的透明尼龙雨衣，戴一顶旧帽子，那模样有点象菜园子里的稻草人。我想引他笑笑，就把他那副样子所给我的印象讲给了他听……后来，把我们从监狱里带出去审讯时，只有他一个人给戴上了手铐。我忿忿不平，对检察机关代表说，格瓦拉不是罪犯，不应该戴手铐，何况在墨西哥，即使是罪犯也从来不戴手铐的。等到把我们押回监狱时他已经不戴手铐了。”

这样，菲德尔·卡斯特罗希望推翻暴君巴蒂斯塔的事业，似乎再次遭到失败。一些缺乏信心的人和心怀叵测的人高兴得不住搓手：怎么样，难道这次失败不是又一次证实了这种阴谋无非是把革命当作儿戏，无非是轻举妄动，而决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吗。况且，在菲德尔和他的朋友们被捕前不久，在四月二十九日，古巴有一个青年小组，仿效“蒙卡达”英雄的榜样，打算占领马坦萨斯城的“戈伊库里亚”兵营，结果所有参加这次战斗的人全都牺牲在巴蒂斯塔刽子手们的屠刀之下了。

但是菲德尔的想法却同这些批评他的人截然不同，他认为挫折是革命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价。失败使他更加顽强，更加坚信他所献身的那桩事业必将获得最后胜利。他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和他的乐观主义感染了他的追随者们。切在回忆他被拘禁在墨西哥监狱里的情景时，写道：“我们从来没有丧失过对菲德尔·卡斯特的信任。”

逮捕古巴革命家这件事激起了墨西哥进步的社会人士的愤怒，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他任内的海军部长埃里维尔托·哈拉、工人领袖隆巴多·托列达诺、名艺术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克罗斯和迭戈·里维拉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作家、学者和大学教授都纷纷出来说情营救。其实，巴蒂斯塔这人即使在墨西哥当权者的心目中也是个叫人极其反感的人物。再说，这些当权者又断定，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计划，由于这次逮捕，加上报纸的大肆张扬，已经破产了，乐得趁机表现一下“人道主义”，于是在拘留了这些被捕者一个月之后就统统把他们释放了，只有两个人例外。这两个人就是埃内斯托·格瓦拉和古巴人卡利斯托·加西亚，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是非法潜入墨西哥。

菲德尔一经出狱，就同过去一样精力充沛地为他的部队打回古巴去作准备。他重新筹措经费，购买武器、建立各秘密营地，规定接头地点和暗号。战士们编成一个个小组，在墨西哥僻远的地方进行军训。菲德尔以一万二千美元买下了瑞典著名人种志学者维尔纳·格林的一艘叫做“格拉玛”号的游艇，以便让部队乘坐这艘游艇打回古巴去。“格拉玛”号可乘坐八个人，至多十二个人，可是必须乘上这艘游艇的战士却有八十多个。不过菲德尔并不认为这是个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再说，除了乘坐“格拉玛”号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为了尽快营救切和加西亚出狱，菲德尔利用了他所有的关系。格瓦拉劝菲德尔不要为他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切生怕这样做会耽误“格拉玛”号启航的时间。但是



菲德尔却不容分说地对他讲：“我决不会扔下你不管！”

切在狱中时，有一次睡着以后，他的一套衣服被人偷走了。伊尔达·加德亚回忆说：“于是我们决定大家凑出钱来替他买一套新衣服，不过我们担心他不肯收下这件礼物。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他非但愿意接受，甚至想亲自选购一套西装。他挑了一套深栗色的西装，可是没过半个钟点，就把这套西装送给了他同牢的难友卡利斯托·加西亚了。”

墨西哥警察局也逮捕了伊尔达·加德亚。但是结果还算顺利，过了一段时间，伊尔达就和切一起获释了。切总共坐牢五十七天。现在他重又同菲德尔和劳尔肩并肩地站在他的岗位上了。

警察局的暗探仍然在监视着古巴人。不时有警察闯进各秘密营地。报纸报导，菲德尔并未安份守己，他重又在准备把他手下的人用船只运往古巴。

筹备工作必须加速进行，否则的确会功败垂成的。但是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完成，工作中也还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武器弹药不足，经费也已经告罄。这时弗兰克·派斯来支援了，他从圣地亚哥送来八千美元，并且报告说，他的人马已准备好在城里起义。

十一月初，警察局重又突然搜查了几个秘密营地。菲德尔得悉有人已经答应以一万五千美元的价格把整个组织出卖给驻墨西哥城的古巴大使馆。这个人叫拉法尔·德尔·皮诺，是菲德尔的私人警卫员。“格拉玛”号游艇就是用这个人的名义买下的，而且无线电收发报机也是藏在这个人家里的。这时只要稍一耽搁就等于自

杀。菲德尔就下令把内奸隔离起来，全体战士立即携带枪枝弹药到墨西哥湾的一个小渔港图斯潘河口集中，“格拉玛”号就停泊在河口的码头旁。

菲德尔还下令把一些枪枝藏到墨西哥的一个可靠的地方去，并要大家对这件事绝对保守秘密。他的同志们对于为什么要把这些枪枝藏起来都困惑不解，就提出了疑问，他解释说：

“如果我们又一次遭到失败，我将回到墨西哥来，再集中一批可靠的人，乘飞机重新回到古巴去。我们将用降落伞空降到山区去。只要我个人没有被打死，只要我们还没有把祖国从暴君和剥削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我就始终不渝地这样做下去。”

菲德尔下了最后一道命令：打一个事前约定的电报到圣地亚哥给弗兰克·派斯，说：“书都卖光了”。这样派斯就会在约定的日子在奥连特省的省会发动起义。

切背上药箱——要知道，他不仅是一名战士，而且还是部队的军医！——跑回家去同伊尔达话别。他吻了吻熟睡的女儿，匆匆忙忙地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告别信。这封信就象他过去写给他父母的所有的信那样，贯穿着一种阴郁的幽默感。这封信的大意是：我正要去干的那桩事业，是值得为之而牺牲的，尽管去干这桩事业等于以卵击石。伊尔达对他说：“别忘了带你的吸入器，别把它闹丢了”……可是切偏偏忘记了带吸入器！没有经历过战斗洗礼的游击队员，什么事不会发生啊……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二时，部队开始在图斯潘河口登上“格拉玛”号。码头上顿时响彻了谈笑

声，闹得不亦乐乎。但是当地的警察由于事先得到了“一块面包”，或者说得干脆些，得到了一笔贿赂，因此都充耳不闻，没有一个到码头上来。过了一段时间，八十二个人连同枪枝弹药、军用装备和其他军用品，终于都登上了这艘形同玩具的游艇，把它塞得水泄不通，使得它活象一个沙丁鱼罐头。天在下着大雨，海上起了风暴，然而决不可能后退了。只有前进！

最后到达“格拉玛”号停靠的码头的是：切、卡利斯托·加西亚和另外三名未来的起义者。

只有坐汽车才能抵达图斯潘河口。切和他的朋友们在一个火车站上下了火车之后，便去寻找顺路的汽车。卡利斯托·加西亚回忆说：“没料到要找辆汽车竟会这么困难。我们在街上等了老半天，总算拦住了一辆空车。我们就请求驾驶员把我们送到港口。那个人讨价一百八十比索。我们一口答应了。谁晓得车子开到半路上，驾驶员拒绝再往前开，显然他害怕了。这使我们陷入了困境，我们本来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而现在驾驶员又出人意料地节外生枝……”

“于是切就对我说：‘监视好公路，司机由我来处理。’他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了驾驶员把我们送到了罗萨-里克，我们才算走完了全部路程的一半多一点。在罗萨-里克，我们又搭上另一辆汽车，向目的地驶去。最后，我们终于在我们前方望到了图斯潘这个小小的城镇。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在镇口迎接我们，他把我们领到河边，‘格拉玛’号就停泊在那里。”

迟到的人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格拉玛”号的甲板

上。

菲德尔下令：

“解缆，开船！”

超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格拉玛”号，黑灯瞎火，吃力地离开河岸，向古巴驶去。

战士们唱着国歌和《七月二十六日颂歌》。

菲德尔曾经说过：一九五六年我们要做自由人，否则就成为殉难者。他履行了他的诺言……

## 二、马埃斯特腊山区

### 1. 战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

前进，迎着朝霞，  
战斗的同志！  
我们替自己开路，  
用霰弹和枪刺！

——《青年近卫军》

“格拉玛”号游艇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切在回忆录中讲道：“船上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有的人愁眉苦脸，双手捧腹，有的人把脸冲着水桶，有的人奇形怪状地躺着。在八十二个人中间，没有晕船的只有两三个水手和四、五名乘客。”

突然，游艇里涌进了水。偏偏抽水机坏了，轮机停转了。大家试图用桶来把水舀干。为了去掉一切不必要的负载，人们纷纷把罐头丢进海里。直到这时才发现“闹水灾”的祸根原来是厕所里的水龙头忘了关上。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得轮机重新开动。

卡利斯托·加西亚回忆这次航行时，说：“必须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方才想象得出，怎么才能在这条小小的游艇中装下八十二个持有武器和其他装备的人。游艇拥挤

到了水泄不通的地步。人跟人都叠了起来，这决不是过甚其辞。携带的食物仅够充饥。最初几天每人发到半罐炼乳，但很快炼乳就告罄了。第四天，每人还发到一小块干酪和几根香肠，可是到了第五天上，就只剩下一些烂橘子了。”然而他们还有漫长的三天航程……

在“格拉玛”号上，切的气喘病严重发作，使他痛苦不堪。但是，据罗伯托·罗克·努涅斯回忆，切不但坚持了下来，甚至还能打起精神来开开玩笑，勉励别人……

顺便说一下，正是这个罗伯托，叫大家虚掷了好几个小时宝贵的光阴。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菲德尔任命他为领航员（船长是拉迪斯劳·翁迪诺·皮诺），他为了确定游艇的方位，往船长室的顶上爬去，没料到一个巨浪扑来，把他卷进了海里。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在水里找到了他，把他救上了船。

超载的游艇在不时迷失方向的情况下，缓缓地向古巴岛驶去。菲德尔本来预定十一月三十日在圣地亚哥附近的尼格罗村登陆，并由那里直奔圣地亚哥，因为弗兰克·派斯及其同志正是在那一天准备在圣地亚哥发动起义。可是到了十一月三十日这天，“格拉玛”号还处在离古巴海岸两天航程的海面上。

而这天早晨五时四十分，英勇的弗兰克·派斯的拥护者们却上街发难了。他们攻占了圣地亚哥的市政机关，但是未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在这天，巴蒂斯塔出动飞机在古巴沿海侦察“格拉玛”号的位置。

只是到了十二月二日白天，“格拉玛”号才终于驶近古巴海岸。

这次远征的一位参加者回忆说：“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当时我们的感想，特别是我们中间久离祖国的那些人的感想，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游艇慢慢向前滑去，四周一片静寂，只有游艇的轮机发出低沉的声音。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竭力想看清海岸。开始听到游艇的龙骨和船底擦过沙滩发出的窸窣声。我们已进入科洛腊多斯海滩。这片海滩位于奥连特省尼格罗市境内的克鲁斯角地区。”

“格拉玛”号没有驶抵海岸就搁浅了。游艇上有一条舢板。可是舢板刚放到水面上，立刻就沉入了水底。战士们只得涉水登岸，海水一直没到肩膀。他们能够带上岸来的只有各自的武器和少量的食品。巴蒂斯塔的快艇和飞机很快就赶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士们登陆的地点，以猛烈的炮火围堵追击他们。劳尔·卡斯特罗事后回忆说：“这与其说是登陆，不如说是船舶遇难。”

这批革命者不得不在遍布沼泽的泥泞的海滨跋涉了很久。苏联女作家纹达·瓦西列夫斯卡一九六一年曾到此地访问过，在其所著《自由的群岛》一书中，对这个地方有这样一段描写：“到处是沼泽和红树丛。红褐色的泥沼中尽是红树的露出在地面上的树根和枝桠，离奇古怪地交织在一起，枝桠上长满了肥厚的、有光泽的叶子。这种树丛非赤杨树丛和柳树丛可比。要拨开赤杨树丛的枝桠并不困难，柳条则更是听任你弯来曲去。可是红树丛却是一道密不透风的坚硬的栅栏，说得确切些，是几百道这样的栅栏。它们的根基深深地长入淤泥之中。有的地方看来土质还比较硬，有的地方，水积成了池塘。这样的

池塘星罗棋布，塘面上，一棵棵红树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而塘底，也同样是红褐色的淤泥。”

这些又饥又渴、筋疲力尽的战士，为了克服这片象铁丝网一般的障碍物而花费的力气，超出了人的忍受力。这位苏联女作家说，如果她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亲眼目睹一九四一年秋季撤退时人们如何陷身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的话，那么当她置身在遥远的古巴的树丛中时，就未必会如此激动了。当初“格拉玛”号的战士们是怎样在这片土地上跋涉的，他们经历了些什么，又是如何牺牲的，她现在一踏进树丛，就一目了然，体会到了。

历史似乎是在重演。六十年前，传奇式的暴动者，古巴的爱国志士们，就曾经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战斗过。率领他们的是英勇的古巴独立战士之一——安东尼奥·马塞奥将军。有个俄国人，叫彼得·斯特烈里佐夫的，志愿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他留下了一部回忆录，曾在《欧洲通报》上发表过。他在谈到他的战友们时讲：“石头把他们赤裸的双脚擦得鲜血淋漓，笨重的木箱把他们的背部磨得皮开肉绽。黄热病开始在他们中间流行，人们纷纷倒在光秃秃的石头地上呻吟，然而健康的人……却依旧不停地前进，他们的是把解放祖国的重任挑在肩上了。在部队转移的整个过程中，也就是说，在长达四五天的时间内，有不少人几乎吃不到一点东西……但是，尽管如此，我却从未听到过一句怨言或者责难，因为武装的起义者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而现在，当年这些英雄的孙子们和曾孙们，又要同样地走上这条充满牺牲和艰辛的悲壮的道路，直到战胜他



们祖国的新的一批奴役者……

整整两个昼夜，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士们，由一个偶然碰到的向导领路，力图避开搜索他们的敌机。

切叙述道：“十二月五日晚，我们沿着甘蔗种植园走了整整一夜。我们用甘蔗解渴止饿，随手把甘蔗皮掷在脚下。这是不可容忍的疏忽，因为这使巴蒂斯塔的兵士轻而易举就能找到我们的踪迹，前来追击我们。

“直到很久以后才搞清楚，原来出卖我们的并不是甘蔗皮而是那个向导。就在我们所要描述的事件发生的前夕，我们放走了他，而他却领着巴蒂斯塔的兵士来追击我们的部队。这样的错误我们犯过不止一次，直到我们终于懂得必须万分小心、保持极度的警惕之后，才不再重犯。

“将近凌晨，我们已完全筋疲力尽了，便决定在一家附有种植园的综合糖厂的地盘内略事休息。这家糖厂的所在地叫做阿莱格里亚德皮奥（意为“神圣的喜悦”）。刚刚安顿好，许多战士立刻就睡着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上空出现了敌机。我们由于艰苦的行军无不疲惫不堪，所以这些飞机并没有立刻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作为部队的军医，必须替同志们包扎。他们的脚擦破了，而且已经在化脓。我至今记忆犹新，在那个沉痛的日子里，我最后包扎的一个人是温贝托·拉莫特。

“我正和蒙塔内同志靠在树上谈论我们的子女，同时津津有味地吃着各自的少得可怜的口粮——两块干饼和一片灌肠，突然枪声大作。过了一秒钟光景，弹雨就向这

支由八十二人组成的队伍迎头盖面地撒了下来。我原来的一枝步枪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我还是特地换了一枝更差些的枪。因为在整个航海过程中，我的气喘病一直发作得十分厉害，我可不愿意叫好的枪枝断送在我的手里。

“我们几乎是赤手空拳地面对猛烈进攻我们的敌人；自‘格拉玛’号登陆以来，经过了沼泽地的行军，我们剩下的装备仅仅是步枪加上少量弹药，而且绝大部分还都是受了潮的……我至今记得，那时胡安·阿尔梅达跑到了我身边，问我：‘怎么办？’我们决定尽快地冲进甘蔗丛中去，因为我们懂得只要到了那里，我们就得救了！……”

“正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有个战士一面跑，一面把子弹掷掉。我一把抓住他的手，想止住他，他摔脱了我，高喊道：‘我们完蛋了！’他的脸由于恐惧而变了样。

“也许，那时是我平生头一遭处于非得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的处境：我究竟当什么？当医生还是当战士？在我跟前放着装满药品的背包和子弹箱。把这两样东西一齐带走，我没有这份力气。我抱起子弹箱，冲过了把我与甘蔗田分开的那片开阔地……”

“这时候，火力更猛烈了。响起了冲锋枪的扫射声。有一样东西猛地推了一下我的胸脯，我倒了下去。我被负伤者的惊慌不安的本能所支配，盲目地朝山那边放了一枪。就在看来一切都要完蛋了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记起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一篇旧作。这篇短篇小说的主人公知道自己反正要死了，就泰然地迎接死亡。

“阿本托沙横倒在我身旁。他浑身是血，却仍然在射

击。我没有力量爬起来，就对福斯蒂诺喊了一声。他一面继续射击，一面掉过脸来对我亲切地点了点头，大声说：‘没什么了不起的，老兄，坚持住！’

“我忍住剧痛，举起我的步枪，开始对敌人射击。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我难逃一死，那我就要竭力为我的生命索取最高昂的代价。

“战士中间有个人大叫应当投降，但是立刻响起了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洪亮的声音：‘胆小鬼！菲德尔的战士决不投降！’……

“突然间，阿尔梅达出现了。他抱住我，把我拖到了甘蔗丛的深处，那里已经躺着好几个伤员，福斯蒂诺正在给他们包扎。

“就在这时候，几架敌机打我们头顶上掠了过去。

“叫人胆战心惊的隆隆声、冲锋枪的扫射声、伤员的叫声和呻吟声——这一切汇成一片持续不停的轰响。

“敌机终于飞走了，枪声也停了下来。我们又集合在一起，但是总共只剩下了五个人：拉米罗·巴尔德斯、查奥、贝尼特斯、阿尔梅达和我。我们总算顺利地穿过了种植园，隐蔽到了树林里。我们刚踏进树林，从甘蔗田那边又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我回过头去，只见我们刚才战斗过的地方，已笼罩在一团团的硝烟中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阿莱格里亚德皮奥这个地方：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我们的部队曾在这里同巴蒂斯塔的优势兵力打了一仗，经受了战斗的洗礼。”

在这一仗中，将近有一半战士阵亡，有二十人左右被俘。被俘的人中绝大部分遭到严刑拷打，并被枪杀了。

但是第二天，当所有幸免于难的人在通往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要道口的一所农舍里会合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却讲道：“敌人虽然打败了我们，但是无法消灭我们。我们将进行战斗，并赢得这场战争。”

农民的友好态度多少减轻了他们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吃了败仗的痛苦。切在一篇文章中讲道：“我们都感到农民对我们的同情和真诚的好感。他们亲切地接待我们，帮助我们去经受一系列的考验，把我们万无一失地隐藏在他们的家里……是谁真正无限地相信人民的呢？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时他已显示出作为组织者和领袖的非凡才能。每当长夜来临（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停止活动了），我们便在某处森林的树丛下，用许多时间制定各种大胆的计划，想望着打仗，想望着进行大的战役，想望着获得胜利。这是幸福的时刻。我跟大家一起抽着雪茄。对我来说，是平生第一次享用这种烟草，我是为了驱赶死乞白赖的扰人的蚊子才学会抽这种烟的。从此我就对芬芳馥郁的古巴雪茄抽上了瘾。不知是由于抽了烈性的‘哈瓦那雪茄’的缘故呢，还是由于我们计划的大胆（我们的计划一个比一个胆大妄为），我的头老是昏昏然的。”

切是具有菲德尔的那种乐观主义的，但是初战中幸存下来的其他的起义者，却并不都是如此。战士们因伤亡惨重而士气低落，因长途行军而疲劳不堪，他们纪律比较松弛，打起仗来也不够坚定。

切对于这种局面有什么看法呢？一九六三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格拉玛”号的战士登陆后最初几天的情况，说道：“现实推翻了我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没有

具备顺利地实现我们意图的一切必要的主观条件，也没有恪守革命战争的一切规律。这些规律是在此后两年的艰苦斗争中，我们用自己和战士们的鲜血作为代价，才逐步掌握的。我们遭到了挫折，从而打开了我们运动历史上的最重要的篇章。直到这时，我们运动的力量，它的真正的功绩，方才显示出来。我们明白了，我们犯了策略性的错误，而且运动缺乏某些重要的主观因素；人民虽然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但是对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却缺乏信心。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使人民坚定不移地树立这方面的信心。”

但是，要使人民树立这方面的信心，首先必须使自己树立起信心来。为此，就应当进攻敌人，打一场胜仗，哪怕这一仗的规模并不大。要知道，再也没有比打胜仗更能鼓舞士气、使战士增强自信心的了。于是起义者在一月十六日袭击并攻占了拉普拉塔河畔的一个军事哨所。切参加了这次战斗。战果是：敌方死两名，伤五名，被俘三名；起义者方面毫无伤亡。除此之外，起义者还缴获了一些步枪、一挺“汤姆逊”机枪、近千发子弹以及其他的军需品和食物。根据菲德尔的命令，给敌军的伤兵作了治疗。此后，又将这些伤兵和俘虏释放了。

虽然打了胜仗，起义者的情况也仅仅是略有好转而已。切在日记中指出，农民虽然对菲德尔手下的人相当友好，但是“还未成熟到投身斗争的程度，而且我们又无法同城市里志同道合的人取得联系”。巴蒂斯塔的陆军、空军和警察部队则始终顽固地追击着起义者。

在这种形势下，菲德尔断然决定：转移到马埃斯特

腊山区去，在那里站稳脚跟，并从那里发动对巴蒂斯塔军队的游击战争。

马埃斯特腊山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远在“格拉玛”号的战士登陆前二十年，著名的古巴共产党员作家帕布洛·德·拉·托连特·布腊乌<sup>①</sup>就作过这样的描写：如果有人想不离开古巴而领略到异国风光，那就不妨去马埃斯特腊山区访问。在那里他不仅可以看到另一种自然景色、另一种风土人情，而且还能看到以另一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他们热爱自由，勇敢而又高尚，他们同警察以及政府当局是有深仇大恨的。

早在十九世纪独立战争时期，古巴的爱国志士便在这里找到了避难之所，获得了支持。帕布洛·德·拉·托连特·布腊乌警告说：“谁向这里的崇山峻岭宣战，谁就要倒霉。一个起义者，只消一枝步枪在手，藏在坚不可摧的峭壁嶙岩背后，就能以一当十。一个埋伏在峡谷里的机枪手，就能抵挡几千敌军的进攻。那些打算把战火烧到这里的崇山峻岭上来的人，也休想依靠飞机来帮他们的忙！这里有山洞可以掩护起义者。谁想消灭山民，谁就要倒霉！山民象扎根山岩的树木一样，寸土不让地坚守着他们的故乡。谁向这里的崇山峻岭上的居民宣战，谁就要倒霉！山民办得到的事，其他人至今还办不到。他们在自己土地的培育下，在自己贫穷生活的整个历史的教育下，表现了奇迹一般的勇敢，获得了永垂史册

① 帕布洛·德·拉·托连特·布腊乌志愿加入国际纵队，赴西班牙作战，在与佛朗哥军队的一次战斗中阵亡。——原注

的荣誉。让人人都知道吧，山民犹如古老的松柏，昂首挺立，不可动摇。与其象移植到陌生、迂腐的英国公园中的古巴树木那样死于饥饿和贫困，不如转战在嶙岩峭壁之中死于斗争。”

菲德尔·卡斯特罗虽然出生于奥连特省，但先前从未到过马埃斯特腊山区，有关山区的情况，无非都是道听途说来的。其他参加“格拉玛”号远征的人也都是如此。至于切，对于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情况，更是不甚了了。

起义者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遭到溃败后，幸存的人便向马埃斯特腊山区转移。他们虽然并不熟悉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然而他们认为这个山区无疑是一道天险，可以使他们转危为安。他们没有失算。马埃斯特腊山区果真成了巴蒂斯塔军队无法攻克的要塞，成了古巴和美洲第一块自由的土地。

起义者还没有熟悉山区的情况，就于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在阿罗约-德-因菲埃尔诺（意谓“地狱之溪”）一举打败了巴蒂斯塔的一支部队。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巴蒂斯塔手下最残忍的吃人生番之一——桑切斯·莫斯克拉。

切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参加这次战斗的情况时说：“突然间，我发现在离我最近的一所农舍里，还有一个敌军士兵，那人拚命想避开我们的火力。我朝他开了一枪，没有命中。我又开了一枪，正中他胸部。只见他先把步枪的刺刀戳进地里，然后一松手倒在地上了。我在农民克雷斯波的掩护下，走近死尸，拿走了他的步枪、子弹和其他装备。”

在起义者的进攻下，桑切斯·莫斯克拉弃下五具死尸，仓皇退却了。起义者没有伤亡。

一月二十八日，切写了封信给伊尔达，这封信是托人带到圣地亚哥投寄的。切在信内谈了自“格拉玛”号登陆后两个月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我们所知，这是他对这段时期的情况所作的第一次书面评价。他在信中讲道：

亲爱的老婆子：

这几行马蒂体<sup>①</sup>的热情洋溢的文字，是我在古巴的林莽中给你写下的。我还活着，并且渴望鲜血。我俨然是一个真正的兵士了。凭什么这么说呢？至少我很脏而且衣衫褴褛，再说我是把信笺衬在军用饭盒上给你写信的，而且肩上背着步枪，嘴里还衔着新近得到的佳品——雪茄。我们的事情看来并不一帆风顺。你已经知道，我们乘着“格拉玛”号航行了七天，在这七天之内，甚至连喘口气都不行。之后，由于领航员的过失，我们落到了臭气冲天的红树丛里，而且厄运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我们，直到业已举世闻名的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一战之后才和我们告别。在那次战斗中，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象一群鸽子那样被人家驱散了。我的脖子在那里挂了花，我之所以得免一死，无非因为我象猫一样命大福大：一枚瞄准我胸部的机枪子弹打在我胸前的子弹盒上了，于是从那里蹦进了我的脖子。我在山沟里跋涉了好

---

① 马蒂体指何塞·马蒂式的文体。何塞·马蒂(1850—1898)是古巴的诗人，争取独立的战士。——原注



几天，自认为伤势险恶，除了脖子挂了花，我还觉得胸部疼得厉害。你认识的人中，只有吉米·赫茨勒已不在人世，他投降了，当了俘虏，结果被他们杀死了。而我呢，同你所熟悉的阿尔梅达和拉米里托过了整整七天饥渴得可怕的日子，直到我们冲出重围，并在农民的帮助下与菲德尔会合之后才算摆脱了这种困境（据说，可怜的尼科也不在人世了，不过还没有证实）。我们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把队伍重新整顿好，重新武装起来。然后，我们袭击了敌人的一个军事哨所，击毙和打伤了一些士兵，还俘虏了一些。击毙的敌人就听其暴尸战场。过了些时候，我们又活捉了三名兵士，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如果再加上我们一无伤亡，而且我们在山上就好象在自己家里一般，你就明白了，那些大兵的士气是何等的低落，他们永远也包围不了我们。当然，斗争还未胜利，今后还有不少战斗，但是天平秤上的指针已经偏向我们这边，而且，我们这边的重量将与日俱增。

现在来谈谈你们吧，我很想知道你是否仍旧住在我现在寄信给你的那幢房子里？你们，特别是“最娇嫩的爱情的花瓣”，近况如何？代我以她的骨骼所忍受得了的力气拥抱她、吻她。我走得如此仓促，竟把你和女儿的照片都忘在潘乔家了。把这些照片寄来给我。来信可寄往叔叔处，并写明交帕托霍收。信可能会耽搁一些时候，但我想定能收到。

起义者在上有敌机、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继续在马埃

斯特腊山区游动。他们饥渴交迫，肮脏不堪，穿着破烂的衣履，避开所有的居民点，唯恐有人去告密。哪里料到叛徒已经混进他们中间。那人就是农民欧蒂米奥·格拉。起义者登陆后，他就参加了他们的队伍。他熟知山区的每一条小路，负责把粮食供应给起义者。但有一次，他落到了巴蒂斯塔分子的魔掌中。他们答应他，如果他杀死卡斯特罗，就赏给他一大笔奖金。这个愚昧的、逆来顺受的农民，被讨伐队的许诺所诱惑，便想伺机下手，完成那桩人家唆使他干的罪恶勾当，幸好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帮助起义者识破了他。格拉供认了他叛变的罪行。在临刑前，他要求起义者一旦胜利之后帮助他的子女上学校接受教育。起义者答应了他，后来履行了这个诺言。

在起义者进入山区的最初几个月内，切的健康状况是可悲的。由不服水土到渐服水土的这段时期，对切来说，真可谓度日如年。二月里，切因疟疾发作而卧床不起。后来哮喘病又发作了，加之没有药品，病势无法控制。一次，起义者在转移时，突然遭到了讨伐队的火力袭击，便一边退却，一边寻找可以隐蔽的地方，而切却无法动弹。全靠一个叫克雷斯波的农民，把他从枪林弹雨中背了出去。

起义者把切安置在一个农场主家里，并留下一名战士保护他。这个农场主是巴蒂斯塔的政敌，他搞到了少许肾上腺素，切靠了这点药品终于离开了病榻，出发去和同志们会合。但是他的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一个健康的人只消几个小时就能走完的路程，他却走了十天之久。切在一篇文章中讲道：“这十天是我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最

痛苦的日子。我扶着树干，拄着枪托，步履艰难地向前走去，而陪伴我的那个战士，已象惊弓之鸟，每听到枪响就浑身发抖，每当我因哮喘而咳起嗽来，他就歇斯底里大发作，乱叫乱嚷，因为咳嗽声可能招致讨伐队发现我们。”

一九五七年四月，正当切的哮喘病又发作的时候，他同巴蒂斯塔的一群兵士遭遇了。指挥这群兵士的就是前已提及的那个桑切斯·莫斯克拉。切一边回击，一边隐蔽起来，这耗尽了他的力气。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哮喘起初有所收敛，让我奔跑了几公尺路，随即就向我报复：我的心跳得如此剧烈，眼看就要脱腔而出。蓦地里，我听到树枝被碰断的窸窣窸窣的声音，我想逃走，但是力不从心，一步也动弹不了。幸好这一次来的是我们的一个新战士——他迷路了。他一看到我，就说：‘指挥员，别害怕，我跟您一块儿死！’我压根儿就不想死，倒是想叫他滚蛋。我记得，我的确把他撵走了。在那一天，看来我成了一名懦夫。”

只有当哮喘病把切彻底压垮了的那些日子里，他怕成为同志们的累赘，才肯留下来，躺在某一个农民的茅屋中养病。每遇这种情况，他手中紧握的就不是步枪，而是书籍和用以记录每日要事的笔记本。在一张从当年保存下来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正躺在病榻上阅读德国文学家爱米尔·路德维希写的《哥德传》。

在切的纵队中作战的马西亚尔·奥罗斯科上尉证实说：“我记得他有许多书。他好学不倦，连一分钟也不肯浪费掉。他常常为了看书或者写日记而放弃睡眠。如果他天一亮就起床，准是为了看书。夜间，他常常借篝火的

光看书，他的视力非常之好。”

即使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切没有诗歌也无法生活。一个叫卡利斯托·莫拉莱斯的起义者回忆道：“上级派我到圣地亚哥去，他就托我给他捎两本书回来。一本是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共同之歌》，另一本是西班牙诗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诗集。他非常喜爱诗歌。”

另一位目击者，安东尼奥上尉在一篇文章中讲道：“他的病常常使他连气都喘不过来，我真不明白，他怎么还能行军。但是他却背着背包，扛着武器，携带全副装备，翻山越岭，象一个最坚韧耐劳的战士。他的意志，不消说，象钢铁一般。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理想的忠诚——正是这种忠诚赋予了他力量。”

如果切在行军途中发作了哮喘病，他决不允许自己掉队。马埃斯特腊山区战斗的参加者若埃尔·伊格莱西亚斯回忆道：“切要是开始发病，也丝毫不会影响纵队行进。他充其量只让别人帮他拿拿背包。他认为不应当由于他生病而使部队耽搁时间。这是一条共同准则，适用于任何人。不应当由于任何一个病号而使部队耽搁时间。如果你不能行走，那就留下来治疗。如果你还能坚持，那就走。这个准则他从来不曾破坏过。”

切这个起义者，既是个外国人，又是个医生，而且常常因哮喘发作而病得死去活来，因此特别引起农民的关注，有些农民感到他这人不可理解，有些农民则尊敬他，同情他。山区有一个叫庞西亚娜·佩雷斯的农民老大娘，曾经帮助过起义者（切开玩笑地管她叫“我的未婚妻”），在回忆切的情况时说：

“可怜的一切！我亲眼看到他怎样受哮喘病的折磨，发病的时候，只能一个劲地喘气。他一声不响，轻轻地呼吸着，免得哮喘发作得更加厉害。有些人发了病，就乱叫乱闹，拚命咳嗽，把嘴张得老大。切却尽力控制病势，使气平下来。他躲到角落里去，坐在凳子上或者石头上，静悄悄地休息。每逢我跟他聊天，只要发现他讲一个字停一会儿，我就知道他发病了，我赶紧去给他烧些热汤，让他喝下去，暖和暖和胸口。喝了些热的，他就轻松些。圣母啊！看到这样一个坚强而又漂亮的男子汉喘不过气来，受那么大的苦，真叫人心头难受！”

但是切可不喜欢人家怜悯他。谁只要“可怜的！”三字一出口，他立即就会看那人一眼，这一眼好象并没有什么意思，但同时却又包含了许多意思。送一碗热汤给他喝，使哮喘多少缓和一点，是完全应当的，但同时又向他发出怜悯的叹息，投之以怜悯的目光，或者讲句怜悯的话：“唉，天啊，拿你怎么办呢！”这就毫无必要了。

虽然切这个起义者显得很古怪，一点也不象古巴人，而且他讲话又用的是阿根廷方言，在古巴人听来是“怪声怪调”，可是古巴农民还是很信赖他。切以他的质朴、勇敢和正义感，以在世界各地普遍受到敬重的那种品德，赢得了许多农民的好感。

有一位叫拉斐尔·查奥的起义者讲道：“他的情绪一贯很好，讲话从不粗声粗气，也从不对人呼么喝六。虽然他在跟人交谈时会讲些不客气的话，可是从不呼么喝六，从不侮辱人。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人铁面无私的人，只要有必要，他才不讲情面哩……比他更无私的人，

我还没见到过。他哪怕总共只有一个甜马铃薯，也愿意把它送给同志们。”

切曾经说过，游击战士应该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本人一贯就是这样一个人。切教导说，游击队的指挥员应当成为在行为上无懈可击并且随时愿意作出自我牺牲的表率，切本人就是这样一位表率。

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切的出众之处就在于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去完成最危险的任务。这位献身于崇高理想、渴望解放拉丁美洲其他所有国家的人，以其利他主义、以其每时每刻都甘冒生命危险去从事最艰巨的事业的那种决心，使得战士们惊叹不已。

切指出，游击战士需要有钢铁般的体质，使他能抵御一切厄运而不致生病。在这句话的字里行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遗憾的心情，因为他本人却为病魔所缠。他为了同疾病斗争所付出的精力，是难以估量的。

因此，不但战士们，连古巴的农民也都敬重这个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曾亲眼目睹他的生活和斗争……

切在整个战争期间写的日记，是他的那部名著《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的基础。这是一部富有戏剧性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真实的作品。书中描述了严酷的游击队生活，描述了那些来到山区的人的苦痛、理想和希望。这些人抱着不战胜就殉难的决心来到山区，以便同老奸巨猾、残酷无情的敌人展开力量悬殊的斗争。作者在书中很少提到自己，即使提到，也多半出之于取笑和讥讽，仿佛在不遗余力地贬低自己，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一部描述切本人、描述这个勇敢、谦虚和善良的人的作品。

切的回忆录有其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在拉丁美洲的同类书籍中是极为罕见的。其中没有连篇累牍的空话，没有对悲欢离合的渲染，也没有作者要把自己打扮成理想的英雄人物的任何企图。

切对于炫耀、吹牛、夸大和自吹自擂，素来厌恶。他的英勇无须再加以美化。切在《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一书中，评论到由他指挥的布埃西托村一战时，讲：“我参加这次战斗所起的作用是无足轻重的，我的举止绝对称不上英勇——即使那寥寥的几声枪响，我也不是用胸膛而是用截然相反的部位去迎接的。”

\*

\*

\*

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战士逐渐与在圣地亚哥和哈瓦那活动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地下活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弗兰克·派斯、阿曼多·阿特、比尔马·埃斯平、艾德·圣塔马利亚、塞莉亚·桑切斯——来到山区，会见了菲德尔。地下工作者负责供应起义者以武器、弹药、被服、药品和经费，并向山区输送志愿军。除此而外，他们还负责动员群众与巴蒂斯塔进行斗争。

只要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战士们在山区坚持住，哪怕他们的人数寥寥无几，巴蒂斯塔就坐卧不安。从起义者登陆的第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要宣布：“匪徒”已被包围、打垮和消灭。他派遣自己最精锐的军队、飞机来围剿起义者。可是，山区的枪声并没有停息，这就说明了起义者仍然怀有一线希望，相信并非一切都已经丧失殆

尽，相信菲德尔·卡斯特罗燃起的星星之火，有朝一日定会变成全民族解放斗争的熊熊烈火……

为了揭穿巴蒂斯塔所捏造的起义者已被击溃的这类谎言，菲德尔·卡斯特罗委派福斯蒂诺·佩雷斯去哈瓦那，——找一个有声望的美国新闻记者，同他取得联系，并且护送他上山。佩雷斯选中了《纽约时报》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马修斯避开了巴蒂斯塔的密探，来到了山区，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晤。

过了一星期，马修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他会见起义领袖的轰动一时的报导。这篇报导证实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活着，而且正在险峻的、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的群山之中顺利地战斗着。马修斯预言说：“从各方面来看，巴蒂斯塔将军指望把卡斯特罗的起义镇压下去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只能指望他的某个纵队的士兵们碰巧遇到了这位年轻的领袖和他的司令部，趁机把他们消灭掉，但是这种侥幸的事未必会发生……”

马修斯这篇报导以及文中所附的菲德尔及其战士们在山区的好些照片，进一步动摇了独裁者巴蒂斯塔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威信。巴蒂斯塔在国外的政敌积极地展开了活动。而在这个岛国的首都以及其他城市，反对独裁者的斗争也日益发展。

一月四日，圣地亚哥的妇女举行了反对独裁者的示威游行。她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停止杀害我们的儿子！”

在哈瓦那，大学生组织“革命指导委员会”在酝酿着



起义。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这个组织的成员终于向电台、大学和总统府发动了进攻，指望在总统府里逮住巴蒂斯塔。这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大部分起义者在同警察和军队搏斗时牺牲了，——但是反巴蒂斯塔的情绪非但没有受挫，反而更加激烈了。

除了那些死心塌地为独裁者卖命的警官、军官以及贪官污吏、富裕的糖厂主和当地一部分靠了跟美国资本勾结而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以外，全岛广大居民阶层对于巴蒂斯塔政权的恐怖手段、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盗窃国库以及向美国企业家、五角大楼和国务院胁肩谄笑的丑态，无不感到满腔愤怒。

\*

\*

\*

三月中旬，山区的起义者获得了增援。弗兰克·派斯装备了一支由五十名志愿人员组成的增援部队，归豪尔赫·索图斯指挥。豪尔赫·索图斯是圣地亚哥的地下工作者，曾参加过十一月三十日的起义。这批志愿人员由当地水稻种植园主乌维尔托·马托斯派他的卡车把他们送进山区。索图斯和马托斯都是激烈的反共分子，后来他们背叛了革命，被革命法庭判处长期徒刑。<sup>①</sup>菲德尔委派切去接应和指挥索图斯的队伍。但是索图斯却断然拒绝把队伍交给这个阿根廷人。切写道：“我当时还有一种身为外国人的复杂心理，因此我不愿意为这件事而使关系搞得太紧张。”菲德尔得悉后，批评了切，指出他应当

---

<sup>①</sup> 索图斯后来逃往美国，他在那里接受反对革命古巴的特工训练时触雷而死。——原注

坚持执行命令。

新补充的兵员事先没有受过适应山区游击战条件的训练。山地行军把这些城里人搞得焦头烂额，他们很快就疲乏了，便动手减轻身上的负担，但他们扔掉的是必需品——食物，带走的却是次要的东西——化妆品。

尽管如此，这批补充兵员的到来使起义者的力量几乎增加了一倍。菲德尔把他的战士编为三个分队，由三位上尉——劳尔·卡斯特罗，胡安·阿尔梅达和豪尔赫·索图斯分别担任各分队的领导人。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受命指挥前卫队。埃菲赫尼奥·阿梅海拉斯指挥后卫队。乌尼维索·桑切斯任总司令部警卫队长，而切名义上继续在总司令部担任军医，实际上却是菲德尔·卡斯特的顾问或者说是执行特殊重要任务的军官。

现在，起义者已扩充了自己的队伍，切便建议菲德尔立即对巴蒂斯塔分子发动攻势——攻打他们碰上的第一个哨所，或者在公路上进行伏击，夺取卡车。但是菲德尔却持有另一种意见：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锻炼新兵，使他们适应山区的艰苦生活和长途行军，学会很好地使用武器；待新兵“成熟”以后，再去攻打驻扎在马埃斯特腊山麓的某一支驻防军。而击溃这样一支驻防军必将对全国产生深刻的影响。切同意了，认为菲德尔的决定有道理。

开始训练战士，以便使他们更好地投入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

切回忆道：“在那些经受考验的日子里，我终于领到了一张帆布吊床。帆布吊床在当时来讲是珍品，但是游击队内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帆布吊床只发给那些克服了

懒惰的习性用麻袋布为自己做了张吊床的人；凡是做了麻袋布吊床的人，都有权根据帆布吊床货源的多少，领取帆布吊床。但是我由于过敏性反应根本无法使用麻袋布吊床。我对麻袋布的细毛有非常过敏的反应，因此我不得不席地而卧。既然我没有做过麻袋布吊床，当然无权指望领到帆布吊床了。菲德尔知道这一情况后，就为我破了例，下令发给我一张帆布吊床。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就发生在拉普拉塔河畔，当时我们正顺着一座山的支脉，攀登到帕尔马莫恰山去。而在发给我帆布吊床的前一天，我们初次尝了马肉。马肉不但是一种佳肴，而且看来也是对人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战斗考验。我们队伍中的农民愤怒地拒绝了分发给他们的那份马肉。有些人几乎把曼努埃尔·法哈尔多看作是谋杀犯。曼努埃尔·法哈尔多在参加游击队前是个屠夫，因此我们就利用了他的专业，委托他去宰马。

“第一匹被我们宰掉的马是属于一个农民的，他住在拉普拉塔河的对岸，名叫波普。游击队员们把他错当成了另一个告密的家伙，因而没收了他那匹背部磨伤得很厉害的老马。几小时后，那匹马就变成了我们的食物。它的肉对有的人来说是美味，但对农民们的胃来说却是一种考验。他们咀嚼着人类老友的肉，几乎觉得自己已沦为食人生番了。”

巴蒂斯塔的军队和警察千方百计地想消灭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起义者，并把国内的反抗运动镇压下去。但是，恐怖手段并没有给独裁者带来预期的结果。对他的军队来说，山区是不可逾越的障壁。报纸和电台报导了起义

军一再大胆地袭击巴蒂斯塔分子的驻防军的消息。具有各种政治色彩的志愿兵争先恐后地来参加“大胡子”军。“大胡子”是人民群众给卡斯特罗的战士们起的外号，因为他们缺乏剃刀只好留起了胡子。侨居国外的古巴侨民为他们募集经费，购买药品、武器，并把这一切秘密地运到古巴。

有一艘叫做“科林蒂亚”号的轮船，应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份内，把以卡利斯托·桑切斯为首的志愿兵从美国的迈阿密运抵古巴，来援助起义者。巴蒂斯塔在海滨布下了讨伐队，企图截获“科林蒂亚”号。菲德尔决定调虎离山，把这些讨伐队吸引开去，便下令攻打距圣地亚哥十五公里的乌维罗村的兵营。乌维罗的驻防军堵住了马埃斯特腊山区起义军的出路。如果能够攻占乌维罗这个防卫严密的据点，便为起义军打开了通向奥连特省平原地区的道路，并将证明：起义军不但具备防御的本领，而且还有进攻的能力。如果这一战告捷的话，对巴蒂斯塔分子来说，就将是他们在军事上的第一次惨败。

切亲身参加了乌维罗一战，他在《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一书中，对这次战斗作了这样的描述：

“攻打的目标一经确定，我们就着手制定当前这次战斗的各项细节。为此必须掌握敌军的人数，哨所的数目，敌军所使用的通讯联络的方法以及通向敌军的接近路等等。后来成为起义军少校的卡尔德罗同志，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不少帮助。

“我们认为，敌人对我们的情况掌握了大体准确的情报，因为我们抓住了两名暗探，据供认，他们是巴蒂斯塔

分子卡西利亚斯派来刺探起义军各支队的部署及其集合地点的。

“就在五月二十七日那一天，司令部召开全体指挥人员会议。菲德尔宣布，即将开始战斗，各支队准备出发。

“我们的向导是卡尔德罗：他对乌维罗兵营地区以及所有通向它的接近路都非常熟悉。我军在黄昏时分开始出动。一夜之间要走十六公里左右。这条路很难走：是一条山路，蜿蜒曲折，又陡又险。这次行军花了大约八个小时：为了审慎起见，我们曾停下来好几次，特别是在穿越危险地带的时候。最后，终于下达了向敌人进攻的命令。必须先解决掉哨所，然后倾我们的全力向巴蒂斯塔分子的木头营房开火。

“事先我们已经得悉，兵营周围分布着岗哨，而且都得到了加强，每个哨所中至少有四名兵士。

“灌木丛使我们得以逼近敌人。

“我们的司令部为了便于指挥战事，把指挥所设立在劈对兵营的一个小高地上。战士们接到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不得向民房开火，因为那儿住有妇女和儿童。

“乌维罗兵营位于海边，因此要包围它只须从三个方向发动进攻。

“由豪尔赫·索图斯和吉列尔莫·加西亚指挥的小队，受命去袭击巴蒂斯塔分子的一个哨所，这个哨所把守着那条通往佩拉德罗的海滨公路。阿尔梅达则受命去拔掉高地斜对面的那个哨所。

“菲德尔驻在高地上，劳尔和他的分队从正面攻打兵营。划给我那个小队的是中间阵地。卡米洛和阿梅海拉

斯本应在我的小队与劳尔的分队之间的中间阵地上行动，但是在黑暗中他们迷失了方向，没有按照规定进入我的右方，却进入了我的左方。克雷森西奥·佩雷斯的分队奉命去占领由乌维罗通契维里科的道路，以便拦住敌人的援兵。

“按照计划，这次战斗是一场速决战，因为我们的进攻应当是绝对地出敌不意的。但是，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我们却还是不能按照命令规定，展开各自的战斗队形。向导们——卡尔德罗和当地人埃利希奥·门多萨——不断传来情报。天已经亮了，战斗还没有开始。我趴在一个大土丘上，兵营在山脚下相当远的地方。因此我们决定向前推进，寻找更有利的阵地。

“其他各队也出动了。阿尔梅达从指定给他的位置向掩护兵营接近路的那个哨所进发。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在我左边走着。他戴的帽子颇象外籍军团兵士的钢盔，上面缀有‘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标志。敌人发现了我们，开起火来。但是我们继续前进，同时采取了各种预防中弹的措施。不久，其他小队掉队的战士都汇集到我们这个小队里来了。那些人中间有马里奥·莱亚尔，阿库尼亚，还有一个来自皮龙的绰号叫做‘炸弹’的同志。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了。我们已经来到了必须通过的那片开阔地。敌人不停地瞄准射击。我们进入了离敌人前沿大约六十米的阵地上，我从那儿看到了两个巴蒂斯塔兵士跳出堑壕向一所民房跑去。我开始向他们射击，但他们已经及时地钻进了民房，而我们是不能对民房射击的，因为那儿有妇女和儿童。

“这时，我们的小队已进入那片开阔地。子弹在周围呼啸。突然，我听到很近的地方响起了呻吟声。我以为是个巴蒂斯塔兵士受了伤。我小心地向他爬了过去，不料却是马里奥·莱亚尔。他的头部受了伤。我查看了他的伤口。应当立即包扎，可是没有急救包，无从包扎。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从后面上来了，过了一会儿，他把伤员拖进了灌木丛。我们又继续前进。不久，阿库尼亚又倒了下去。于是我们停了下来，趴在地上，对着前面伪装得很好的敌人的堑壕开火。只有发动勇猛的冲击，才能攻下这条堑壕。我下了决心，终于拔除了这个敌人凭以顽抗的据点。

“在我们的感觉上，战斗似乎只打了一刹那就结束了，但事实上从打响第一枪到攻占整个兵营花费了两小时又四十五分钟。

“巴蒂斯塔分子终于从位于我们正前方的由圆木构筑的堑壕中跳了出来，举起了双手。到处响起了‘我投降！’的喊声。我们一跃而起，向兵营冲了过去。

“我们冲进了兵营的院子。俘获了两名巴蒂斯塔分子，其中一名是军医，一名是卫生员。伤员越来越多了。此时，我没有可能去医治他们，就决定把他们交给那名军医。那个军医突然问我有多大年纪，什么时候领到毕业证书的。然后他坦率地承认说：‘喂，小伙子，你知道吗，还是由你自己来医治他们的好。我刚刚毕业，还没有经验。’看来，这个人由于没有经验，再加上心中害怕，把人家教给他的本事统统忘掉了。我又只好放下战士的步枪，穿上军医的白罩衫……

“在这次战斗中，向导埃利希奥·门多萨牺牲了，他是在手执步枪向敌人冲锋时被打死的。埃利希奥是个迷信的人，随身带着护身符。当人家大声地叫他‘留心！’时，他却鄙夷地答道：‘我有我的圣徒保护！’结果，没过几分钟，他就被一梭子冲锋枪子弹打成了两截。

“那一天，我作为部队的军医碰到的最重的伤员是西列罗斯同志。子弹打进他的肩膀，穿过了他的肺部，嵌进了脊椎。他的伤势极其严重。我给他服了镇静药，替他包扎了胸部。我能够帮助他的仅此而已。我决定把两位受了重伤的同志——莱亚尔和西列罗斯——交托给敌人驻防军的军医去护理。我跟他们告别时，竭力掩饰住我为他们的伤势万分担忧的心情。他们声明，他们宁愿死在自己人中间，宁愿战斗到最后一息，也不愿留下来。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他们不得不留在兵营里，同也是经过我们急救的巴蒂斯塔伤兵们待在一起。

“缴获了好多辆卡车，我们在其中一辆上载满了军事装备和药品，便向山区进发，很快回到了我们的基地。我们给伤员作了治疗，把牺牲的同志埋葬在道路的拐弯处。”

克雷森西奥的分队当时负责扼守通向契维里科的道路，因此没有参加攻打兵营。这个分队的战士们在这条路上捉住了好几名企图逃命的巴蒂斯塔兵士。

这次战斗的战果是，起义军有十五人伤亡，而敌军则有十九人受伤，十四人毙命。

对起义军来说，乌维罗之战是一个转折点。经过这次战斗，部队士气大振，更增强了必胜的信心。乌维罗的



胜利决定了敌人配置在马埃斯特腊山麓下的小股驻防军的命运。在短时期内,这些驻防军都被歼灭了。

在乌维罗一战中立下战功的起义军战士中间,有胡安-比塔略·阿库尼亚·努涅斯,朋友们都管他叫比洛,他后来化名华金,和切一起在玻利维亚山区战斗,并且牺牲在那儿。

乌维罗之战再次证明,这位患哮喘病的阿根廷人具有天赋的战士的素质:勇敢、冷静、机敏。无怪乎游击战这门科学的“教授”巴约认为切是他最有才能的学生。但那时还只是在理论上,而现在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对切来说,战斗并非最终目的。卡利斯托·莫拉莱斯对作为战士的切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对他来说,战斗只是工作的一个部分而已。在打完仗以后,甚至是打了胜仗以后,他也必须继续工作。因为必须要统计伤亡人数,编写战报和开列战利品清单。战后的活动仅限于此。他既不举行群众大会,也不搞任何庆功活动,充其量召集大家座谈座谈,有时,打完一仗以后,过了几天工夫,我们便在晚间聚拢来谈谈这次战斗。即使这种座谈,切也用来指出战斗中的错误以及打得不好的地方,并对已经过去的战斗进行详尽的分析。”

不论切如何千方百计地想抛弃医生这个职务而专心致志地当一名战士,但是他未能如愿以偿,他总不能眼看战士负伤或患病而不闻不问。他为战士医病或治伤是非常认真的,只要游击生活的环境和条件许可,他总是尽力而为。

关于切这位拔牙的“江湖郎中”的本领,在马埃斯特

腊山区流传着许多趣闻。有一次，他所在的支队搞到了一套牙科医生的器材。战士们刚停下来休息，切就热心地到处找人拔牙，准备施行他生平从未施行过的手术。他终于找到了好几个愿意让他拔牙的勇士，但是他们事后都叫苦不迭，后悔不该如此轻信切。

这位充充数的牙科医生后来回忆道：“当时我不仅没有拔牙的经验，而且也没有麻醉药。因此我只得依靠‘心理麻醉’：我在我的病人嘴巴里乱捣的当儿，如果他们叫疼叫得太厉害，我就把他们臭骂一顿。”

切不光是给游击战士而且还给农民治病：给那些由于劳动过于繁重而未老先衰的青年妇女和生佝偻病的孩子治病。古巴农民大都患有维生素缺乏症、胃病和结核病。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曾经看到过医生。但是，能够改变这些贫病交迫、囿于偏见的山民的厄运的，与其说是药品和医疗，还不如说是根本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土地改革。

切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而且竭力使别的起义者也深信这一点……

## 2. 游击队的日常生活

言语最完美的形态就是行动。

——何塞·马蒂

起义者在乌维罗打垮了巴蒂斯塔分子，从而证明正规军绝不象巴蒂斯塔政权的拥护者所吹嘘的那样是不可

战胜的。虽然在乌维罗之战的下一天，陆军总司令部宣布：从“科林蒂亚”号登陆的全部起义者已被歼灭或者俘虏，但是巴蒂斯塔还是不得不在“哥伦比亚”兵营为“阵亡将士”降旗志哀。独裁者在盛怒之下，强令农民从马埃斯特腊山各处的坡地疏散，他想用这种手段使起义者得不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可是古巴农民抗拒疏散，很多农民加入了起义军或者给予起义军以种种援助：供应粮食，监视敌人的行动和担任向导。

但是，起义者同农民的密切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经历了一个复杂、矛盾而又漫长的过程。并非所有的农民都理解起义军的政治目的和任务。古巴农民大部分是文盲而且相当迷信。有时只要一句话讲得不恰当，一个手势做得不得体或者一个举动欠考虑，就足以失去他们的信任。

古巴农民的精神世界可以从游击战参加者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讲的一个故事中看出来。这个故事描述了起义军在一个山村中的生活：“起先，当我们刚进驻这个地区时，跟我们交谈的人十分有限……可是渐渐地在我们周围聚集起越来越多可以信赖的农民。这全是靠了切的功劳，他经常同农民接触，与他们谈心。我们就这样获得了这些农民的同情。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但谁也没有去告发我们。我们每天晚上都同老乡谈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譬如：当我们再次与菲德尔会师时，他将拥有多少人啦，战争结束后情况又会怎样啦……但是，有一个话题几乎每晚都会从我们的谈话中冒出来，那就是关于神鸟的传说，这是在那一带广为流传的一则非

常古老的神话，当地人都将这种鸟奉为至圣。

“据说，有一次，有个西班牙人向神鸟放了一枪，非但没有打死它，自己却险些儿送了命：他的帽子竟被打穿了好几个洞。有一个倒霉蛋，不相信世上有神鸟，可是一天晚上那鸟在他前面出现了，他就此成了残废。

“有一次在谈天时，我说：只要这种鸟一露面我就要用步枪把它一枪打死。农民们当即警告我说：讲这种话的人，就一定会碰上这种鸟，而且将遭到极其悲惨的后果。

“第二天，农民们纷纷议论我这种狂妄的行为，有些人甚至拒绝和我一起外出。切等到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时，问我对那种鸟有什么想法，我干吗扬言要把它打死。我就对他解释，我不相信这种鬼话。

“几天后，我们和老乡又谈到了这一话题，我趁此机会向老乡们解释：虽然我不相信这种神鸟，但是对于相信这种神鸟的人的意见却是尊重的。”

古巴农民对于巴蒂斯塔和他的讨伐队深恶痛绝，这些家伙把他们破败的茅屋洗劫一空，强奸他们的女儿，残酷地镇压他们的家人。但同时，许多古巴农民又几乎把共产主义看作洪水猛兽，这都是因为受了教堂里的布道和电台里的宣传的影响。

切的游击支队里的第一个女战士伊尼里亚·古铁雷斯是一位农村姑娘，参军时才十八岁，她曾讲起过一桩极其生动的事情：“有一次，切问起我对宗教的看法。这迫使我反问他自己是否相信上帝。他回答我说：‘不，我不信，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我惊得目瞪口呆。我当时还

非常年轻，毫无政治修养，而关于共产党，我所听到的尽是些叫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我从吊床上跳了下来，大叫道：‘不！您不可能是共产党，要知道，您是个多么善良的人啊！’切听了，哈哈大笑，笑了好久，接着就开始把我不懂的那一切事情解释给我听。”

不但无知的农民受到反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连一些起义者也受到影响。马西亚尔·奥罗斯科回忆说：“有一次，有个战士说，在推翻巴蒂斯塔以后还得继续打仗。到了那个时候就该轮到和共产党打仗了。切用脚轻轻踢了我一下，要我注意听，他对那个战士说：‘你得知道，共产党人是很难对付的。’那个战士问：‘为什么？’切回答说：‘因为他们到处都有，你无从知道谁是共产党人，也无从知道他们在哪儿。想抓住他们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你跟一个人谈话，他恰好就是共产党人，可是你却一点也不知道。’”

切在与农民和战士谈心时，总是致力于消除他们思想意识上所受的反共毒害。他用“狙击手”的笔名发表在起义者机关报《自由古巴人报》创刊号上的那篇杂文，是这方面的极好例证。这篇杂文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一月，是切在古巴问世的第一篇文章。现将全文引述如下：

电台和报刊把那些遥远的国家内所发生的事件传到了我们马埃斯特腊山的山顶上。电台和报刊报导那些国家的事件倒是毫无顾忌的，可是关于这个国家内天天都在犯下的罪行，却未见提及，因为它们不能报导。

这样一来，塞浦路斯、阿尔及利亚、伊夫尼和马来西亚所发生的风潮和屠杀之类的事，我们都听到和读到了。这类事件具有四个共同的特点：

1. 当局使“叛乱分子遭受重大损失”；
2. 没有俘虏；
3. 政府无意改变其政策；
4. 所有革命者，不论其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活动，一概得到共产党人的秘密“援助”。

世界各地和古巴何其相似乃尔！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一群爱国者，不论是持有武器的还是手无寸铁的，不论是已经起义的还是尚未起义的，都被枪杀了；讨伐队经过“长时间交火”以后又一次获得了“胜利”。所有目击者悉被杀戮，因此无俘虏可获。

政府军从未遭到过伤亡。有时，这倒也是事实，因为屠杀赤手空拳的人是不用担多大风险的。但更多的时候却纯属谎言。马埃斯特腊山区——乃是驳斥这类谎言的无可置辩的例证。最后，还有一套惯用的伎俩，便是给对方扣上“共产主义”的罪名。

不管事情发生在哪个国家，凡是拿起武器的人，统统都是共产党人，因为他们不甘心过贫困的生活……而所有那些屠杀老百姓、屠杀男女老少的人，却自称为民主主义者。世界各地和古巴何其相似乃尔！

然而不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象在古巴一样，反对恶势力与不公平的制度的决定权总是属于人民

的，人民必定取得胜利。

在巴蒂斯塔报纸的官方报导中，总是把切称为“流窜于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匪帮中的阿根廷共产党党魁”。据巴蒂斯塔的官方宣传机器“揭发”，起义者都是共产党人和“莫斯科的代理人”，因此官方的宣传机器断言，巴蒂斯塔军队追剿这股匪徒是为了把古巴和拉丁美洲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拯救出来。这个暴君是深知他的美国主子的“弱点”的：只要拉丁美洲的“大猩猩”卖力反共，华盛顿的阔老们就会施舍给他们一些残羹冷炙，而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笔可观的进账了。

但是，信奉反共主义的人必将付出昂贵的代价；这帖毒药将使他们自己送掉性命。

\*

\*

\*

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农民对起义者信任的程度，取决于起义者对待山民的态度，取决于他们的言行举止。起义军要使自己在这方面无懈可击，就必须对自己队伍内部进行整顿。清除那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这帮家伙总是要到革命运动中进行投机的，特别在运动初期更是如此。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起义军的纪律确实很糟。切的回忆录中有一章叫作“痛苦的插曲”，就曾谈到这一点。

切曾在拉洛·萨迪尼亚斯指挥的支队中待过。拉洛是位忠诚而又勇敢的同志，深受战士们的尊敬和爱戴。

支队里建立了一个军纪委员会，具有军事法庭的全部权力。有一次，有几个战士想捉弄委员会的委员们，谎称发生了紧急情况，把委员们骗到了一个离驻地很远的地方。于是这些恶作剧的家伙都被监禁起来，拉洛亲自审问他们。他在盛怒之下，用手枪去揍一个战士，不料手枪突然走火，那个战士立即倒地死去。按照菲德尔的指示，逮捕了拉洛。

接着便开始就这个案件进行侦查，传讯目击者。战士们意见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完全是蓄意杀人，另一部分人却认为是过失杀人。但不论怎么说，指挥员擅自枪杀战士，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菲德尔亲自来到这个支队。亲自传讯证人直至深夜。好多人要求判处拉洛死刑。切挺身而出，当着战士们的面，断然反对这种意见，但是他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并不能说服拉洛的那些对头。

已经是深夜了，战士们还在激烈争论。最后菲德尔发言。他激昂地讲了很久，向战士们解释，为什么应当保留拉洛的生命。菲德尔谈到了起义军军纪废弛，提到了日常所犯的各种错误，还分析了军纪所以废弛的原因，最后着重指出，拉洛的行为理应受到严厉的制裁，但是他犯罪的本意却是为了维护军纪，这一点是不应当忘记的。菲德尔强有力的声音、激昂慷慨的言辞以及他那被许多火炬所照亮的魁伟的身躯，对战士们发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原来要求枪毙拉洛的那批人中间，有好些人逐渐地转而支持菲德尔了。

后来表决时，支队一百四十六名战士中有七十六名



主张给予拉洛以降级的处分，而其余七十名则仍旧主张枪毙他。

拉洛·萨迪尼亚斯受到了降职处分，其支队长一职，菲德尔委派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接任。

起义军不但要为整肃自己队伍的军纪而斗争，还得和打家劫舍的匪徒进行斗争。匪徒们盗用革命的名义，抢劫农民的财物，以此替巴蒂斯塔政权效劳。

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支队就曾经受命去消灭这样的一股匪徒。切在“与匪帮作斗争”这一章中叙述了卡米洛的支队怎样完成了上级交予的这个任务。

要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建立起统一而巩固的革命秩序，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由于居民们政治觉悟太低，因此需要长期地、细致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何况除此之外，四面八方都有巴蒂斯塔分子。起义者时时刻刻都处于敌人会侵入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这种威胁之下。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卡拉卡斯地方，有一股土匪，专事抢劫农民财产，破坏农村经济。土匪头子是一个姓张的华人<sup>①</sup>。这帮土匪以革命的词句作为掩饰，专事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在这一带，只要一提起这个姓张的，个个谈虎色变。

起义军顺利地消灭了以姓张的为首的那股土匪。革命法庭审判了匪徒们。张被判处死刑，对其余的匪徒也

---

<sup>①</sup> 在古巴有将近十万名华裔居民。他们都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被运至该岛甘蔗种植园做苦工的中国苦力的后裔。他们中间绝大多数已与本地居民同化。——原注

分别处以各种刑罚。张的匪帮中有三名青年，后来参加了起义者的队伍，都成为出色的忠诚的战士。

切指出：“在那些艰辛的日子里，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以杜绝种种违反革命纪律的现象，决不允许无政府主义在已经解放的地区中泛滥。”

另一个经常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是起义者的队伍中出现的开小差的现象。逃兵当中不但有被游击斗争的艰难困苦和危险所吓倒的城里人，而且也有当地的农民。切叙述了他的支队中有一名战士因临阵脱逃而被枪决。切写道：“我在山坡上集合了我们的整个支队，集合地点就在发生那出悲剧的地方。我向起义军战士解释了这一切对我们大家有些什么教育意义，解释了为什么要对临阵脱逃的人处以死刑，为什么叛变革命的人只配一死。

“我们在肃静的气氛中从那个抛弃了自己岗位的人的尸体旁走了过去。这第一次枪决使得许多战士大为震惊。也许，他们之所以感到震惊，与其说是因为对革命事业三心两意，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那个逃兵怀有私人感情，而且他们的政治觉悟也较低。在这里没有必要指名道姓地来谈这个事件中的当事人……我们只想交代一下，那个逃兵是一个普通的、思想落后的、来自当地农村的小伙子。”

要提高起义军战士的革命觉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不论是起义军的领导人，不论是普通战士，不论是农民，人人都在马埃斯特腊山这所“游击学校”里进行学习。

切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所发现的农民世界，比什么都

吸引他。农民实际上是“被侮辱和被损害”得最厉害的，切经常与农民交往，对他们了解得很透彻。他爱他们，却并不把他们理想化。没有农民的拥护，起义军不但无法取胜，甚至都无法在山区支持一个短时期。然而古巴农民也同样需要起义军，他们今后的命运，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期望，都有赖于起义军的胜利。为了取得山民的好感，起义军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嘴巴向山民证明，他们是山民真正的朋友。起义军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处处保护农民，使之不受讨伐队和吸血成性的财主们的迫害，他们为农民及其妻儿治病，教他们读书识字，给农民们确立了耕者有其田的权利。

有一位记者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到五月期间访问了马埃斯特腊山区，切当时对这位记者说：

“我们正在办的事情中，有许多是以前甚至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办的。可以说，我们是在革命过程中成为革命者的。我们为了推翻暴君来到这儿，可是却在这儿发现了一个广阔的农民的天地，这个天地成了我们斗争的支柱。在古巴，正是农民的天地最最迫切需要解放。而且，我们没有受教条和僵死的正统观点的束缚，向农民提供了援助，我们可不象形形色色的假革命者那样口惠而实不至，我们是切切实实地帮助农民的。”

\*

\*

\*

斗争的利益往往迫使人们作出严酷无情的决定，然而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凡属真正的革命都非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不可，而且这种严酷无情的决定所

殃及的还不仅仅是人。切在描述游击队员的日常生活时，曾谈起过这么一件事：

“就马埃斯特腊山区艰苦的环境而言，这一天还算是幸福的一天。我们在图基诺地区最为险峻曲折的山谷之一阿瓜雷维斯山谷中，耐心地监视着桑切斯·莫斯克拉的兵士们的行动。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一路走，一路放火烧毁一间间的茅屋，这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和悲伤。

“敌人既然企图攻打卡米洛的驻地，就必然要上山，而上山的路有两三条。敌人可能沿‘降雪路’上山，可能沿‘瘸腿路’上山，也可能沿现在人们称之为‘死路’的那条路上山。

“卡米洛急忙带领十二名战士前来迎击敌人。他手边总共只有十二名战士，却还得把他们一分为三，配置在三个地方。而这十二名战士所要抵挡的敌人却在一百人以上。我的任务是迂回到桑切斯·莫斯克拉的后方，然后对他发动袭击，并将他包围。包围敌军——这就是我们的意图，因此我们支队咬紧牙关，走过一间间还在冒烟的农舍，尾随着敌人，同时又不过分接近他们。我们离开敌军讨伐队相当远，但又不是远到听不见他们咋咋呼呼的叫喊声的地步。敌军的确切人数，我们不了解。我们排成一列纵队沿着山腰举步维艰地移动着，而敌人则在深谷中行进。

“要不是我们的新伙伴——一条小猎狗捣蛋的话，事情本来会非常顺利的。尽管费利克斯不止一次地撵这条狗回我们的基地去——所谓基地也者，是几间茅屋，炊事员都留在基地内，——可它还是跟着我们。在马埃斯特

腊山的这一带地方，山腰上没有一条路，因此非常难走。我们正在通过的那个地段，枯死的老树已被新生的丛莽所湮没，每走一步都需要我们作出很大的努力。战士们跳过树干，穿过丛莽，竭力盯住我们的那批‘客人’。我们这支小小的一列纵队默默地行进着。只是偶尔碰断树枝才发出一两下喀嚓声，而这种声音非常自然地汇入这一带山区的天然的喧声之中。忽然，小狗绝望而又焦急地哀哀狂吠起来。原来它被荆棘缠住了，因此呼唤主人来帮它脱身。有个战士把它救了出来，大家才重新上路。但是，当我们大家在一条山涧旁休息，而由一个战士从高处监视敌军的行动时，小狗又歇斯底里地狺狺狂叫起来。这一回，它已不是呼唤人们去救它，而是害怕人们会丢下它不管才如此狂吠的。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我声色俱厉地命令费利克斯：‘掐住小狗的脖子，掐死它！狗叫声必须制止！’费利克斯茫然地望了我一眼。疲乏的战士们围住了他和小狗。他慢吞吞地从袋里掏出一条绳子，把它绕在小狗脖子上，动手勒死它。小狗起先快活地摇着尾巴，但到了后来，绳子勒紧了，小狗的喉咙里发出了嘶嘶的哀声，随着这个哀声的节拍，它的尾巴甩动得越来越剧烈。我不知道这一切拖延了多久，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简直长久得没完没了。终于，小狗作了最后一次挣扎，便再也没有声音了。我们就这样让它长眠在一堆树枝上。

“我们重新上路。对刚才发生的这件事谁也没有吭一声。我们和桑切斯·莫斯克拉的兵士之间的距离拉长了。片刻之后，我们听到了一阵阵枪声。

“我们立即下山去寻找一条可以接近敌人的捷径。根据情况判断，敌人一定是和卡米洛的战士遭遇了。对射的枪声很密，但是没有多久就寂然无声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等待着下文。我们花了好大力气才赶到了我们以为发生战斗的那排茅屋旁，但是那儿没有一个敌人的兵士。两个侦察员上山到‘瘸腿路’去侦察。不久以后，他们便回来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座新坟，里面埋着一个巴蒂斯塔兵士。侦察员把这人身上的文件带了回来。就这样，我们知道发生了一次小接触，击毙了一名敌军的兵士。此外便一无所知了。

“我们垂头丧气地慢慢往回走。我们又对四围侦察了一下，发现两边山坡上都有人下坡的足迹。我们在归途上走了很久。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了一所阒无一人的农舍里。这是绿海畜牧场。我们就在那儿休息，立刻杀了一口小猪，把它和丝兰<sup>①</sup>搁在一块儿煮来吃。一个战士在屋子里找到了一把吉他。不知谁唱起歌来。

“也许，是因为歌声十分忧伤，也许是因为夜已经深了，而我们大家又都累得要死，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费利克斯席地而坐，吃着晚餐，他随手把一根骨头掷到了地上。屋主人的一条挺温和的小狗，本来一直在他脚旁打转，这时立刻衔起那根骨头，咬嚼起来。费利克斯抚摸了一下狗的头。那条狗诧异地望了费利克斯一眼，于是费利克斯就朝我望了一眼。我和费利克斯两人都感到内疚。屋内突然鸦雀无声了。不知不觉之间，我们所有的

<sup>①</sup> 丝兰是一种块根植物。——原注

人都激动起来。这头狗用它和善的眼睛望着大家，在它的眼光里，似乎可以感到那头被勒死的小狗对我们的责备。”

美国的宣传家们力图把切描绘成为一个冷酷、残忍、盲目的狂热之徒，不但以虐杀敌人为乐事，而且对自己朋友的牺牲也无动于衷。他们所以这么说，无非因为他们总是用自己的以及他们同伙的尺度来衡量他人的。谁是这帮人的同伙呢？巴蒂斯塔的那个古巴以及地球上凡是有反共“斗士”在为非作歹的地方，其中也包括美国本身在内，都是这帮人的同伙。至于切，他是一位人道主义的高尚战士。他总是首先给予受伤的俘虏以药物治疗，严禁别人侮辱俘虏。起义军对于战俘照例都是释放的。

每当有同志阵亡，切总是极其悲痛。然而战士终究是战士。战士应当视死如归，对战友和同志的牺牲也必须经受得住，不为其所动摇，并在战斗中痛歼敌人，为阵亡的战友复仇。在这方面，指挥员自始至终都应当以身作则。

尽管如此，有些人的牺牲也仍然震撼了切的钢铁意志。农民哈维尔·米连·丰塞卡回忆说：“当人们向切报告西罗·雷东多战死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方万万想不到切会哭，但那一天他忍不住了，悲痛征服了他。我亲眼看见他靠到岩石上，用双手捂住脸，悲恸欲绝地嚎啕大哭起来。”

\*

\*

\*

一九五七年六月初，菲德尔·卡斯特罗把起义部队

编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命名为何塞·马蒂纵队，由菲德尔亲自指挥，第二纵队（或称第四纵队，所以取这个番号是出于保密的目的）则由切担任指挥员，当时已一致公认切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切的纵队共有七十五名战士，编成三个分队，这三个分队的指挥员分别由前已提及的“违犯军纪的”拉洛·萨迪尼亚斯以及西罗·雷东多（雷东多牺牲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纵队）和拉米罗·巴尔德斯担任。革命胜利后，拉米罗·巴尔德斯出任内政部长，最近已成为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建立纵队之后，过了一些时候，起义军的指挥员们联名致函弗兰克·派斯，感谢他的帮助与支持。当大家在信上签名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告诉切说：“你签上少校军衔。”于是切就这样荣获了起义军中的最高军衔。切回忆这件事时说：“我们人人都难免的那种虚荣感，使我在那一天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起义军总司令部战时办公室主任塞莉亚·桑切斯为此发给了切一只手表和一个小小的五角星，切就把那枚五角星缀在自己的黑色圆形软帽上。

起义军在同讨伐队的战斗中连连取胜，这就迫使反巴蒂斯塔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直接进行接触。七月，被切称之为“歌剧中的女主角们”的古巴资产阶级政客费利佩·帕索斯和劳尔·奇瓦斯来到了马埃斯特腊山区。帕索斯曾在普里奥·索卡拉斯总统任内担任过国立国家银行行长，而劳尔·奇瓦斯则是人民党的首领。菲德尔和他们共同签署了全国革命阵线成立宣言。



宣言要求巴蒂斯塔下野，任命一个临时总统(帕索斯渴望得到这一职位)，举行普选，实行分配荒地的土地改革。

切后来在评论这一协议时写道：“我们当时就知道，这是一个束缚我们行动的最低纲领；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局处于马埃斯特腊山区，很难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人。因此我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得不依靠许多‘朋友’，虽然我们明知这许多‘朋友’无非是想利用我们的军事力量 and 人民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高度信任，以实现他们的无耻阴谋，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阴谋便是确保帝国主义得以通过买办资产阶级来统治古巴，买办资产阶级是和其北部主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

与此同时，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吃了一个又一个败仗的巴蒂斯塔军警，却在全国城乡加紧施行白色恐怖。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弗兰克·派斯在圣地亚哥的一条街道上被警察杀害了，他的兄弟霍苏埃也为警察所害。警察的这两桩罪行激起了公愤，人们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圣地亚哥全城居民几乎都参加了这次罢工，但是当局又将罢工残酷地镇压了下去。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西恩富科斯城的海军基地发生兵变。领导这次兵变的是一些持有反对派观点的军官，他们想借推翻巴蒂斯塔来防止真正的人民运动的深化和发展。但是连这次兵变也以失败告终。独裁者的嫡系部队把兵变镇压了下去，所有被俘的水兵悉被枪毙。在兵变期间和兵变之后，西恩富科斯一城就有六百名以上反对暴君的人遭到枪杀。

巴蒂斯塔的宪警还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人民社

会党党员。这个党始终不懈地努力使所有劳动者和一切进步力量采取统一行动去和暴政斗争，并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运动给予全面的支持。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于一九五九年时说道：“我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盟员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需要他们具有原则性、英勇气概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他们中间凡是被捕的人都曾遭到拷打和侮辱，其中许多人被残酷地杀害了。”

墨西哥政论家马里奥·希尔曾写过一部反映古巴那几年情况的著作，他在书中写道：为了对付革命行动而采取的恐怖行动、对无辜者的空前残酷的拷打和屠杀，使整个岛国成为一个大战场。对峙的双方中，一方是用美国所提供的威力强大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独裁政权，而另一方是虽然还未组织起来却对独裁政权同仇敌忾的人民。巴蒂斯塔由于用恐怖行动压服不了人民，便乞灵于最为卑劣的手段：他悬赏征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头颅。整个奥连特省到处都张贴着告示，其内容如下：

兹宣布：凡能提供情报，有助于戡平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克雷森西奥·佩雷斯、吉列尔莫·冈萨雷斯及其他头目所指挥之叛匪者均予以嘉奖，奖金数目视情报重要程度而定，至少不低于五千比索。

赏金数额不等，低者五千比索，高者十万比索；呈交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首级者，赏以最高之奖金，计十万比索。

附告：情报提供人之姓名将永予保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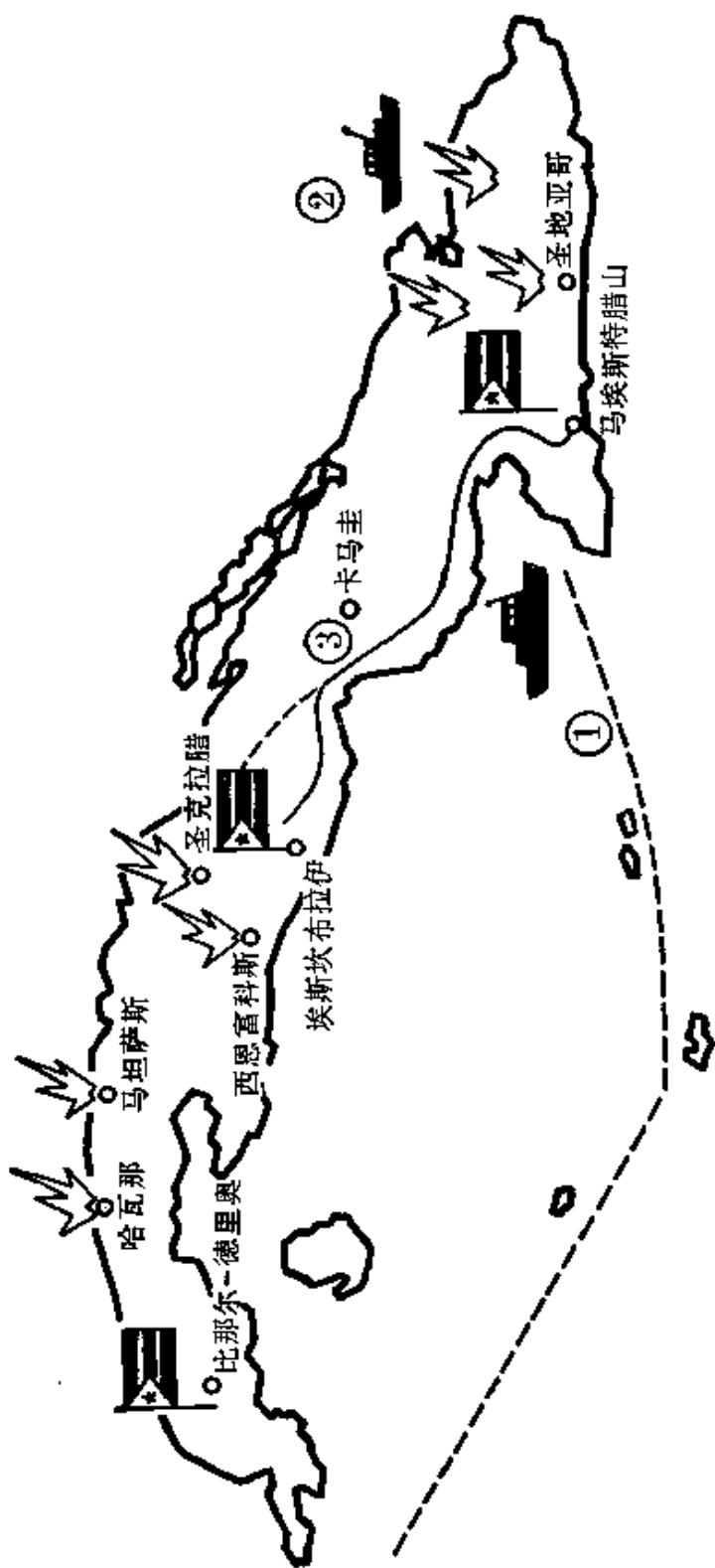
但是，即使用这样的巨额赏金，巴蒂斯塔也无法找到另一个欧蒂米奥·格拉……

许多反对巴蒂斯塔的人，为了躲避警察的暴行，纷纷上山，从而充实了马埃斯特腊山区起义军的队伍。此外，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克里斯塔尔山区和巴拉科阿地区也出现了起义中心。领导这些起义中心的是“革命指导委员会”、“七月二十六日运动”以及共产党的成员。

切在总结古巴的斗争时说：“将城市中的革命斗争和游击活动加以比较，事情就清楚了：人民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后一种形式最为有效，其特点是对人民来说需要作出的牺牲较小。游击队的伤亡几乎微乎其微，可是与此同时，城市中却牺牲了不少人，不但有职业革命家，还有普通战士和老百姓，这就说明当独裁政权发动镇压时，城市组织是极易遭到破坏的。”

切又写道，城市里往往把组织得很好的怠工活动与不顾死活的同时又是不必要的恐怖手段交替使用；使用恐怖手段的结果，往往使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遭到牺牲，而对共同事业又不能带来任何好处。

古巴的资产阶级政客们心犹不死，仍想利用马埃斯特腊山区起义军的功勋来捞取政治资本。他们于十月间麇集到迈阿密，等不及熊死，就着手瓜分熊皮了。他们成立了解放委员会，郑重其事地宣布费利佩·帕索斯为临时总统，还起草了告人民书。中央情报局特务朱尔·杜波依斯参与了这场把戏，他与迈阿密的那批阴谋家经常保



1953—1959 年期间古巴人民解放斗争形势

1. “格拉玛”号航线
2. “科林蒂亚”号登陆场
3. 切和西恩富戈斯由马埃斯特腊山向拉斯维利亚斯省进军的路线

持着接触。

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公开声明，严厉谴责了这些向美国佬卖弄风情的资产阶级“歌剧中的女主角们”所玩弄的阴谋。革命胜利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也曾谈起过这件事，他说道：“当时我们陷入了孤立，但孤立比起同小人为伍，要好上千倍，当时的确就是那么一种情况。”这批政客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想把胜利果实从起义者的手中夺走，准备在巴蒂斯塔垮台之后，复辟“民主制度”，镇压劳动人民，重弹反共老调，以讨好美国的大老板们。但是，菲德尔断然拒绝了“迈阿密公约”，从而使这个阴险计划以流产告终。

切热烈地称赞了菲德尔的立场。他在致菲德尔的信中讲道：“我再一次为你所发表的声明向你祝贺。我曾对你说过，你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你证实了依靠人民支持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大有潜力的。现在你已经踏上了更其美好的康庄大道。这条康庄大道，通过群众的武装斗争，必定会导致政权的取得。”

\*                                 \*                                 \*

到了一九五七年底，起义军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军事态势。现在他们已控制了马埃斯特腊山区。双方进入了短暂而又独特的休战状态：巴蒂斯塔的军队不上山来，而起义军为了积蓄力量，也不下山去。

切在《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中写道，起义军这个时期的“和平”生活过得非常艰苦。战士们缺乏口粮、被服和药品；武器弹药也很紧张；而且又没有自己的报纸和电

台可以用来开展政治工作。

起先,规模很小的游击支队都各自就地取粮。但是,随着队伍的壮大,就有必要建立正规的中央粮食供应站。当地农民把菜豆、玉米和稻米出售给起义军,起义军还通过他们去农村收购其他农产品。至于药品,主要是由城市的地下工作者输送给起义军的,但数量远远不足,而且送来的往往又不是急需的药品。

在战斗的间歇期间,切总是精力充沛地致力于巩固游击队的“后方”,建立卫生站、野战医院和兵工等工场。这些工场虽然是用手工方式操作的,但仍然制造出了靴鞋、背包、子弹带和军服。切兴奋地把工场缝制出来的第一顶军帽赠给菲德尔·卡斯特罗。

切还参加了小型烟厂的筹建工作,该厂出品的烟卷虽然质量不高,但战士们没有别的烟可抽,能抽到这样的烟也就心满意足了。肉类都是游击队员们从叛徒和大牲口贩子那儿没收来的,其中一部分无偿地分配给当地居民。

根据切的建议,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始出版《自由古巴人报》,由切担任编辑。该报最初几期是手抄的,后来改用胶印器印刷。十九世纪末,为独立而战斗的古巴爱国志士所出版的那份报纸使用的也正是这个名字。切在向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报告该报创刊号已经问世时,写道:“现送上报纸和印就的纲领。但愿报纸低劣的技术质量使你为之休克,那你就只好亲自动笔写些文章了。第二期社论将谈甘蔗种植园内的烽火。在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文章有:诺达写的土改资料,基阿拉写的《罪恶累累

的反动派》，军医写的资料性文章《古巴农民生活状况》，拉米罗编的最新消息以及我写的报名解说、社论和《弹无虚发！》一文。”

起义者还弄到了一台小型无线电发射机。广播质量逐步得到改善。到了一九五八年末，把广播装置转交给第一纵队后，这座电台便成了古巴最富声望的电台之一。

到了斗争第一年的年底，起义军便和四围的城乡居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秘密小道进入山区，送来各种消息。

巴蒂斯塔的兵士一出现，当地的农民就会立即向起义军报告，不仅如此，只要有任何一个陌生人踏进山区，农民就会来告诉起义军，因此敌探无法为害。

切在《回忆录》中写道：“至于当时国内的政治情况，则非常复杂而且充满矛盾。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行动，得到卖身投靠的国会的支持。独裁政权掌握着强大的宣传工具，日日夜夜要人民搞民族团结与民族和睦……”

“国内出现了许多派系和集团，暗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其中绝大多数都密谋攫取政权。大批巴蒂斯塔特务打进了这些集团，把它们的一举一动报告给上司。

“虽然这些集团的活动具有乌合之众的性质，但是它们中间也不乏好人，人们至今还怀着敬意常常提起这些人的名字。“革命指导委员会”虽然在三月间采取了起义斗争的方针，但很快就和我们分道扬镳，另外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口号。古巴人民社会党在某些具体措施上是支持我们的，但是相互的不信任妨碍了我们的联合。

“在我们运动内部，对于斗争的方法泾渭分明地存在

着两种观点。其中有一种观点是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游击队所坚决主张的；这种观点总括起来说就是必须进一步开展游击运动并把它推向其他地区，通过顽强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摧毁暴政机器。而国内平原地区的革命者则持另一种观点，主张所有城市的劳动者都有组织地发起行动，并使这些行动逐渐形成总罢工，而一旦全国总罢工，可憎的巴蒂斯塔政权就将垮台。

“这种观点乍一看来甚至比我们的更革命。但事实上这些同志提出的总罢工的主张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坚持这种观点的人的政治水平实在太低……”

“这两种观点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全国领导成员中获得了大致相等的支持，全国领导成员在斗争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更换过……”

写到这里，有必要援引一九六八年四月九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萨瓜拉格兰德发表演说时所讲的下面这个意见：“需要讲一句起码的公道话：由于我们斗争的性质，再加上我们的斗争是由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始的，而决战又毕竟是由游击力量进行的，因此造成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颂扬和赞美几乎统统都集中到山区的游击运动上去了。然而，只有持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才是理智的、有益的，因此，应当指出：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地下工作者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掩盖了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斗争以至牺牲了生命的数以千计的青年的英勇气概和他们所起的作用。还必须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的革命运动史上，我们起初无论对于游击运动的作用还是对于地下斗争的作用，都



知道得不甚透彻，其实历史上，在所有类似的过程中，无不都是如此。尤其是面临历史的新现象时，就更是如此了。的确，当时甚至连许多革命家都认为游击运动是一种象征，并且认为唯有这种象征才能使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使人民的希望不致幻灭，使暴政遭到削弱。然而得以推翻独裁政权的，归根结底，不是游击运动，而是全民起义。不过我想强调一下，革命运动内部存在不同的准则和观点，在我们看来，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都不应当自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了真理。就我们本身而言，我们的目标是确定了的，即通过游击运动来夺取胜利，但是如果在游击运动尚未壮大到足以打败敌军之前，在某个城市内，发生了强大的群众运动和人民起义，并取得了胜利，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是会声援这样的运动并且参加进去的。我是想说，在革命的过程中，可能作出各种不同的选择，因此应当准备好利用其中的任何一种。”

必须指出，同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英勇战斗的普通游击战士，不论是山区的还是平原的，总的说来，对革命的目的和任务都持有正确的观点，他们战斗的革命精神也越来越旺盛。革命胜利后，他们积极地为建立一个在菲德尔直接领导下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奋斗。“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派把自己的力量同许多大学生组织，同古巴人民社会党联合了起来，从而建立了统一战线。

巴蒂斯塔政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主要是靠了美国继续给予财政、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尽管暴君的政权已日陷孤立，可是美国统治集团却仍然把赌注押到它

的这条走狗身上。美国政府虽然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煞有介事地宣布不再向巴蒂斯塔提供武器,可实际上,还是继续武装巴蒂斯塔,供给他凝固汽油弹、火箭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巴蒂斯塔的飞机,前往轰炸起义军时,总是在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加油和补充弹药。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一九五八年底。尽管按照有关协定规定,美国在“古巴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必须召回其派驻古巴的军事顾问,但是美国政府却拒绝从古巴召回其军事代表团,因为这个代表团正在暗地里替代巴蒂斯塔指挥讨伐队的军事行动。华盛顿的间谍机关所扮演的脚色同样是罪大恶极的,因为正是它操纵了独裁者的镇压机器。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们在哈瓦那掌权的“自己人”实在保不牢了,那么接替他的无论如何也得是一个同样唯命是听的傀儡。按照巴蒂斯塔颁布的宪法,应于一九五八年底举行新总统的选举。巴蒂斯塔提名由他的总理里武·阿圭罗为总统候选人。毫无疑问,这个候选人是一定能在“选举”中“获胜”的。

为了不让美国借口防止共产主义取得胜利而直接武装干涉古巴内政,为了不让另一个傀儡代替巴蒂斯塔而把暴政制度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必须有充分的灵活性并注意政治上的分寸。菲德尔·卡斯特罗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正如切所指出的,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谈出自己真正的计划,而在大庭广众则表现得象个温和派,借此来迷惑华盛顿的战略家们。所以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从未有人谈起过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至于

起义军所提出的一些激进的改革，诸如没收大庄园的田产、把交通运输、电力公司以及其他社会性的企业收归国有等，倒并不使美国人特别感到不安。即使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包括巴蒂斯塔在内，也曾不止一次地许下诺言，要进行这类改革，只是从来未曾兑现罢了。

美国的古巴问题专家们确信，如果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菲德尔·卡斯特罗竟获得了胜利，他们也照样可以同他“达成协议”，正如在菲德尔之前，他们曾同许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达成了协议一样。华盛顿的战略家们曾作过统计，仅仅在二十世纪，拉丁美洲就先后发生过八十多次“革命”，但美国资本对于这个地区的影响，非但没有因此而削弱，反而扩大了。在他们看来，谁要是当真想将美国资本逐出拉丁美洲的某一个共和国，无疑等于自杀，何况是想从古巴这样的国家逐出美国资本呢，古巴就位在它的北部“保护人”的身旁，说得确切些，位在它的北部“保护人”的脚底下。如果菲德尔硬要自杀，那就让他自食其果吧。华盛顿所作的判断就是这样或者大致是这样。

\*

\*

\*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由劳尔指挥的游击纵队，按照菲德尔的命令，下了马埃斯特腊山，在山下截获了好几辆载重汽车，神出鬼没地穿过密布巴蒂斯塔军队的地区，到达奥连特省西北部的克里斯塔尔山支脉，开辟了以弗兰克·派斯命名的第二战线。与此同时，在阿尔梅达指挥下的另一个纵队，把基地转移到了奥连特省东部，也同样

顺利地在那里开展了军事行动。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二日，公布了由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告人民书。告人民书号召人民对独裁政权进行总体战，自四月一日起不再向巴蒂斯塔政府纳税；号召敌军反戈一击，归附起义军。告人民书还号召城市居民参加反独裁政权的总罢工。

总罢工定于四月九日举行，结果以失败告终。切在《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一书中曾谈到这次总罢工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

“四月九日到了，可是我们的全部斗争却落得一场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全国领导机构完全忽视了群众运动的原则，事先未经通知，就打起枪来，想以此突然发动总罢工，结果造成不少工人拒绝罢工，好多优秀分子牺牲。四月九日事件是一次大失败。丝毫也没有动摇政权的基础。

“不但如此，政府在把罢工镇压下去以后，便得以抽出部分军队，陆续调往奥连特省来围剿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起义军。我们只得退入深山，进行防御。政府方面把军队源源不绝地开进山区，在我军阵地附近集中。最后，集中到山区来的巴蒂斯塔军队的兵力竟达到一万人之多。五月二十五日，政府军在我前沿阵地所在地拉斯马塞德斯村地区发起进攻。尽管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十比一乃至十五比一，而且敌军还使用了迫击炮、坦克和飞机，我们的一支小小的游击队还是英勇地抗击敌人达两天之久，然后才放弃了那个村子。

“敌人则不断加强其攻势。经过两个半月的激战，敌

人伤亡和开小差的共达一千多人。这已是巴蒂斯塔军队对马埃斯特腊山区所能发起的最后一次进攻了，在这次进攻中，巴蒂斯塔的军队虽然还没有被击溃，但是它的脊梁骨却已经被打断了……

“巴蒂斯塔的军队不但征服不了马埃斯特腊山区，而且对于在平原地区活动的、由劳尔·卡斯特罗指挥的第二战线也同样无可奈何。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第二战线的起义军已经在奥连特省东北部控制了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新的革命秩序，开设了二百所学校、三百所学龄前儿童的幼儿园，征收赋税，设置了自己的电台和电话网，修建了七个简易机场，开设了十二所医院，设立了革命法庭，出版了报纸，实行了土改……”

政府军根本没有力量对付起义军，这就预示了独裁政权的必然垮台。暴君的一些亲信开始筹划，怎样才能丢掉巴蒂斯塔而保住自己的官职和地位。奥连特省政府军司令坎蒂略将军曾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建议：让巴蒂斯塔下野，由另一个独裁者接任总统，而这另一个人，这个将军表示，可由他来充当。菲德尔·卡斯特罗接见了坎蒂略的使者，当时切也在场。菲德尔告诉来使：必须将政权全部移交给起义军，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同意这一建议。菲德尔要求坎蒂略逮捕巴蒂斯塔及其手下那帮为虎作伥的官僚，将他们交付法庭审判。推翻暴君的统治决不能通过上层政变的途径，只有粉碎暴政的军队才行。

到了同年八月，起义军不但在军事态势方面，而且在

政治形势方面也有了显著的改善。人民社会党同起义军司令部建立了联系。有多年的反独裁斗争和反帝斗争经验的人民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和其他共产党人来到了马埃斯特腊山区。菲德尔和切对于同共产党人合作是持欢迎态度的，他们两人认为这种合作将加强反巴蒂斯塔阵线，使其具有更强烈的反帝倾向，不过，在“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拥护者当中还有不少人，对共产党人却仍然抱着不信任的态度。<sup>①</sup>

战胜巴蒂斯塔暴政的时刻已经在望了……

### 3. 经由圣克拉腊到达哈瓦那

摘自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命令：

“责成埃内斯托·格瓦拉少校执行下列任务：率领起义军纵队由马埃斯特腊山区进入拉斯维利亚斯省，并

---

<sup>①</sup> 关于共产党人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关系，特别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军的关系，古巴革命的敌人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谣言和挑拨性的谰言。例如，巴蒂斯塔曾经断言，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另一些人利用游击运动初期共产党人偏重于搞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群众斗争这一情况，造谣说共产党人与起义者之间存在着所谓敌对关系。事实上，即使在那个时期，共产党人与起义者也已经在为同一个理想和同一个政纲而奋斗了，只是采用了互为补充的不同的方式而已。

在反对巴蒂斯塔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力量克服了观点上的分歧，并且在彼此之间进行了密切的合作，结果终于共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原注

按照起义军战略计划在指定地区活动。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一时于马埃斯特腊山区”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起义军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制定了彻底推翻巴蒂斯塔暴政的总攻计划。计划不但勇敢、大胆，而且在战略上是正确的，在政治上也是有根据的。诚然，巴蒂斯塔还掌握有两万名军队，配备有各色武器，包括飞机和坦克，美国一直在向他供应武器，从未停止过。此外这个暴君还拥有半打左右的特务机关与反谍机关，手下有几千名警察和情报人员以及特种讨伐队。而在这些刽子手背后，还有一批“斗篷与匕首式的人物”——即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派出的顾问。除此而外，巴蒂斯塔还拥有好几亿美元。可是起义军方面呢，却总共只有几百名装备很差的战士。而他们却指望获得胜利。这是不是在作非非之想呢？不，这一次的计算没有错，革命的会计学总归是正确无误的。

是的，巴蒂斯塔在力量上无疑占有优势。但是武器再多，没有人愿意去掌握的话，就形同废铁了。巴蒂斯塔的军队非两年之前可比了。现在他们已经明白，同起义军打仗可不是象猎取山鸡那么容易，相反，却有送掉性命的危险。巴蒂斯塔的兵士们越来越不愿为巴蒂斯塔打仗和送死了。即使军官中间，对独裁者的不满情绪也在日益滋长。军官们把他们与起义军作战时连连败北的责任都推诿到巴蒂斯塔一人身上。他们指责他胆小如鼠，因

为他从未到过战区，甚至都不敢到圣地亚哥视察。古巴社会对当局的恐怖镇压、横行不法、盗窃公款和倒行逆施早已忍无可忍，再也没有人相信这个暴君能够把政权维持下去了。连神父、种植园主和糖厂厂主也起来反对他了。种植园主和糖厂厂主唯恐起义军把他们的产业付之一炬，因此纷纷向菲德尔·卡斯特罗纳税。巴蒂斯塔旧时的盟友们也无意同他一起沦亡。甚至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发出了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不要再帮这个“在哈瓦那的自己人”的忙了。说真的，既然巴蒂斯塔已经没有办法保证古巴的“和平与安全”，还有谁需要这个过去的中士呢？须知对于美国海盗——垄断资本家来说，古巴历来是他们的宝岛。走狗既然已无法再为主子效劳，就该滚蛋，要是不识相，会挨主子的拳脚的。

而起义军的力量呢，则在不断壮大。这主要的倒不是指人数的增多，而是指各阶层居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越来越同情起义军。现在各地的农民都支援起义军，起义军中的战士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农民都深信不疑，自有古巴历史以来，他们第一次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保护人和真诚的朋友，这就是起义者。支持起义者的还有工人、大学生、知识分子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士。诚然，资产阶级人士所以支持起义者是别有用心的。甚至连神父也急匆匆地赶到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不可攻克的大本营来向菲德尔·卡斯特罗朝拜。国内外记者簇拥在他的周围。其中不乏冒充为记者的中央情报局特务。他们的任务是搞清楚菲德尔的激进程度，摸清他的脾气，探听明白：如果发生了最糟的情况，终于被卡斯特罗掌握



了政权，华盛顿能否与他搞好关系。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混进山区这一事实，也说明这位游击运动的领袖、二十世纪的罗宾汉、争取正义与自由的传奇式的战士，威望已越来越高。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新的战略计划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同当年古巴爱国志士“暴动者”为反对西班牙殖民者而进行的军事行动有类似之处。按照这一计划，菲德尔本人指挥的纵队和劳尔的纵队将包围圣地亚哥并拿下该城。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指挥的第二纵队将把基地转移到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并在该地展开军事行动。至于切的纵队——番号为第八纵队，是以英勇的西罗·雷东多上尉命名的——奉命前出到位于古巴中部的拉斯维利亚斯省，占领全省并攻克省会圣克拉腊，然后由此向哈瓦那进军。同时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则从西部向首都进军。交给切的任务最为复杂。这不仅是因为敌军在拉斯维利亚斯省驻有重兵，而且还因为当时这个省内还有其他反巴蒂斯塔组织的一些武装小组也在活动，这些武装小组互相倾轧，都认为这个地区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切必须把这些互不相容的小组团结起来，务使它们一致行动，除此而外，还要克服它们的反共偏见，保证与人民社会党的合作，因为人民社会党在这个地区也有一支武装部队。

菲德尔任命切为“拉斯维利亚斯省城乡一切起义部队司令”。切的职责是：征收由起义军当局规定的捐税，用之于军事需要；在其部队活动地区，根据刑法典行使司法职能，实行起义军的土地法；协调在本省活动的各革命

力量之间的军事行动、作战计划及行政军事措施，并逐步将其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军队，以团结和巩固革命的军事力量；在各地组建武装部队并委任起义军军官担任各级领导直至纵队司令。

切接到命令后，便将设在米纳弗里奥山村的游击学校毕业生调来充实他的纵队。这所学校是由他创建和领导的。他警告他的战士们说：“凡是害怕飞机的绵羊，我一概不要！”

战士们都配备了当时游击队所拥有的最精良的武器。

八月二十七日，切在埃尔希巴罗村召集了纵队各级指挥员会议，通知他们，纵队即将下山，前出至平原地区战斗。但是他没有透露纵队所领受的任务的详细情况。切对指挥员们说：“我们在今后的战斗中可能有一半人要牺牲。但是，我们中间即使只有一个人活下来，这个人也要保证完成菲德尔·卡斯特罗总司令交予我们的任务。谁不愿意冒险，谁就可以离开纵队。不算他是懦夫。”有几个人希望留在山区。但是绝大多数人表示甘愿跟随切走。

切的部队本来打算照以前劳尔的战士们的办法，乘坐载重汽车，沿乡村土道，以四天的时间，插入拉斯维利亚斯省。可是切不走运。

第八纵队于八月三十日从马埃斯特腊山下来，进入了曼萨尼略地区。载重汽车在这儿等待着他们，此外，一架运载武器和弹药的飞机也应从国外飞来，在一个临时筑成的简易机场着陆。飞机来了，但是敌人却发现了起义军，立即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机场及其周围地区发动进

攻。大炮犹如狂风暴雨一般猛轰了一整夜。拂晓时分，敌人逼近了机场。切下令烧毁了飞机，因为它有落到敌人手中的危险，而且还不得不把载重汽车全部烧掉，因为油槽车被巴蒂斯塔军队劫走，汽车没有燃料了。尽管受到了这样的挫折，切仍然率领纵队西进，指望在曼萨尼略与巴亚莫之间的中央公路上截获到汽车。

游击队员们果然在那个地段截获了好几辆汽车，但是却无法用它们来代步：突然刮起了强烈的飓风，暴雨冲毁了所有的乡村土道，而在中央公路上行车又太冒险，因为敌人派有重兵守卫着这条公路。

切回忆道：“我们只得放弃载重汽车。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只好骑马或者步行。日子一天天过去，处境越来越困难，虽然我们还未走出居民对我们非常友好的奥连特省。一路上，河水都泛滥了，漫出了河岸，变成了一道道浊浪汹涌的巨流，我们在强渡这些巨流时，竭力不让弹药和武器浸湿，我们到处找寻新的马匹替换那些疲乏了的马匹。我们离开奥连特省以后，就竭力避开有居民的地区。”

九月九日，切的前卫部队在一个叫做拉费德腊耳的地方中了埋伏。虽然起义者顺利地歼灭了伏兵，打死两人，俘虏五人，但自己也遭到了损失——两名战士阵亡，五名受伤。现在敌人发现了游击队，开始跟踪追击。

不久，正在向同一个方向进军的西恩富戈斯的纵队与切会合了。有一个时期，这两个纵队在一起行军，共同击退不时攻打他们的巴蒂斯塔军队和飞机。

游击队员们在穿越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带时，遭到了

无数吸血蚊的追逐，要打退它们比打退巴蒂斯塔的兵士困难得多。

有一天黄昏，起义军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敌军总参谋长塔维尼利亚将军的讲话，说是政府军已经消灭了“切·格瓦拉匪帮”。战士们听见这个官僚如此信口胡吹，都不由得哑然失笑，但他们的情绪却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

切写道：“战士们渐渐悲观起来：又饥又渴，疲惫不堪；敌军包围日紧，而我们却无力对付他们；尤其可怕的是农民们叫做‘马萨莫拉’的足疾，患有这种足疾的战士每走一步都感到痛彻心肺，——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变成了一群飘浮不定的幽灵。当时，行军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十分困难的事。战士们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食物又少得根本无法增强他们的体力。

“当我们在巴腊瓜糖厂附近陷入包围的时候，是我们最艰苦的日子。我们被赶到了一片臭气冲天的沼地中，没有一滴水可供饮用。敌机不断地空袭我们。我们连一匹马也没有，因此不能用马来驮载最孱弱的同志翻过艰险难行的山岭。我们的鞋子被肮脏的海水腐蚀坏了。荆棘戳伤了我们的光脚板，痛彻心肺。我们的处境的确险恶已极。后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突破重围，登上了那条由胡卡罗通向莫隆的著名的道路，这时，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这个地方的历史。在上一世纪独立战争时期，古巴的爱国志士正是在这里与西班牙人进行了浴血的战斗。待到倾盆大雨浇到我们身上时我们才从沉思中猛省过来。敌人仍然在追击我们，我们不得不继续赶路。战

战士们已精疲力竭，他们的情绪越来越恶劣了。但是正当情势看来已经毫无出路的时候，正当只有用侮辱、怒骂或者哀求才能迫使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继续前进的时候，我们远远地望见了一样东西，这使游击队员们振奋了起来，给他们增添了新的力量：西方青山隐隐，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山岭已经在望了。”

这次远征中的一些戏剧性的插曲，同绥拉菲莫维奇《铁流》中所写的十分相似。但是切在描述这次艰苦的远征时，却象往常一样，绝口不谈他本人在那些严酷的日子里的遭遇。有一次纵队行军时，切突然一头栽倒在地。战士们连忙向他跑去。他看来好象已经死去。实际上，他是睡着了，睡得跟死人一般。他是累倒在地上的。

战士们吃多少苦，切也同样吃多少苦，不仅丝毫也不少，而且还要忍受哮喘病发作的痛苦，但他和他的部下不同，他可不能抱怨，不能发牢骚。他作为指挥员，必须鼓励战士，加强他们抗敌的意志，给他们灌输必胜的信念。他甚至不能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体力不支的表现。正因为他严以律己，所以深得战士们的敬重，把他们都团结在他的周围。

巴蒂斯塔下令，无论如何必须在卡马圭地区截住和歼灭第八纵队。于是他派驻该省的司令官，便在十月六日的一道密令中写道：为了截断切及其“匪帮”的去路，他准备“每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不进餐，也不睡觉”，他号召他的部下务必以他的“英勇气概”为榜样。这个武夫不知天高地厚地夸口道：“他们决不可能通过！造反者只不过是些愚昧无知的乡巴佬，而且枪枝陈旧，解决他们

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同时却又抱怨道：“我们仿佛遭到了原子弹的放射性沾染一般，都害怕起这批无知无识的匪徒来了。”这位巴蒂斯塔的战略家企图制止他的部下的这种恐惧心理，促使他们去建立战功，这是白日做梦。

到了十月十六日，第八纵队已经离开马埃斯特腊山六百多公里，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埃斯坎布拉伊山区。这是起义者的巨大胜利，是对巴蒂斯塔及其军队的威信的一次沉重打击。尽管政府军拥有成千上万的士兵，拥有飞机及其他技术兵器，结果还是阻挡不了切的战士们向前挺进。美国军事顾问也信誉扫地，因为古巴的讨伐队，实际上就是由他们指挥的。

切后来说，他的纵队和西恩富戈斯的纵队，总共只有两百多一点人，而且衣着褴褛、饥肠辘辘、一个个都累得筋疲力尽，却能突破巴蒂斯塔武装到牙齿的军队的层层阻拦，这个事实，可能在人们看来是奇怪的或者不可思议的。切把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归因于：起义者认为艰苦的游击生活是胜利的前提，对他们来说，冒生命危险是很寻常、很自然的事情，而巴蒂斯塔的士兵们却珍爱自己的生命，胜过珍爱他们的“教父”——从前的中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因此，他们根本不想为他送命。

但是，切强调指出，起义军的这两个纵队所以远征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宣布土改的人，是答应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人，不仅口头上答应，而且的确把大庄园的田产，包括牲畜在内，分配给了农民。切写道：“我们到达拉斯维利亚斯省后，甚至早在开办第一所民众学校之前，就颁布了关于土改的革命法令，这项法令还规定佃农无须

向地主缴租……颁布这项法令是我们进入该省后的第一个行动，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的发明创造，而是农民自己责成我们颁布的。”

切在叙述对拉斯维利亚斯省的那次充满艰难困苦和严重考验的远征时，强调指出：各地的农民们都乐于帮助游击队员，即使只剩下一小块面包也愿与战士们分享，农民还为起义军担任向导。但是在这个省内也曾发生过叛卖的事件，然而按照切的保留说法，这种叛卖行为并不是存心的，那只不过是有些农民害怕惩罚，将游击队到达的消息告诉了地主罢了，但是地主却立即把这些情报转告军事当局。这一类的不自觉的告密者，是一切游击运动都会碰到的，古巴的游击运动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通向埃斯卡布拉伊山的接近路上，有一个村落叫佩德雷罗村，切在这个村子里同年轻的阿莱达·马尔奇相遇了。她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地下工作者，给予了游击队员以忘我的援助。阿莱达要求切允许她参加他的纵队，当一名战士。这位勇敢的爱国姑娘，准备手持武器为自由和正义而战斗。切很喜欢她，便吸收她参加了他的纵队。

切的纵队从佩德雷罗村向埃斯卡布拉伊山进军。上文已经说起过，在这个山区，有好几派游击小组。其中一派大言不惭地自称为“埃斯卡布拉伊山区第二民族战线”，它的首领是古铁雷斯·梅诺约<sup>①</sup>。他早先属于“革命

---

<sup>①</sup> 埃洛伊·古铁雷斯·梅诺约曾是西班牙内战的参加者。他回到古巴后，参加了1957年3月13日攻打总统府的行动。1959年后，他变成了反革命头子和狂热的反共分子。——原注

学生指导委员会”，但后来脱离了该组织，采取了极右的反共立场，此人在山区更多的是打家劫舍，而不是同巴蒂斯塔分子作斗争。“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游击小组也在这个山区活动，由该组织的领导人福雷·乔蒙指挥，他曾参加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攻打总统府的战斗。人民社会党在这个山区也拥有自己的游击队，指挥者是共产党员费利克斯·托雷斯。

托雷斯的游击队是以反对西班牙的解放战争中的英雄马克西莫·戈麦斯命名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曾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过这支部队，他写道：“我们来到了费利克斯·托雷斯先生的营地（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这个营地组织得井井有条。托雷斯就其世界观而言，是个共产党人。他对于同我们合作以及给予我们援助这两件事上，一开始就表现了极大的热忱。我们刚一到达营地，就感觉自己是处在兄弟们中间，仿佛又置身于马埃斯特腊山区了。他们用最好的方式接待了我们。”

福雷·乔蒙和他的战士们以同样的友好态度欢迎“大胡子”切。

“第二战线”的头子古铁雷斯·梅诺约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甚至公然声称山区是“他的领土”，企图阻挡切的战士们进入山区，古铁雷斯·梅诺约对于切为之而斗争的土地改革的思想更是恨之切骨。在起义者所有的主张中，最使反动分子恼火的，是十月二十日菲德尔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所宣布的土地改革（起义军指挥部第三号法令）。甚至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领导人中间，也不是个个都赞成切所坚决主张的



在农民中间分配地主土地的这种彻底的土地改革的。有些人反对这一点，借口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们说土地改革会使那些殷实富户对起义军持敌对的态度。而另一些人所以跳出来反对土地改革，因为他们本人就是土地所有者或是资本家，唯恐土地改革会替其他更其激烈的社会改革打开道路。

这些假革命口是心非地说，我们同意土地改革，但是又声称土地改革必须是合理的，经济上有利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说必须是渐进的。他们硬说，激进的改革只会引起经济的混乱，激怒所有的人，从而使革命遭到威胁。

连拉斯维利亚斯省“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领导人谢拉<sup>①</sup>也持这种看法。谢拉在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第一次和切会面时，就对切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为此而受到了切严厉的申斥。

谢拉与当地的一些富人关系颇深，他甚至对反巴蒂斯塔的武装斗争也采取否定态度。总之，在切的纵队到达之前，埃斯坎布拉伊山区已经没有“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任何武装小组了。

在一九五八年时，与谢拉持同样观点的人，都把切视为“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内的异端，对他又恨又怕。

下面是谢拉在其回忆录中所描述的他与切初次见面和谈话时的情形：

“我们相遇了。我想象中的切的模样都是根据报

---

<sup>①</sup> 谢拉是作家兼政治家恩里克·奥尔图斯基的党内化名，曾在米罗·卡多纳的政府内任运输部长，后来在工业部工作。——原注

上的那些照片得来的。可是其中没有一张与他本人相似。这是一个矮壮的人，戴着圆形软帽，长发从帽子中披垂下来。络腮胡子并不浓密。肩披黑色的雨衣，衬衫敞开着领子。胡髭和营火的光芒使切变得象个中国人。我想到了成吉思汗。营火在他的脸上投下了一个个光斑，不停地跳动着，使他的脸显出一种极其出人意料 of 古怪的表情。”

这个“凶恶”的人物一到，人未坐定，就对谢拉谈实行土改的必要性。

据谢拉回忆，他们作了如下的对话：

“切讲：‘当我们扩大并巩固了我们的地区之后，我们就实行土改，把土地分给耕地的人。你对土改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说：‘土改是必要的，’这时切的眼睛亮起来了。我又说：‘没有土改，就不可能取得经济进步。’

“切打断我的话，说：‘也不可能取得社会的进步。’

“‘那是不消说的，我就曾经为我们运动的政纲起草过有关土改的条文。’

“‘真的？是什么内容？’

“‘所有未开垦的土地都应交给农民。必须向大庄园主征收重税，以使用他们的钱来赎买他们的土地。然后按实价卖给农民，如果有必要，可以分期付款并发放贷款，供他们搞好农业生产之用。’

“切怒不可遏地说：‘你这个纲领是反动的。卖，这怎么行？我们怎能 把土地卖给耕地的人？你跟所有平原地带的人是一丘之貉。’

“我发火了。

“‘见鬼！你要怎么样？把土地白白送给他们？好让他们把土地荒掉，就象在墨西哥<sup>①</sup>那样吗？每个人都应当懂得，他要获得一样东西就必须花一番力气。’

“‘你原来是这么一个狗杂种！’切喊道。他脖子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

“我们唠唠不休地争论起来……

“我争辩说：‘除此之外，不应当把我们行动的真实意图暴露出来，必须加以掩饰。不要以为美国人会袖手旁观，听任我们去实现我们的意图。必须把他们蒙在鼓里。’

“‘原来你也是这么一流货色，竟认为我们必须瞒过美国人才能干革命？你可真是个混蛋！我们干革命应当从头一天起就同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真正的革命无须掩饰。’”

为了补充起义者极其匮乏的财库，切命令谢拉没收桑克蒂斯皮里图斯城的银行的财产。不消说，切是读过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的，因此记得马克思曾批评公社社员们没有去触动法兰西银行藏在地下室里的黄金。切不想重犯巴黎公社社员们的错误。但是谢拉借口没收银行财产会使殷实富户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疏远，拒不执行切的命令。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切给了他一封措词严厉的

---

① 指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1934—1940)实行的土地改革。谢拉是在重弹墨西哥反动分子的老调，这伙人硬说什么分地给农民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原注

复信：“我可以向你提出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农民都拥护我们耕者有其田的主张？难道这和没有分文存款的起义群众赞成没收银行的财产毫无关系吗？你对财政机构中最具掠夺性的机构如此敬若神明是有其经济原因的，你大概从来也没有好好地去思考过这一点吧？对于那些靠高利贷和投机倒把发财致富的家伙是不配对他们讲客气的。他们给我们的那点小恩小惠，充其量相当于他们一天的剥削所得，可是灾难深重的人民却在山区和平原地区流着鲜血，成为他们以扯谎为能事的领导者的叛卖行径的牺牲品。没有一天不是如此。”

切克服了重重阻难，才取得了谢拉及其同道者的合作，才得以把活动于埃斯坎布拉伊山区的各股革命力量团结在一起。他不得不把古铁雷斯·梅诺约匪帮从共同阵线中清除了出去。切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致“革命指导委员会”领导人福雷·乔蒙的信中解释了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

“自我们的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的号召书（指抵制巴蒂斯塔所宣布的大选的那份号召书——作者）发表以来，所谓‘埃斯坎布拉伊第二战线’的组织与我们之间的磨擦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他们悍然对我军驻扎在圣布拉斯地区的那支部队的指挥员直接发动进攻。这种行径使我们根本无法同该组织达成协议。”

也就在这封信中，切指出：“在与人民社会党人正式谈判时，他们表示赞同统一行动的政策，并且为了证明确有诚意起见，他们愿意将该党在平原地带的组织和在亚瓜哈伊活动的游击队划归我们指挥。”

几天后，“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革命指导委员会”签署了一项统一行动的协议，并号召其他一切反巴蒂斯塔的组织都来缔结这样的协议。

响应这一号召的只有人民社会党。该党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的公开信中讲道：

“人民社会党已对该文件作了必要研究，兹答复如下：

“一、我党响应号召书之呼吁，并公开遵守之，因为我党认为协调一致乃是古巴革命民主运动的当务之急。六年多来我党一贯认为：我国各反对派力量的分裂、革命民主力量的涣散及其行动的缺乏一致，乃是暴政得以苟延残喘以迄今日的首要因素之一。

“二、我党接受你们所提出的一致行动的各项原则。

“三、但我党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声明：

“号召书中所阐明之各项原则应当认为仅系初步原则，既然如此，便需要以一系列符合我国人民愿望及其合法要求之思想与一定的纲领性原则从本质上加以充实。

“团结越紧，成就越大，在武装斗争中尤属如此。因此，我党坚信，当前进行反暴政斗争的一切武装部队，应联合为统一的军队，属统一的司令部指挥，不仅拉斯维利亚斯省一省如此，全国各地也应如此。

“四、为遵守埃斯坎布拉伊公约计，我党已采取必要措施，使公约中与我党有关之部分生效。”

各主要的革命派别之间既已取得统一，就可以用联合起来的力量发动进攻了。首先，必须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粉碎独裁者巴蒂斯塔所炮制的总统、议会以及市政府的选举。菲德尔·卡斯特罗号召抵制这一选举丑剧。革

命指挥部颁布了法令：凡提出候选人名单者，均按叛国罪论处。凡参加投票者，褫夺其公民权。但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区颁布的这条严厉的法令，必须由反对独裁政权的积极的军事行动来加以配合，方能切实地加强其威力。

切写道：“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卡米洛已经在北方开始执行其任务，打得独裁者的鹰犬们闻风丧胆。我们必须袭击毗邻的各个村子，使选举无法进行。我们还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准备同时对位于古巴岛中部肥沃的平原地区的卡瓦伊古安、福门托和桑克蒂斯皮里图斯等城市发动进攻。我们一举歼灭了古依尼阿梅朗达地方的一小股驻军，接着又攻克了巴瑙地方的兵营。在十一月三日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频频出击，军事行动十分活跃。我军各纵队都动员起来了。它们几乎使各处的选民都没有投票的可能。”

如今巴蒂斯塔军队不得不在四条战线上作战，不得不同时对付切、西恩富戈斯、劳尔和菲德尔的纵队，已无力再向起义军发动任何攻势了。巴蒂斯塔的兵士们都成了惊弓之鸟，士气十分低落，至于军官，有许多人已经对战胜起义军失却了信心。而起义军的威望，则在人民中间一天高似一天。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巴蒂斯塔的军队在十一月份还仍然是一支威慑力量：它还拥有几千名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兵士，而起义军总共不过几百人。残酷的血战还在前头。

十二月下半月，以切为首的起义军纵队下了埃斯坎布拉伊山，开始攻打敌人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各个据点。攻克了这些据点就便于解放省会圣克拉腊了。

十二月十六日，起义军包围了拥有一万人口的福门托城。经过两天血战，政府的卫戍部队投降，该城宣告解放。起义军俘获了敌军一百四十一名，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运输工具。

此后，到了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义军开始攻打拥有一万八千名居民的卡瓦伊古安城。在这座城内，进行了逐屋的争夺战。切在战斗中，从一座房子的屋顶上跳下来时不慎跌折了左臂，摔伤了前额。当地的诊疗所给他摔断的左臂上好石膏绷带之后，他又投入了战斗。最后，敌人的守军终于投降就俘，战斗宣告结束。起义军一如既往，在解除了敌军官兵的武装之后，就把他们释放了。巴蒂斯塔的官兵被解除武装，成为俘虏之后，倒反而感到无生命之虞了。加之，起义军给予战俘的人道主义待遇，就更其促使巴蒂斯塔部队的兵士甘愿投降就俘。由敌人手中缴获来的武器，起义军总是立即将其分发给志愿入伍的人，因为每解放一个居民点，总是有几十个人参加到起义军的队伍中来。

\*

\*

\*

本书作者从一九六〇年起与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结成了朋友。早在大学生时代，努涅斯·希门尼斯就积极参加反帝运动，遭到警察的迫害。他担任拉斯维利亚斯大学的教授后，著成《古巴地理》一书。他在该书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统治对国家带来的恶果。检查官查禁了该书。根据独裁者的命令，此书被悉数烧毁。努涅斯·希门尼斯转入地下，参加了“七月二十六日运

动”，后来又加入了第八纵队，在切的直接领导下，经历了拉斯维利亚斯省的整个战役。他因多次参加战斗而获得起义军上尉的军衔。革命胜利后，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担任过一系列要职：他领导过著名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从一九六二年起任古巴科学院全国委员会主席。此外，自古苏友好协会成立之日起，他一直担任该会主席。一九六〇年，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率领古巴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访问苏联的第一个古巴正式代表团。

作者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〇年访问古巴期间，曾不止一次就拉斯维利亚斯战役同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作过长谈。努涅斯·希门尼斯所谈的情况，有助于我们更确切地了解当时一些事件的意义以及切在那些事件中的领导作用。下文就是按照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的叙述顺序记下来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清晨，攻打普拉塞塔斯城的战斗开始了。该城拥有将近三万居民，离圣克拉腊仅三十五公里。到了黄昏，驻守该城的巴蒂斯塔军队就向起义军投降了。

在普拉塞塔斯城，努涅斯·希门尼斯受切委托草拟了告民众书。切对于努涅斯·希门尼斯所写各点深为赞赏。这份告民众书的内容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切的愿望：加强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实行根本性的社会改革，从而把“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资产阶级盟友置于既成事实之前。现将起义军占领当地电台后所广播的这份告民众书摘引如下：



告古巴人民书。

由“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及“革命指导委员会”战士组成的光荣的革命军，解放了普拉塞塔斯城，在此之前，我们经过激烈的战斗，攻克了福门托、苏卢埃塔、卡瓦伊古安等城市及其他居民点。所有这些地方的居民，长年来饱受以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中士为头目的暴政制度的野蛮压迫。

而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均告解放，人民在反对其压迫者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这一辉煌胜利，必须在全体人民的支持下，靠工人的坚强团结来加以巩固。我们的军队是农民、工人、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军队，其任务，除了领导推翻暴政的战争之外，还必须保证一切人均享有民主，建立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实行土地改革，并立即分地（就象奥连特省山区和拉斯维利亚斯省山区所实行的那样），废除强制缴纳工会会费的制度（是项会费悉为巴蒂斯塔在工会运动中的走卒所侵吞——作者），确立工会民主，保证工人的正当要求均能得到实现，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人民的权利。

同胞们！与革命一起前进！工人们！起来斗争！农民们！组织起来！革命军将继续展开锐不可当、所向披靡的攻势，整个拉斯维利亚斯省宣布为古巴的自由地区已经指日可待了！

告人民书在结尾部分向革命、土地改革、革命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革命指导委员会”、工人的团结以及“自

由古巴”致敬。

工人的团结与土地改革，是菲德尔和切在革命胜利前夕提出来的两个主要口号。这两个口号自然是不合乎那些极端反共的资产阶级政客们的心意的。

普拉塞塔斯城解放后，敌人曾空袭这个城市，炸死了不少平民。

这时，切的纵队包围了桑克蒂斯皮里图斯，这是拉斯维利亚斯省的第二大城市，人口为十一万五千人。攻城战持续了两天，也同样以起义者的胜利告终。

切毫不延误，立即用载重汽车载运着他的战士，向位于通往圣克拉腊途中的雷梅迪奥斯城进军。该城敌军龟缩在殖民时代建造起来的一些牢固的建筑物——市政府、监狱、警察局和兵营之内，进行顽抗。起义战士分别包围了这些建筑物，展开了攻坚战。

市政府成了一片火海，龟缩其间的警察首先投降。接着切率领起义军向兵营发起突击，一举拿下了兵营，俘获了近百名兵士。于是在古巴又有一座城市获得解放。在攻打雷梅迪奥斯城的战斗中，与切并肩作战的有阿莱达·马尔奇和绰号叫做“牧童”的罗伯托·罗德里格斯上尉。罗德里格斯领导一个突击排，因为该排战士都非常勇敢，大家把这个排称为敢死排。

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当天，起义军冲进了距雷梅迪奥斯八公里的凯巴连港。经过短促的战斗，防守该港的巴蒂斯塔陆海军士兵全部投降。他们被解除武装，遣散回家。

下一天，起义军解放了居民点卡马华尼，该地守军未作抵抗就向圣克拉腊方向仓皇逃窜。敌军还放弃了好些

小居民点，把兵力集中在拉斯维利亚斯省会圣克拉腊西面七十公里的圣多明各和圣克拉腊东面十六公里的埃斯佩兰萨，指望能在这两个居民点附近阻止住起义军。切命令他的战士围困住这两个居民点里的守军。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切把部下的指挥员们召集到普拉塞塔斯城“拉斯图利里亚斯”旅馆的一个房间里，通知他们，对圣克拉腊发起决定性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努涅斯·希门尼斯奉命担任向导，带领第八纵队秘密地由乡村土路前往“玛尔塔·阿夫雷乌”大学城地区。该区离圣克拉腊城只有几公里。

深夜二时，一共拥有三百名士兵的第八纵队，在努涅斯·希门尼斯的带领下，乘坐载重汽车出发，于两个小时以后，便到达了大学城。该城的大学生和教职员工都欢欣若狂地迎接起义军。

清晨六时三十分，切抵达大学城。八时，切下令顺中央公路向圣克拉腊市发起总攻。起义军分成两路纵队，沿公路两侧前进；切乘一辆吉普车，在公路中央缓缓地向前驶去。和切同车的有阿莱达、努涅斯·希门尼斯及其妻子鲁佩·韦利斯。路上，先有一辆敌军轻型坦克，后来又有一架敌机曾向他们开枪骚扰。

努涅斯·希门尼斯告诉切：他有个两岁的女儿，叫马利特腊，寄养在朋友们家里，而这几个朋友就住在纵队将要攻打的圣克拉腊郊区。切陪同努涅斯·希门尼斯和他的妻子鲁佩去寻找他们的女儿，这两个做父母的深信孩子一定安然无恙。

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时，纵队已挺进到俯瞰圣克拉

腊的卡皮罗山的山麓。巴蒂斯塔军队在山顶构筑了防御工事，山脚下则有两辆坦克摆开了阵势。附近还停着一列铁甲列车，配备有火箭装置、臼炮、高射炮以及机枪。车上有四百多名兵士，由工兵部队司令罗塞尔·莱瓦上校统率。

从表面上看来，起义者是无法攻克这一固若金汤的阵地的。但是，巴蒂斯塔分子尽管拥有优势兵力，却早已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单是切的名字就把他们吓得丧魂落魄了。

早在铁甲列车从哈瓦那驶往圣克拉腊的途中，就有好几十名兵士开了小差。一九六〇年，布拉斯·罗加在人民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至今还记得，当他们把铁甲列车派往圣克拉腊去时，我们组织士兵集体逃跑。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能弄到多少套便服供士兵逃离列车时化装，我们就能组织多少名士兵逃跑。如果说没有能再多逃走一些，那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可以用来化装的衣服。沿途各站，凡是建立有我们组织的地方，都有士兵逃跑。”

巴蒂斯塔分子感觉到他们已处于穷途末路了。他们的坦克开了几炮装装样子，就慌忙向城里退却，卡皮罗山顶的兵士，抵挡不住起义军的攻击，也一窝蜂地向城里逃去。罗塞尔·莱瓦上校也无意同切的战士交锋，决计逃离战场。他命令铁甲列车开足马力返回圣克拉腊车站。但是这位上校不知道，切在几小时以前就搞到了两部铲路机，已经把卡皮罗与圣克拉腊之间的一段铁轨破坏了，正在等他前去送死。

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五点，全速行驶的铁甲列车在铁路被破坏的地段出了轨。机车和好几节车厢翻了身，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巨响，好象到了世界的末日。切回忆道：“饶有兴味的战斗开始了。我们把盛有混合燃液的燃烧瓶纷纷扔到铁甲列车上，终于把兵士们熏了出来。铁甲列车上的全部敌军都有非常之好的防御装备。但是这帮家伙就象在美国西部消灭印第安人的殖民主义者一样，只有在保持相当距离、占据了有利的阵地而且对方实际上又都是手无寸铁的人时，才能作战。铁甲列车陷入了近距离的包围圈中，盛满汽油的燃烧瓶接二连三落到它身上，熊熊燃烧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铁甲列车由于其四壁都是铁甲，因此对兵士们来说，就变成了真正的炼狱。几小时后，敌军全部缴械投降。二十二节车厢、一门门高射炮、一挺挺机枪以及多得难以置信的弹药，统统落到了我们手中。”

而参加这次伏击战的起义军，总共只有一个排，计十八名战士。他们不但使铁甲列车——顺便提一下，那是巴蒂斯塔仅有的一列铁甲列车——无法再为非作歹，还俘获了四百多名敌军官兵。切准许军官们保留他们的防身武器，命令努涅斯·希门尼斯押送全部战俘到凯巴连港，交回给巴蒂斯塔的军队自行处置。

努涅斯·希门尼斯叙述道：“我们把俘虏装上了载重汽车，向凯巴连港疾驶而去，该港离圣克拉腊六十公里。虽然押送的人只有三个——我和另外两位起义者，可是俘虏们被刚才发生的事吓破了胆，竟没有一个人想逃走。再说处在他们的境地，逃走无异于自杀。沿途，居民们一

面兴高采烈地欢迎我们，一面痛骂那些俘虏，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使他们没有被愤怒的人民打死。在凯巴连港，我用无线电与一艘在岸边游弋的巴蒂斯塔的武装护航舰取得了联系，请它驶入港内把战俘接走。舰长向哈瓦那巴蒂斯塔的总参谋部请示，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认为那批战俘是可耻的懦夫，起义军可以任意处置他们。于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把战俘安置到当地的海员俱乐部里，委托当地的民警照管他们。接着我们就立即赶回血战方酣的圣克拉腊市。”

敌军盘踞在市区内的一些大建筑物内，诸如“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警察局、“格兰德”旅馆、司法厅大厦和教堂等地，筑垒固守，而在这些建筑物四围又都有坦克保护。攻下这些筑垒据点并非易事，更何况在市区进行战斗威胁着居民的生命，而这自然是起义军竭力想避免的。巴蒂斯塔分子指望他们能在市区一直支撑到巴蒂斯塔所许诺的援军开到。但是切早已料到特里尼达与西恩富科斯两地可能派来援军，因此派出了几支部队包围了这两个居民点，切断了它们和圣克拉腊的联系。结果，被围困在圣克拉腊的巴蒂斯塔军队，始终未能得到增援。

原来的圣克拉腊城防司令查维亚诺少将因怯阵而被巴蒂斯塔撤职，独裁者另任卡西利亚斯·伦普伊上校主持防务。此人同他的前任是一丘之貉，犯有镇压爱国志士的累累罪行。尤为严重的是他曾亲手枪杀甘蔗种植园工人的著名领袖赫苏斯·梅嫩德斯。卡西利亚斯·伦普伊将其司令部设在“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但是，市区的战斗刚一打响，卡西利亚斯·伦普伊就逃出了兵营，

结果，仍被起义军抓住枪决了。他的职位由埃尔南德斯上校继任。

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司法厅大厦、旅馆、监狱、警察局和“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等处，都发生了激战。大火的浓烟笼罩了全市，到处枪声不绝。居民们热情奋发地支援起义军，欢欢喜喜地请他们进屋，请他们吃饭喝水，领他们到屋顶上去占领更有利的阵地，揭发那些为虎作伥的鹰犬藏匿的地点，报告敌军调动的情况。几十个人围住了切，纷纷表示愿意效劳。切左臂缠着石膏绷带，右手提着冲锋枪，嘴巴里一刻不离地叼着根雪茄，身上穿着一件皮革的短上衣，脚上套着一双破皮靴，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圆形软帽，听取联络员的报告，发出种种命令，有时还亲自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给战士们鼓气。

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这两天内，起义者先后攻占了法院大厦、“格兰德”旅馆和两座设有防御工事的教堂——“一路福星”教堂和“卡尔门”教堂，俘获了上述四处的兵士和警察。

努涅斯·希门尼斯叙述说，司法厅大厦由两辆坦克守卫着，几名敌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攻打大厦的人猛烈开火。当年仅十八岁的起义军上尉阿塞维多向坦克扫射时，躲在坦克后面的三名敌军兵士中弹负伤。可是坦克手们非但不抢救其负伤的同伙，反而开倒车逃跑，将伤兵们活活辗死。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径同起义军的行为适成鲜明的对照：起义军对待伤员，自己的当然不用说了，即使是敌人的，也从不将他们弃于战场而不顾，总是将他们抢救出来，给予治疗，而且一有适当机会就尽先把他们送

往红十字会的野战医院去作进一步治疗。

巴蒂斯塔分子把坦克视为靠山，结果坦克并没有能够挽回败局。在起义席卷全城的情况下，到处都是街垒、翻倒的载重汽车以及小轿车，弄得坦克寸步难行。起义军纷纷把盛有混合燃液的燃烧瓶投向坦克，坦克手们都只好投降了事。巴蒂斯塔的飞机曾扫射和轰炸圣克拉腊地区以及起义军所控制的其他城镇和乡村，然而敌机的行动杂乱无章、漫无目的。

攻打警察局的战斗十分激烈，可以称作是一场血战。在这场血战中，“牧童”——敢死排的排长——牺牲了。直到起义军火烧这所警察的老巢时，被围的警察才同意投降，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起义军准许他们在解除武装后去“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藏身。切同意了。从警察局里出来的巴蒂斯塔分子有三百名左右。但是，只有十来个人去了兵营，其余的人都四散回家或者赶急另觅藏身之所了。

到一九五九年元旦，只有监狱、几座兵营和城郊的机场仍在敌人手中。巴蒂斯塔分子曾几次想从哈瓦那派遣援兵去营救他们在圣克拉腊的走卒，但是这一切企图都未能得逞。纵然如此，圣克拉腊的那些兵营仍然是颇难对付的。它们同古巴所有同类工事一样，筑有坚固的堡垒，所有的接近路悉被火力网所封锁。在这些兵营中还有近千名武装到牙齿的兵士和警察。只要他们愿意，是有能力进行顽抗的，在这种情况下，起义者若要占领这些兵营，取得胜利，就不得不付出大量鲜血。然而这对起义者来说是下策，上策是付出极少的鲜血而尽速取得胜利，



因为拿下圣克拉腊也就决定了夺取卡马圭和圣地亚哥的战斗的结局，使古巴的整个东半部获得解放，进而导致巴蒂斯塔的垮台。除此而外，所以要尽速取胜，还有一个原因：为争夺圣克拉腊的血战，很可能招致美国借口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而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这是美国所惯用的伎俩。美国干涉的危险不但的确存在，而且非常之大。为了证明干涉有理，美国反动报刊散布种种谣言，说什么苏联潜水艇正在向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军提供武器。

切考虑到了这种情况，便在元旦早晨委派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和罗德里格斯·德·拉·维加上尉到“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去劝说守军放下武器，同时允诺守军，无论是军官和士兵，都可解散回家或去他们所选中的古巴的任何一个地方。

军使们坐上插着白旗的小汽车，携带着会谈时可以呼吁对方停火的扬声筒，向敌人的防地驶去。

巴蒂斯塔的兵士们，毫不掩饰他们如释重负的轻松心情，满怀希望地迎接了军使们。

“弟兄们！”巴蒂斯塔的兵士们叫道。“结束战争的时候到了！和平！和平！”

埃尔南德斯上校和敌军全体指挥人员——九名少校、八名上尉以及警察局长科尔奈里奥·罗哈斯上校，都在兵营里接待起义军的两位上尉。埃尔南德斯本人根本无意再继续作战。十月五日，他在镇压西恩富科斯城的起义时，他的儿子丧了命，他本人的一条腿也受了伤，到会谈时为止，还上着石膏绷带。

埃尔南德斯建议订立无限期的停战协定。

两位军使则以切的名义，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

努涅斯·希门尼斯对军官们说：“你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我军已控制了市内局势，居民都支持我军。在奥连特省，你们的军队已被击溃。起义已遍及全岛。在这种情势下，继续顽抗就是犯罪。”

埃尔南德斯频频点头，表示同意。但罗哈斯与另外几名军官却只肯停战，他们的借口是只有先行停战才便于同他们的部下商量。

努涅斯·希门尼斯对他们说：

“诸位先生！现在是十一点半。如果到十二点一刻你们还不投降，我们将不予警告，立即开火。这就是我们接到的命令。”

就在这时候，电台广播了哈瓦那总参谋部的消息：巴蒂斯塔已经逃亡到多米尼加共和国，投奔独裁者特鲁希略去了；在首都的“哥伦比亚”兵营，成立了以最高法院法官佩德拉以及总参谋长欧洛希奥·坎蒂略将军为首的军政府。

接着，埃尔南德斯走近了无线电通话机，向坎蒂略报告了圣克拉腊的形势以及军使来到兵营的情况。

坎蒂略便跟希门尼斯通话，声称他接管政府是征得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意的，现在，圣克拉腊的警备部队既然已归他统辖，起义军似乎就无权要求他们投降了。但是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坎蒂略在离圣地亚哥不远的地方秘密会晤了菲德尔，答应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逮捕巴蒂斯塔及其同伙。同时坎蒂略还答应

制止圣地亚哥及其他城市的军队对起义军的抵抗，并将全国各地的政权统统移交给起义军。哈瓦那的政权，则应由军队和革命者的地下支队共同夺取。

坎蒂略背信弃义地破坏了这一协议。他根本不想逮捕巴蒂斯塔，他与菲德尔的会晤事先是征得了巴蒂斯塔同意的。巴蒂斯塔竭力想赢得时间，以便促使美国武装干涉，从而防止起义军获胜。本着这个目的，巴蒂斯塔指望能说服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特鲁希略派空军轰炸古巴的城市，并把部队空降到古巴，以便使华盛顿得有借口干涉古巴事务。但是这些阴谋计划，被起义军的胜利，特别是切的第八纵队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胜利打乱了，全部成了泡影。

十二月三十一日，总参谋长塔维尼利亚将军向巴蒂斯塔报告，军队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已经没有丝毫希望可以阻止起义军向哈瓦那进军了，坎蒂略也对独裁者讲了同样的意见。这时巴蒂斯塔明白：他已经完蛋了，便下令卷铺盖。金钱，他早已寄存在瑞士的几家银行里了。此刻，在他大大小小的行李箱中放着的是各种各样的“细软物件”，其中有独裁者心爱的珍品：一架纯金电话机和一只银尿壶——这都是美国商人馈赠给他的谢礼。随同巴蒂斯塔一起逃亡的还有他手下那些杀害古巴人民的刽子手——将军们、特务机关的头目以及部长们——总计一百二十四人。巴蒂斯塔先任命坎蒂略为总参谋长，然后又指定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坎蒂略把他的恩人一直送到飞机的舷梯旁。巴蒂斯塔在上飞机前同坎蒂略告别时声色俱厉地提醒他说：“不要忘记我的指令！”但是，这个

在逃的暴君力图用欺骗手段战胜起义军的这条指令，就如他以往力图在战场上打垮起义军的那许多指令一样，是根本实现不了的。巴蒂斯塔掌权达七年之久，可是他的后任连二十四小时也掌握不了。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获悉首都的事变后，立即发表声明，谴责坎蒂略的政变，并指出坎蒂略是巴蒂斯塔的帮凶和胁肩谄笑的食客。菲德尔号召劳动人民举行全国总罢工，并且一直坚持到政权完全转入起义军手中的那一天为止。同时，革命领袖号召起义力量坚决而果断地对凡有巴蒂斯塔分子负隅顽抗的地方发起总攻，解放圣地亚哥、卡马圭及其他城市。“要革命！不要军事政变！”菲德尔·卡斯特罗用这样一句口号结束了他的演说，而这次演说标志着游击战时期已告结束。

努涅斯·希门尼斯当场在兵营里答复巴蒂斯塔的傀儡坎蒂略说：

“不投降是不行的。除此而外，你声称你那个与人民毫不相干的军政府得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少校的支持，纯属谎言。菲德尔·卡斯特罗昨天与格瓦拉少校用无线电通话时，坚决地谴责了这次军事政变，这次政变无非是想搭救巴蒂斯塔及其同谋犯罢了。”

坎蒂略竟破口大骂起努涅斯·希门尼斯来。努涅斯·希门尼斯叫对方见他妈的鬼去，就把通话机关掉了。这位军使同刚刚上台的独裁者的这场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谈话时在场的军官们，都被巴蒂斯塔逃跑的消息以及希门尼斯对独裁者手下那个不可一世的官僚说话时的

口气，吓得目瞪口呆。纵然如此，他们唯恐会丢掉脑袋，还是下不了决心放下武器，下不了决心承认自己已经被战败。他们请求让他们的代表费尔南德斯少校和切继续谈判。

军使们带着费尔南德斯回到切所在的指挥所里。费尔南德斯重复了关于停战的要求。切的答复是断然拒绝。

“十二点三十分将恢复军事行动，”切向费尔南德斯声明。“那时我们就会毫不留情地攻打你们。休想把战争拖延下去。如果由于你们的过失而发生了美国干涉的情况，你们这些人就统统犯了叛国罪，就将在绞刑架上结束你们的生命。”

切重申，如果敌军立即投降，那么凡是家居圣克拉腊的军官和士兵都可予以遣散回家。凡是犯有严刑拷打及其他罪行的人，则交付法院审讯。其余的人可根据本人的意愿，经由凯巴连港到他们所选择的地方去。

费尔南德斯在原来的两名军使的陪同下，带着这些条件返回兵营。一路上只见圣克拉腊的居民都兴高采烈地向起义军、菲德尔和切欢呼致敬，并且要求惩办巴蒂斯塔及其帮凶。

在费尔南德斯向埃尔南德斯上校报告了他和切会谈的情况后，埃尔南德斯上校说：“一切都完了！我们投降。”

紧接“莱昂西奥·比达尔”兵营之后，巴蒂斯塔分子所盘踞的其他据点也相继陷落了。至一九五九年元旦午后两点，圣克拉腊全城转入起义军之手。

切用无线电话向正在准备对圣地亚哥发起总攻的菲

德尔报告了已经取得的胜利。菲德尔命令切和西恩富戈斯不失时机地立即以急行军赶至哈瓦那，撤去坎蒂略的职务，占领市区各主要战略据点。

然而这时，被抗议浪潮吓破了胆的坎蒂略已“自动”下台，把政权移交给了曾于一九五六年四月间密谋推翻巴蒂斯塔的为首分子拉蒙·巴尔金上校；在这一天之前，这名上校一直被囚禁在松树岛的牢狱里。巴尔金是应美国大使的请求被释放出狱的。如今这位前古巴驻华盛顿的武官，对美国佬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求之不得的人物了。巴尔金心甘情愿地充任巴蒂斯塔继承人的角色。他打电报给菲德尔·卡斯特罗，提议共同建立政府。可是，再过一昼夜不到，巴尔金就要遭到与坎蒂略同样的命运，就将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圣克拉腊的居民都读到了张贴在家家户户墙壁上的切的《告拉斯维利亚斯省公民书》：

当我接受起义军最高指挥部所交予的新任务，离开本市与本省之际，我要向全市与全省居民表示深切的感谢。你们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反对暴君的许多次极重要的、结局性的战斗正是在你们的土地上进行的。我希望，你们对起义军驻拉斯维利亚斯省的代表卡利斯托·莫拉莱斯上尉同志提供最广泛的支持，俾使他能最迅速地恢复这个苦难深重的省份的正常生活。

应当告知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公民们，我们的这

支起义军纵队，由于本省子弟的入伍而壮大了，我们是怀着对你们深切的爱和感激的心情告别本省的。我号召你们永葆这种革命精神，以便在执行宏伟的复兴任务时，你们，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公民们，仍将是革命的先锋和支柱。

就在当天早晨五点三十分，第八纵队——西罗·雷东多纵队——的战士们，在他们那位传奇式的司令、阿根廷医生、外号叫做切的埃内斯托·格瓦拉·塞尔纳的统率下，分乘载重汽车、越野汽车和其他类型的机动车，向哈瓦那进军。沿途居民用热烈的欢呼迎接起义军战士，向他们投掷一束束的鲜花。第八纵队的战士们于当天中午到达首都，首都的居民以同样的热情欢迎自己的解放者。

当欢迎的人群要求切停下来发表演说时，切摇摇头，谢绝了。他正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办。他迫不及待地要去执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命令，攻占“卡瓦尼亚”要塞。这是一座兼作监狱之用的要塞，位于哈瓦那港的入口处，还是当年西班牙人建造的。要塞中还盘踞有巴蒂斯塔的军队。

这座要塞未发一枪就向切投降了。

也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那天，西恩富戈斯的纵队同样以急行军赶到了哈瓦那，也同样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哥伦比亚”兵营，巴蒂斯塔的精锐部队在这座兵营中向起义军投降了。

大胡子们胜利了。

现在朋友与敌人都给他们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明天又将怎么样呢？



### 三、誓死保卫祖国

#### 1. 在革命的狂飙中

在海洋的岸边，  
你，海上的狱卒，  
紧紧地监视着，但你瞧瞧，  
瞧瞧长矛的尖锋，  
听听浪涛的怒吼，  
听听烈火的呼号，  
瞧瞧觉醒了的蜥蜴；  
把你伸到它地图上的爪子缩回去。

——尼古拉斯·纪廉

在这次革命中，一切都是不平凡的，出乎意外的，跟那些只是偶然使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气氛略略震荡一下的革命是迥然不同的，后一类革命可以用一句法国谚语来形容：“愈革命，愈复旧。”

这些起义者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他们蓄着大胡子，留着松软的长发，佩着武器和护身符，他们的领导人都是一表堂堂的年青人，聪明而又勇敢。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丝毫不象拉丁美洲通常那种“幸运的骑士”，看来，他们

确实想要根除叛卖、贪污和各种腐败的风气，使古巴成为美洲大陆上最先进的国家。

这些计划，在有些冷静的观察家看来，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幻想罢了，因为要使古巴有所改变，必须使它脱离“被监护的”地位，摆脱美国垄断组织经济上的控制。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比推翻巴蒂斯塔困难得多。

切到达哈瓦那的第一天，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是喜气洋溢的一天，尽管也是担惊受怕的一天。首都的居民以笔墨所无法形容的喜悦心情迎接他们的解放者。独裁者和他的亲信都逃之夭夭了。哈瓦那的卫戍部队和警察没有对起义军进行抵抗。但是敌人并未死心，仍然指望保牢政权，即使用武力做不到，至少也得用阴谋诡计来做到这一点。

元旦夜间，首都一片混乱，到处都有人在趁火打劫。巴蒂斯塔分子纷纷在城里藏了起来，坎蒂略将军和巴尔金上校转入了地下，他俩仍然指望靠他们的美国后台来左右局势。

其他党派和集团也急于想夺权。“革命学生指导委员会”的拥护者们占领了总统府和哈瓦那的大学区，企图以此巩固他们的地位。

一天以后，起义者在已经解放的圣地亚哥宣布曼努埃尔·乌鲁蒂亚法官为共和国临时总统。当年曾为审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人组织过一个紧急法庭，乌鲁蒂亚就是那个法庭中的一名法官，他主张释放他们，从此被认为是巴蒂斯塔的反对者。

与此同时，切和卡米洛在哈瓦那力求将一切革命力

量团结起来，解除军队和警察的武装。切在他所作的第一次电视讲话中谈到建立革命的民警以代替暴君的警察的必要性。起义军在居民的协助下，搜捕巴蒂斯塔手下的刽子手们，将他们“乔迁”到“卡瓦尼亚”要塞，由第八纵队的战士看守。

这时，智利社会党领袖，现任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正巧路过哈瓦那。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同他商定与切会晤。一月三日，他在罗德里格斯陪同下，到“卡瓦尼亚”要塞拜访了切。这次会晤，是切在革命胜利之后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著名代表人物的第一次接触。七年前，多亏阿连德出了封介绍信，切才得以离开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现在，切周游拉丁美洲各国的长途旅行已在哈瓦那结束了。在今天之前，他对哈瓦那这座城市一无所知，可是今天却正是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这座城市的命运。

切给了阿连德不可磨灭的印象，尤其使阿连德这个曾经学过医的人惊异的是，这个赫赫有名的起义军指挥员，竟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阿连德在叙述这次会晤时，说：“在一间当作卧室的大房间里，到处都是书籍。一个光着上身的人，只穿着一条草绿色军裤，正躺在行军床上。他目光锐利，手里拿着吸入器。他打手势请我稍待片刻，因为他的哮喘病发作得很厉害，他正在对付它。在这几分钟时间里，我端详着他，看见了他那双狂热地炯炯放光的眼睛。美洲的一位伟大战士，为残酷的痼疾所折磨，正躺在我的面前。后来，我们开始交谈了。他毫不卖弄自己，对我说，在起义

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哮喘病始终不让他安生。我审视着他，倾听着他的话，不由得想到这人正在演一场悲剧：他负有完成伟大事业的使命，却被这样无情的绝症制服了。”

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几天以前，这间屋子还是巴蒂斯塔“卡瓦尼亚”要塞司令的卧室——《真理报》记者瓦西利·契奇科夫访问了正在发病的切。契奇科夫在他所著的《曙光照耀着古巴》一书中这样讲道：

“格瓦拉的卧室很小，也许只有十二平方米。靠墙放着两张铁床，在两张铁床中间有一口五斗柜和一面旧镜子。五斗柜上杂乱地搁着几支又粗又长的雪茄和一叠公文纸……

“格瓦拉穿着白色汗背心和草绿色军裤，光着脚，坐在床上。在一根钉进墙壁的大钉子上，挂着一枝冲锋枪、一枝手枪和指挥员用的其他装具……

“互相寒暄以后，我首先请求格瓦拉准许我给他照一张相。他并不十分起劲地穿上军便服，戴上军帽，相片就照好了。

“‘请您谈谈，参加你们革命的人都是什么样的阶级成份？’我取出笔记簿和钢笔，开始问道。

“‘干革命的主要还是农民，’格瓦拉低声说起来。‘我认为，起义者中间，百分之六十是农民，百分之十是工人，百分之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虽然工人举行的罢工斗争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但是革命的基础毕竟还是农民。’

“格瓦拉有一对乌黑的、忧郁的大眼睛。长及肩膀的

头发使他的脸庞颇象一位诗人。格瓦拉举止沉着，说话慢条斯理，甚至说一句就顿一顿，仿佛在挑选字眼。”

一月五日，临时总统乌鲁蒂亚抵达哈瓦那。他煞费周折，才住进被“革命学生指导委员会”的拥护者们所占领的总统府。接着，乌鲁蒂亚宣布了他所任命的内阁名单。何塞·米罗·卡多纳出任内阁总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占据了政府中绝大多数部长职位，这些人对实现革命的改造根本不感兴趣，不过他们至少不是巴蒂斯塔分子，而且地方上的实权已统统由起义军的活动家掌握了，各省省长也都由参加起义斗争的积极分子担任。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和起义军的另一些领导人没有参加政府。切所得到的任命，乍看起来，是极其微不足道的：担任“卡瓦尼亚”要塞军事长官，或者说得确切点，担任要塞司令；卡米洛则担任起义军陆军司令。

这样一来，国内似乎形成了双重政权：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没有实权；另一方面是起义军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它们将管理国家的各种机构，使其愈来愈严密地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开始麇集到乌鲁蒂亚总统和米罗·卡多纳总理周围，而各种反帝力量则团结到起义军领袖的周围。力量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这两个阵营的冲突，然而这种冲突的结局将会怎样，目前还不清楚。

一月八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抵达哈瓦那。首都万人空巷，欢迎起义军的领袖。就在同一天，菲德尔在“哥伦比亚”要塞内对挤满了要塞的首都居民发表了演说。

菲德尔号召一切革命者团结起来。他在这次演说中还提到了切，称他为反巴蒂斯塔的革命战争的“真正英雄”。

一月九日，切的母亲塞莉亚自布宜诺斯艾利斯飞抵古巴。她的儿子把她从机场接往“卡瓦尼亚”要塞，一路上指点给她看美丽的哈瓦那的市容。塞莉亚发现儿子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具有自信心的男子汉，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士，而这正是她一向对她的长子所期望的。

她问起切哮喘病的情况，切却用笑话搪塞了过去。他告诉她，古巴的气候和雪茄对他的疾病“大大不利”。

切把阿莱达·马尔奇介绍给塞莉亚后，问道：

“你喜欢她吗？”

“非常喜欢。她是那么年轻、漂亮和勇敢！”

“我们快要结婚了。”

“那么伊尔达和小伊尔达怎么办？”

“我通知了伊尔达，她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同意把小伊尔达留给我们。”

革命胜利了，但是为实现革命理想所作的斗争还刚刚开始。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完全理解列宁的一条原理：任何真正进步的革命，其首要的、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必须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古巴，这架机器的核心部分就是御用军队、警察局和多如牛毛的秘密机关。人民对它们早已深恶痛绝，所以由衷地拥护解除它们武装，拥护将它们解散的决定。巴蒂斯塔军队不复存在了，而多年来一直担任这支军队的教师爷的美国军事代表团，菲德尔以他们毫无真才实学为理由，干脆将他们一概辞退。

“请你们卷铺盖回去吧，”菲德尔对代表团成员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效劳，巴蒂斯塔的军队是受你们监护的，却根本经不起起义军打。你们这些军事顾问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现在应该狠狠地惩罚巴蒂斯塔的刽子手了，他们手上沾满了古巴爱国者的鲜血。在巴蒂斯塔执政的七年间，大约有两万古巴人被虐杀和枪杀。刽子手们既然犯下了这样的滔天罪行，理应受到惩罚，人民一再要求严惩他们。起义军不止一次向人民保证，罪犯们是逃脱不了报应的。不久便建立了革命法庭，法庭在审讯这些罪犯时严格地遵循一切司法准则。被告有权聘请优秀律师作为辩护人，有权提请法庭传讯任何证人来为其作证。审讯公开进行，人民群众和新闻记者都可旁听，有时还通过电视播送审讯实况。审讯的一大特点是所有被告无不罪证确凿，以致他们几乎都承认有罪。对于民愤最大的刽子手，革命法庭判以极刑——枪决。

巴蒂斯塔手下的刽子手绝大多数是美国侦缉机关的特务。对他们的惩罚使得某些美国人老羞成怒，猖狂吠起来。美国统治集团授意这个国家的刊物指摘古巴起义者极度残暴，杀人成性和太不人道。

在古巴国内，由于推翻巴蒂斯塔以后实现了出版自由，革命的敌人便趁机利用报刊呼吁说，应当发扬人道主义和基督的慈悲，不要再“使古巴人流更多的血”了，应当宽恕那些曾经拷打、折磨和杀害过爱国者的人，饶他们一命。由于这些罪犯全都囚禁在“卡瓦尼亚”要塞，革命法庭也设在这座要塞内，而这座要塞的司令则是埃内斯

托·切·格瓦拉，因此反动派及其美国主子的火力自然而然就都集中到切的身上。在所有这些黑暗势力看来，切这个阿根廷人，危地马拉革命的辩护者，马埃斯特腊山起义斗争的参加者，圣克拉腊的解放者，一定是“莫斯科的手”，是莫斯科派到古巴来的一名间谍，以便使古巴沦为“赤色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然而反对切的运动并没有使那些反对切的人得到多少好处，相反却使他们更加倒霉。切和其他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与日俱增。劳动人民怀着真诚的热情全力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战友们的行动。革命领袖的演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切也在各种场合下发表演说。一月十六日，切在医师协会的讲话，是他到哈瓦那后所作的第一次公开演说。

医生们一致公认切是他们的同行，就是他本人，在抵达哈瓦那后的最初几个月内，也总是以医师自称的，每当签署什么文件，他总在姓前加上医师这一头衔，而在本名后面签上“切”这个名字，并加上括号。但是不久，他就改变了他的签字，用“少校”替代了“医师”，取消了“切”字的括号。的确，既然他现在从事的只是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怎么还能算作医生呢？至于提到医学，他如今所关心的只是医学的社会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怎样使医学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剥削阶级服务。他向哈瓦那的医生们作演说时，就曾谈到这一点。

切在这次演说中，仿佛是为了回击反动分子的攻讦，特意谈到了他参加起义运动的动机。他解释说，他参加起义运动是出于对古巴独立的传播者何塞·马蒂的理想



的信仰，何塞·马蒂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就曾同拉美各族人民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切在演说中讲道：“不论我侨居在拉丁美洲的哪个国家，我都不认为自己是外国人。当年，我在危地马拉时，我就觉得自己是危地马拉人，在墨西哥时就觉得自己是墨西哥人，在秘鲁时就觉得自己是秘鲁人，就象今天我身在古巴觉得自己是古巴人一样。然而不论我在哪个国家，即使是在古巴也好，我同时又是一个阿根廷人，因为我无法忘记马黛茶和阿萨多烤肉<sup>①</sup>，我的性格特点就是这样。”

这个阿根廷人好象是作为整个拉丁美洲的全权代表来参加古巴革命的。他出现在这个自由之岛上（人们越来越经常地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祖国称之为自由之岛），象征着古巴革命具有拉丁美洲这片大陆的全大陆性的特点。并且突出地表明这次革命不仅是古巴历史上的，也是整个拉丁美洲历史上的转折点。

切是最早指出古巴革命具有全大陆性意义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古巴革命表明，一支由革命的起义者组成的不大的，但是愿意作出任何牺牲的部队，如果得到人民的支持，就能战胜职业的御用军。古巴革命还表明，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中，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工人的支持，还需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所以革命者首要的职责是做农民的工作，使他们成为革命的支柱。

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对于切的历次演说都是十分注意的，他们心还不死，仍然指望通过古巴政府中的妥协分子去开导大胡子们，使他们“通情达理”。但是此后的事态

<sup>①</sup> 阿萨多烤肉是一种用炭火烤的肉，系阿根廷民间菜肴。——原注

表明，他们的这种希望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泡影。

根据起义军领导人的要求，政府于二月九日颁布了这样一条法令：鉴于埃内斯托·格瓦拉为古巴人民所建树的功勋，特授予他古巴国籍，享有与出生古巴的人相同的权利。

二月十二日，切发表电视演说。他讲道，授予他古巴国籍一事，使他深为感动，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获得过这样的荣誉，那人便是在独立战争时期担任民族解放军总司令的多米尼加人马克西莫·戈麦斯将军。切指出：他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为实现土地改革而斗争。在古巴，两千名大庄园主就占据了全国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七，而其余的地主则占去了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三。外国垄断组织霸占了几万公顷的地产。这种情况将彻底改变，农民将得到土地。如果政府不实施土改，那么农民将自己动手把理应属于他们的土地夺取过去。

一天以后，阴谋抵制社会改造的米罗·卡多纳政府宣布辞职。菲德尔·卡斯特罗出任总理。这是要求把革命进行下去的人民力量的一大胜利，是那些提出“一步也不要前进！”这个口号的人的失败。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六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就任总理时宣布：一项彻底的土地改革法即将在最近期间通过。

反动派深信美国统治集团决不会对在他们“鼻子底下”发生的这类“不成体统的事”置若罔闻，就公然越来越激烈地进行顽抗，但是反动派的顽抗阻挡不了革命向前迈进。

二月十一日，“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机关报《革命报》发表了切的《何谓游击队员？》一文。这篇文章还是在山区写成的，目的是为“游击队员”一词恢复名誉。事情是这样的：古巴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不同，当年在独立战争时期，把自愿支持西班牙军去镇压爱国者的人称为游击队员，而把爱国者称为起义者。切写道，现在的游击队员则是为实现人民事业而斗争的战士，就是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战斗的那些人，也就是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游击队员只不过完成了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另一项重要任务——土地改革，还有待于他们去实现。为了完成土改这项任务，他们也必须顽强地、百折不挠地、不惜牺牲地进行战斗，就象当初为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而进行战斗时一样。切强调指出，游击队员的力量，在于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在于取得人民的支持。

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切开始积极地从事政论的写作。此后他在古巴度过的五年中，始终怀着他所特有的革命热情，积极从事写作。

切的遗著是相当多的，具有各种不同的体裁和丰富的内容：其中有论述游击战的理论和战略战术的著作；有继承了拉美文学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有关反巴蒂斯塔游击战的回忆录《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有揭发美帝及其应声虫的政策、署名“自由射手”的许多杂文；有论述古巴历史、对外政策、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问题的报告和演说；有出国旅行的汇报；有在工业部历次全体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有为各种书籍写的序言；还有信筒。此外，应当补充进去的是著名的《在玻利维亚的

日记》。虽然切还有不少著作尚未问世，单是公开发表的，篇幅也已超过一百印张。

切力图在他的著述中总结古巴游击战的经验，用于进一步推动拉丁美洲的革命进程。

切特地为一部苏联著作《古巴。历史和风俗文化概观》（一九六一年在莫斯科出版）写了一篇文章。切在这篇文章中把古巴的经验，扼要地归结如下：

“我们所以能够取得政权，是开展农民斗争的结果，是以土地改革和农民阶级的其他正当要求为口号，武装农民和组织农民的结果。同时，还始终保持了与工人阶级的团结，并且正是在工人阶级的协助下，取得了最后胜利。换言之，在城乡掀起革命，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创立小型的游击队；第二阶段，当这支游击队壮大之后，分出一部分战士到另外一些地区去活动，当然这些地区的幅员还是有限的；第三阶段，所有这些游击支队又联合起来，组成革命军，和反动军队进行一系列野战，将它们击溃，夺取胜利。我们的斗争是在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时开始的，然而却有助于我们分清各派基本政治力量，促使夺取政权的条件日趋成熟。而这一斗争的顶点就是革命在一九五九年元旦所取得的胜利。”

切认为，古巴革命并不是一种“偶然性”，而是在拉丁美洲开辟了人民反帝革命新阶段的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因此古巴革命不但具有局部的而且具有全大陆性的意义，切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切还注意到了必须使农民变成工人阶级积极的革命同盟军，这无疑也是正确的。

然而切认为游击战在古巴开始打响的那个时候，用人民力量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还未成熟，也就是说，游击战从实质上讲开始得过早了，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值得怀疑。

英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要证明布丁，就要吃一吃。如果我们套用这句谚语，岂不是可以说，要证明游击战获胜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就非要使革命力量获胜不可。说实话，在这个问题上，两者之间根本不可能是那么一致的。即使在革命成功的主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革命仍然可能遭到失败。失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者因为战略或战术部署错误（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列宁关于必须在十月二十五日夺取政权，早一天不成，迟一天也不成的那些名言），或者因为外国干涉（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匈牙利苏埃维共和国的命运），或者因为革命力量的分裂，或者因为革命领袖牺牲，等等，等等。

此外，也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一支革命的先锋队采取了一个大胆而果断的行动，使得敌人及其阵营措手不及，惊慌万状，丧失了反抗的意志，而人民群众则因此而积极起来，从而使这支先锋队取得胜利。在拉丁美洲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批人数较少的爱国军人，同广大群众没有任何接触，采用秘密手段夺取了政权，这就是“秘鲁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胜利毕竟是衡量革命力量的活动是否合乎规律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准。常言说，胜者无罪！革命既然已经取得了胜利，还要回过头去指摘革命开始得不是时候，就没有道理了。

至于拉丁美洲革命道路的问题，需要我们去作更深刻的研究。而且还要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许多国家中，暴力夺取政权，与其说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还不如说是一种传统，一种惯例。

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不可能一目了然。要在推翻巴蒂斯塔之后，立即就正确地预见到拉丁美洲革命发展的各种道路，并不那么容易。今天，除古巴以外，又有了智利和秘鲁的经验，两者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却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在革命道路这个问题上，就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了。如果责怪切不能预见到智利或秘鲁的道路，那么这种责怪无疑是可笑的，这就象去责怪那些在一九五六年未能预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会取得胜利的人一样荒唐。革命家，甚至是天才的革命家，也不是未卜先知的。因为生活总是比任何理论，甚至比最正确的理论丰富多彩。

然而，我们还是不要把本书的任务搞得太复杂了，本书不是政治论文，而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生平和传记。应当说，切在主要方面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种看法就是由于古巴起义者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迈进了一步，现在这片大陆已进入了人民反帝革命的时期。

切的遗著不仅表明他具有旺盛的精力，还表明他具有全面的文化修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对于古巴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历史以及国际形势都有丰富的知识。切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不为引文所束缚。他是注意对具体的现实生活进行分析的，力图在现实生活中发现

新事物的幼苗，并将这种幼苗运用到革命事业中去。他是为了革命而生活，而斗争的，他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革命，而且仅仅献给革命。他是一位革命战士，为革命而鞠躬尽瘁，他的脑子里除革命外，没有丝毫私心杂念。他的所作所为和一言一语，无不都是为革命服务的。

象切这样一位政论作家和思想家，在拉丁美洲是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文人性好虚伪的激情、华丽的辞藻，无病呻吟和卖弄方言俚语，而这一切正是他所不屑去做的。他的创作风格极其简洁，他不是靠层出不穷的夸张和比喻来取胜，而是以逻辑性很强的信念的力量来打动读者的。切无疑是一位天才作家，但是，当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的领导人建议他参加这个组织时，他却以自己不是“职业作家”为理由婉言谢绝了。

切认为真正革命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人，应该俭朴、谦虚、廉洁。而且这种俭朴和谦虚不是为了装装门面，而应该是由衷的。在这个问题上，切从来也不肯作丝毫的妥协。他的这种品德处处都表现出来，有时表现的形式是出人意料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初，切的健康状况到了极度恶化的地步。哮喘病不间断的发作，加上又缺乏正常的休息——这一切严重地毁坏了他的健康。战友们担心他有生命危险，几乎用强制的手段迫使他去疗养，为此把哈瓦那郊区的一幢别墅拨归他使用。这幢别墅在革命前是属于巴蒂斯塔的一名省长的，革命后，作为敌产予以没收。于是反动报刊便乘机中伤说：切住进了别墅，如此说来，他

并不反对享用当年巴蒂斯塔的走狗的财产。

切立即对这种卑劣的诽谤予以反击。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革命报》发表了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由于他患了病,这病不是在窑子或是赌场里得的,而是在为革命的利益工作时得的,因此不得不就医,接受一个疗程。政府当局拨给了他一幢别墅,因为他作为一名起义军军官,每月拿一百二十五比索的薪金,无力自费租赁需要的房屋。他写道:“这幢别墅过去属于一名巴蒂斯塔分子,房子很讲究,我拣了其中最朴素的一间住了下来。然而,我住进别墅这件事本身,还是会惹得某些人火冒三丈的。我答应,首先答应古巴人民,待我的健康稍稍恢复,我就搬出这幢别墅。”

切在古巴发表作品,从来不收分文稿酬。至于国外汇来的稿费,他都赠送给古巴的社会团体或者外国的进步组织。例如,意大利出版了他的《游击战》一书,他就把这本书的稿费全部赠给意大利和平拥护者运动。

有一次,哈瓦那大学埃利亚斯·恩特拉尔戈教授邀请切去给大学生做报告。并且通知他说,为此将送给他一定数目的酬金。切写了一封彬彬有礼但是却极其辛辣的回信给这位教授。

切在这封信中说道:“一个革命领导人的行为举止应该是怎样的,我和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大不相同的……我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总要用金钱来酬谢党务活动家或者国务活动家所做的任何工作。至于对我个人来说,在我所获得的一切报酬中,最为珍贵的报酬便是使我有权利成了古巴人民的一分子。而这种权利,我是无



法用比索或者生太伏来计算的。”

在古巴实行粮食配给制以后，有一天，切的部下当着他的面讨论每户人家的定量。有些人埋怨粮食配给证上的定量太少。切就予以反驳，还举出了他家的情况为例，他家就从来没有感到粮食不够。

有人开玩笑说：“你是首长，你家的定量当然比人家高。”

切非常恼火。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却告诉那些同志说：

“我去核对了一下。的确，我家的定量是比人家高。不过这种岂有此理的情况，现在已经结束。”

乍一看来，切这种“平均主义”思想，无非是“左倾”的表现罢了。而且这种思想，不独切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其他战友也都百分之百地赞成的。这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的共同愿望，那就是要向人民表明，他们为人民服务，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是出于革命的责任感。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战胜巴蒂斯塔后所作的一次报告中谈到，历来参加各色各样政变的人都自称是“革命者”。他们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身上还往往佩着大得可观的手枪，逞凶霸道，不可一世。他们川流不息地出入于内阁的接待室，以“劳苦功高”为理由，索取各种优待、特权和报酬。因此，一提起“革命者”，古巴人民就习以为常地联想起这帮人。而这帮人已经成为社会的寄生虫，人民是不相信他们的，鄙视他们的。

自从古巴独立后，一般的所谓“革命者”尚且这样，至于那些执掌国家大权的，例如马查多将军、巴蒂斯塔中士

以及诸如此类的所谓“人民之友”，就更不用提了。对他们来说，执掌政权首先意味着可以生财有道，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可以满足他们各种各样卑鄙的欲望。

而一九五九年的革命者，则同这帮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投机分子截然相反，他们不爱沽名钓誉，不求发财致富，不谋任何私利，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权利。革命的领袖们每往前走一步，朋友、敌人和人民都密切注意，力图根据他们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语来判断：这是一次普通的“革命”呢，还是人们梦寐以求然而迄今为止还未见过的另一种新型的真正的革命。因为对于判断革命的性质来说，革命领袖的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他们所宣布和捍卫的崇高原则。

新的革命领袖是决不能去仿效天主教神父的，这些神父总是规劝他们的绵羊听信他们的美好祝愿，而不要去管他们的实际行动究竟怎样。但是新的革命领袖必须言行一致。他们所以有力正在于他们在道德上比敌人高尚。

对于这一点，切是完全理解的。古巴同志们尚且都廉洁奉公，决不允许自己做出使人家怀疑他们是政治上的伪君子的事情来，那么他这个由总统法令“授予古巴国籍的人”尤其应当这样。

然而，促使切坚持过斯巴达式的生活的，除了上述的一切政治原因外，还有他个人的素质，他爱好节俭朴素的生活，对于挥霍浪费深恶痛绝，即使最起码的舒适生活，也不屑一顾。在物质需要方面，他确实善于克制自

己。粗茶淡饭就心满意足。在他看来，摆阔气、讲排场是最没有意思的事。

但是，这绝不是说，切是个连通常的人生乐趣也一概摒弃的苦行僧。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日，切和年轻的女游击队员阿莱达·马尔奇结婚，他俩是在埃斯坎布拉伊山的一次战斗中邂逅相遇的。这是切第二次结婚，婚礼简朴，废弃了宗教仪式。出席婚礼的仅劳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夫人女游击队员比尔马·埃斯平以及其他几个知交。至于伊尔达，在切乘“格拉玛”号出发远征以后，就回秘鲁去了。她有她的志趣和朋友。再说，马埃斯特腊山区已把切变成了古巴人，他立志要扎根在自由之岛上，而他和阿莱达所缔结的婚姻不但证明了他的这种意愿，而且使其神圣化了。切是个热爱妻子的忠实丈夫和关心孩子的父亲。阿莱达在和切共同生活的五年中，给他生了四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切和前妻所生的小伊尔达，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切难得有业余时间，偶尔有空，总是在家里度过的。

这个钢铁一般的革命家不仅热爱他自己的孩子，而且还热爱他人的孩子，古巴劳动人民的孩子。他曾多次指出，孩子是革命的希望，革命的继承者，正是孩子们将把革命的不朽事业继续下去。

孩子们也都热爱他，古巴各地都有孩子写信给他。切则有信必回，而且回信写得很认真，他总是把孩子们当作同他完全平等的成年人对待的。在古共中央纪念格瓦拉委员会的档案库里保存着几十封古巴小学生写给切的

信和切回信的复制品。我们现在就来援引切的一封回信。这封信是回哈瓦那省阿瓜卡特村一个十岁小学生的。这个小學生写了一封信给切，并在信中附了五十个生太伏，请切代为捐赠给巩固古巴经济基金会。邮局把这封夹有钱币的信退还了那个男孩子。他重又把这封信寄给切，不过把上述的那些钱改用邮汇寄来。这一次这封信终于投到了切的手里。切就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给这个孩子写了复信：

尊敬的朋友：

万分感谢你在三月三十日为纪念学生递信日而写给我的友好的信，感谢你汇来五十生太伏作为巩固我国经济基金之用。现寄上编号 9186 号收据一纸，以证明你的爱国主义行为。

你立志升学，使我非常高兴，我还要劝你立志成为一个对你的祖国和对你自己都有益的人，而且要终生如此。这是孩子们所能给予革命政府的最好的帮助。

我感到遗憾的是，邮局曾经把你附有钱币的信退还给你，以致使你误以为我不想回信给你。请你相信，你的信使我感到非常愉快。此致  
敬礼！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敬复

\*

\*

\*

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切考虑的是什么呢？

切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看法是一致的，两人都认为：首先应当将革命进行下去，用新的、忠于人民的政府机关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机关；用新的、革命的军队，这个军队必须以起义军为骨干，来代替旧军队；实施一系列改革，以摧毁美国资本和本国剥削者的阵地，其中包括实施彻底的土地改革；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

这个纲领是同团结在人民社会党内的共产党人所主张的纲领相符合的。然而当时，古巴相当大一部分人仍然持有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偏见。因此，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包括切在内的起义军和“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领导核心，是在克服这些偏见的同时，实现上述纲领的。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二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的讲话中，谈起了当时笼罩岛国的政治气氛，他讲道：

“在并不很久以前，由于长期进行欺骗性和诬蔑性宣传的结果，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气氛，非常遗憾，曾在我国广为蔓延，并且占据了优势。

“你们要不要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请你们回忆一下革命后最初几年的情况吧。

“有时，由于好奇心的关系，我们曾向各种各样的人，其中也包括工人在内，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问：

“‘你们可同意土地改革法？可同意关于住宅的法令？可同意把银行收归国有？’

“对于其中的每一项法令，我们还提出了一连串的问

题。

“‘你们可同意，人民存钱进去的银行不再属私人所有，而应该掌握在国家手里，银行的存款应当用来发展经济，使它有利于国家，而不应当听任银行主们随心所欲地挥霍掉？’

“大家回答我们：

“‘同意。’

“‘你们可认为，这些矿井应当属于古巴人民，而不应当属于外国公司，不应当属于住在纽约的那些家伙？’

“‘是的。’

“由此可见，条条革命法令都受到拥护。于是我们又提出一个问题：

“‘你们可赞成社会主义？’

“‘啊，不赞成，不赞成，不赞成！绝对不赞成！’

“偏见的力量竟强烈到这样的地步，真叫人难以置信。人们可以赞同这个词汇所包含的一切主要内容，却不愿意赞同这个词汇本身。”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由于进行革命的改造，遭到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古巴的同盟者的猛烈攻击。这些家伙把每一项改革都斥之为共产主义，妄图在反共这面肮脏的旗子下，动员居民反对革命。

然而，反动派的这类手法并未得逞。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实施的各项改革，都是对人民有利的，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劳动人民的意识中，“共产主义”这个词汇，越来越同他们所爱戴的革命领袖结合在一起了，越来越同各项革命改造工作结合在一起了。正是这一系

列的革命改造，为劳动人民开辟了从社会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道路。

为了削弱革命阵营，华盛顿及其代理人千方百计地企图阻挠革命力量之间的团结一致。要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同志们去同冒充革命者的反共产主义的右倾改良主义分子，例如：乌鲁蒂亚总统、米罗·卡多纳总理或者象乌维尔托·马托斯等一小撮“指挥官”讲团结的话，他们自然是不会加以阻挠的。他们要百般破坏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同志们同人民社会党之间的团结。他们力图切断人民社会党进入政府的道路，也不让它进入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不让它进入新的国家保安机关以及起义军。按照反动派的如意算盘，把人民社会党——该党领导人和党员都百分之百地赞同和拥护革命政府的政策——加以孤立，就能削弱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听听华盛顿的意见，放慢革命步伐，并进而彻底取消革命的进攻性。也正是出于这种打算，反革命分子还使尽各种方法阻挠新古巴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

但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这些计划也同样成了泡影。帝国主义者激烈地反抗社会改造，恰好暴露了他们是古巴劳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古巴人民根据切身的经验，看清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是古巴人民的主要敌人。他们同样也开始明白共产党人是古巴人民的利益和权利的最可靠的捍卫者，古巴人民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苏联是古巴人民真诚的朋友和同盟者。一旦古巴人民明白了这一切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就将宣布古巴革命的社

会主义方向,就将创立古巴共产党。

革命的不断深入,使这次革命成为美洲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切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让我们从头谈起吧。切坚决地支持一切根本性的改造,这些改造的目的是把古巴从帝国主义的势力下解放出来,摧毁岛国中的资本主义基础。

切始终不渝地赞成同人民社会党采取统一行动,坚决谴责反共和反苏的任何表现。切是最早提出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古巴革命家之一,等到古苏关系建立以后,他又竭尽全力地巩固并发展这种关系。

帝国主义者们在切生前,对切又恨又怕,并下毒手夺去了他的生命,今天在切身后,他们又企图歪曲他的形象,把他描绘成为反共分子和反苏分子,甚至几乎把他说成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同盟者和战友。他们一会儿称他为托洛茨基分子,一会称他为毛分子,一会儿又几乎把他说成是涅恰也夫<sup>①</sup>的信徒,反正随心所欲地给他加上各种各样称号,却独独不肯称他为苏联的朋友。但是许许多多事实驳倒了那些双手沾满了他鲜血的人的恶意诽谤。

古巴在一九五九年首次把五月一日定为国家的节

---

<sup>①</sup> 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涅恰也夫(1847—1882):俄国密谋革命家,1868—1869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9年莫斯科的革命组织的创始人;1869年起流亡瑞士,1869—1871年曾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1882年死于彼得—保罗要塞。——译者



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都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表示支持政府。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这时正在拉丁美洲各国访问）在哈瓦那向示威游行的人讲了话。切则在圣地亚哥发表了演说。他号召古巴人民加强同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切革命力量之间的团结，痛斥了反动派的反共主义。阐明了尽速实施彻底的土地改革的必要性。

同年五月十七日，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普拉塔村，也就是在当年同巴蒂斯塔斗争时期颁布过第三号法令（土地法）的那个村子里，召开了革命政府部长会议。这次隆重的会议切也参加了。会议通过了进行土地改革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凡四百公顷以上的地产一律没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并根据国家经济利益的需要，在被没收的土地上，建立国营农场。为了贯彻这项法令，特地成立了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由切的战友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任委员会主任。

古巴革命显然跟那种调换傀儡的传统宫廷政变毫无共同之处。连美国保守派杂志《现代史料》在评论古巴事件时也指出：

“拉丁美洲的历次革命都千篇一律，令人腻烦。在许多情况下，这类革命总是遵循可以预料的老框框。革命刚一发生，它今后的动向就一目了然了。可是古巴的情况却迥然不同。菲德尔·卡斯特的革命，一直将一些崭新的、极其重要的、无从逆料的东西，充实到旧的型式中去。这次革命完全有可能标志一连串类似的革命的开端，这类革命外表上虽然和旧的革命有相似之处，但是

实质上却以其崭新的风格有别于旧的革命。看来，政治革命正在让位给社会革命了。”

土地改革触怒了古巴的大庄园主和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后者霸占了几十万公顷古巴土地。华盛顿开始向哈瓦那递交一份又一份照会，要求“赔偿损失”，并且威胁要给予古巴各种制裁。国内的反动派也公然威胁要发动反革命。有五名同资产阶级关系密切的部长辞职，表示反对政府所采取的激进方针。不久，乌鲁蒂亚总统也提出辞职。于是就由坚定的革命家、反巴蒂斯塔的地下斗争的参加者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接任总统。乌鲁蒂亚则携同那五名前部长立即迁居美国，并在美国统治集团的支持下，煽动古巴起来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逃亡到美国去的还有古巴空军司令迪亚斯·兰斯，这人自称是反革命的军事首领。

反动分子对切尤其切齿痛恨。在他们看来，他是使他们遭到一连串不幸的罪魁祸首，是古巴革命（这次革命在开始的时候是那么地使他们“兴高采烈”，那么合乎他们的心意！）的“凶神恶煞”。反动分子暴跳如雷地问道：这个切是什么人？是从哪里象灾星一般落到我们头上来的？这个冒险家，一个出身不明的外国佬，竟敢把共产主义“移植”到我们岛上来，要想把我们的岛变成向整个拉丁美洲，甚至美国本土发动进攻的“共产主义侵略”的桥头堡。反动报刊要居民们相信，一旦古巴和苏联恢复邦交，切一定会被任命为驻莫斯科大使，以便使古巴这个国家更加听命于“赤色帝国”。

这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切曾在电视台作电视谈话，这

个电视台是受几家敌视革命的私营商行操纵的。主持节目的人向切提出了一些挑衅性的问题：

“您是共产党员吗？”

“假使您认为我们所做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是共产主义的表现的话，那么您就算我们是共产党员好了；假使您问我们是不是属于人民社会党，那么我们回答说：‘不是’。”

“您为什么到古巴来？”

“我想参加解放受尽奴役的美洲的斗争，即使所解放的只是一小块土地……”

“您是否认为俄国存在着独裁制度，假使您认为是的，那么您是否打算去那里和它斗争？您是否认为古巴有可能发生共产主义政变，如果发生，您是否反对？您是否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同古巴的民族性是水火不相容的？是否已经有许多共产党人打进了政府？”这个利用电视进行挑衅的家伙象打连珠炮似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

切沉着地、不失尊严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最后那人提出了他的“最主要的”问题：

“您赞成同苏俄建立邦交吗？”

“我赞成毫无例外地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把那些尊重我们并且希望我们的理想获得胜利的国家排除在外。”

在谈话结束时，切仿佛是顺便提起似的，告诉电视观众说，同他谈话的这个记者是巴蒂斯塔雇佣的一条走狗。

利用电视所作的挑衅，显然没有得逞。然而，革命的

敌人并不甘心。尤其有一名美国记者更是纠缠不休，这人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朱尔·杜波依斯，他实际上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上校。五月二十三日，切写了一封愤怒的信到《波希米亚》周刊编辑部去回答了他的挑衅。切在信中指出，杜波依斯是一条“披着羊皮的狼”，专门搞造谣中伤的勾当，他是美国垄断组织的奴才，对美国垄断组织唯命是从，但是不管杜波依斯及其主子是否喜欢，革命必将实现其既定的纲领。如果有人妄图从国外进犯革命的古巴，那么古巴人民将奋起自卫，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美国统治集团一直威胁说，要严惩革命古巴。为了巩固革命古巴的国际地位，古巴政府决定派切访问“第三世界”的主要国家：埃及、苏丹、摩洛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同这些国家进行友好的接触。在这次出国期间，切还访问了日本、南斯拉夫和西班牙。其中大部分国家，在切访问它们之前，都同古巴没有外交关系。

切是访问东方这么多国家的第一位古巴活动家，甚至可以说是访问东方这么多国家的第一位拉丁美洲活动家。美国力图把拉丁美洲同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同各社会主义国家隔离开来。在“冷战”年代，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包括古巴在内，根据华盛顿的指示，都同苏联断绝了邦交。不管同苏联保持哪一种关系，在华盛顿看来，都是弥天大罪，“是对西半球安全的威胁”。凡是在这方面违抗华盛顿的，都立即会遭到惩罚。美洲国家组织（其实是美国的殖民部）曾专门就这个问题通过了几项严厉

的决议。大家都还记得，不愿俯首听命的阿本斯总统因此遭到了悲惨的下场。

华盛顿力图用美元的帷幕，把拉丁美洲同不久前摆脱了殖民主义桎梏的亚非国家隔离开来。因为亚非国家如果同拉丁美洲接近，就能巩固这些国家的独立，并且坚定它们同帝国主义以及它的“最新”变种——新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意志。

古巴的革命领导决定，首先冲破那幅把古巴和亚非国家隔离开来的美元的帷幕，然后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切这次出国旅行，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埃及。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埃及其他领导人以及埃及人民，十分热烈地迎接了革命古巴的使者。其他国家也同样满怀好意地、盛情地款待了切。

切在埃及访问期间，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苏联专家，他们是来埃及对各个经济领域进行技术援助的。也是在开罗，切在接见记者时，公开表示要同苏联恢复邦交。

切在埃及结识了巴西总统雅尼奥·夸德罗斯，他当时也在埃及访问。从此以后，切始终保持着同夸德罗斯的友谊。

切这次去亚非各国访问，使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此之前，他当然知道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但是只有在现在，当他身历其境以后，才能对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作出判断。这些国家尽管在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同古巴和拉丁美洲大相径庭，然而却也有某种共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帝国主义和

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它们都渴求独立地生存和发展,许多国家都在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革命古巴都深有好感,准备同它建立友好关系,发展贸易,购买它的食糖、烟草以及其他食品和农产品。虽然总的说来,同这些国家的联系,并不能解决革命古巴由于美国对它实行经济制裁并采取一系列敌对行动而遇到的所有问题,但是至少切已经看到无论在亚洲、近东还是非洲,自由之岛都拥有许多朋友。单单这一点,就具有一定的意义了。然而,革命古巴的主要的、未来的同盟者苏联,到当时为止,对古巴来说,却至少在表面上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仍然是一种禁区。

切自六月十二日出国,至九月五日回国,在国外度过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一直同哈瓦那保持着密切联系,知道古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切回国后一个月,被任命为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工业司司长,同时保留军职。这时,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已成为最大的政府机构,不仅要贯彻土改,而且要研究和制订这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各种方案。切的使命就是去解决后面这个问题的。但是工业化计划取决于财政,而当时国家的财政命脉却仍然操纵在私营银行手里。国家银行行长费利佩·帕索斯就是大资本家的代理人。既然国家财政命脉操纵在革命的敌人手里,就无从考虑工业化的计划了。后来,古巴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这个问题也在有利于革命的情况下获得了解决。

由于实施了根本性的社会改造,美国垄断组织就无法再继续掠夺古巴人民,这可大大激怒了华盛顿。美国

统治集团唯恐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都步古巴的后尘，因此早在一九五九年年中就采取了这样一条方针，就是用反革命政变的方法来颠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府。计划中的政变主角将由“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右派分子来充任。这些人为了伪装起见，也口口声声拥护社会改造，声称他们反对的只是共产主义和苏联而已，据他们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把古巴革命“预售”给苏联了。

十月二十一日，一条逃到美国去的名叫迪亚斯·兰斯的蛆虫(人们就是这样称呼反革命分子的)，策划了对哈瓦那的空袭；空袭用的全是美国飞机，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空袭使得五十多人惨遭伤亡。也就在同一天，卡马圭省军区司令，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的参加者乌维尔托·马托斯少校发动暴乱，要挟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共产党人“一刀两断”。

反革命分子的挑衅，激起了古巴人民强烈的愤慨。马托斯的叛乱被镇压了下去，马托斯本人被革命法庭判处了二十年徒刑。

遵照劳动人民的要求，建立了革命的民兵，专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数以万计的工人、农民和大学生加入了民兵队伍。美国统治集团及其在古巴的代理人企图颠覆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的计划全落了空。古巴革命继续旗帜鲜明地向前发展。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根据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建议，部长会议撤去了费利佩·帕索斯的职务，任命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接任国家银行行长，并授予他财政部长的全部权力。

切老爱讲这么一则笑话来说明怎么会任命他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有一次，菲德尔把他的同志们都召集拢来，问我们中间谁是经济学家，我举起了手。菲德尔非常诧异地问我：‘你打什么时候起成为经济学家的？’我回答：‘我听错了，以为你问我们中间什么人是在共产党哩。’就这样将错就错，任命我当了国家银行行长。”

这则笑话是寓意深长的。

切虽然不是经济问题专家，而且他也从不掩饰这一点，但是他却深知国家的财政、国家的银行，应当为人民服务，不应当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剥削工具。

切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后，直到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才被免去这个职务，出任工业部部长。工业部是在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工业司的基础上新建起来的一个部。革命政府所以任命切为这个部的部长，不消说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政治品质，还考虑到他一贯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工业化。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苏联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在哈瓦那访问了切。切对他说：

“按职业来说，我是医生，可是现在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却当了工业部长。也许，您会觉得奇怪吧？不过我想您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要知道列宁按职业来说是律师，而他的部长中间有医生、有法学家、有著名的工程师……是这样吧？”

“革命就是革命，要按照革命的需要来安排人力。当年，在我加入菲德尔的队伍的时候（我为我同菲德尔多年来的友谊感到自豪），在我乘上‘格拉玛’号游艇的时候，



我的职务恰恰是军医，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将来会担任经济工作的组织者，我一定会发笑的。”<sup>①</sup>

古巴政府在成立工业部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央计划委员会，切极其积极地参与了对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工作。

同时，切继续致力于建设革命的新军队。这些年来，他一直领导着革命武装部的训练部。这个部负责起义军的战士、下级军官以及民兵的队列训练和政治教育。古巴的共青团式组织，起义青年协会（现称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就是在这个部首先诞生的。根据切的倡议，这个部还出版了在古巴发行很广的起义军机关刊物《绿橄榄树》周刊。切经常在这个周刊上发表关于国际问题的杂文。

切是“七月二十六日运动”最高领导成员之一。一九六一年下半年，“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和人民社会党以及“革命学生指导委员会”，联合成立了“古巴革命统一组织”。切当选为“古巴革命统一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和“革命统一组织”经济委员会委员。

一九六三年五月，“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担任了这个党的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雇佣军侵犯吉隆滩的那些日子，对革命来说，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此期间，切负责领导驻防比那尔德里奥省的军队。

吉隆滩战役还没有结束，切就到了吉隆滩，投入了局势演变的中心。法国女记者阿妮阿·弗朗科斯，在其所

<sup>①</sup> 引自鲍里斯·波列伏依所著《切同志》，载《拉丁美洲》1970年第6期，第80页。——原注。

著《欢度节日的古巴》一书中，曾描写了她在这些日子里和切相遇的情景：

“切被一群民兵围在中心，我好不容易才从这些人的背后看清了他那张苍白的脸。他戴着一顶黑色圆形软帽，穿着一件深绿色上装，没有佩戴任何奖章之类的东西……我不由自主想起了我的一个阿根廷女友赞美他的话：‘拉丁美洲所有的姑娘都钟情于切。他那带浪漫色彩的苍白的脸，配上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和并不茂密的、蓬松的络腮胡子，真是美极了！简直是圣茹斯特<sup>①</sup>再世！……’”萨特<sup>②</sup>曾在一篇文章中描绘了切，认为他是真正的革命英雄。萨特还援引了切的这样一句话：“‘菲德尔完全能够找到一个头脑比我聪明的人，但是他未必能够找到一个在思想上比我更和他一致的人。’”

阿妮阿·弗朗科斯还旁听了切同一名俘获的黑人雇佣兵的谈话。

“切问那名俘虏：‘你到这里来干吗？也是为了捍卫“民主”吗？你居然也参加了由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提供经费的武装干涉？而且居然同资产阶级的小崽子们搞在一起，他们才瞧不起你这个黑皮肤哩，你跟他们毫无平等的权利。要知道他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所反对的这场革命，恰恰是维护一切种族的尊严的！你为了好让这些个“上等人家”的孝子贤孙重新霸占他们的俱乐部，居然拿起枪杆来当炮灰，可是他们连俱乐部的门槛也不会允许

---

① 圣茹斯特系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党的领导人之一。——译者

② 萨特系法国现代作家。——译者

你这个黑人碰一碰的！’

“那个黑人默然不语。切转过身来问其余的俘虏：

“‘你们当中谁曾经是贵族俱乐部的会员？’

“有几个人举起了手来。

“‘都是哪些俱乐部的？’

“俘虏一个接一个说出了俱乐部名称：‘航海俱乐部’、‘向洋俱乐部’、‘游艇俱乐部’等等。

“切问那个黑人：

“‘那么你有权参加这些俱乐部吗？’

“那人回答说：‘没有。’

“于是切结束他的话说：‘当然不会有，他们害怕你会弄脏他们游泳池里的水。可是吉隆滩的水，不知怎的，他们却并不担心被你弄脏！你能替自己辩护的理由比他们还要少。’

“那名黑人俘虏回答说：‘我知道，少校。您讲的这些话，民兵们已经再三给我讲过了。’”

切数年如一日地过着俭朴的生活，始终辛勤工作，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高等数学和经济学，一遍又一遍地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把他的知识都传授给同事们，但从不好为人师，从不训斥他的下级。切对待朋友一贯和蔼可亲，他经常同工人、农民和大学生接触，同外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们联系。

切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建设古巴的社会主义，用于捍卫并巩固古巴光荣的革命。而且同时他又向往着规模更加宏大的全大陆性的革命，向望着将整个拉丁美洲，包括他的祖国阿根廷在内，从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

出来。

既然切这个阿根廷人可以不远千里来到古巴，为了古巴的自由而战斗，那么他更加有理由离开古巴，投身到在他祖国的潘帕斯草原或者安第斯山各地高举起义大旗的人们的行列中去。那些地方有兀鹰在翱翔，有美洲大地的真正主人印第安人在放牧羊驼。

不过，古巴革命还处在摇篮之中。的确，古巴这个奇迹般的婴儿正在日新月异地飞速成长。但是，在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可以放下部长的皮包，换上他那么热爱的游击队员的背包以前，古巴还要经受不少考验和克服重重困难……

## 2. 社会主义世界

没有苏联的存在，古巴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菲德尔·卡斯特罗

我们愿意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上千万遍，我们一踏上苏联国土，就立即体会到苏联是地球上社会主义的祖国。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自从革命胜利那天起，切和他的同志们就都料到，为争取古巴人民的社会解放而作的斗争，必定会遭到美国

方面的镇压，美国为了使“危地马拉的军事行动”得以在古巴重演，是不惜花费金钱和力气的。

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古巴人民当然会为了保卫国土而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然而古巴人民为了保卫国土就需要武器，需要援助，在已经形成的局面下，只有苏联才能够向古巴人民提供这种援助和支持。

苏联能够向古巴革命提供保卫革命所迫切需要的武器援助，也能够向古巴革命提供经济援助。苏联可以购买古巴的食糖，也可以向古巴出售石油、机器以及必需的日用消费品。关于这一切，华盛顿及其在古巴的走卒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也是极其害怕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就用那套反共的唬人宣传，不择手段地企图阻挠革命的古巴和苏联接触。

促使古巴必须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古巴革命的领导者所渴望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造工作：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实行免费教育和公费医疗等等，总之，使得劳动人民摆脱剥削的这一切社会改造工作，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这还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或者说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步伐吗？当然，对于这些改造也可以冠以另一种名称，但是，问题不在于名称。无论菲德尔、劳尔还是切，他们全都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他们都懂得，只要一踏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道路，他们迟早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因为要摆脱贫困、无权和剥削没有也不可能有另一条道路可走。

如果是这样的话(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的)，那么一个

国家难道可以不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跟伟大列宁的国家建立最密切的关系，而能够指望获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并建成一个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新社会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用说，只能是否定的，何况苏联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立即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一日发表声明，承认古巴新的革命政府。苏联报刊、广播电台以及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都坚决地、无条件地表示支持自由之岛的革命。

一九六〇年二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应古巴政府邀请抵达哈瓦那访问。苏维埃国家的这位高级代表受到了特别友好的接待。菲德尔·卡斯特罗、切和其他革命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米高扬。米高扬和古巴的国务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出席了在哈瓦那举办的苏联科学技术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

但是米高扬这次访问的主要意义还在于，他的访问使得古巴领导人有机会同苏联的代表举行会谈和缔结有利的协定，这些协定奠定了发展革命古巴和苏联之间牢固的兄弟般友好关系的基础。

切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积极地参加了同米高扬的会谈。他曾多次拜会米高扬，并邀请米高扬到他家作客，把米高扬介绍给他的妻子和儿女认识。

会谈结果，签订了苏联以高于世界市场平均价的价格向古巴购买一百万吨食糖的协定。苏联还向古巴提供为期十二年的一亿美元的贷款。两国政府还签署了政治声明，这项声明表明两国政府都愿意竭尽全力地为保卫

和平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其他原则而斗争。

这些协定气得革命的敌人——“蛆虫”——暴跳如雷。他们企图在哈瓦那组织反苏示威。当苏联代表团向古巴独立的倡始人、诗人何塞·马蒂的纪念碑献花圈的时候，他们竟然朝代表团打冷枪。

然而，“蛆虫”们得到了应有的回击。古巴人民和劳动者对于革命古巴和强盛的大国苏联之间建立的友好关系无不表示欢迎。他们明白，已经签订的这些协定巩固了革命古巴的地位，使它能够把有利于人民的深刻改造的纲领，付诸实施。

美国中央情报局则继续进行阴谋活动，反对自由古巴。一九六〇年三月四日，比利时轮船“库弗尔”号在哈瓦那港爆炸，原来是有人潜入船内，安下了一枚炸弹。结果炸死七十人，炸伤一百余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为这些牺牲者举行的葬礼上发表了讲话，他在结束这次讲话时，第一次高呼下面这两句口号：“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从此这两句口号就成了古巴革命的象征。

“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是说，革命古巴究竟能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还是会重新受美国垄断组织统治的这个问题，是要通过和反动派的残酷斗争来解决的。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日，切在“人民大学”这个新的电视节目中所作的讲话就专门谈了这个问题。讲话的题目叫做：“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

举国上下，不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倾听了切的这次讲话。切谈到如果经济上没有取得独立，而要想维护国家的主权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还谈到他曾“有幸”参加同

苏联缔结协定的会谈，签订这些协定的目的就在于巩固古巴经济的独立，也就是说，巩固古巴的主权。

切指出，苏联答应在今后五年内每年向古巴购买一百万吨食糖，答应出售石油给古巴，售价比美国石油垄断组织的价格便宜百分之三十三，并向古巴提供贷款，条件是贸易关系史上最为优惠的。接着，他说道：

“菲德尔·卡斯特罗解释说，同苏联签订的贸易协定给古巴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他的这句话表达了，更确切地说，概括了古巴人民的心情。的确，大家一晓得我们已经有可能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就都感到自己更加自由了，而今天，全体人民尤其应当认为自己更加自由了，因为所签订的这项贸易协定，不仅巩固了国家主权，而且是对古巴最为有利的协定之一。”

同年五月八日，古巴和苏联正式复交。华盛顿认为，这是“哈瓦那的令人发指的行为”，是对它的极大冒犯，就决定采取新的制裁。美国的公司都停止向古巴输出石油，并停止在古巴加工石油。然而，苏联是可靠的朋友。古巴政府派出了以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任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为首的经济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同苏联订立了供应古巴石油和石油制品的一些重要协定。

这件事使华盛顿老羞成怒。美国政府竟单方面取消了输入古巴食糖的定额，用这个方法使得自由之岛这项最重要的产品实际上无法进入传统的美国市场。但是，拉丁美洲人一见山姆大叔发火就吓得胆战心惊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古巴政府决定“采取强制的剥夺方式”，



把美国佬的财产和企业收归国有。华盛顿为了对古巴政府的决定实行报复，公然以武装干涉相威胁。在这紧张的日子里，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誓以一切手段支持古巴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苏联政府的声明在古巴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应，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这个声明表示感谢和满意。同年六月十日，切在总统府前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五角大楼和美国垄断组织的亲信们，过去一直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为非作歹而没有受到过惩罚，但还是要奉劝他们小心些的好。有些情况，他们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古巴早已不是大洋中的一个孤岛了，早已不是仅仅依靠她的手无寸铁的儿子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者的高尚的激情来捍卫的孤岛了。今天的古巴，是位于加勒比海中心的光荣之岛，正由有史以来一个最强盛的大国的火箭保护着她！”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切在第一届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上讲道：“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朋友，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毫不含糊地、一清二楚地回答说：是的！”他指出，当美国取消食糖定额并拒绝向我们出售石油的时候，假使苏联不来帮助我们，那么革命古巴的情况势必凶多吉少了。

为了对付美国想迫使革命古巴屈膝投降的威胁，古巴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公布了第一个哈瓦那宣言。切参加了这个宣言的起草工作。哈瓦那宣言反映了古巴革命领导人和全体古巴人民的观点。切在卡马圭市群众大会上宣读哈瓦那宣言时，强调指出，苏联对古巴的援助是不附

任何政治条件的。哈瓦那宣言高度评价了苏联和革命古巴之间的团结，宣言第四条宣布说：“苏联自愿建议一旦我们的国家受到帝国主义武装力量袭击时给予我们援助的做法，绝不能视为干涉行为，而是一个明显的支援行动，这种在美国五角大楼即将发动攻击的情况下给予古巴的援助，一方面使提供援助的苏联政府显得光荣，另一方面也使美国政府对古巴的卑怯的罪恶的侵略行为显得可耻。”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二日，切率领经济代表团访问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古巴革命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社会主义已经获得胜利的各个国家。切在国外逗留了两个月，其中几乎有一个月的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除苏联之外，他还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切出席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的庆祝典礼。

切从列宁墓高高的观礼台上，观看了阅兵式和莫斯科人的游行。切还在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访问了工厂和学术机关，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和列宁住宅博物馆；还去列宁格勒和伏尔加格勒作了访问，参观了斯莫尔尼宫、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和马麦古墓。

切在莫斯科还缔结了对古巴说来极其重要的新的经济协定。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一日，莫斯科各界人士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了欢迎切的集会。

切向到会的人发表了长篇演说，他在提到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时说，这位元帅的名字，就象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其他英雄的名字一样，是古巴革命者所永志不忘的。切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文件表示拥护，他指出，这些文件有四处提到古巴，把古巴作为处在类似条件下的其他国家人民的榜样。这位演说者说道：“我们没有参加这个声明的起草，但是我们全心全意地拥护这个声明。”

切提纲挈领地叙述了古巴革命的主要阶段。他指出：“我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我们的斗争的，当时意识形态方面力量的分布情况不能跟今天相比。我们在斗争过程中进行了学习并取得了经验；我们是在革命的过程中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的。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认识了一个真理，那就是贫农群众应当是我们起义军的核心。我们懂得了，在古巴的条件下，除了走以人民的武装起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傀儡的武装压迫这条道路之外，没有其他出路。我们拿起武器，同农民团结在一起，开始跟代表寡头政治——美国的同谋者——的军队进行斗争，结果我们击溃了这支军队。处于同我们类似条件下的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是完全可以我们的旗帜来武装他们自己的。我们已经用事实证明，人民是能够武装起来的，是能够同压迫者进行斗争，并把他们消灭的……”

“现在我们的处境是：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军舰、基地和海军陆战队始终虎视眈眈地威胁着我们的岛国，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有苏联的宝贵的援助。苏联如同是我们的护身铁甲，保护着我国的主权以及领土的完整。

“遗憾的是，古巴是地球上紧张局势的热点之一，我们可不象帝国主义者，我们无意玩火。我们很清楚，如果在我国沿海地区发生冲突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们竭尽全力地防止冲突。但是，单单靠我们自己是防止不了冲突的。声援古巴的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是一种我们所信赖的武器，正是这种武器使得美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

“但是，我们决不可放松戒备，我们必须警惕地守卫我国的领海、领空和领土，以便随时歼灭入侵之敌……富有创造性的热情的古巴人民，正满怀信心地展望着自己的未来。古巴人民知道，他们必定能经受住各种考验，从而取得胜利。他们正在准备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虽然他们在建设这个世界的同时，遗憾得很，不得不紧握着武器。古巴人民就是这样的人民。因此，我作为古巴人民的代表，会在你们这里，在苏联所有的城市，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的角落，都受到了欢迎，这种欢迎是这么热情洋溢，这么兴高采烈，充满了火热的革命情谊。”

切说，我们决不会忘记苏联人民所给予我们的战斗支援，也决不会忘记，古巴人所到之处，苏联人民欢迎他们的那种革命热情。这位演说者继续说：“我要告诉你们，苏联人民所给予我们的支援和对我们的热情欢迎，在我们看来，是证明我们之间的友谊永不褪色的印记，我们之间的友谊不但与日俱增，而且是与时俱增，它奠定了我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坚不可摧的基础。

“我们的关系还可以用下面这两句话来加以说明：

‘古巴决不背信弃义！古巴决不出尔反尔！’

“古巴将毫不懈怠地坚守它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占据的岗位，它决心作为生气勃勃的战斗的榜样屹立在那里，直到帝国主义不再用武力威胁它的存在为止。

“同时，古巴也决心利用一切可能，即使是最小的可能，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而不诉诸武力。古巴热烈拥护苏联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的普遍裁军的建议，以便将现在用于军备的一部分金钱，分配给极其需要经费来发展国家的各国人民。古巴坚决赞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并且建议给要求和平的人以和平。但是，目前我们是不会放下手中的枪杆的，假使敌人侵犯我们的国境，我们就将紧握手中的枪杆进行自卫。同时，我们公开宣布，对于反革命的恐怖手段，古巴政府将用革命的恐怖手段来回击，对于凡是动用武器，想把枷锁重新套到我国人民头上来的人，古巴政府将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

切在莫斯科期间，本书作者曾去访问过切，请求他为本书作者和现已去世的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叶菲莫夫合著的一部研究古巴的历史和风俗文化的论文集写一篇文章。切欣然答应，而且很快就把文章交给了我。这篇文章就印在上面讲的那个集子里，题目叫《革命浅论》。这篇文章中的有些话，我已经在前一节中援引过了。现在我要援引的是切在文章中谈到苏联对于古巴革命的形成以及保卫古巴革命所起的作用的那些段落。

切写道：“古巴人民的胜利表明，在天平秤上，两个敌

对阵营——和平阵营和战争阵营——之间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社会主义体系一边已经重于另一边了。古巴能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存在，是因为古巴人民在一系列伟大的口号下万众一心，团结了起来；是因为古巴领导人同古巴人民休戚与共，肝胆相照；是因为古巴领导人善于率领古巴人民沿着胜利的道路前进。这是真相，然而还不是全部真相。古巴能够存在，还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那些始终支持正义事业，并且也有足够的力量支持正义事业的国家结成了联盟。有人剥夺了古巴的石油，想用这个办法迫使古巴投降，于是苏联的油船便从苏联港口运来了足够古巴使用的石油。有人拒绝购买古巴的食糖，想借此迫使古巴投降，于是苏联就购买古巴的食糖。最近有人又企图用经济封锁扼杀古巴，然而他们的希望又同样成了泡影。这是真相，不过还不能算是全部真相。古巴能够作为主权国而存在，还因为美国虽然已经在它的领土上作好了军事入侵的一切准备，但是苏联政府发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警告却使它不敢轻举妄动。

“由此可见，通过古巴的例子，充分显示了和平力量已经决定性地压倒了战争力量。置身北美帝国心脏地区的古巴，是个活生生的见证人，证明凡是立志要取得独立的人民，都能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必要的支持，都能够捍卫自己的独立。”

十二月十九日，切代表古巴政府签署了苏古联合公报。公报指出，苏联和古巴对于国际问题和两国的内政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公报谴责美国帝国主义集团侵略古巴和其他维护独立的国家。苏联同意向古巴提供广泛的

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同意巩固并发展同古巴的贸易关系，包括向古巴购买大宗食糖。

同一天，切在苏联政府为古巴经济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说：

“我将怀着两点最深刻的印象离开我个人首次访问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点，我作为古巴共和国的活动家在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完成了托付给我的全部使命，而且是在处处都洋溢着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切使命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满意。

“除此而外，我们在这个国家度过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个国家完成了世界上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我们在苏联逗留期间，没有一天不体会到这一点。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革命已经胜利了四十三年以后，在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已经结束了那么多年以后，仍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们的革命精神。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苏联的公民，竟没有一个例外，都深刻地了解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都有高度的政治修养。这是我们在各地切身体会到的，凡是我们所到的地方，不论在大街、工厂还是农庄，人民一眼就认出了我们，立刻向我们欢呼：‘古巴万岁！’在这十五天内，我们的确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友谊的海洋中。这对我们说来，是深刻的教育，有力的支持，因为我们当初一出古巴国境，就立刻陷入了敌意的汪洋大海中。”

切又一次高度评价了苏联给予革命古巴的援助和支持。他强调指出：“在古巴革命取得胜利以后的整整两年

中间，不论古巴碰到什么问题，也不论这些问题多么复杂，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每一次都向我们伸出了援助的手。如果我现在来列举过去两年内苏联所给予我们的援助，那就会被我占去许多时间；如果我现在来列举我们刚才签署的公报所包含的内容，同样也会被我占去不少时间。但我还是要指出，无论是苏联的援助还是公报的内容，都清楚有力地证明苏联始终是站在争取和平和独立的各国人民一边的，而苏联这种始终不渝的态度本身，又使得苏联在许多同古巴类似的、奋起争取自由的国家的心目中，成为更加伟大的象征。苏联的这种态度使得拉丁美洲各国，即使不是它们的政府，至少是它们的人民，更加明白，真正的新生活正是苏联这个国家才有，并且是从这个国家传播开去的。苏联的这种态度还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懂得了正是苏联，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一贯支持他们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也帮助他们懂得了正是美帝国主义者一贯压迫他们和残酷地剥削他们。”

切在结束他的讲话时警告帝国主义者说，如果他们胆敢侵犯古巴，那么古巴人民就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拿起武器，捍卫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取得的自由。切指出，古巴人民知道，在这一斗争中，他们是会得到苏联的支持的。

切在启程离开苏联前，对莫斯科电台的代表说：“我们愿意不厌其烦地重复说上千万遍，我们一踏上苏联国土，就立即体会到苏联是地球上社会主义的祖国。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苏联人民至今保持着产生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那种革命精神。”



切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根据苏联的建议，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赢利同盟”，每年向古巴购买达四百万吨的食糖，苏联则承购其中的二百七十万吨。除此而外，各国还答应向古巴提供各种技术援助和其他援助。

切回到哈瓦那后，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六日发表电视和广播演说，向古巴人民详细汇报了他这次访问的成果。

我们只消举出切讲话中的一些地方，就足以证明切对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党和政府是十分敬重的。

切在讲话中提起，当初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从苏联回国以后，向大家谈了他的观感，有些人不相信，称之为“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切在回忆了这件事以后，说：“由于我走的地方比努涅斯·希门尼斯多得多，我走遍了整个社会主义大陆，岂不是也可以把我讲的称之为‘阿丽思漫游列国奇境记’了吗。但是每个人都有责任把他的见闻讲出来，而且有责任如实地讲出来。要知道那些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同古巴有类似经历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罕见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的发展方式同资本主义国家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对于象我国革命这样一类事件的看法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居民对于这类事件的看法更加无法比拟。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我们都十分热情，而苏联，看来尤其热情。苏联革命已经有四十三年了，因此苏联人民具有最高度的政治修养……”

切对他的听众讲述了苏联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内

所取得的成就，他还特别指出，苏维埃政权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不可胜数的优越条件。

切说道：“我甚至无法设想，怎么可能做到这一切的。苏联人民除了其他许多优秀品质之外，天赋都很高，都十分愉快、乐观，充满同志式的感情，这是苏联人民的特点。我这么说，并非出于礼貌，我讲的是真实情况，这一点我就是苏联也谈起过：我一到苏联就立刻体会到，正是在这个国家诞生了社会主义这种正义的制度……”

切详尽地介绍了他在莫斯科和苏方签署的公报内容，他特别着重地谈了公报的结尾部分，在这个部分中，双方声明，它们坚决拥护和平共处，并且将尽它们的一切可能来保障世界和平。

切对于这一部分是这样评论的：“关于和平问题，很可能被看作是空谈而已，但对我们来说，和平问题决不是空谈。这是十分重要的东西。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帝国主义走错任何一步路，犯任何一个错误，都可能突然使局部战争扩大，立刻引起世界大战。不幸的是，如果发生世界大战，那就是一场原子火箭战争，古巴就要遭到浩劫。

“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我们应该有保卫和平到底的决心。我们一方面要保卫和平，一方面如果有人侵犯我们，那么就叫他为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同时，我们应该有所节制，为保障古巴和世界各地的和平而斗争。”

切的这些话，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意义。切为人的真诚和政治上的光明正大是任何人都不怀疑的。因此，他证实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就

的那些话，他拥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方针的那些话，对于一部分虽然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的政策，但是却仍然囿于反共和反苏偏见的劳动人民来说，特别有说服力。切在历次讲话中，反复地谈了古苏关系问题。在吉隆滩歼灭了雇佣军以后，切在一次纪念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古巴战士安东尼奥·希特拉斯（他在一九三三年被巴蒂斯塔下令杀害）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驳斥了某些人的看法，这些人硬说，革命古巴同苏联的联盟，意味着苏联势力取代美国势力。切指出：“我们尊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为它们高兴，我们愈是了解它们，就愈是尊敬它们，就愈是为它们高兴。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务活动家中，从来没有人想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想要对我们指手划脚。苏联是一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强国，古巴是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小小的岛国，然而苏联是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同古巴建立关系的。苏联首次给我们一亿美元的贷款时，甚至并不要求我们同他们恢复邦交，以作为最起码的担保。”

不消说，切有关苏联的这些话，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看法，而且也反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其他主要领导人的观点。但是，不能否认，这种看法所以能够形成，切是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的。

切所以对苏联抱友好和尊敬的态度，不仅因为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认识到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消灭了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其他祸害的国家；而且因为苏联的党和政府在列宁主义思想的激励下所制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保障了革命古巴的安全，使古巴能够根

据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建设正义的新社会。苏联不仅承担了向古巴革命提供军事援助的责任，而且还承担了向古巴提供经济、技术和财政援助的责任，苏联援助的规模超过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供的援助的总和。而且这种援助是在最优惠的条件下向古巴提供的，建立在完全和绝对的平等基础上，并不强迫古巴尽任何政治义务，也不向古巴提出任何同它的主权相抵触的要求。

切对于这种援助的价值是理解得十分透彻的，他渴望社会主义的古巴在经济上能够获得全面发展，并保持合理的平衡，从而保证古巴劳动人民具有高度的生活水平。

切的许多外国崇拜者，把切想象为“永恒不变的”这样一类革命者，这类革命者的最高理想就是打游击，就是拿起枪杆来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打仗。这种崇拜者有意无意歪曲了切的形象，他们根本忘记了切对古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所起的作用。

切尤其重视发展古巴的工业，他不是没有根据地认为，建立起古巴本国的工业，便能提高古巴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他们具有高尚的道德和精神，使他们接近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中还要进一步详谈。在这一节中，我们只是指出：切很注意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研究我国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和领导工作的经验，特别是工业的计划工作和领导工作的经验，研究我国的党、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在经济领域内和在开展竞赛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的相互关系以及劳动定额等问题。总之，在社

会主义经济工作方面,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他都很有兴味地加以研究。

切不仅阅读我国出版的这一类书籍,还经常同访问古巴或者在这个自由之岛上工作的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工程师、经济学家谈话,通过谈话,如饥似渴地汲取他所迫切需要的知识。切在访问苏联期间也曾和这些专家联系过,他那时是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所长费奥多连科院士的常客。

切很乐意同苏联人交往,不管他们从事的是哪一种职业:作家也好、科学家也好、社会活动家也好、演员也好,象棋手那就更不用说了。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梁,是早在一九五九年初就在古巴访问过切的第一批苏联人中间的一个。切还和我国第一个宇宙航飞行员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建立起了感人肺腑的友谊。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也曾经在哈瓦那同切作过长谈;波列伏依所著《真正的人》一书,切还在墨西哥的时候就看过了,并且曾经向“格拉玛”号远征军的参加者热烈推荐过。如果一一列举同切有过来往的苏联人,那就需要很多篇幅才能载完。

凡是同切见过面的苏联人,对于切的坦率、诚恳和革命热情,无不叹服。

我在前一节中已经援引过鲍里斯·波列伏依回忆切的那篇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还追忆了切的相貌,他是这样描绘的:“切的脸四四方方,可以说是漂亮极了。双颊蓄着一绺绺又软又松的大胡子、唇上乌黑的髭须和两道如我们俄罗斯人所常说的黑貂一般的剑眉,把他的脸衬

托得益发白皙了，看来，他的脸是晒不黑的。乍一看去，这张脸相当严峻，甚至透出一股狂热；但是当他微微一笑时，不知怎地，一下子就看出这位部长的实际年龄还很轻，他立刻变成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他穿一件草绿色的卡叽军便服和一条宽大的军裤，裤脚管塞在长统球鞋里，戴着一顶缀有小五角星的黑色圆形软帽，这套军装似乎最终完成了对他性格的写照。”

切经常接见苏联记者，在同他们谈话时，每一次都要强调指出苏联的援助对于古巴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作用。其中有一次谈话，曾发表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的《新时代》杂志上，切在这次谈话中提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古巴的无私援助时指出：“自然，苏联的援助，更加广泛，更加全面。所以当我们谈到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关系时，我们指的首先是，我国同苏联的关系，这种关系自始至终是建立在兄弟般合作和互相尊重民族利益的基础上的……”

古巴宣布一九六二年为“计划年”。然而，革命古巴的和平建设却使美帝国主义者非常恼火。虽然上一年帝国主义者的雇佣军入侵吉隆滩遭到了惨败，但是帝国主义者并没有死心，继续制造反对革命古巴的充满敌意的气氛。

美国政府加紧了对岛国的经济封锁，指望靠饥饿之神的魔爪来扼杀革命。美国中央情报局则继续训练和派遣破坏分子、怠工分子和间谍打进古巴。交给这帮匪徒的任务是进行破坏和捣乱，使革命政权陷于瘫痪。美国间谍飞机公然违背一切国际法，日日夜夜在古巴上空盘旋。

加勒比海地区所有美国军事基地内，都集结了大量军队。美国的这一切侵略行径威胁着古巴的独立，而且华盛顿丝毫不掩饰他们的这一目的。

但是同时，美国政府当局的代表人物却以帝国主义者所固有的寡廉鲜耻的态度，表示愿意给古巴政府“友爱和钱袋”；唯一的条件是，断绝同苏联的友好关系。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全体古巴人民，怀着蔑视的态度，断然拒绝了帝国主义者卑鄙的贿赂。古巴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古巴加强它的防御能力，苏联政府慨然允诺了古巴朋友的请求。

为了缔结相应的协定，以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为首的古巴代表团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抵达莫斯科。这一次切在苏联总共只逗留了一星期。会谈结果十分圆满。

据一则关于古巴代表团访苏情况的消息报导，代表团就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对古巴进行威胁这件事，同苏方交换了意见。由于这种威胁的存在，古巴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武器援助以及相应的技术专家援助，以便训练古巴军人使用苏联所提供的武器；苏联政府注意地听取了古巴政府的这个请求。双方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只要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一天不停止对古巴的威胁，古巴共和国就完全有理由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以及捍卫自己的主权与独立。古巴所有真正的朋友也都完全有权利对这种合理的请求作出响应。

华盛顿的头目非但毫不醒悟，反而把他们同古巴的关系搞得更加紧张；他们宣布对古巴采取“隔离措施”，也

就是说,实施军事封锁,并以武装干涉相威胁,甚至不惜以发动世界范围的冲突相威胁。于是就造成了加勒比海危机。然而,即使这一次,进行战争讹诈的美国侵略者“也还是在古巴人民保卫祖国独立的钢铁意志面前,在苏联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古巴的声援面前”被迫退却。

这些日子对古巴说来是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切在这些日子里,象当初雇佣军侵犯吉隆滩时一样,始终坚守在比那尔德里奥省集团军司令的战斗岗位上……在此期间,切发生了一桩不幸的偶然事件:他的手枪不慎掉到地上,走了火,打伤了他。反革命分子知道以后,开始就这次不幸事件大做文章,散布了各种各样“确实可靠”的消息。他们断言,切“由于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意见分歧”,因此企图自杀。

当美国由于加勒比海危机而又一次遭到惨败以后,那些专门造谣中伤的人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又一次妄图给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脸上,甚至给菲德尔·卡斯特的脸上抹黑,他们煞有介事地说,这两个人都同苏联“决裂”了。据他们说,这个消息,就同上面提到的切由于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意见分歧”而自杀的消息一样,都是“确凿可靠”的。

苏联和革命古巴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仿佛是鱼刺卡在他们的喉咙里一样,因此他们不惜代价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制造分裂。

事实的真相是,古巴政府对解决加勒比海危机的方法,有它自己的观点。古巴和苏联讨论了这个问题,双方达成了协议。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声明：“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和苏联之间存在某些分歧，但是我们之间没有出现裂口。首先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相信苏联的原则性政策。”

由此可见，切以及古巴其他领导人根本就没有同苏联之间发生什么“决裂”。这又一次暴露敌人把希望当作了现实。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电视和广播演说：“在我们每个困难时期中，面对着美国的每次阴谋，每次经济侵略，面对着美国取消食糖定额、停止对我国的石油供应的做法，面对着我们所遭受的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苏联一贯对我们伸出友谊的援手。苏联总是同我们站在一起。这一点，我们是感激的，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高声宣布这点。”

古巴革命领袖的这个看法，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同美洲大学生谈话时表示，他是完全赞同的。这次谈话的全文发表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二日的《革命报》上。

切坚决地谴责了托洛茨基分子在加勒比海危机时期的挑拨性行径，他们当时曾要求向关塔那摩美国军事基地发动进攻。切指出，托洛茨基分子同古巴革命风马牛不相及，都是坏蛋和饶舌者，他们蛮横无礼地要出版他们的机关刊物，但政府是决不会批准的。

我们深信，如果切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同意菲德尔·卡斯特罗为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所作的讲话中有关苏联的以下这些话的：“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目前有一种超革命的理论家，超左派，如果你们想为这些人取名字

的话,可以称他们为名副其实的‘超人’,他们只消三言两语就能把帝国主义的内脏取出来;许多超革命家对现实情况,对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和困难,统统一无所知,却受了帝国主义的煽动,满怀兽性的仇恨。连世界上存在着苏联这个事实,他们似乎都不能原谅……

“这伙人忘掉了苏联在革命初期所经受的一系列难以置信的困难……忘掉了封锁、隔离和法西斯侵略所引起的一系列难以置信的问题。对于所有这一切,他们都装作不知道,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存在着苏联这个事实几乎就是一桩罪恶。而所有这一切,他们都是站在‘左派’立场上来搞的。真是无耻之尤!”且不说这些包藏祸心的“左派”在别的方面怎么样,反正干无耻的事他们是最拿手的。

一九六四年,切几乎每周都要出席各种工厂的开工典礼,其中大部分工厂是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一九六四年五月三日,他在出席机械轴承工厂“阿吉利亚尔厂”开工典礼时发表了讲话,热烈地赞扬了竭尽全力地使工厂早日投产的苏联专家的忘我劳动的精神。他指出,苏联对古巴的发展一直提供具体的援助。

苏联政府和人民自革命古巴存在那天起,一贯支持无时无刻不处于美帝国主义威胁下的古巴。切表示深信,今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古巴都能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援助和谅解。切下结论说:“这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一九六四年,苏联同古巴签订了一项向古巴购买食糖的长期协定,对这个协定,切作了高度评价。同年,切

在英国《国际事务》季刊十月号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个协定不仅对古巴经济具有积极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切在这篇文章中讲道，古巴同苏联签订的协定，证明了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新型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工业强国总是力图以廉价购进不发达国家的原料，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正好相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总是援助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切第三次访问苏联，在苏联逗留了两个星期。他参加了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庆祝大会，会晤了苏联党政领导人，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纪念十月革命的庆祝大会。

十一月十一日，切出席了在友谊之家举行的苏古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这个协会主席的我国第一位宇宙航飞行员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首先做了报告，接着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当时的领导人哈拉尔多·马索拉致词，然后切发表讲话。这是他在苏联的最后一次讲话。现在我们将他的讲话全文援引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这句话切是用俄语讲的——作者）！

下面我改用西班牙语讲。你们是知道的，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一站到话筒面前，就很难叫他们离开话筒了。

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你们不必担心这一点。马索拉同志已经表达了我国人民的全部感情。而其余各位同志又尽可能把各种消息都告诉了我们，其中

还包括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而提前完成了计划的消息。

当然，提前完成计划的事是发生在这儿，发生在苏联。遗憾的是，我不能向你们报告同样的消息。然而将来我们也要为纪念十一月七日而超额完成计划，因为十一月七日这个日子是属于大家的。

同志们！古巴人民还是在不久之前才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我们要提高觉悟，培养热爱劳动的感情。不过，我国人民是熟悉历史的，是熟悉真正的历史的。我国人民知道榜样的力量。我国人民知道，苏联战士为了保卫自由、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流的血，可以汇成一条河流。我国人民也知道，苏联人的鲜血曾经洒在远离他们祖国的土地上，并且知道，也有苏联的军事专家在我国尽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我国人民同样还知道，今天有大量的苏联专家正在教我们从事和平建设。我国人民知道苏联专家到世界各地去是为了帮助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掌握最先进的技术，靠了这种技术就可以建设美好的未来。我国人民知道正是苏联奠定了征服宇宙的基础，在这方面作出了丰功伟绩。

熟悉历史并且知道榜样力量的我国人民，对于苏联人民过去所作出的牺牲始终怀着钦佩的心情，因此我国人民必然能够遵循你们的光辉榜样，百折不挠地保卫我们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同志们，古巴决不退却！

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光荣属于苏联(这句话切是用俄语讲的——作者)！

切在回国前夕，向苏联通讯社的一位记者谈了他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的总的感受，他说道：

“我有幸两次——一次是在一九六〇年，一次是现在——代表古巴来莫斯科参加十一月七日的庆祝大会。一九六〇年，当我们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时，我们所代表的那个国家正在同美国进行激烈的斗争，同时建国的方针还没有确定。

“而今年我们却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作为在美洲大陆上诞生的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的。我们看到我国的国名列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名中间，听到阅兵时演奏我国的军乐，这使我们感到欢欣鼓舞，就象不久前我们在哈瓦那欢迎用我国首都的名字命名的苏联新油船时一样高兴。苏联有一组巨轮是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名字命名的，这艘油船就是其中的一艘。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感人肺腑的事实，因为我们仅仅是在不久前才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

“我们在红场上感受到了苏联人民火一般的情谊和经久不衰的热情。

“我们参观了苏联的许多企业单位，看到了许多反映苏联工业巨大潜力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在利哈乔夫汽车厂就看到了一系列新型的自动化车间和新式的载重汽

车。”

切在回答古巴工业发展的前景如何和进一步加强古苏经济合作的前景如何这个问题时，说：

“我们和苏联的合作，在许多部门，首先在动力技术部门，正在顺利地进行着，苏联动力技术部门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的发电站大都是在苏联援助下建造的。我们将要建造适合古巴传统的、用石油作燃料的热电站，如果用泥炭或其他燃料证明是经济的话，一部分热电站将使用这一类燃料。

“现在冶金工业也已经成为古巴的一个重要工业部门。我们将建立一些新的炼钢企业。我们将要发展有色冶金工业。在我国奥连特省的北部有大量的红土矿。应该在那里建立一个联合冶金工厂，这个工厂将成为有色冶金工业的基地。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

“我们正在依靠苏联的经验，计划组织农业机械的生产。

“古巴对于发展化学、自动装置和电子学也是有兴趣的。但是这三个方面，目前对古巴来说，还是新事物，因此在制定计划以前，我们必须先积累一定的经验。

“不过在化学工业方面，我们已经获得了苏联同志们的具体帮助，明年他们将在努埃维塔斯市建造一个化肥厂。”

切祝贺苏古友好协会的成立，他深信苏古友好协会将有助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巩固，有助于文化交流以及其他接触。

切指出：“在协会成立的时候，苏联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的气氛本身，确实使我们感到由衷的激动，有那么多的个人和组织争先恐后地表示愿意参加协会，人们都是那么热烈地欢迎成立协会的消息。

“顺便提一提，我们也准备在古巴成立这样的协会，不过你们抢在我们前面了。”

切在结束谈话时说：“尽管我们之间建立友谊为时还不久，但是连结我们的纽带却是非常牢固的，是无法折断的。每次，当我们一踏上这个最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土地，就顿时感到友情的温暖。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要一而再地声明，古巴人民也同样满怀这种友情。当我们看到世界和平的保卫者和古巴的盟友——苏联人民所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时，我们就变得更加有力，更加充满信心。

“我们知道苏联人民是拥有能够保卫和平的东西的，这些东西我们在十一月七日阅兵式上已经看到了。”

当切在苏联的国土上作这次谈话的时候，他已经决定永远离开古巴了。

那么切在最后一次接见苏联记者时为什么要谈和平的创造性劳动呢，要谈和平呢？其实这里面没有丝毫矛盾。因为他在此之前所作的一切以及在此之后将要作的一切，总而言之，他一生所向往的，就是要在资本主义专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正义的、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使共产主义理想在世界各地，包括他的故乡拉丁美洲在内，取得胜利。

在这位革命的骑士重新跨上他的罗西南特之前，再

次来到苏联，以便最后一次向列宁墓低头致敬，这里面是包含着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的。他信仰列宁崇高的思想，甘愿为列宁的崇高思想的胜利而献出一个人的最宝贵的东西——生命……

### 3. 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员

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劳动成果、日益发展的生产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如果我们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量，如果我们没有各式各样的消费品，那么提高我们的觉悟也徒劳无益。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无法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无法依靠为此预先准备好的干部来实现的。

未来的社会只有在取得政权以后，在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才会显现出它的轮廓来，而这个社会的未来建设者的干部也只有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锻炼成长。

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即使仅仅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也寥寥无几，不仅如此，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对许多人来说，也还是格格不入的。然而，革命却超出了最热烈地拥护革命的人的最大胆的希望，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当一九六一年，国家掌握了一切生产资料的时候，必须将这些生产资料用于建设新社会这件事，就成为议事日程上急待解决的问题了。



由于古巴革命是在特殊条件下发展的，因此，革命先锋队——在革命过程中担任领导的革命派——起初并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问题的复杂就在于此。实际上，这个纲领是在革命过程中，在革命领导人的影响下形成的。自然，在这个问题上，就象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决定权首先属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而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之下，对革命的经济政策产生最大影响的第二号人物，无疑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他起初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以后又当工业部长，始终直接领导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工作。

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领导人，都力图通过根本的社会改造，使他们的祖国摆脱外国资本的桎梏；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杜绝历来的统治集团所固有的营私舞弊、贪得无厌和骄奢淫逸的现象；教育古巴人民；唤起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自信心以及和全世界被压迫者团结一致的感情；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仅革命的领导人，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工人和农民，也无不渴望发生这样的变化。

不消说，人人都懂得，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公正的、自由的新生活，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也就是伟大列宁在苏联奠定了基础的那种制度。因此，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一九六一年四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前夕，宣布革命已采取社会主义方针的时候，古巴人民都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的领袖。

然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是一回事，在一个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形式又是另一回事，何况是象古

巴这样一个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又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呢。要知道，是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这个国家在消费范围内，已经广泛使用先进技术的最新成就，例如最新式的汽车、电视机和电冰箱；而另一方面，却没有本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化学家和冶金工作者，没有本国的工业。革命前的古巴，仅仅是它的富强的邻国的原料附属国。古巴的原料——食糖、烟草、矿产品、水果、肉类——统统向美国出口，而美国则把成品输入这个岛国，富裕的古巴人穿戴的是美国服装、皮鞋、帽子、衬衣、领带；吃的是美国罐头；喝的是美国饮料和美国酒；睡的是美国床垫；用美国的电视机观看美国电视节目；用美国的汽车代步或运输；用美国的拖拉机耕耘古巴的土地；拖拉机如同汽车一样，都用的是美国汽油；连古巴人看的书基本上也是美国人写的；总之，没有一样不是美国货。

这就不得不产生这么一个问题：如果古巴取缔美货，如果美国停止购买古巴的食糖，停止向古巴出售石油、日用必需品和其他商品，古巴人是否经受得了，古巴有没有能力弥补由此而产生的短缺，向古巴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商品？何况还不能象在旧制度下那样，仅仅把商品供应一小撮享有特权的剥削者，而必须供应所有的劳动人民；必须建造必要的住房、学校、医院和托儿所，还必须办好千百桩大小事情。不然就根本不可能使古巴变为欣欣向荣的花园，就根本不可能使古巴人成为有文化的、有高度修养的、享有一切必需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

切深信，这一切都是可能办到的，如果革命古巴走工业化和计划经济的道路，并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而劳动人民本身又积极参加新社会的建设的话。切认为，劳动人民的热情，大公无私和自我牺牲精神是能够创造出奇迹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切深信，完成了英勇的革命的解放事业因而获得了苏联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盟友的古巴人民，是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的。他迫不及待地重又投入战斗，不过这一回他手里拿的不是枪杆，而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可以说，自革命胜利那天起，切就准备建设新社会了。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工业司成立后不久，就根据切的指示，设立了一个局，专门调查研究国家的原料资源和制定古巴工业基本部门的发展规划。这个局辖有电能和燃料处，冶金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处，制糖工业及其附属工业处，化学工业处，矿物原料处，农产品加工工业处等。

初步的计算表明，古巴完全可以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极其顺利地发展经济。然而，切是知道的，这个任务并不轻松，要完成这个任务，别的且不说，至少有两个困难要加以克服，首先，几乎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训练有素的干部，其次，美国统治集团方面必然会千方百计地不断进行破坏。他们将不惜人力和财力破坏古巴的“实验”，来证明社会主义在古巴是“行不通的”，是“不服美洲的水土的”。

切历来热心于土地改革，始终强调农民中间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可是归他领导的却不是古巴实施土改的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而是工业部。乍一看来，这似

乎是不合情理的。其实，这里面没有丝毫不合情理的地方，没有丝毫矛盾。要知道，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是一回事，建设新社会又是另一回事。在上一斗争中，农民作为人数最多的一个被压迫阶级，自然应该积极参加；可是建设新社会就又当别论了，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奠定这个社会的基础，因为单靠农业是无法保障劳动人民群众享有高度的生活水平的，没有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就不可想象。切就这个题目所作的多次讲话表明，他正是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的。早在一九六一年，切就起草了一个题为《工业化的各项任务》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在他逝世后发表的，他在这个文件中指出，古巴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工业生产，包括最大限度地发展大众日用品：食物和服装等等的生产以及制造大众日用品所必需的原料的生产。切自始至终坚持这个观点。一九六四年五月，切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就是通过生产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好的人民必需的商品来实现的。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概念，社会主义是同人民的福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切对于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了解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切正确地认为，将剥削者权力的杠杆——生产资料剥夺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切在实际解决这个问题时，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作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把所有的银行都收归了国有，使国家控制了全部的货币基金。由于把全部货币基金和金融基金以及银行业务统统集中到了国家手里，革命便得以控制工商企业的活动。后来根据切的建议，

又设立了外贸银行，于是一切外贸业务也改由国家控制。

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在实施土地改革，剥夺那些占有大量甘蔗种植园的大庄园主和外国垄断资本的权力的同时，国家开始没收巴蒂斯塔手下的官僚们用不义之财置办的企业。这些企业全部归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中切所领导的工业司管辖。应当指出，本来设立这个司的目的只是为了管理农业原料加工工业的，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收归国有的企业拨归它领导，它的职能也就越来越扩大。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美国政府断绝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和实际上的经济关系，公然采取以暴力颠覆古巴革命政府的方针，大肆开展对古巴的破坏活动，并且拼凑雇佣军准备入侵古巴。美国断绝同古巴的邦交和它对古巴的敌对活动，导致美国垄断组织在岛国的全部财产都被没收。在这一年的二月份，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工业司改组为工业部，同时成立了中央计划委员会。同年四月份发生了读者已经知道的雇佣军入侵吉隆滩的事件。在发生这起事件的前夕，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决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击溃雇佣军以后，便立即将全部大型的私营工商企业收归国有。到一九六二年底，这一国有化的过程就基本结束了。

切对于古巴社会主义建设最初几年内所出现的薄弱环节和所遇到的困难是完全了解的。他认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对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进行业务、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教育。他本人和他的副

手都是这方面的榜样,他们总是按时去听政治经济学、计划问题和其他学科的讲座的。

切第一个在古巴发起了社会主义竞赛。他所以认为这种竞赛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他认识到竞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方法,而且还在于竞赛制度有助于在古巴培育一代新人,培育新型的劳动者。这种新型的劳动者总是以集体利益为重,甘愿为创造社会财富而作出任何牺牲。

切认为职工在业余时间内自觉自愿从事义务劳动(其性质就象苏联的星期六和星期日义务劳动),和社会主义竞赛同样富有重大的意义。切认为,为了创造社会财富而从事的义务劳动,有助于提高革命觉悟,是社会主义新道德的组成部分。切还认为领导工作者参加劳动,尤其是参加砍甘蔗的劳动,也同样富有重大的意义。过去,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古巴的高级官吏历来都是在俱乐部和赌场里消磨他们的余暇的,他们的兴趣所在,十之八九都超不出酒色财气的范围。不消说,在这类“人民公仆”中间,决不会有一人想到去砍甘蔗的,这在他们看来,这岂不成了十九世纪的奴隶了。现在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甘蔗种植园和糖厂都是属于人民的。革命的官员是不带引号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他们参加砍甘蔗,参加体力劳动,有助于管理机关同农业劳动者打成一片。要知道,在旧制度下的古巴,官吏和公务员几乎被认为是不该从事任何劳动的特等人物。他们对劳动者态度倨傲,尽管他们没有一个不欺诈和搜刮劳动者,却以劳动者的恩人自居。而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则粉碎了这种殖民地的“传

统”。切在这方面也一贯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他参加各种劳动，例如砍甘蔗、为轮船卸货、清理工厂场地、建造住房等等。一九六四年八月，由于切在一个季度内就义务劳动达二百四十小时，他荣膺“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员”的证书。切最亲密的助手以及其他部委的工作人员，无不以切为他们的表率。

切要求领导工作者，不仅应当精通业务，知识渊博，有责任心，善于倾听部属的意见，而且要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生活上要极端俭朴，要大公无私。对于这样的领导工作者来说，最高的奖赏，不是那种会使他们脱离劳动人民群众的额外的物质待遇、名誉地位或者勋章、奖章之类的东西，而是履行革命义务的觉悟。

那么怎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进管理制度和计划制度，组织学习小组，举办训练班和专修学校，来提高工人的专业知识。切毫不动摇地认为这一切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起作用的。同时，他也承认，物质刺激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不过，他更注重的却是精神刺激。切认为，物质刺激会助长私有观念，劳动人民积极工作决不应该出于物质利益方面的打算，而应该出于竭力要增加公共财富的自觉性。

切是懂得的，所谓精神刺激并不仅仅限于发发奖状以及授予突击队员和先进生产者的称号，而且还有其他的鼓励形式，例如选拔工人去学习，学习结束后给予提级，再如发展入党，授予共产党员的称号。在古巴，根据规定，只有一贯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参加义务劳动和竞

赛，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并加入了“保卫革命委员会”的人，才能考虑吸收他入党。

关于精神刺激和物质刺激的问题，工业部曾不止一次开会讨论过。有一回，切向各企业的经理指出，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中等阶层，尚且都能不辞辛劳地忘我工作，何况工人阶级呢，切要他的同事们相信，工人阶级是一定能表现出同样的觉悟来的。

切曾多次作报告，歌颂古巴独立斗争中的两位战士——诗人何塞·马蒂和将军安东尼奥·马塞奥，号召古巴人要将这两位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并为人们献出了生命的爱国主义者作为自己的榜样。

如果切在阿根廷也具有他在古巴那样的地位的话，他大概会举出他的著名的同乡何塞·因赫涅罗斯为例的。因赫涅罗斯是哲学家和政论家，拥护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遐迩闻名的《精神力量》一书的作者。这部书自一九二五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问世后，曾不止一次再版过。因赫涅罗斯认为精神刺激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思想同切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应该指出，切值得称道的是，他一方面坚持精神刺激比物质刺激优越，一方面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承认这是他的“主观”见解，需要得到实践的证实。切写道，如果实践证明精神刺激的政策妨碍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就坚决放弃精神刺激，重新采用物质刺激这个众所周知的方法。

古巴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主客观困难，例如：工业部的领导干部和各工厂的新经理



缺乏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他们的业务知识并不总是同他们对革命的耿耿忠心相协调的）；干部调动频繁；计划工作中有错误，而且在初期缺乏远景规划，也没有制定财政纪律；本位主义；外国供应的设备和原料时常中断；企业中常有旷工现象；经济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玩忽职守。

切深信，这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深信古巴的革命者和劳动人民一定能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这门科学，尽管他也明白，这个任务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政权以后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在工业部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各企业负责人的会议上，切对于部分领导人的错误、缺点和失策，总是耐心地加以分析，指出克服和纠正的方法，并以身作则地教育他们多作自我批评。

切反复地向他的同事们阐明经济核算的意义，号召他们维护国家利益，节约资金，不要浪费人民的财产。

切对于自己总是毫不留情，他总是首先对自己提出最严格的要求。切曾一再作自我批评，批评自己的性格喜怒无常，批评自己不善于在一大堆问题中选出最为重要的、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处理，批评自己并不总是能够对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的检查。

切批评同事们的缺点时，往往很尖锐，一针见血，而有过失的人却并不见怪，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认为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是没有道理的，因而进行申辩。切并不单单批评几句就了事，他总是帮助人家弄清楚产生缺点的原因，并找出克服缺点的方法。

由他主持的大小会议总是笼罩着真正革命的民主气氛。任何一个出席会议的人，都可以不同意“指挥官”——格瓦拉少校——的意见，都可以同他争论，而无须担心会引起他的不快。不但如此，他还主动诱导出席会议的人同他争论，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观点阐述得更清楚，就可以把理由讲得更充分。

切本人以及他的副手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根据他的指示，都定期深入企业，检查工作，了解它们的需要和困难，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帮助。

切经常到各个企业去义务劳动，通过劳动跟劳动人民进行交往，同他们无拘无束地谈心，回答他们的问题。同工人们的接触，使切本人也得到不少好处。

切最受不了官场中拍马奉承那一套。假使有人端出一杯牛奶，或者端出一盘他爱吃的煎牛排来款待他，却并不同样款待其他在场的人，那么他就会客客气气地加以拒绝。

切十分重视宣传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的知识，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者向劳动人民发表演说，阐明经济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根据他的建议，创办了《我国的工业》和《工艺杂志》两个刊物。这两个刊物的发行量都很大。

切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以及如何将这些发明应用到国民经济中去，也十分关心。他一直向往古巴能够掌握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向往在古巴建造原子能发电厂。他的热情感染了他周围的人，在他们中间，信心不足、悲观失望或者怨天尤人之类的情绪是没有立足之地

的。

那么切领导古巴工业，成效怎么样呢？切用整整四年的时间，领导了工业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期间，古巴彻底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劳动人民不再遭受剥削。国家实行了计划经济。消除了革命前古巴劳动人民深受其苦的经常性的失业现象。劳动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成为先进生产者。美帝国主义者一心指望古巴的“实验”以失败告终，一心指望古巴工人没有美帝国主义者的参与就办不成工业。可是古巴工人使他们的指望落空了，古巴的社会主义工业，同形形色色的美国“基金会”中的古巴问题专家的阴暗的预测相反，从理想变成了现实。在这件事情上，古巴共产党是有丰功伟绩的。其中自然也有切的一份功劳，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完成了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轨道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的复杂而艰巨的过渡。

切认为革命古巴在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他在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国际事务》季刊一九六四年十月号上）指出，如果不是由于缺乏经验和知识而犯了一些严重错误的话，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的。其中第一个错误便是在推行农业的多样化时考虑欠周。

按理应当选择最合适的地区来单独耕种新的农作物，可是没有这样做，却是在每一个甘蔗种植园内划出一块地段来种植，结果给制糖业带来了重大损失。到了一九六三年年初，这个缺点才得到纠正。

另一个错误是，古巴政府努力要摆脱由于美国的经

济封锁而形成的困境,便从国外进口大批机器,有时甚至输入成套设备,其中许多还是用外汇购买的,然而这些机器和成套设备却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效果。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说,在进口这些成套设备时,没有考虑到古巴缺乏这些工厂所需的原料品种,缺乏备用零件和本国专家。在某些情况下,从国外进口的机床和生产设备都是老式的,于是产品价格昂贵,质量低劣。

尽管存在着这些缺点和困难,一九六三年古巴工业生产水平同上一年比较,增长了百分之六。这无疑是一大成就。

但是切认为,主要的倒不是经济上取得了成就,而是古巴出现了忠于革命理想并按照革命道德标准行事的新人。一九六五年三月,切在离开古巴的前夕,写信给乌拉圭《前进》周刊的编辑,说:“这种新人的面貌还没有最后定型,因为它的形成过程是同新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并行不悖的。有种人受了错误的教育走上了自私自利的道路,关于这种人就不必去谈他们了,可是世上竟还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虽然置身于整个社会都在前进的环境之中,却偏偏要为他们个人另辟蹊径,他们虽然也同情群众,却总是脱离群众。重要的是,人们日益明确地意识到自己从事公益劳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还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动力所起的作用。”

这些人早已不是从前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陷入了悲惨的生活,而又不知道也看不到出路何在的“群氓”了。革命的狂飙粉碎了资本主义制度,从而撕下了蒙住劳动人民眼睛的黑布。切在上面所提到的那封信中写道:现

在“他们已经不用孤零零地踏着荒僻的小径去寻求他们遥远的目标了。他们正跟随着先锋队，也就是跟随着党，跟随着先进的工人，跟随着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的先进的人向前迈进。走在最前列的人凝望着未来，憧憬着未来将要带来的美好事物，然而他们并不把未来的美景视为私有。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奖赏莫过于一个由新型的性格的人们组成的新社会，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的新社会。”

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者方面针对自由之岛的敌对行动，那么革命的成就也许会更加辉煌。

要知道从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革命胜利那天起，美国统治集团没有片刻停止过对古巴的侵略活动。美国统治集团，为了扼杀古巴革命，为了使古巴的“实验”失败，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在美洲土地上是“行不通的”，就策动怠工、从事间谍活动、组织空袭、对居民点发动海盗式的袭击、进行恐怖活动、劫持飞机、密谋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革命领袖、建立专事破坏的匪帮组织、发动雇佣军入侵、实行经济封锁，乃至在拉丁美洲建立包围古巴的防疫线。就这一点来说，古巴确实同越南一样。虽然古巴并未成为美国直接侵略的牺牲品，如果不把雇佣军入侵吉隆滩算在内的话。但是，自从革命古巴存在以来，美国始终不分昼夜地对古巴进行着秘密战争，直到今天仍然在进行着。

切本来是一名医生，后来成了威名赫赫的游击队指挥员，然而他最爱的却是和平劳动。假使华盛顿的枭鹰们并不威胁要消灭古巴这个自由的社会的话，那么切在这

个自由的社会中将只是从事建设、生产人民所必需的商品和发展科学技术。

然而在古巴的现实情况下，切这位工业部长不仅仅要关心工业部的计划和任务，而且还要关心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所作的斗争直接有关的种种问题……

#### 4.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我们被推向斗争，因此除了准备斗争，下决心开始战斗之外，没有其他出路。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艾森豪威尔总统以及他的两个幕后策划人杜勒斯兄弟（一个是主持国务院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头子艾伦·杜勒斯）千方百计地想通过组织怠工、破坏活动和雇佣军入侵来扼杀革命古巴，他们为一九六一年四月发动的那次入侵作了狂热的准备，可是他们的竞争者约翰·肯尼迪在这一点上却持有与他们不完全相同的看法。

肯尼迪与艾森豪威尔以及杜勒斯兄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美国不仅可以采用暴力手段，而且还可以采用缓和拉美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办法，来阻止拉美革命的发展；这种办法就是扩大投资和实行一系列加速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这个主意，按照乌拉圭共产党总书记罗德内·阿里斯门迪一针见血的说法，就叫

做给反革命戴上一顶红帽子。美国成立所谓“争取进步联盟”这个组织，就是打的这个主意。美帝国主义的吹鼓手声称，这个组织必将开创华盛顿和拉丁美洲关系史上的新纪元。这还用说吗！要知道美国在此以前，一直是敲骨吸髓地榨取其南部的各个邻邦的，可是如今却答应通过“争取进步联盟”向这些邻邦提供为数达两百亿美元（每年提供二十亿）的资金，以供这些国家开发之用。这即使对山姆大叔这样的阔人来说也是一笔巨款。仅仅在一年半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美洲国家会议上提出，有必要向美洲的这些国家提供三百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发展。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的这个数字大得近乎荒谬。可是今天美国却自愿慷慨解囊，尽管不是三百亿美元，却也有两百亿之多，只要能够拦阻人民的反帝革命就行。除此而外，美国佬还暗中指望，投资这么多美元以后，可以扩大美国商品在拉丁美洲的市场，为垄断组织开辟新的生财之道。不难想象“争取进步联盟”的发明者见到他们所发明的这个组织既可以替他们反对社会革命，又可以让他们牟取暴利，一定会认为自己是多么精明，多么工于心计。但是我们将看到，不消多久，生活就会迫使这些阴险的计划作出一定的变动，而这些变动是不符合华尔街财阀的意愿的。

肯尼迪总统在大选中获胜并迁进白宫之后，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召见拉丁美洲各国大使，向他们宣布了他的政府准备成立“争取进步联盟”的各项计划。肯尼迪呼吁西半球各国政府和人民与美国同心协力地进行这

种“无论就规模之宏大和目的之崇高来说都是无可比拟的广泛努力,以便满足美洲各国人民在住房、工作、土地、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基本要求”。有位记者在评论肯尼迪总统所开的这些支票时,挖苦地指出,现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获得美国所赐予的这些好处时,大可以这么说:“菲德尔,谢谢你,多亏你闹了革命,要不我们是拿不到美国的一个子儿的。”

肯尼迪总统在公开的情况下把橄榄枝递给拉丁美洲,可是在暗地里却继续加紧执行还是由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兄弟所制定的拼凑雇佣军入侵古巴的计划。肯尼迪认为,如果能够扼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真革命,那么由他所发起的、挂着“争取进步联盟”这块招牌的假革命就能赢得胜利。

古巴政府虽然对肯尼迪政府的帝国主义本质不存丝毫幻想,但是仍然希望新总统比他的前任明智些,拒绝执行预定的冒险计划。古巴政府无意加剧同美国新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古巴政府唯一的希望是:美国尊重古巴的主权,不干涉古巴的内政。在肯尼迪就任总统的同一天,古巴根据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命令,复员了部分武装力量。这个和解的姿态并没有得到反应。肯尼迪总统同他的前任一样,竭力要颠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一点上,他是决不会同意作丝毫让步的。

拉丁美洲发生的数十次武装干涉和政变,都是美国统治者一手策划的。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历来都得心应手,历来都能逍遥法外,不受惩罚。唯独在古巴,他们遭到了可耻的惨败。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美国雇佣



军入侵吉隆滩，古巴人以急风暴雨一般的炮火迎击他们。经过三天激战，一千二百名侥幸未死的喽罗向古巴军队投降了。肯尼迪想一举扼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的企图，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

于是肯尼迪不得不把特务头子艾伦·杜勒斯撤职，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派遣特务和破坏分子潜入自由之岛，但是美国总统除了改弦易辙，成立“争取进步联盟”以外，已别无他途。因此便决定于同年八月在乌拉圭海滨疗养区埃斯特角召开美洲国家组织的泛美社会和经济理事会特别会议，以便产生“争取进步联盟”这个机构。

必须着重指出，即使发生了雇佣军入侵的事件，古巴政府仍然不想加剧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古巴政府希望吉隆滩的教训能促使肯尼迪对革命古巴采取比较清醒的态度。遵照这样的方针，古巴政府决定接受邀请，派遣代表团出席在埃斯特角举行的会议。古巴工业部部长、古巴经济的实际领导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

切将出席会议，成了轰动拉丁美洲各国的头条新闻。这是他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第一次在美洲大陆露面，而且丝毫也没有浪子回头的样子。数以千计的劳动人民聚集在蒙得维的亚附近的“卡拉斯科”机场热烈欢迎切。从机场到埃斯特角，沿途的乌拉圭人都向切鼓掌致敬。会议参加者中间唯有切一个人受到居民这么热忱的接待。人民通过切向古巴革命致敬。美国代表团团长、财政部长、大银行家、亿万富翁狄龙飞抵当地时，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团也是这样，没有什

么人去注意他们。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切身上，集中在古巴革命的这位代表身上，正是古巴革命的胜利促成了埃斯特角会议的召开。

切飞抵乌拉圭时，一如往常，穿一身古巴起义军的草绿色少校军服，出席会议时，也仍然穿着这套军服。他一到会就声明，古巴代表团不仅不想阻挠会议的工作，而且相反，将同其他代表团通力合作，一起来寻找发展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和保障这些国家经济独立的最有效的途径。古巴代表团为了表明自己的确具有诚意起见，就会议议程有关的大量问题，提出了二十九项决议草案，交大会审核。

切在一篇发表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的、题为《古巴和“肯尼迪计划”》的文章中指出，古巴的二十九项提案大部分是无法简单地予以否决的，因为这些提案都是为了促进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一些国家的代表便不得不在各个委员会工作过程中，仓猝制定反提案，然后把他们的反提案并进古巴的提案，用这样的方法，阉割古巴提案的实质。不过，古巴代表团在会议期间，毕竟还是有所成就的：有些代表发言的口气变了，已经和他们过去在类似情况下所惯用的那种调子不同了。

切指出，会上巴西、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三国的代表团，采取了同情古巴的态度。切着重地强调了玻利维亚的态度，当时玻利维亚总统仍然由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担任。切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讲道：玻利维亚“这个几乎位在美洲大陆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国家，受尽了四邻各国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摧残，最后

几乎被我们各国的共同压迫者北美帝国主义所扼杀。玻利维亚的基本居民是矿工和农民，他们处在残酷剥削的重压之下。”

切对玻利维亚代表团在埃斯特角的活动则作了如下的评价：“假使撇开古巴代表团的计划不谈，那么在各国代表团中，正是玻利维亚代表团提出了最具体的经济计划，它所采取的立场，大体上说来，是相当积极的。于是有些人就用一种特殊的语言，也就是在这类会议上所惯用的口是心非的语言，把玻利维亚的代表们称作为‘古巴的叔伯兄弟’。”

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切和古巴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埃斯特角会议期间同他们的玻利维亚“叔伯兄弟”的接触，对于切后来决定选择玻利维亚作为在拉丁美洲开展游击运动的桥头堡，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切曾经先后两次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两次发言的语气都是极其温和的。尽管这样，切在发言中仍然揭露了美国统治集团的侵略行径，揭露它们妄图利用“争取进步联盟”从政治上孤立古巴，因为只有那些追随华盛顿的反古巴方针的政府，才有可能得到成百万美元。

切还论证说，“争取进步联盟”将要开发的无不都是国民经济的次要部门，目的并不是想使拉丁美洲能够自由一些，而是要使拉丁美洲更加依附于美国垄断资本。同时，切还指出，“争取进步联盟”答应向参加国提供的发展机会是有限的，并且是极其可疑的，但是即使这样，古巴政府也丝毫不想奉劝拉丁美洲各国不要去利用这些机会。

切在八月九日的全体会议上发言说：“古巴代表团开诚布公地向你们声明，我们希望在不变我国性质的情况下，继续留在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家庭中，和你们共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用和我们相同的速度发展，可是如果你们采取另一种发展速度，我们也不反对。我们唯一的要求是我们各国国境的不可侵犯性能够得到保障。”

然后，切自然还谈到，假使不普遍实施社会改造的话，其他国家就会学习古巴的榜样，那时菲德尔·卡斯特罗所讲的“安第斯山脉的科迪勒拉山将变成美洲的马埃斯特腊山”这句预言就会应验。

切在八月十六日闭幕会议上的发言同样是相当温和的。他在前面提到的、登载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概述了他这次发言的内容：

“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表决所有的文件时，古巴代表团都投了弃权票，并且发表声明，阐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声明说，古巴不同意‘金元’政策，不同意企业家自由活动的原则，更不同意在会议最后通过的文件中对于使我们蒙受无数灾难的元凶——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对于一系列的侵略罪行，竟不作只字的谴责。不仅如此，我们代表团曾多次就古巴是否可以参加‘争取进步联盟’这件事提出询问，可是对方却用沉默作为回答，这种沉默我们只能将其解释为拒绝。非常清楚，我们不可能参加一个拒绝我国人民参加的联盟。”

切也指出了会议的一份总结性文件还有可取的地方。这份文件有一段就提到，在拉丁美洲，除了允许“企

业家自由活动”的国家以外，也就是说除了资产阶级国家以外，还存在不允许“企业家自由活动”的国家。

切在登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中讲道：“古巴代表团曾就这段文字发表声明说，‘这是和平共处思想的胜利，表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是有可能共处的。古巴代表团指出，这段文字的通过，是会议的积极成果之一。’切接着谈到，在此之后，却有一名美国代表上台发言，激烈反对古巴代表团的这一论点，声称他们不承认古巴政府。

即使如此，古巴方面仍然认为不妨再往前走一步。于是切会见了美国代表团的一名团员，约翰·肯尼迪的亲信，二十八岁的理查德·古德温。据古德温讲，切向他提出，假使美国不再对古巴采取敌对行动，不再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古巴可以将革命所没收的美国人的产业，折价偿还给业主，同时减少在拉丁美洲各国的革命宣传。切本人在埃斯特角会议闭幕后，在哈瓦那发表电视演说时，也谈到他曾经通知古德温说：古巴愿意就调整古美之间的关系同美国进行谈判，古巴对于同美国斗争并无兴趣，虽然它并不害怕同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斗争。古巴希望留在拉丁美洲的体系之内，并认为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它同美洲大陆是联结在一起的。切对古德温说：“我们要求，承认我国有权属于拉丁美洲，换句话说，承认我国有权在保持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情况下属于美洲国家组织，同时我们要求承认我国完全有权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建立友谊。”

古德温只限于听对方讲，并没有回答，他答应把对方

讲的话转告肯尼迪总统。

切和古德温的会晤，引起了拉丁美洲报刊的各种各样议论。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次会晤为美国和古巴之间达成某种“临时协定”开辟了道路。但事实上，美国根本就无意同古巴达成任何合情合理的协议。美国准备“宽恕”古巴，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古巴必须拒绝苏联的援助，必须采取反苏的立场，说得确切一些，古巴必须向美国佬屈膝求饶。

阿根廷总统阿图罗·弗朗迪西所以和切会谈，就是要在这方面充当说客。还在埃斯特角会议刚刚召开的时候，切就接到了弗朗迪西的私人邀请，请切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同他会晤。弗朗迪西在阿根廷政界中是个极其矛盾的人物。多年来他一直站在进步的立场上。但是，他当选总统以后，就屈服于反动军人集团和美国大使馆的压力，不但没有实现他所应诺的改革，反而迫害共产党人，纵容美国垄断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向阿根廷的经济渗透。他甚至同革命古巴断绝了邦交。尽管这样，反动军人集团却仍然不信任弗朗迪西，认为他过份“左”倾。

八月十八日，切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同弗朗迪西会晤。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总共只逗留了几个小时。切同弗朗迪西会晤这件事是严加保密的。阿根廷外交部长知道后，立即辞职表示抗议，一些反动的将领也都勃然大怒。因此，切如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再多耽搁一些时候，很可能被他们逮捕，连弗朗迪西本人也可能同切一起锒铛入狱。

这种情况，无论弗朗迪西还是切事先都早已估计到

了,然而,两人还是决定冒险会晤。弗朗迪西指望能够说服他的赫赫有名的同胞设法使古巴脱离“苏联集团”,回到拉丁美洲的羊圈里来。假使弗朗迪西能够把革命古巴拉到美国方面来,那么华盛顿为了感谢他,就会让他稳坐在总统的宝座上。这一着棋风险虽大,却有利可图。于是弗朗迪西就甘愿冒这场风险了。

切接受弗朗迪西的邀请完全出于不同的意图。切不仅不回避而且愿意同拉丁美洲各种色彩的活动家们接触。他在乌拉圭时就曾受到艾多总统的亲切接待。因为这样的接触可以破坏美国对革命古巴设置防疫线的政策。除此之外,不用说,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自从十年前他离开祖国,经玻利维亚去委内瑞拉投奔米阿尔以来,他的祖国是否发生了很多变化。

切使弗朗迪西的希望落了空。切对弗朗迪西讲的也就是他对古德温讲的那些话。弗朗迪西以著名的阿根廷烤肉款待了他的客人。然后两人喝了马黛茶,就分道扬镳了。切在赴机场途中顺便去探望了他的正在患重病的姑母贝亚特里斯。当天傍晚,他就回到了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

次日,切离开乌拉圭回到哈瓦那。途中他又会见了一位总统,就是当年他在埃及结识的老朋友雅尼奥·夸德罗斯。夸德罗斯领导着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他和弗朗迪西不同,在与美国的关系上表现了独立自主的态度,同时毫不掩饰对革命古巴的同情,从而激怒了巴西的反动派,使华盛顿的统治集团非常不满。夸德罗斯为了故意气气他们,特地在巴西新都隆重地欢迎了切,并授予切以

巴西最高勋章“南十字座”勋章。

埃斯特角会议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这次会议表明，即使在拉丁美洲各国的统治集团中间，也有许多人拒绝对华盛顿俯首帖耳，他们不但同情甚至钦佩革命的古巴。至于美国方面则照旧给古巴制造重重困难，力图将古巴“排挤”出去。

过了一段时间，美洲大陆上便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对民族解放力量和革命古巴不利的局势。弗朗迪西总统被军人推翻，夸德罗斯总统顶不住反动派的压力，自行辞职。一九六二年初，古巴被排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反对排除古巴的只有乌拉圭、玻利维亚、智利和墨西哥等四国。但是不久以后，即使这几个国家，除了墨西哥以外，也都同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一切都是华盛顿施加压力的结果，华盛顿威胁这几个国家，说如果再一味任性下去，它们将失去“争取进步联盟”本来要向它们提供的亿万美元。当时谁也不曾料到，起先说是亿万美元，结果却变成了少得可怜的残羹冷炙，而所谓的“争取进步联盟”就象美国在此之前所提出的形形色色改革、援助和发展拉丁美洲各国的计划一样，无非是骗局而已，根本不可能兑现。

一九六二年的加勒比海危机，表明美国不仅无意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调整它同古巴的关系，恰恰相反，只要能彻底消灭古巴革命，它甚至不惜冒发动世界核冲突的风险。“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这句口号，就是自由之岛的劳动人民以及他们在全世界的朋友，针对美帝国主义者这种罪恶计划所作出的回答。



切清醒地估计了这一切变化的意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肯尼迪那个时候，看来还是有一些关于和平共处的合情合理的想法的，可是如今执政的那些政治集团对于和平共处这个问题的态度却更加可疑了。他们正如福斯特·杜勒斯所鼓吹的那样，只要能达到目的，甘冒战争的风险。在现阶段，他们要对社会主义加以抑制的最明显的目标是南越和古巴。在这两个地点，可能爆发火星，从而酿成世界性的火灾。”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恬不知耻地声称，期待美国同革命古巴之间的关系会有所好转，是毫无根据的，据他讲，古巴威胁着西半球的安全。腊斯克宣称，美国政府认为，只有打倒了卡斯特罗的政权，这种威胁才会消除。

腊斯克的这个声明，证实了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以后，美国统治集团对付革命古巴的方针重新强硬起来，坚决拒绝作出任何和解的姿态。华盛顿在拉丁美洲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阻止“第二个古巴”的出现。

古巴领导者，当然，也可以如常言所说的，咬紧牙关，忍辱负重，听任大有吞没他们之势的美国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浊流朝他们滚滚涌来。然而，他们真这样做的话，就不成其为曾经第一个在美洲土地上完成了真正的反帝人民革命，第一个在西半球高举社会主义胜利旗帜的战士了。至于坐等风平浪静，坐待美国有朝一日转怒为喜，也同样是不智的。要知道美国侵略者会把这种态度当作是软弱的表现，而变本加厉地加强其对自由之岛的压力。

不，革命古巴决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示弱的表现。它把希望寄托在将来拉丁美洲的反帝革命上，这场革命一定会削弱美国统治集团方面所施加的压力。

但是，把希望寄托在美洲大陆的革命上，是否有根据呢？有的，古巴革命获得胜利这件事本身就预示了美洲大陆的革命必将爆发。虽然革命仅仅在古巴取得胜利，但是革命的热风却吹到了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吹到了玻利维亚的高原，吹到了亚马孙河畔的热带丛林，吹到了巴西东北部烈日炎炎的辽阔平原，吹到了委内瑞拉的草原，也吹到了从火地岛到墨西哥北部边境的大小城镇乡村。

罗德内·阿里斯门迪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取得政权后不久写道：“古巴的胜利，对我们整个大陆说来，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个胜利把所有的矛盾集中到一起，使它们趋于激化，于是拉丁美洲的巨腹中就此孕育着民族解放革命。

“我们革命的一致性是由我们各民族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共同性所决定的（在若干地区，这种共同性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种共同性使各个国家的解放运动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人民对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从来不袖手旁观。危地马拉的经验（一九五四年）证明了这一点，而现在古巴又作出了榜样。古巴人说得对：‘现在革命讲的是西班牙语。’”

如今大家都看到，革命之风吹遍了拉丁美洲。研究这个地区的美国著名专家特德·舒尔茨，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革命风暴。拉丁美洲的今天和

明天》。他在这本书里写道：“革命的主旋律在若干地区犹如号角一般，发出声声召唤，而在另一些地区目前还只是隐约可闻，几乎听不真切。然而不论在哪个地区，这种革命的主旋律，在这决定性的十年内，必将成为拉丁美洲贫困无告，辗转不安，但是却在迅速成长的亿万群众中间的压倒一切的旋律。”

舒尔茨指出，拉丁美洲的革命洪流，目前还没有采取古巴那样咄咄逼人的气势来冲击美国。在许多场合下，它还是比较隐蔽的，是缓缓地向前流去的，它所采取的形式无非是激烈的民族主义、中立主义，无非是反对北美的经济政治势力以及反对这种势力的干涉而已。但是无论采取什么形式，这股革命洪流是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最有力的挑战。

连教会神职人员也都在谈论社会革命了。哥伦比亚神父卡米洛·托雷斯同教会断绝了关系，参加了游击队，在同政府军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不少“造反的”教会神职人员。

革命古巴在美国不停地侵略它的情况下，能不能对西半球革命的进程采取不闻不问的旁观态度呢？当然不能！古巴已经无从指望和平解决同美帝之间的争端了，它在失望之余，得出一个结论，唯有在美洲大陆开展反帝运动，才能制止在古巴四岸胡作非为的美国宪兵。

置身于这种环境的切，一方面整个身心都被和平劳动，也就是说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抓住了，而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又无法遏制地吸引着他。这就使他必须在两者中间作出抉择。既然当年他为了追求革

命，从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不远千里来到了马埃斯特腊山，那么如今他怎么有权利留在自由之岛上呢？在他看来，作出抉择，并不困难，他决不会举棋不定。他只可能选择前线，只可能选择从来没有人走过、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的最危险、最崎岖的道路，那就是拉丁美洲革命的道路。他在作出选择以后，顿时感到部长的称号对他来说是个累赘。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重新跨上他那革命的罗西南特，奔向征途；他已经急不可耐地想使他的双肩重新尝到那盛满子弹、药品和书籍的沉甸甸的背包的重量，想重新尝到自动步枪的皮带勒痛他肩膀的滋味。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自己躺在营火旁边，被白蛉子叮着，由于哮喘病发作而呼吸困难，但是，他感到很幸福，因为在他身旁的都是拉丁美洲被排斥的人：拉丁美洲的农民、印第安人和黑人；他怀着一种男性的爱——严肃而腼腆的爱，热爱着这些人。

这种爱是双方面的。他们也爱他。他们爱他，是因为他治愈了他们子女的疾病，帮助了他们的妻子和母亲，是因为他英勇而善良。同时他们又怜惜他，因为在他们看来，他是那么孱弱，长年累月由于哮喘病而透不过气来，他是那么英俊，却到他们这里来，跟他们同甘共苦，为他们的幸福和自由而战斗，并且，如果命里注定的话，他将同他们一起战死在密林当中的一块荒芜的草地上，或者牺牲在一条无名的山涧旁。至少，当年在马埃斯特腊山那些美好的日子里就是这样的……

然而，在他重新跨上他理想的罗西南特，登上征途之前，他还必须执行他的政府和党所托付给他的各种使命

和任务。他还要不止一次出席国际会议，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同永无履足的金元帝国作斗争。他还将号召各国人民声援英勇的越南。他还将视察工厂、作坊、建筑工地，号召工人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努力学习，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和义务劳动。他就这样，将一直忙到待在古巴的最后一天。在此期间，只要有闲暇，他照样去砍甘蔗。而每天拂晓之前，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没有同事和客人来访问他，他就利用片刻的清静，不是看书，就是写诗或者憧憬着拉丁美洲光明的未来：那时拉丁美洲的儿童们再也不会成为饿殍，拉丁美洲美丽的妇女们再也不会由于力不胜任的劳动、疾病和贫穷而未老先衰……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初，切作为出席第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古巴代表团团长飞抵纽约。这是他第二次来到美国。第一次是在十二年前，他在迈阿密作了短期的逗留。那时在美国佬的土地上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可是今天他却成为当地报刊和无线电台及电视台评论员注意的中心。要知道他现在代表古巴革命政府。古巴面对美国的侵略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精神，博得了全世界的尊敬和钦佩。

十二月十一日，切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谴责了美国统治集团在世界各地的侵略行径。切在联合国的讲台上，控告美国继续对革命古巴不宣而战。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在中美洲各国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各个秘密军事基地训练雇佣军。由美国统治集团所策划的反对古巴的破坏活动和特务活动，单单在一九六四年的十一

个月里边，就有一千三百二十三起之多。

切说道：“我们希望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宣布，谁为和平而斗争，我们就是他的拥护者。我们声明，我们虽然是马列主义者，但我们认为自己是不结盟国家中的一员。因为不结盟国家，就象我们一样，是反帝的。我们希望和平，希望为我国人民建设美好的生活，所以不管美国佬怎样挑衅，我们始终竭力克制自己。然而我们也知道，美国佬的政府是怎样看待我们这种态度的，它千方百计地要迫使我们为了和平付出昂贵的代价。我们现在可以回答他们，想要我国付出超出我国尊严的代价，那是办不到的。”

美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针对切的讲话，作了发言，反诬切犯有所谓“共产主义”的罪行，还诬蔑切想把美国的封锁作为理由，为古巴经济面临的困境找寻遁辞。切驳斥史蒂文森说：“我无意在这里重复美国对古巴进行经济侵略的那一长段历史。我只想指出，尽管美国对我国进行这种侵略，可是我国依靠社会主义各国，首先是苏联的兄弟般的援助，正在克服，并且将继续克服我们的困难。虽然经济封锁对我们有害，但是却无法阻止我们的运动向前发展。不管我们的敌人反应如何，反正我们就是要叫他们稍微头痛头痛，无论是在这届联合国大会上也好，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好，我们就是要发言，就是要讲出事实的真相，而且还要指名道姓，连美国代表也无法例外，我们就是要指出：他们是妄图称霸世界的宪兵。”

那些倾听着切讲话的人，即使想象力极其丰富，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切今后将会做些什么，也无论如何料想

不到正是切这个人将要在拉丁美洲解放运动史上写下最悲壮的一页。甚至连他本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对于他将要去从事和完成的事业也未必胸有成竹。但是有一点，他在当时就已经十分清楚，并且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是罗西南特早已备好鞍鞴，只等主人回到它身边，便立刻启程重新去作长途旅行，以便把摆脱贫穷和一切不公正的待遇的希望播送到饱经忧患、备受压迫的人们中间去……

## 四、《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 1. 神秘的失踪

开展游击运动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是绝对的保密。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四日，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国外作了长时间访问之后，回到了哈瓦那。他这次出国历时达三个多月。他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离开哈瓦那飞抵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常会的。在纽约一共逗留了八天。十二月十七日，他离开美国，取道加拿大和爱尔兰，飞至阿尔及利亚。然后去马里、刚果（布拉柴维尔）、几内亚、加纳和达荷美等五国访问。此后，他返回阿尔及利亚，经由巴黎去坦桑尼亚。在访问了坦桑尼亚以后，他又飞往开罗访问。从开罗他又再度去阿尔及利亚访问，然后又重返开罗。最后由开罗飞返哈瓦那。在哈瓦那的“兰乔博耶罗斯”机场迎接他的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活动家，此外还有他妻子阿莱达·马尔奇。

切这次出国访问是由当时主持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联络工作的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陪同进行的。



古巴的报刊曾广为报导了这次访问。切出国期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美国发表了电视讲话，接见了美国记者，在阿尔及尔参加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第二届经济讨论会，在其他非洲国家，会见了官方人士、社会活动家和记者。

切在非洲的这些国家内，逗留了这么长的时间，不消说，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那么是什么目的呢？他竭力想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们直接接触，以便把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同亚洲及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这些接触对于此后得以在哈瓦那召开三大洲会议（一九六六年一月三日至六日），得以建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团结组织是起了作用的。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的总部就设在古巴的首都。

切花了这么多时间去熟悉非洲的这些国家，必然使他更其坚信游击战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行之有效的的手段。而阿尔及利亚无疑首先提供了这方面的光辉榜样：阿尔及利亚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战士们运用游击战的手段，终于迫使法国撤离了这个国家，就如当年越南爱国者以同样的手段迫使同一个法国撤出印度支那一样。

前比属刚果的形势看来也大有希望，自从帕特里斯·卢蒙巴惨遭杀害以后，他的拥护者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游击活动。

非洲各葡属殖民地的游击战争也如火如荼。各处都涌现出向殖民主义宣战的新的领袖人物。他们组织了政党，发起了运动，建立了游击队乃至完整的军队。其中有

些人推翻了殖民主义者的傀儡，取得了政权，另一些人却失败了。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人当中，盛行着这么一种看法，认为只要有了钱、武器和若干勇士，就可以取得胜利，赢得独立，击败帝国主义。他们以为只消开始行动，向敌人打响第一枪，运动马上就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把殖民主义者埋葬掉。他们渴望战斗的真诚意愿，对他们为之服务的神圣事业必定能够获得胜利的狂热信念以及愿意为这一事业献出生命的决心，跟拉丁美洲的情况极为相似，革命古巴的这位工业部长对这一切非常熟悉，同时也感到非常亲切，他正在寻找例证，以证明他所提出的游击战作为一种斗争的手段具有神效这个论点是正确的，现在他似乎在非洲的密林中找到了这方面的例证。

当然，在拉丁美洲，游击战的火焰并没有熄灭，然而也没有象拥护游击战的人所期待的那样熊熊燃烧。在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游击队虽然还在活动，但是他们能否取得巨大的成就，那就很难说了。其实，他们的活动与其说是团结了反帝力量，还不如说是分裂了反帝力量。那么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古巴革命的游击战经验不适用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呢？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拥护游击活动的人认为，“无论如何”都是因为各国的游击队没有正确地运用古巴的经验，所以才连连败北，日趋垮台的。而反对游击活动的人则指出，游击战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既得不到农民的也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在许多国家，开展有效的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在这种情况下

下,双方照例互相指摘、猜疑、非难,责怪对方有偏见,口是心非,甚至背信弃义,总之争论得十分激烈。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切又是怎么看的呢?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其坚信游击战这一手段的有效性。他认为游击战得以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领导游击活动的领袖的个人素质和威望。切在《游击战:一种手段》一文中讲道:“一般说来,凡符合人民利益的游击战,总是由有威望的领袖领导的……”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就是这样的一位领袖,这位天才的军事和政治领袖的威望,不但得到了全体进步力量的一致公认,连进步力量的敌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象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样的领袖,拉丁美洲的游击运动还没有造就出第二个来。有些具备条件的人,未及显露头角,就在战斗中牺牲了。既然还没有这样的领袖,那么切本人难道就不能成为这样的领袖吗?切原是阿根廷人,后来又改入古巴籍,他的前妻是秘鲁人,而他俩所生的女儿入了墨西哥籍——难道这还不足以使他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拉丁美洲的公民,而且是继承了圣马丁、玻利瓦尔和马蒂以及这个大陆解放战争中其他英雄的优秀传统的全大陆性的公民吗?

不消说,还是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的:他直接参加异国的革命活动,是不是干涉别国的内政呢?从形式上来看,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可能是这样。然而反动政权,首先是美国政府,几十年来自己就到处进行干涉,镇压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拉丁美洲国家中,凡不愿意俯首听命于美国的,美国就对它们发动武装干涉,实行经济制裁,搞阴谋颠覆,肆无忌惮地暗杀不合它心意的活动

家。事情竟发展到了白宫最高一级讨论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各种计划的地步。一九六一年组织雇佣军入侵古巴的，难道不是华盛顿吗？把一批批破坏者、间谍、特务派往古巴的，难道不是华盛顿吗？而在这方面为美国大效其劳的，难道不是格兰德河以南那些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权吗？入侵古巴的雇佣军是在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的基地上进行训练的，几乎所有拉丁美洲政府都遵照华盛顿的命令，同革命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参加了对自由之岛的封锁。难道所有这些行动不是对古巴事务的干涉，从而给了古巴人以道义上的权利，去采取各种措施保卫他们的革命，去援助各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及其他各种压迫的正义斗争吗？至于古巴所采取的这类行动是否恰当，是否适时，它们的形式是否好，是否有必要同当地的革命运动协调、配合，这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但对于采取这些行动的权利本身是不容争论的。

关于这一点，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他古巴领导人曾不止一次公开谈到过，两个哈瓦那宣言中谈到过，切也谈到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最后一次和古巴革命的敌人进行论战时宣称：“我是一个古巴人，又是一个阿根廷人；如果来自拉丁美洲的各位最可尊敬的先生，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的话，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决不比任何人逊色的拉丁美洲的爱国主义者，任何时候，只要需要，我甘愿为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决不会为此向任何人索取任何

代价,提出任何要求,也决不剥削任何人。”

这并不是为了要再一次“刺激”古巴革命的敌人而说的漂亮话。说这番话的人自己知道,不久的将来,他就要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这番话了。他迫不及待地、出自衷心地渴望这一天的到来,因为革命,而且只有革命才是他本性所好……

\*

\*

\*

切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四日回到古巴以后,就再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开露面。无论是古巴人,还是外国的记者和观察家,都发觉了这一点。日子一天天过去,切始终“没有出场”,他的“失踪”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传说和谣言也就越来越多。美国反动报刊的猜测尤其荒诞不经,它们说:“切已被捕”,“切已逃离古巴”,“切已被害”,“切患了绝症”。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切的确影踪全无了,至少他回到古巴以后,没有公开露过面。四月中旬,他母亲塞莉亚其时正因患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医院里,收到了切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叫人纳闷的信。切在信中讲,他打算辞去繁忙的国务工作,去砍一个月的甘蔗,然后搬到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那儿去,和他住在一起,并下厂去当五年普通工人。这封信很可能在许多人中间传阅过,恐怕连革命古巴的敌人也都看到了。当然,可以把切写这封信解释为故弄玄虚,他通常就是爱跟亲友们开开这一类玩笑的。然而他的“失踪”却使这封信增添了强烈的戏剧性。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日,正在卡马圭省砍甘蔗的菲

德尔·卡斯特罗，在回答那些关心切的去向的外国记者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时，第一次公开地作了如下的表示：“关于格瓦拉少校的情况，我唯一可以奉告的，就是他总是待在对革命最为有益的地方，至于我和他的关系，非常之好。我们的关系就同我们相识初期一样好，我甚至还可以说，比那时更加好啦。”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这席话，间接地证实了格瓦拉已不在古巴。五月初，切的母亲塞莉亚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医院挂电话到哈瓦那找他的儿子。人们回答她说：切身体很好，但是人不在，如果可能的话，将通知他和她联系。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塞莉亚与世长辞了，她至死也没有接到儿子的电话。这就说明，切当时已不在岛上了。那么他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资产阶级报刊关于切的去向众说纷纭，而且无不荒唐透顶。好些报纸断言，切在越南、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巴西或者厄瓜多尔。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多米尼加共和国爆发了爱国军人起义，针对这一事件，不少报纸就说，切积极参与了这个国家主张恢复宪法的人的斗争，甚至还绘影绘声地报导了他已战死在这个国家。美国的一家所谓“严肃的”杂志《新闻周刊》于七月九日报导说，切以一千万美元的价格出卖了“古巴的秘密”，就此不知去向。乌拉圭《前进》周刊断言，切在奥连特省“休养、写作和工作”，而伦敦《晚邮报》则煞有介事地讲，切在中国。

资产阶级报刊所制造的这些荒诞不经、矛盾百出的谣言，所散布的这些诽谤性的非非之想，只能说明一点：

资产阶级报刊根本就不知道切确实的行踪，根本就不知道他真正的情况。只有古巴的领导人、切本人以及曾经和他直接联系过的人才知道这一切的详情，然而他们都守口如瓶，而且暂时是不会摊牌的，不管敌人如何狂吠乱叫，拚命想嗅出这位从他们视野中消失的革命者的踪迹……

六月十七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又一次公开谈到切的问题，但是他所讲的，还是象第一次那样神秘：“我们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报告切的去向。”然而菲德尔·卡斯特罗担保说，切身体很好。有人问：“人们什么时候才能获悉格瓦拉少校的消息呢？”菲德尔回答说：“待到格瓦拉少校愿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知道他的情况呢？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对此作何想法呢？我们的想法是格瓦拉少校过去一直是进行革命活动的，今后自然也将进行革命活动。”

直到一九六五年十月三日，菲德尔·卡斯特罗才把一直遮住了切的那道厚实的帷幔微微拉开了一些。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时，说：

“我们中央委员会缺少了一个人，这人无论就其功绩而言，或者就其品德而言，都完全有资格进入这一机构。然而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中间却没有这个人。

“敌人便借这一事实，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我们的敌人力图扰乱人心，散布惊慌和猜疑。至于我们，我们则等待时机，因为有必要等待……

“形形色色的预言家、翻译家、‘古巴问题专家’和电

子机，日以继夜地不停工作，力图揭开这个谜。他们还有什么没有说过呢，他们说：埃内斯托·格瓦拉成了‘清洗’的牺牲品；埃内斯托·格瓦拉患了病；埃内斯托·格瓦拉同领导发生了分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人民不消说是相信我们，信任我们的。但是我们的敌人却散布这类谎言，主要是在国外散布，借以毁谤我们：瞧，这就是狰狞可怖的共产主义制度，人无影无踪地消失了，而且不作任何交代，莫名其妙地就消失了。至于我们，当人民发觉这个人已经不在的时候，我们便及时地告诉了人民，必要时我们会把全部情况讲给他们听的，而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还不能讲，还要等待……”

“为了澄清这件事，我们将在这个会上宣读一封信。是埃内斯托·格瓦拉同志写来的，信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一封是他的亲笔原信，而这一封是用打字机打的副本。我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在会上谈谈我和切的友谊的历史，谈谈我们两人同志情谊的历史，谈谈这种情谊是怎么产生的，在什么情况下发展以及怎么发展起来的。然而没有谈这些的必要。我现在只限于把信读一下。

“信上没有注明日期，因为曾经约定这封信应在我们认为最适当的时候才拿出来宣读。但是假使要严格地如实反映情况的话，那么这封信是今年四月一日，也就是说在六个月零两天之前交给我的。信的全文如下：

菲德尔：

此刻我忆起很多往事，忆起在玛丽亚·安东尼娅家跟你结识的情况，忆起你建议我到这里来，忆起



当时的筹备工作是何等的紧张。

有一天，有人问我们，万一我们死了，应该通知谁。这种实际可能性使我们为之震惊。后来我们知道了，在革命中(如果这是真正的革命的话)，的确不是胜利就是牺牲。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很多同志都倒下了。

今天，这一切已经不再具有那么浓厚的戏剧性的色彩了，因为我们更加成熟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会重演的。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把我同古巴土地上的古巴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职责，因此我要向你，向同志们，向你的人民同时也已经是我的人民告别。

我正式辞去我在党的领导机构中的职务和我的部长职务，放弃我的少校军衔和我的古巴国籍。从此，我和古巴不存在什么法律上的联系了，仅存的是另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不能象职务那样辞去的。

回顾我过去的的生活，我认为，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我是鞠躬尽瘁地工作的。我唯一严重的错误是，我上马埃斯特腊山之后，未能从最初一刻起就更充分地信任你，未能尽快地看出你身上那种领袖和革命家的品德。

我度过了壮丽的岁月；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那些光辉而又不幸的日子内，在你的身旁，我感到属于我们的人民而自豪。

你作为国务活动家，很少有比在那些日子里表现得更光辉夺目的了，我同样也为我当时能够毫不

动摇地追随你，能够在考虑和观察问题、估计危险性和坚持原则方面都同你一致而感到自豪。

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献出我微薄的力量。由于你担负着古巴领导的重任，我可以做你不能去做的工作。我们分别的时刻到了。

你要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是悲喜交集：在这里，我留下了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最美好的希望，留下了我的最亲爱的人……留下了把我当作一个儿子看待的人民；这使我的内心深感痛苦。我将把下面这些东西带到新的战场上去，即你灌输给我的信念、我的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履行我最神圣的天职的心情：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在哪里同它斗争；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创伤。

我再说一遍，我不要古巴负任何责任，我只是学习了古巴的榜样而已。如果我葬身异国，那么我临终时想到的将是古巴人民，特别是你。我感谢你的教导和你的榜样，并将尽力做到至死不渝地忠于你的教导和榜样。我过去一贯同意我们革命的外交政策，并将继续如此。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将意识到作为一个古巴革命者的责任，并且将象一个古巴革命者那样行事。我没有给我的子女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我并不为此难过，反而感到高兴。我不为他们提出任何请求，因为我知道国家会对他们作出充分安排，让他们能够生活和受教育。

我还有许多话要向你和我们的人民讲，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多讲了，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要说的

一切，又何苦浪费笔墨呢。

祝永远胜利！誓死保卫祖国！

用全部革命热情拥抱你。

切写于哈瓦那，“农业年”。

菲德尔·卡斯特罗读完信后，接着讲道：

“对于那些议论革命者的人，对于那些认为革命者都是铁石心肠、冷酷无情的人来说，这封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革命者的内心蕴藏着多么崇高纯洁的感情……

“这不是唯一的一封信。还有不少致各方面同志的告别信，也留待此刻宣读这封信时一并分送，除此而外，还有两封信上分别写明‘致孩子们’和‘致双亲’，这是切特地写给他的子女和父母的。所有这些信，我们都将转交给这些同志和切的亲人，同时，我们请求他们把这些信赠送给革命，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信是值得加以珍藏的历史文献。

“我们认为，这已经足以澄清我们应当加以澄清的一切了。剩下的那些问题让我们的敌人去操心吧。至于对我们来说，需要在这里解决的问题和任务，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事务方面的，已经够多的了；我们要履行的和正在履行的义务也已经够多的了。”

菲德尔讲话时所提到的那些信，至少有两封，即致双亲和致孩子们的信已经发表，前者载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阿根廷杂志《每周画刊》上，后者是在切死后发表的。因为这两封信是与致菲德尔的信同一个时候写

的,我们特援引如下:

### 致双亲的信

两位亲爱的老人: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

将近十年前,我曾给你们写过另一封告别信。

据记忆所及,当时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是一名比较优秀的战士和比较优秀的医生;而今,我对医生一行已无兴趣,但作为战士我却不是那么差劲的了。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觉悟大有提高,我的马克思主义也正在生根,逐渐纯粹起来。我相信武装斗争是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且我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信念的。许多人会称我为冒险家,我是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

也许结局就是这样。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但这是势所难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此最后一次拥抱你们。

我热爱你们,只是不知如何表达我的爱。我办事是非常坚决的,我认为有时你们对我并不理解。另一方面,要理解也不容易,不过这一次请相信我说的话。

我以艺术家的趣味所渲染过的意志,将会支持虚弱的双腿和疲惫的肺。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有时候也请不要忘记二十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吻塞莉亚、罗伯托、胡安·马丁、波托丁，吻贝亚特里斯，吻所有的人。你们倔强的浪子热烈拥抱你们。

埃内斯托

### 致我子女的信

亲爱的小伊尔达、小阿莱达、卡米洛、塞莉亚和埃内斯托：

如果有朝一日你们读这封信的话，那就是说，我已经不在你们身边了。

关于我，你们将来几乎会记不起来的，小的几个就更是如此了。

你们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动，不容置疑，他是忠于他的信仰的。

望你们都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者。你们要努力学习，以便掌握技术，征服自然界。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主要的，而我们每个人，作为个别的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主要的，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

再见，孩子们，我希望还能见到你们。

爸爸寄给你们一个长吻，并紧紧地拥抱你们。

切牺牲后，又发表了他的另一封告别信，是写给他女

儿伊尔达的，信上注明的日期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这封信究竟是在古巴写的，还是在国外写的，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小伊尔达：

我今天给你写的这封信，你却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收到。但我希望你知道我在惦念着你，并希望你过一个非常快乐的生日。你差不多是个大人了，所以给你写信，就不能象给小孩子写信那样瞎扯几句，讲些无聊的话。

你应当晓得，我正在遥远的地方，我将和你分别很久，为了同我们的敌人斗争，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正在做的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毕竟是在做一件事情吧，我想，你是可以永远为你的父亲感到骄傲的，就如我为你而感到骄傲一样。

你要记住，今后斗争的岁月还长着呢，甚至在你成人之后，你也要为这一斗争作出贡献。同时你应当作好准备，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就是说，在你现在的年纪，要尽可能多学习些东西，并随时准备支持正义事业。除此之外，要听妈妈的话，不要过于自负。而这种情况将来是可能产生的。

你要争取成为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之一。在各方面都要比较好，你知道我所指的是学习和革命态度，说得清楚些，就是要品行端正，严肃认真，热爱革命，与同志友好相处等等。我在你那么大时，没有做到这些，但我是在另外一个社会里长大的，那是

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而你呢，现在的条件很优越，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里，因此你应当无愧于这个时代。

别忘记回家去看看弟妹们，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叫他们规规矩矩。特别是要照顾好阿莱达，她是非常尊重你这个大姐姐的。

好吧，小老太，再一次祝你幸福地度过你的生日。代我拥抱妈妈和希娜；接受我热烈的、紧紧的拥抱吧，以此来弥补我们今后不能相见的全部时间。

### 你的爸爸

这些扣人心弦的文件，首先是致菲德尔的告别信，证实了什么呢？最主要地是证实切已一去不复返地最终离开赋予了他世界性声誉的革命古巴。然而这既不是被迫出走，也不是自愿流亡，更不意味他放弃了革命活动。切之离开古巴，无论如何不能解释为他已对革命悲观失望，已走投无路，或者轻举妄动，癖好冒险，虽然切由于他的自我贬抑的特性，并不讳言他有这种癖好。切之离开古巴也不是一个在政治上陷入绝境因而想以战死沙场作为出路的人的自杀的举动。

切所以离开古巴，非但不是因为他对革命已经丧失了信心，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对革命无限信任。他所以离开古巴，重新拿起武器，与帝国主义者作战，不仅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而且还因为他强烈地渴望这样做。

一九六五年的切与一九五六年的切相比，已判若两人。一九五六年时，切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阿根廷医生，在命运的播弄下来到了墨西哥，由于机缘的使然加入了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革命者的团体；而到了一九六五年，切早已成为取得了胜利的那场革命的领袖之一，早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国务活动家和革命家，可是他却突然离开古巴去谋求新的革命成就了。

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拉丁美洲，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还似乎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是一种属于遥远未来的事情。当时，切虽然参加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队伍，可是却认为他这是去从事一桩极度冒险的，甚至是属于轻举妄动之类的事业，诚然，这桩事业的目标是崇高的、壮丽的，然而成功的希望却微乎其微。

但是“奇迹”出现了，这桩事业竟然成功了。古巴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面貌。由于古巴所取得的胜利，反帝革命在这些国家内已不再是一句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口号，而成为当前迫切要做的事情了。

如今，切在启程去拉丁美洲“干革命”时，他并不是一个唐·吉珂德式的革命家，不顾一切危险，单枪匹马地去同绝非风车的帝国主义较量。如今有古巴革命的极为丰富的经验在作他的后盾。

不，切离开古巴不是去谋求一死，而是去谋求战胜帝国主义。他深信，正是他能够而且应该为战胜帝国主义尽自己的力量，作出自己的贡献。既然如此，为什么



他致菲德尔和亲人们的信中，字里行间却流露出了如此悲观的，甚至是阴郁的情绪呢？为什么这些信都有一种绝命书的味道呢？莫非他已预感到死是不可避免的了，或者这只不过是出于他“阴郁的幽默”这种个性？

切是一个兼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反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人；革命的浪漫主义在他身上表现为绝对的大公无私、禁欲主义、毫无利己主义和甘愿自我牺牲，而“反浪漫主义”在他身上则表现为鄙视夸夸其谈，鄙视各色各样庸俗的感伤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这位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却是自成一格的教条主义者。蔑视死亡就是他所信奉的“教条”之一；死亡从他孩提时代起便一直窥伺着他，当他到古巴打游击的时候，更是寸步不离地窥伺着他了。革命，这也是一种战争，而哪里有战争，那里就有人死亡。在战争中，无论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勇敢的人，都不能保险自己不会被打死。切作为一名战士，自然是深知这一点的。这便是他告别信的那种“调子”的由来。

如果把目光放得远大些，看问题看得深刻些，就会发觉切决定离开古巴去寻找新的“革命天地”一事，全然不是象初看上去那样反常和怪僻。凡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论其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如何，是普通一兵还是一位将军，谁不想当一名志愿者，去为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而战斗呢？

波兰人捷尔仁斯基、南斯拉夫人奥累科·东迪奇、捷克人雅罗斯拉夫·哈谢克和美国人约翰·里德不就是加

入了俄罗斯战士的队伍，为十月革命这一正义事业而进行战斗的吗？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革命的西班牙。当时，苏维埃人无不争先恐后地想去援助西班牙人民，想去参加共和国军同法西斯战斗！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时在西班牙，有许多苏联的飞行员、坦克手和军事首长手持武器，同法西斯战斗。勃柳赫尔元帅<sup>①</sup>不也曾为中国人民的自由而战斗过吗？这类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这些前去参战的人，不论是在祖国战斗也好，还是去遥远的异国战斗也好，都给党的领导人和亲友们写过告别信。

同样，和切一起离开古巴的其他古巴革命家，切的亲如手足的同志和战友，也都给党的领导人以及亲友们留下了告别的书信。他们和切一样，在告别祖国的同时，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对他们为之战斗、为之远离祖国、亲人和同志的那桩事业必定能够取得胜利，充满了信心……

他们的告别信，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全部看到。一九六九年发表过其中一封信的摘要，一年后又发表过一封。前一封信是埃利塞奥·雷耶斯·罗德里格斯上尉（在玻利维亚化名罗兰多）写的，他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古巴游击战争的著名战士，曾在切指挥的第八纵队中作战。他把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都留在古巴了。他临赴玻利维亚以前，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写了一信给妻子内莉亚·巴雷拉斯，说道：

---

<sup>①</sup> 此人于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期间，化名加仑，人称“加仑将军”。

——译者

“离别是不好受的，但我知道，你也象我一样非常了解，一个正直的人为了履行最神圣的天职：同帝国主义斗争，总是愿意作出自我牺牲的。

“你要勇敢，要挺得住。我希望，如果我在斗争中牺牲了，我们的孩子一到年龄就能接我的班，并且也跟我们一样，对兄弟民族遭受的苦难和贫困感到义愤填膺。

“也许有一段时间你会得不到我的音讯。但是别忘记，不管相隔多远，分别多久，我的心是永远和你在一起的。

“一方面，我丢下我最亲近的人——丢下你、我的孩子、我的双亲，感到心酸；另一方面，我知道，我这样干是为了去同使千百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敌人作斗争，又感到快慰。

“你要保重自己，爱护孩子，热爱我母亲。你们所有的人，加上我的革命的祖国，都是我的至宝。

“假如我注定要阵亡，那么在临终的时刻我会想到你们的。”

下面援引另一封信。它跟前封信一样，说明了促使古巴革命者参加玻利维亚游击战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动因。写这封信的是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在玻利维亚绰号叫黄头发），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一出校门就参加了反对巴蒂斯塔的地下活动，被捕过不止一次，曾流亡美国和墨西哥，一九五八年四月由墨西哥回国，同暴君作战。在攻打一座电台时，一枚炸弹把他的两腿烧伤了。尽管如此，他仍然参加了切的第八纵队，一直战斗到革命胜利。推翻巴蒂斯塔以后，赫苏斯担任

过一系列重要职务：领导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土地改革委员会、面粉托拉斯和矿物资源委员会，从一九六四年起任食糖工业部副部长。赫苏斯动身去玻利维亚时，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写了一信给自己年幼的儿子赫苏斯-费利克斯：

致赫苏斯-费利克斯·苏亚雷斯同志

亲爱的儿子：

促使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很多。我是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写这封信的。将来待你长大成人，读这封信的时候，你是能够完全理解我所采取的决定……

今天你满四岁了。你是我寄予希望的未来。在我能够待在你身边的有限的日子内，你给了我莫大的愉快。你是我唯一的儿子，要是你在我身边长大，我一定会跟你谈很多话的，如今当我去履行我的革命职责时，而我在斗争中是很有可能牺牲的，如果不把我本来会对你谈的话哪怕写几句给你，我认为，那是不可饶恕的。

我能生活在我国历史的关键性时期，我感到异常幸运。古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正在创造人类历史上一首宏伟的史诗。它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革命，战胜着矛头针对它的每一个威胁和每一次侵略……

古巴革命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给正在遭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榨取的其他各国人民指出了解放的

道路。那些国家的人民，不能象我国人民这样，自己建设自己的未来。在那里，千百万男女的劳动，只养肥了一小撮剥削者，使他们发财致富。在那里，成千上万象你这样年龄的儿童，或者年龄更小一些的，因为缺医少药而夭折，许许多多孩子读不上书，请不起老师。伴随剥削而来的贫困和无知，便是他们的命运。

这就说明，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一个古巴革命者的职责应当超越本国的范围，把他引导到至今还存在着剥削的地方去，引导到帝国主义还在榨取人民血汗的地方去。

由于我这样理解革命的职责，我势必离开祖国，到异国去同帝国主义作战。我知道我这样做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在这里留下了我最热烈留恋的东西和我最亲近的人，但同时我感到无比高兴和骄傲的是，我将在各国人民同剥削者进行残酷斗争的前沿阵地上占有一个岗位。

在我亲近的人当中占首位的就是你，我的儿子。我很想守在你身边，注视着你成长，看着你成为一个男子汉和革命者。但是考虑到我的决定，这是很难办到的，我希望，我的榜样，我留给你的我一生的精神遗产（我的一生整个献给了革命），以及你在革命的国家内所受到的教育，能绰绰有余地弥补我不在你身旁这一不足。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决定，永远不要为此责备我。我希望（这是父亲的合理希望）你将以我为荣。

既然我没有可能象其他做父亲的人那样给你个人以舐犊之情这类细微的快乐，但愿我的决定能成为你幸福的源泉。

我希望你能刻苦学习，并以最好的方式把自己锻炼得能够担负起革命的任务来。我想，至少我希望，你将来不至于再要使用武器来为人类的幸福作战了。你将在科学、技术或者任何创造性劳动的舞台上活动。在这些领域中，也可以为正义事业作战，也可以表现自己的英雄主义，并获得荣誉，如果一个革命者满腔热情地、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些领域的话。

你要时刻警惕，坚决果断地捍卫本国的革命。它是用许多鲜血换来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莫大的宝物。

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真诚、严正、善良的人。你要永远看重真理，不管它是怎么不合口味。要听取批评，但同时要毫不动摇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如果确信自己是对的。

不要听人家阿谀奉承，也永远不要去阿谀奉承人家。要永远严于自我批评。

等到你能看懂这封信的时候，大概你已经知道何塞·马蒂所写的绝妙的诗篇了。这位先驱者写过一首题为《鞭和星》的诗。你一定要读这首诗，并且要加以深思。要记住，我希望你在选择各种不同的生活道路时，要永远偏重于“星，它能够照耀，也能够惩罚坏人”。

祝你做一个无愧于祖国的儿子！

祝你成为一个革命者。

祝你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你爸爸拥抱你。

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于古巴哈瓦那

共有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参加谱写这首玻利维亚的史诗，其中十四位为此殒命。这十七个人没有一个年满三十五岁，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

总之，切离开古巴或者决定离开古巴大致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不管怎样，至少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以后，从形式上来讲，他已不在古巴了。他就此影踪全无，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才又在玻利维亚露面。在此期间，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又七个月的时间内，切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至今不甚了了。直到他牺牲后，报纸才断言，他当时在黑非洲参加刚果内战。关于这件事，他在《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中曾有所暗示。切对非洲的命运是非常关注的，因此有可能的确是在非洲；但是也有可能其他地方，然后由那里回到古巴；甚至也有可能，他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以后，什么地方也没有去，仍然留在古巴。反正他当时的行踪我们不了解。只有古巴提供消息的机关才能够使这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可是它们目前却默不作声。

然而这事对于本书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自然，在这一年半内，切决不会无所事事。在此期间，跟他有过联系的人，大概总要有几十个之多吧，可是

他在这个时期的活动却至今还是个谜，这就表明了切有高度的地下工作的才能，还表明了当时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对他都是忠诚的。

在这个时期，切是否是在作远征玻利维亚的准备呢？根据在玻利维亚牺牲的年轻的德国女革命家塔妮亚的经历来判断，切早在“失踪”之前一年，甚至还要更早一些，即已着手准备远征玻利维亚了。一九七〇年，在哈瓦那出版了《塔妮亚——令人难忘的女游击队员》一书，书前有玻利维亚革命家、切在玻利维亚的挚友和战友因蒂（真名为吉多·阿尔瓦罗·佩雷多·莱格）所作的序。在这本书中就曾谈到塔妮亚的这段经历。

塔妮亚的真名叫塔玛拉，是两位德国共产党人埃里希和娜佳·邦克的女儿。埃里希和娜佳·邦克都是教师，一九三五年为了躲避纳粹的恐怖，带着刚刚出世的头生子，到阿根廷投亲。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他俩在阿根廷生下了个女儿，取名塔玛拉，在家里，大家都管她叫伊塔。伊塔是塔玛拉这个名字的昵称。塔玛拉在阿根廷修完了中学。她是一个惹人喜爱的聪颖的姑娘，对文学和政治很有天分，而且爱好音乐。她有一副很好的歌喉，会弹奏钢琴、吉他和手风琴，还热衷于芭蕾舞和体育活动。

塔玛拉的双亲积极参加阿根廷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他们的女儿是在地下工作、秘密会议和政治性论争的气氛中长大的。她母亲娜佳·邦克回忆道：“我们总是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深入浅出的话，告诉我们的子女，我们是在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了阿根廷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我



他们还讲给他们听十月革命的意义。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正是为了要建立一个象苏联那样的新社会而斗争，然而这项工作是艰巨而危险的。我们告诫他们，警察是要搜捕象我们这样的人家的，因此行动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乱说，不许告诉任何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我们家开会。”

战后，邦克一家于一九五二年回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父亲担任体育教师，母亲担任俄语教师。塔玛拉则考进了柏林洪堡大学语文系，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后来又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

塔玛拉认为自己既是德国人又是阿根廷人，所以密切注意拉丁美洲政治事态的发展，想望回阿根廷去参加革命斗争。

一九五九年，当她听到古巴革命胜利的消息时，不消说，是欣喜若狂的。一九六〇年年中，她接待了第一个古巴政府代表团，团长是现任古巴科学院院长的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上尉。同年十二月，她又接待了以切为首的古巴贸易代表团，自此之后，她对自由之岛就益发好感了。塔玛拉曾为这两个代表团担任翻译，并担任过切本人的翻译，切跟她一样，也是阿根廷人，他们是同胞。在和古巴同志的交往中，他们身上那种感化人的力量，他们朴素的作风、以诚相见的态度和革命的热情，给予了塔玛拉以深刻的印象。她想方设法要到古巴去，参加革命的改造。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她如愿以偿了。她来到了哈瓦那，到教育部工作，同时在哈瓦那大学新闻系学习，加入了革命民兵的队伍，经常参加义务劳动和各种各

样的群众运动，并为德国的代表团担任翻译，有时还去见见她的同胞切。

古巴革命使塔玛拉心向往之。她立志要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整个献身于“解放全人类的斗争”。“解放全人类的斗争”原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讲的一句话，塔玛拉把这句话抄录在她的日记簿的卷首，作为座右铭。她在哈瓦那时，还曾经同领导尼加拉瓜国内游击活动的尼加拉瓜统一阵线的代表们一起工作过一个时期。她想望成为一个女游击队员，一个地下工作者。

塔玛拉这一次又如愿以偿了。革命古巴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包围，被迫进行自卫。一九六三年三月，古巴同志建议她去从事地下工作，打算派她到拉丁美洲去执行一项有利于革命运动的重要使命。塔玛拉欣然同意了。委托她去的那项工作很重要、很危险，但是也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配去做。她因为如此信任她而感到自豪，她决心不辜负对她的信任，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才干和知识。这样，塔玛拉就成了地下工作者塔妮亚。

接着便是接受繁重、细致、全面的训练：学习密码书写、各种字体、无线电联络和秘密工作的规则。训练工作十分认真，进行了足足一年。下面，我们援引《塔妮亚——令人难忘的女游击队员》一书中的两段文字：

“一九六四年三月，对塔玛拉的训练结束了，这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经受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激动’。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把她请到他的工业部去，终于向她宣布了她将要前去执行的任务……”

“在此之前，塔妮亚对自己要执行的任务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她曾研究了拉丁美洲各国和欧洲某些国家的形势，可是却不知道她究竟要到其中的哪个国家去工作。切问塔妮亚是不是掌握了干地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怕不怕这项工作带来的艰苦和危险。塔妮亚果断地、简捷地、毫不含糊地回答切说，只待一声令下，她就立即去执行任务。在几个小时的会见中，她谈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形势，还谈了南美一些国家先进的革命运动已在着手发动武装斗争。切向塔妮亚交待了任务。她的任务是在玻利维亚定居下来，设法在那个国家的军队和统治集团中建立一些联系，了解这个国家内地的情况，研究玻利维亚矿工、其他工人以及农民被剥削的形式和手段，最后，等待联络员来通知她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性的行动以及她怎样参加已经准备就绪的斗争。切告诫塔妮亚，一定要等待由哈瓦那直接派去的联络员。不管她的处境如何困难，断断不可自己去找关系，不得请求援助，也不得对任何人、任何组织或政党暴露身份，即使它们在玻利维亚是以革命者著称的。重要的是对一切都必须采取绝对的、始终不渝的怀疑态度。”

上述两段引文是极有价值的，透露了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便已在切的直接领导下，拟定了远征玻利维亚的计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古巴革命的敌人把切离开古巴这事说成是“突然的”决定，是由于“失望的”缘故，是想借此自寻死路等等，都无非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造谣专家们的无稽之谈罢了。

那么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拉丁美洲的形势又如何呢？

在巴西，古拉特总统的政府越来越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由古巴革命的热烈拥护者弗朗西斯科·儒利安领导的巴西农民协会迅速壮大。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秘鲁，游击队积极开展活动。在阿根廷，由豪尔赫·里卡多·马赛蒂领导的一支游击队蹒跚地跨出了最初几步；切希望马赛蒂能在同智利、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交界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三角地带站住脚跟。在玻利维亚，则由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执政，关于这位总统的情况，切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时就已有所了解。

在一九六四年三月的时候，玻利维亚同古巴还保持着外交关系，这种关系直到同年八月二十日才在美国的压力下宣告破裂。因此在三月份的时候，未始没有可能获得玻利维亚当局的默许，在该国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作为出没于阿根廷和秘鲁的游击小组的支柱和后方。至少当时玻利维亚的副总统，影响很大的玻利维亚总工会的领导人胡安·莱钦，公开表示支持古巴革命。除此之外，在帕斯·埃斯登索罗当政期间，玻利维亚的矿工都已经武装起来，各矿都建立了民兵组织。诚然，民兵的头头无不奉行政府的方针，但是武装起来的矿工，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成为包括游击运动在内的积极的革命运动的基干力量。

虽然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拉丁美洲形势大好，对于将来开展革命斗争极为有利，可是到了这一年年底，形势却转化到远不能称为好的方面去了。在阿根廷，游击队还没有开始活动就瓦解了，游击队的领导人牺牲了。在巴西，古拉特总统被反动的将领们推翻了。在玻利维亚，帕

斯·埃斯登索罗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总统一职被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将军篡夺了。

当然，对于这些事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反动派在玻利维亚和巴西上台，就把组织游击活动来反对这两个政权，提到了议事日程上，而游击活动如果成功的话，便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拉丁美洲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反帝事业。

一九六四年四月九日，塔妮亚使用化名护照由哈瓦那出发，前往西欧，去进行几个月地下工作的“锻炼”。同年十月初，终于作出了把她派往玻利维亚的决定。现在她叫劳拉·古特雷斯·鲍尔，生于阿根廷，是个业余的民族志学者，她父亲是阿根廷的地主兼畜牧主，母亲是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塔妮亚于十一月五日顺利抵达秘鲁首都利马，同天，刚刚被将军们推翻的玻利维亚前总统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也由拉巴斯来到了利马。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塔妮亚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拉巴斯。

这位年轻诱人的女郎，掌握了好几国语言，而且从各方面来看，又相当富裕，因此，很快就成了推翻帕斯·埃斯登索罗后得势的新贵们的座上客。她同总统办公厅新闻和情报处处长贡萨洛·洛佩斯·穆尼奥斯成了好友，同后来参加切的游击队的因蒂也成了好友。经贡萨洛介绍，塔妮亚到当地一家周刊社工作，同时在教育部民间创作局兼职，此外还专门给部长们的子女讲授德语，其中包括内政部长兼司法部长安东尼奥·阿赫德斯·门迪埃塔的女儿。塔妮亚还博得了阿赫德斯的私人秘书安妮塔·海因里希的信任。按血统来说，安妮塔也是个德国女

子。

在玻利维亚的统治集团内，特别是在军界，对德国人和德国血统的人十分器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许多年，玻利维亚的军队是由德国军官训练的。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任国家总统的、声望卓著的赫尔曼·布施中校，就是德国移民同一个印第安女人生的儿子。塔妮亚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对德国人的好感，扩大了交往。

在阿赫德斯领导的内政部里担任广播局局长的，是因蒂的兄弟安东尼奥·佩雷多·莱格。显而易见，塔妮亚得以在一家出名的广播电台充当答覆妇女来信的“占卦者”的角色，他是出了力的。塔妮亚为了站稳脚跟，嫁给了玻利维亚的一位大学生马里奥·马丁内斯·阿尔瓦雷斯，从而取得了玻利维亚国籍。阿尔瓦雷斯婚后不久，便赴欧洲深造去了。有一件事情足以说明塔妮亚打进玻利维亚“上层”的深度，她甚至同玻利维亚总统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也有交往，他们两人是在一次宴会上结识的。

哈瓦那通过信使同塔妮亚保持着极其可靠的联系。她有时在玻利维亚同这些信使碰头，有时则特地跑到别的拉美国家去同他们联络。在这个准备阶段里，玻利维亚的事业进展得十分顺利。哈瓦那对巴里恩托斯政府的情况了如指掌：原来连巴里恩托斯的嫡系都在密谋推翻他。

然而巴里恩托斯的地位并不象初看上去那样岌岌可危。他讨好农民，把自己装扮成为农民的朋友和保护人，并且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革命者往往有一种通病，便是

过于乐观,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但这又是很自然的,要知道,没有极其充沛的乐观主义精神,就不可能投身战斗。然而这毕竟……

塔妮亚是用化名的护照进入玻利维亚,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的,而受哈瓦那所信托的另一个人——二十三岁的雷吉斯·德布雷,则用真名实姓于一九六三年底至一九六四年初,走遍了整个玻利维亚及其各个邻国。

德布雷是巴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九五九年去美国实习,并由美国到了古巴。古巴的一些领导人接待了他,向他介绍了革命经验。此后德布雷花了一年半的工夫,周游了拉丁美洲各国。他在委内瑞拉为法国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影片,然后在玻利维亚度过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搜集有关安第斯高原印第安人社会状况的资料,以供撰写学位论文之用。在玻利维亚期间,德布雷曾在拉巴斯、科恰班巴、奥鲁罗等地发表演说,同许多政治活动家晤谈,并和法国驻拉巴斯大使馆的文化专员保持着接触。

值得注意的是,德布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同一个委内瑞拉女郎埃莉莎维塔·布尔戈斯相好了,便将她携往玻利维亚作伴。她到玻利维亚后,在矿业和石油工业部秘书处内谋得了一个职位,便定居于拉巴斯。

一九六五年,德布雷发表了他的两篇处女作,根据他的观点,阐述了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的意义。一篇题为《拉丁美洲:革命战略的若干问题》,刊载于法国《现代》杂志一月号上;另一篇题为《卡斯特罗主义:拉丁美洲的长征》,发表在当年下半年的古巴《美洲之家》杂志上。

德布雷在遍访拉美各国之后，于一九六五年底再度来到古巴，此时切已不在古巴了。德布雷到古巴后，便深入研究古巴的革命运动史。他同参加过游击战的人进行座谈，会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研究了各种文件。古巴《美洲之家》杂志编辑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在一篇文章中讲道：“德布雷获得许可翻阅当初保存下来的大量未经发表的文件，诸如：战地命令、给指挥员们的指令、军事报告、书信和其他原件。这使他得以熟悉以往的历史事件。任何一个著书立说论述古巴革命的人，都未能象他那样占有如此丰富的材料和内幕情况来从事历史研究。”

一九六七年初，在哈瓦那大量发行的《革命的革命？》一书，就是德布雷这种精心研究的成果。现在这本书，早已为人们遗忘了，可是当初却轰动一时，被游击活动的“死心塌地的”信徒们奉为圣经。德布雷企图借古巴革命的经验，从理论上论证，采取游击战手段同帝国主义斗争，对拉丁美洲各国来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舍此别无他途。

德布雷的这本书，反映了古巴革命胜利后，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发生的争论和分歧。

乌拉圭共产党总书记罗德内·阿里斯门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摸索道路的时期，是在理论上进行争论的时期，是某些左倾倾向抬头的时期，是对拉丁美洲革命的过程和特点持静止观点的危机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德布雷在他的那本书中谈到了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活动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游击中心在



其开始活动之际,应当选择在人烟稀疏,绝少有居民点的地区。比方说,在安第斯高原的村落里,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外来人,都无法逃过土著的注意,并且立即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克丘亚人或卡克契内尔人(即玛雅人)不信任‘外来人’和‘白种’农民是有很多原因的。他们深知,漂亮话是不能用来充饥果腹,也不能用来保护他们不挨轰炸的。贫农首先尊重的是有权有势的人。在这些地区,压迫制度极为厉害:自古以来,它就在这些地区主宰着一切,已经根深蒂固,十分严密了。军队、农村宪兵、大庄园主的警察、今天的‘突击队’、绿贝雷帽或黑贝雷帽,拥有着权势,而且农民的觉悟越低,这种权势就越强。这种权势乃是自古以来的压迫方式。它使人逆来顺受,充其量也敢怒而不敢言,单单披在身上的那套军装,就足以使人乖乖地忍受侮辱了。新殖民主义的理想至今仍然是‘显示实力,同时又不使用实力’。然而,显示实力本身就意味着使用实力。换句话说,警察和军队的肉体的实力,是一种不得触动的圣物,单凭几句话是摧毁不了它的,只有证明了子弹也照样能打进警察和士兵的肉体,才能使之毁灭。”

切是否阅读过德布雷的这本书呢?阅读过的。德布雷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来到玻利维亚的“游击中心”后,曾送了一本给切。切对此书并不满意,表示不同意此书的内容。这是德布雷在玻利维亚银铛入狱后,自己讲给记者们听的。

然而事至今日,关于“游击中心”的理论上的分歧,已失去其意义了。箭已在弦上。行动的时刻到了。

## 2. 尼阿卡瓦苏河畔的营地

开头有三五十个人就绰绰有余了。有了这么些人，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小拉丁美洲国家发动武装斗争。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一九六六年三月，一个化名里卡多（又名钦丘）的古巴人，抵达拉巴斯。他就是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战的积极参加者何塞·马里亚·马丁内斯·塔马拉上尉。里卡多以一九三六年生于一个工人的家庭，曾经当过拖拉机手，革命胜利后，学会了驾驶飞机，有一个时期，在坦克部队任职。据《格拉玛报》报导，里卡多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完成了一项援助危地马拉革命运动的重要使命”。一九六三年，他使用哥伦比亚的护照，第一次进入玻利维亚，执行一项秘密使命。不久他就弄到了玻利维亚的身份证，用的名字是里卡多·莫拉莱斯·罗德里格斯，从此他便可以通行无阻地进出这个国家了。当时，里卡多协助人们在玻利维亚同阿根廷交界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营地，作为在阿根廷萨尔塔省活动的游击小组的据点。

里卡多早在第一次去玻利维亚时，就和因蒂及其另一个弟弟科科（罗伯托·佩雷多·莱格）接上了关系。因蒂兄弟俩都一离开校门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因蒂领导过少先队组织，担任过共青团的领导，后来任拉巴斯玻共党组织书记和玻共中央委员。科科也是一位积极的革命

者，是共青团的领导人，曾经当过内河轮船的船长，捕鳐者、汽车司机。他于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六年两度访问古巴，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两度访问苏联。他同他的哥哥一样，热爱苏联。他为了对尤里·加加林表示尊敬起见，特地给他儿子起名叫尤拉。

一九六三年，里卡多完成了托付给他的使命后，便返回古巴，直到两年半之后，才重又在玻利维亚露面。他到玻利维亚后，先后同塔妮亚、因蒂、科科和他所认识的其他志同道合的玻利维亚人进行联系，大家都表示愿意同他合作。

同年七月底，又有两个古巴人：庞博和图马来到了拉巴斯。庞博就是加里·比列埃加斯·塔马约上尉。图马就是卡洛斯·科埃略中尉，切在日记中有时也用他的绰号“图迈尼”或“拉斐尔”称呼他。他们两人都是用哥伦比亚护照进入玻利维亚的。

庞博小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农村地区购置一个农场或者庄园，作为训练基地，如有可能，也可作为未来游击队的作战基地。最初，庞博及其朋友们都赞成在玻利维亚北部上贝尼地区购置一块地皮。但是后来他们看中了玻利维亚南部的一个地区。

他们所选择的这个地区，靠近切的祖国阿根廷。从游击战的观点来看，这个地区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有相当大一部分地方灌木丛生，人烟稀少，居民主要以狩猎和畜牧为生。而且美国“玻利维亚海湾石油公司”的几个油田就分布在这个地区，这是个有利条件，因为石油工人很有可能给予未来的游击队以援助的。缺点是这一

带除几条河流而外,水贵如油,毒蚊扁虱成灾,使人难以居住,离开矿业中心又过于遥远,可是玻利维亚工人阶级中最富战斗性的力量却都集中在矿业中心。而且当地居民大都是讲瓜拉尼语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是小佃户就是小农场主,政治上极其落后无知。

一九六六年七月,科科·佩雷多花了三万玻利维亚比索(合两千五百美元),在这个地区买下了一个农场<sup>①</sup>,这座名垂史册的农场叫作“卡拉米那”,面积达一千两百二十七公顷,在这一大片土地上,除面朝公路的一幢住房而外,几乎无人居住。农场靠近尼阿卡瓦苏河,位于圣克鲁斯省会以南两百八十五里处,距第四军区中心卡米里城不远,玻利维亚军队第四师的部队就驻扎在这个城里。对于“卡拉米那”未来的住户来说,有这么个高邻,不见得是什么好兆头。此外,附近还有两个村子:拉古尼利亚斯村和古铁雷斯村,必要时可以在这两个村子置办到粮食及其他各种商品。“卡拉米那”农场还有一个祸患:离它三公里的地方住有当地的一个富农西罗·阿加尼亚拉斯,他曾在卡米里这个小城里当过法官,开过肉铺。通往“卡拉米那”的路正好从他的庄园旁经过,因此,他就得以监视邻人的活动。然而这是后话,待到“卡拉米那”的新住户搬来以后,才会碰到这些问题。

同年九月初,一个名叫帕乔(又名帕春戈)的古巴人,使用乌拉圭护照,由智利来到了拉巴斯。帕乔是阿尔维托·费尔南德斯·蒙特斯·德·奥卡上尉为从事地下活

---

① 这座农场中的住宅系用镀锌的铁皮为顶,这类铁皮在西班牙语中称“卡拉米那”,农场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原注

动而起的化名。他很快就离开了玻利维亚，前去接应切到这个国家来。

同月，法国人雷吉斯·德布雷也来到了玻利维亚，而且用的是真名实姓。这从搞秘密工作的观点来看，是很不妥当的，那时德布雷早已因拥护古巴革命而成了名人，因此，不但会招致玻利维亚密探对他的注意，而且还会招致在玻利维亚大肆活动并同玻利维亚当局紧密勾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的注意。

德布雷出现于玻利维亚，可能会使他们猜到，至今行踪不明的切，正是在这个国家内，或者将要来这个国家。况且有些报纸已经纷纷在讲玻利维亚是切的藏身之地。墨西哥记者阿努尔福·乌塞塔就曾在—篇刊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的《至上报》的报导中讲，切已于这一年年初由巴西潜入玻利维亚。他甚至还对切乔装改扮后的外貌作了一番描绘，而且描绘得相当正确，不仅如此，他还很有把握地说，切使用的是“拉蒙”这个假名。诚然，也有一些报纸对切的去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但是不管怎样，德布雷用真名实姓来到玻利维亚，无论对他本人来说，还是对切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

读者早已知道，塔妮亚有个朋友叫洛佩斯·穆尼奥斯，是玻利维亚总统办公厅新闻和情报处处长。这位处长发给了德布雷一张新闻记者的证件，允许他在玻利维亚各地自由旅行，为他要写的一本书搜集材料；这本书，据德布雷说，是论述玻利维亚的“地理政治”的。德布雷取得证件之后，便出发到准备开展游击运动的各个地区去旅行，一路上热心地收购地图和拍摄各种目标。有一

次，在作这样的旅行时，他同里卡多小组的人不期而遇，竟把后者当作玻利维亚人，硬要将他们摄入镜头。里卡多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这个法国人的纠缠。几周之后，德布雷前往智利，直到一九六七年二月，才又从智利回到玻利维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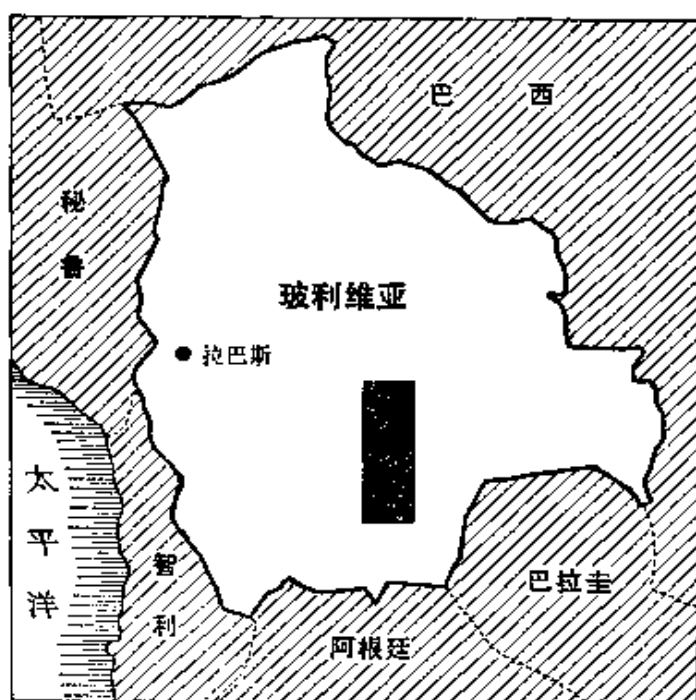
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格瓦拉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巴西圣保罗市乘飞机抵达拉巴斯的。他没有胡子，头已秃顶，两鬓如霜（是染的发），戴一副阔边玳瑁眼镜，打着领带，这副外表使人怎么也不会料到他就是举世闻名的切。他经过化装后，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当他在哈瓦那回到家里和妻子及女儿塞莉亚告别时，连他的亲生女儿都认不出他来了，甚至在他抱起她亲了一阵之后，她还是没认出他来。女儿对母亲说：“妈妈，你看，这个老头儿爱上我啦！”

而现在，这位“老头儿”正自由自在地在玻利维亚首都的大街小巷溜达，口袋中放着一张乌拉圭的护照，证明他的身份是商人，姓名叫拉蒙·贝尼特斯·费尔南德斯。为了以备万一起见，他还领有一张护照，也是乌拉圭的，身份同样是商人，但姓名已换作阿道弗·梅纳·冈萨雷斯。但是切究竟凭哪一张护照进入玻利维亚的，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两张护照上都没有盖过这个国家的入境印章。

玻利维亚一九五二年革命的幻景，曾把切吸引到这个国家来过。岁月易逝，自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十三个年头了。

十三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切也已判若两

人，可是玻利维亚却依然如故。这个国家仍然由那些贪污纳贿的将军和政客所控制，矿工们过着极度贫困的悲惨生活，广大的农民群众，基本上都是不操西班牙语印第安人，依然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生活于贫困和愚昧之中。这个国家的革命力量，本来就影响有限，现在又由于托洛茨基分子、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而进一步遭到削弱……然而切却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游击队的枪声，将根本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使之有利于革命力量。



切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活动的地区

在切抵达玻利维亚时，将参加切的游击队的十七位古巴人大部分已先行到达。切也和德布雷一样，从洛佩斯·穆尼奥斯那里弄到了一张证件，证明他为“美洲国家组织研究和搜集玻利维亚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情况的特派员”，证件上用名字是阿道弗·梅纳·冈萨雷斯。这张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签发的证件，使他有权在玻利维亚各地自由居住。

拉蒙（切现在已开始这样称呼自己），没有在拉巴斯耽搁，就在帕乔的陪同下，取道科恰班巴，前往“卡拉米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他终于到达了“卡拉米那”，当晚就写下了第一篇日记，自这天起，直到次年十月八日在尤罗山峡进行最后一战为止，凡十一个月内，天天都记日记，没有间断过。

切的日记一经发表，全世界都为之轰动。这部日记恰如一面镜子，映出了切的性格和为人的基本特点。这部日记是极其真挚和真实的文献，然而并不是切的游击队的全面的队史。这是因为切在日记中，主要把着眼点放在战士乃至整个游击队的缺点、错误、弱点和失策之上。切的日记对于软弱的动摇分子记载颇详，而对于行为举止不失英雄气概的战士却很少提及。看切的日记，还有一个情况应当注意：这部日记的作者绝少谈到自己，偶尔谈到，也主要是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然而他恰恰是他天天加以记载的那部悲壮的戏剧的主角和创造者；正是他的钢铁意志和他对革命的信心，激励他本人和他的战友们去作出英勇的业绩，并在“不成功毋宁死！”的口号下进行战斗。这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口号。各个时代和



各个民族的勇士，从努曼西亚骁勇的守卫者<sup>①</sup>到斯大林格勒英雄的保卫者，都曾在这个口号下，为正义事业战斗过。

切所打算进行的事业，按其开创者们的意愿来说，其结果必然是：美帝国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在美洲，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尽管这是幻想式的事业，说得确切点，是宏伟的事业，但是在切的日记中，却没有一字一句唐·吉诃德式的话。这不是一个幻想家的日记，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日记，而是一位清醒地思考问题并深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革命家的日记。在切看来，同帝国主义者们的斗争乃是一条由胜利和失败交织而成的长链。如果取得胜利，他将感到无限幸福，然而他也并不害怕失败，因为他知道，他的接班人迟早会把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旗帜，会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插到安第斯山脉的顶峰上去的……

那么打开切的日记，第一页上记载了些什么呢？

第一页上的日期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切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在夜里到达了庄园。这次旅行是相当顺利的。在经过适当化妆从科恰班巴入境后，帕春戈和我进行了联系，我们乘两辆吉普走了两天。

“在到达庄园附近时，停下了吉普，只开一辆吉普到

---

<sup>①</sup> 努曼西亚：古代西班牙城市，是当初西班牙一个部落抗击罗马侵略者的主要中心。该城曾遭罗马人围攻多年，而始终屹立不动，直至公元前133年方始陷落，遂遭破坏。——译者

庄园,以免引起附近的一个庄园主<sup>①</sup>的疑心,他嘀咕说可能我们是以制造古柯硷为业的。说也奇怪,和蔼可亲的图迈尼竟被认为是我们这批人的化学技师。在第二批人随后前往庄园时,‘小胡子’<sup>②</sup>——他刚刚知道我的身份——几乎从悬崖上掉下去,把吉普车搁在悬崖边上了。我们步行了约二十公里,下半夜才到了庄园,那里有三名党的工作人员……”

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和它有联系的密探们,一年半来无时无刻不在搜寻切,因此切得以抵达“卡拉米那”这事本身,就是秘密工作的一大胜利。而在此之前,参加切的游击队的十七名古巴人,其中有四名是古共中央委员,也都来到了玻利维亚,这同样也是秘密工作的一大胜利。这十七个人是通过不同途径相继进入玻利维亚的。在切到达尼阿卡瓦苏河畔的游击基地后不久,他们也都在那里集中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医药用品、照相机、无线电以及其他通讯器材、书籍和游击队员的制服,运到了“卡拉米那”。这些物资有的是从国外弄来的,有的是在拉巴斯搞到的,然后分批运至尼阿卡瓦苏河畔的营地。可见,到当时为止,建立游击基地的工作进行得一帆风顺。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当初古巴的史诗是如何开始的。当时巴蒂斯塔已获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登陆计划,他的军队正严阵以待“格拉玛”号的战士们到来,起义者到达古巴后未及几天就被打得七零八落,牺牲了五分之四

---

① 指与“卡拉米那”毗邻的庄园主西罗·阿加尼亚拉斯。——原注

② 即玻利维亚大学生豪尔赫·巴斯克斯·马奇卡多·比亚尼亚,又名“鸚鵡”或豪尔赫。——原注

的兵员，损失了许多武器弹药。经过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一仗，菲德尔·卡斯特罗几乎落到了非重建自己的队伍不可的地步。

而现在，起义者却已经在拉丁美洲的中心，而且可以说是正中心，落下脚来了。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武器、技术装备和经费。他们掌握着主动权，无须担忧敌军突然袭击使全军遭到覆没。

切当初乘坐“格拉玛”号前往古巴时，对于古巴一无所知。可是玻利维亚他却是熟悉的，早在一九五三年，他就在这个国家内逗留过一个时期。

如果再进一步同古巴的事件比较，就可发现玻利维亚的方案，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十拿九稳。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战士在发难之初，不管有多少弱点，毕竟是待在自己家里，大家知道，在家里连墙壁都会帮忙的。菲德尔可以指靠全国各地的同志和同情者的援助。

而玻利维亚却和古巴不同，组成游击队核心的都是外国人，其中主要是古巴人，而且领导这支游击队的也是一个外国人，那就是切。无论游击队将会得到玻利维亚革命人士多么大的好感和同情，可是当地居民却很可能以外国佬相待，这就意味着，对游击队抱有怀疑和偏见。

从国际方面来加以比较，也是不利于切的游击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发起战斗时，美国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场战斗的结果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古巴取得胜利。因此，马埃斯特腊山的枪声并没有使他们过分不安。可是玻利维亚山中的枪声却可能招致华盛顿方面的集中反击。诚然，这是在切的意料之中的，不

过谁又能担保在这样的对抗中游击队一定会取得胜利的结局呢？

但是不管将来如何，反正目前，整个优势都在“卡拉米那”的新住户这一边。

十一月八日和九日两天，切都在庄园四围的丛林中作短距离的侦察。他对这次侦察很满意，在十一月九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有良好的纪律，可以在这里待很长的时间。”

但是到了十一月十日，比邻的庄园主阿加尼亚拉斯（“卡拉米那”的居住者曾向他买过食物）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使切深为不安，于是切决定转移到丛林中去，在离农场八公里的地方建立基本营地，或者建立一个永久性营地。切在丛林中过了头一夜之后，于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记中提到：“虫子咬得要命，不得不在吊床上安上蚊帐（仅我一个人有蚊帐）。”第二天切写道：“我的头发正在长，尽管很稀疏，白发已经变成金黄色；长出了胡子。在两个月内，我又将恢复本来的面目。”

在营地内，砌了一只烘面包的炉子，做了几条长凳和一张桌子。每天下午四点至六点，都在这个别具一格的“红角”内上政治课，由切介绍古巴革命的经验 and 游击战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其他人则讲授玻利维亚的历史和地理，教西班牙语和克丘亚语。这些课程是全体游击队员必修的。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后，切还教授法语，这是自愿参加的。

切组织了著名的“辎重队”，把食物、武器和游击队的其他用品统统从“卡拉米那”转移到基本营地。这是一项

极其劳累的工作，每天都要靠肩膀来搬运许多极重的东西。游击队员们在基本营地的周围，想尽办法找寻可以秘密储藏东西的地方和山洞，挖掘藏东西的坑道。切虽然认为这个地方不是游击队员的久居之地，但是他相信，只要有必要，随时都可以派自己人到这里来补充食物、药品和武器的。

“卡拉米那”居住者们的活动，越来越引起邻人阿加尼亚拉斯和他的雇工们的好奇。“卡拉米那”的居住者们在路上碰见这些好奇得过了头的邻人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必须加强戒备。于是在营地上搭了一个了望台，以便观察通往庄园小房子的各条接近路。切在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讲：“从了望台报告，驶来一辆乘着两三个人的吉普车。他们是疟疾防治所的；他们取了血样后立即走了。”

使切和他的战友们大为不安的，确切点说，使他们的肉体大吃其苦的另一个原因是虫子和蚊蚋猖獗成灾。事先，切和他的战友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这里会有这些东西，也没有想到要带防治的医药用品来，现在就只好忍受自己粗心大意造成的后果了。切在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是单调的；蚊蚋和扁虱<sup>①</sup>咬伤的地方感染后开始出现讨厌的烂疮。”

切同“马尼拉”（哈瓦那）经常保持着无线电联系。补充兵员陆续抵达庄园，其中有古巴人，也有玻利维亚人。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已经有三十个队员了。

切在十一月三十日做一个月的小结时，写道：“一切

---

<sup>①</sup> 扁虱钻入人体生幼虫，使人奇痒难熬。——原注

都相当顺利：我的到达没有惹出什么麻烦；半数人已在这里，尽管耽搁了一些时候，也没有惹出什么麻烦；里卡多的主要合作者们顶着风浪造反了。在这个偏僻地区，情景是良好的，一切表明，我们简直可以在这里随意住下去。计划是：等待其余的人，把玻利维亚人的数目至少增加到二十个人，然后开始行动。还要打听一下蒙赫的反应以及格瓦拉的人的表现。”

里卡多的合作者们都是玻利维亚人，八成就是指佩雷多弟兄以及几个和他们有联系的大学生。格瓦拉的人是指矿工领袖莫伊塞斯·格瓦拉·罗德里格斯的拥护者们。蒙赫就是马里奥·蒙赫，当时任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玻利维亚共产党对拟议中的游击运动究竟持什么态度，这是需要跟他谈的。

十二月二日，“中国人”来到营地。他就是胡安·巴勃洛·昌格·纳瓦罗，秘鲁革命家，参加过秘鲁游击运动，那次游击运动被秘鲁政府当局镇压了下去。“中国人”建议将二十名参加过秘鲁游击运动的秘鲁人交切指挥。他们还讨论了在秘鲁境内的普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课题，普诺位于的的喀喀湖畔秘鲁一方。“中国人”同切会谈以后，就取道拉巴斯，前往哈瓦那，然后打算由哈瓦那回玻利维亚参加切的部队。

营地上，游击队员们照旧忙于日常工作。十二月份，他们在“卡拉米那”附近又挖掘了一个秘密仓库，把武器和弹药储藏在里面。

但是阿加尼亚拉斯的雇工们却不让营地太平。他们继续鬼鬼祟祟地刺探“卡拉米那”住户的动静。切在十二

月十一日的日记中提及此事时讲道：“这件事改变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应该十分当心。”

那些已经来到“卡拉米那”的玻利维亚人，发生了争执。其中有的人同意当游击队员，有的人则要待玻利维亚共产党作出决定后才肯同意。至于玻利维亚共产党对游击队究竟抱什么态度，切到那时为止还不清楚。

切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说道：“我对全组讲话，‘向他们朗读’关于战争现实的《手册》。我强调了统一指挥和纪律。<sup>①</sup>我作了如下任命：华金为第二军指挥；罗兰多和因蒂为委员；亚历杭德罗为作战指挥；庞博负责后勤；因蒂负责财务；‘塌鼻子’负责供应和装备；莫罗临时负责医务。”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切又提到一桩应该当心的事：“科科从卡拉纳比回来了，在那里买了必需的食品，但他被一些拉古尼利亚斯人看见了，他们对他买这样大量食品感到吃惊。”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卡拉米那”的居住者一直忙于游击队员的日常工作：挖掘洞穴、掩体，架设无线电台，愈来愈深入地侦察地形，在丛林中修筑隐蔽的小道，选定有利于埋伏的阵地，从事各种各样的训练。这一切往往是在大雨滂沱和饥肠辘辘的情况之下干的。切是什么活儿都参加的，而且跟往常一样，自己拚着命干，同时

---

① 这一句的俄译文与古巴出版的《日记》原著有明显出入。原著中，这一句为：“我强调了统一指挥和纪律，并提醒玻利维亚人去注意他们对违反他们党的纪律而接受另一条路线所承担的责任。”俄译文把“我强调了统一指挥和纪律”之后的话全部删去了。——译者

也要求战士们也拚着命干，可是他这种要求看来连那些古巴的老战士也不总是欣然接受的。关于这一点，他十二月二十八日日记中的一段话可以作证：“当我到营地的时候，就同马科斯和米格尔碰头了，原来他们是在一个峭壁上睡觉的，没能赶到营地来。马科斯向我表示不满意人们对待我的那种方式。看来他的不满是针对华金、亚历杭德罗和医生的。”

盼望已久的马里奥·蒙赫终于在除夕早晨，来到了“卡拉米那”，陪同他来的有塔妮亚、里卡多和一个绰号叫做“圣餐面包”的玻利维亚人。“圣餐面包”是志愿前来参加游击队的。当天，切便同蒙赫会谈，谈了一天一夜。谈判并不顺利。发生争执的问题倒不是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活动合适不合适。玻利维亚共产党表示拥护革命行动。然而在游击运动的统一领导问题上却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领导虽然未能承担组织游击队的责任，但是仍然允许党员参加游击队，并在政治上给予游击运动以最坚决的支持。因此，当切的游击队同玻利维亚军队交锋几次之后，玻利维亚共产党便立即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发表声明说：“……玻利维亚共产党一贯反对叛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并为此而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我党早就提出过警告，这种政策必将导致难以预料的事件。现在，我党指出，正在发起的游击战只不过是这种政策的后果之一，只不过是政府对答复的形式之一。

“因此，玻共声明它支持爱国游击队员的斗争。这一



斗争的最积极的意义无疑在于它可能开辟一条康庄大道，玻利维亚人应当循着这条康庄大道去获取革命的胜利……”

玻利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豪尔赫·科列（后接替蒙赫任第一书记），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在尼阿卡瓦苏河畔的军事行动发起后不久，科列在同玻利维亚记者鲁文·巴斯克斯·迪亚斯的谈话中宣称：“我们对游击运动的态度可以归纳如下：只要党能够援助和支持的都尽力予以援助和支持。”同时科列还更明确地说：“并不是我们发起游击运动的。游击运动不是我们的工作，也不是我们组织的……然而我们真心诚意地援助和支持游击队。我们知道，他们是反帝的革命战士，因此不仅应该得到我们的援助，而且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山里的同志们是按照自己的观点行动的，这使人深受感动。不过斗争的形式是很多的。我们全党正在酝酿打游击和起义，但也不应该忘记群众斗争……”

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谈谈一九六七年元旦尼阿卡瓦苏河畔的情况吧。切期望“卡拉米那”成为游击运动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这根链条将贯穿所有南圆锥国家，至少包括从秘鲁到阿根廷这个地区。至于说到秘鲁，他已经跟“中国人”讨论过了，“中国人”不久就该回“卡拉米那”了。跟切一起待在“卡拉米那”的还有他忠实的战友安东尼奥，即前第八纵队参谋长奥尔兰多·潘托哈·塔马约上尉，他在进军拉斯维利亚斯时曾两度负伤。他跟罗兰多一样，从一九六三年起就熟悉玻利维亚了。他对秘鲁革命者在昔日印加人的土地上开展游击

战的各项计划也都完全了解……

但是使切产生更大希望的却是阿根廷。尽管在阿根廷，马塞蒂的游击队惨遭失败，可是切深信，他的祖国能够而且应该成为顺利开展游击战的舞台。在同玻利维亚接壤的地广人稀、山峦起伏的萨尔塔和胡胡伊两省中，有许多遭受地主残酷剥削的雇农和缺少土地的农民。他们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未来游击队的战士。早在上世纪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解放战争时期，游击队就曾在这里活动过。

在阿根廷有许多“易燃的”材料。游击“中心”一经在玻利维亚出现，这些人就会东山再起，那时候，他，也就是说切，一定会从尼阿卡瓦苏河出发去援助他们。埃内斯托·格瓦拉·塞尔纳将终于返回祖国去进行战斗，去赢得胜利。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同阿根廷的同志们建立联系，这些同志在马塞蒂的游击队失败以后，一直无所行动了。于是切就派塔妮亚前往阿根廷同他们联系。

切在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说道：“‘鸚鵡’冒雨前来报告说，阿加尼亚拉斯同安东尼奥谈过话，显出知道很多事情的样子，表示愿同我们合作，无论是制造古柯硷还是其他方面都行，他说这个‘其他方面’，是表示他怀疑还有别的什么文章。我给‘鸚鵡’指示说，可以让他沾点边，但是不要答应很多东西，只是用钱买他用吉普车运来的一切，要警告他说，如果出卖，就要他的命。”但是，从一切迹象看来，阿加尼亚拉斯同卡米里的警察早已有联系，因为第二天警察就突然到“卡拉米那”来搜查了。切在一月十九

日的日记中说道：“费尔南德斯中尉和四个警察穿着便衣乘着一辆租来的吉普车到达那里，寻找古柯硷工厂；他们只检查了房屋，有几样奇怪的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如象带来点灯用的还没搬到洞里去的炭精。他们拿走了‘鸚鵡’的手枪，但把毛瑟枪和二十二毫米口径步枪留给了他；他们还‘装模作样’要拿走阿加尼亚拉斯一枝二十二毫米口径步枪，并给‘鸚鵡’看，他们走时还警告说，他们了解一切，必须考虑到他们。”

切已毫不怀疑：阿加尼亚拉斯和他的手下人都在刺探“卡拉米那”的情况，并向警察告密。

次日又出现令人担心的情况：“我们本想进行几次演习，但是老营地继续发生险情，因为出现一个外国人（是美国人。——作者）带一枝 M-2 型步枪在那里打了好些子弹；他是阿加尼亚拉斯的‘朋友’，是来他家过十天假期的。我们将派出几批人进行侦察，把营地搬到一个更靠近阿加尼亚拉斯家的地方去；如果被发现，我们在撤离这个地方前，先要叫这个家伙尝尝我们的厉害。”

尽管“中心”上空阴云密布，但是同卡米里和拉巴斯的联络目前仍然畅通无阻。新的兵员陆续不断地来到营地。一月二十一日，来了三名新队员，都是玻利维亚人。切在日记中提到，其中有一个是阿依马拉<sup>①</sup>农民。一月二十六日，矿工领袖莫伊塞斯·格瓦拉和女秘密工作者洛约拉抵达营地。莫伊塞斯·格瓦拉过去本来是玻共党员，后来加入毛派，但又因“与古巴人妥协”而被毛派开除。他答应率领他的追随者们，计二十个人，一齐参加游

<sup>①</sup> 阿依马拉系高原印第安人。——译者

击队。切向他的同姓者提出：他的人不得进行派别活动，“应该避免就国际或国内分歧进行论战”。莫伊塞斯·格瓦拉接受了这个条件，不过他说，要到二月上半月才能把志愿人员带来，据切的日记记载，原因是“由于狂欢节，他的部下心都散了。”

洛约拉表现得十分坚定，对事业充满信心，给了切很好的印象。切委派她到拉巴斯及其他城市去建立支援游击运动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的职责是供应游击队以弹药、装备和粮食，收集有关敌人的情报，发动怠工和从事破坏活动。切把“给城市干部”的一份详细指示交给了洛约拉，她便启程到拉巴斯去了。但是，尽管在这些接触中，人们向切慷慨许诺，可是实际上，加入“中心”的玻利维亚人的人数却与切的希望相距极远，于是切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的“本月小结”中，以其固有的坦率指出：“现在开始典型的游击阶段，我们将使这支人马受到考验；时间将说明成果如何，玻利维亚革命的前景如何。

“在预定的一切中，进行得最缓慢的是玻利维亚战士的加入。”

“卡拉米那”已经过清理，凡涉嫌的东西都已藏到秘密的洞穴里。切指派了以古巴人马科斯为首的几名战士留守“卡拉米那”，自己则率领由二十个人组成的一支队伍上山去作为期二十五天的行军训练。据因蒂讲，在这次行军中，切背的背包最重。以身作则始终是切的“癖好”。

这次行军旨在锻炼和团结战士，考验他们的毅力、纪律性、刻苦耐劳和勇敢的精神。在行军途中，还可以侦察

地形，可以沿途修筑储藏武器和食物的秘密仓库，最后，还可以同居民接触。游击队员们历尽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为当地居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战斗，那么当地的居民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会不会象他们的同行——如此遥远、但对切来说又是如此亲切的马埃斯特腊山的农民那样，帮助游击队，并加入游击队的行列一起战斗呢？还是恰恰相反，将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外国人，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呢？切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同他们见面，同时又预感到他得花费很大的力气，方能推倒那道疏远和不信任的障壁，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就是用这道障壁把他们自己同那个跟他们格格不入的、数百年来从未向他们预兆过吉祥的外部世界隔绝开来的。

游击队员所经之处，都是崎岖难行、荆棘丛生、毒虫麇集而又很少人烟的地方。到处是湍急的山涧、怪石嶙峋的山岭和危崖绝壁。在许多地方，战士们不得不用砍刀开路，方能通过密林。他们携带的地图全都错误百出，毫无用处。切带出去的这支人马迷了路，原定二十五天，结果却在路上花了四十八天。

在这次行军途中，游击队员们曾不止一次同当地居民接触。农民们讲当地的印第安土语，游击队员都听不懂。农民对游击队员的态度是戒备的、疑虑重重的，甚至是敌对的。这种态度本身，并没有出乎切的意料，切在一篇论述游击战的文章中就曾讲过，在游击行动开始之初，农民由于害怕政府的报复，加之又缺乏知识，总是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外来人”游击队员的；只有随着战斗行

动的展开,农民相信了游击队员对他们确实是友好的,才会转而支持起义者。但是即使如此,即使在这个刚刚开始游击斗争的侦察阶段,切还是期望玻利维亚的农民会有比较热情的反应。切的日记对他在这次行军途中同农民的第一次接触,作了如下的描述:“我做因蒂的助手去同农民谈话。我认为由于因蒂的迟钝,这次活动不太成功。

“这个农民是典型的;他不能帮助我们,也不知道他可能给游击队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因此,它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他讲了农民的一系列情况,但是由于把握不大,消息不太确切。

“医生给孩子们治了病……”

“(这个农民叫罗哈斯)”

至今还保存着一张照片:切坐在树墩上,将罗哈斯的两个孩子分别搁在他的双膝上,罗哈斯本人则站在一旁。我们要记住罗哈斯这个人,下文还要提到他的……

游击队员们随身携带着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因此同“马尼拉”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日子一天天过去。部队在崇山峻岭中越爬越高。口粮越来越少,虫子不停地咬人,沉重的背包毫不留情地将背包带嵌进肉里,鞋子坏了,脚上伤痕累累,暴雨如注,所有这一切折磨得战士们精疲力竭,肝火都旺了起来。部队中,不论是在古巴人之间,还是在古巴人与玻利维亚人之间,越来越频繁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吵架。战士们都失去了自制力。切力图控制他们,说服他们,号召大家要遵守纪律,然而他的话,对于这些心力交瘁的人,已

不再象以前那样发生作用了。

切本人刚开始行军没有几天便感到身体不舒服了。他早在二月三日<sup>①</sup>的日记中就说道：“我减轻了几乎十五磅，可以利落地走路，虽然肩上的疼痛有时是难以忍受的。”

二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讲：“我累极了……”

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讲：“对我来说，这是倒霉的一天……十二点钟时我们出发了，烈日炎炎，一会儿以后，爬到最高的山顶时，我发晕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凭意志力走路。这个地区最高的地方是一千四百二十公尺。”

二月二十六日，玻利维亚人本哈明失足落水。没有能够把他救起来。他淹死了。切在日记中说道：“本哈明是一个身体很弱，一点也不能干的小伙子，但是有坚决夺取胜利的意志；考验超过了他能负担的程度，他的体力支持不了，而我们现在在格兰德河畔初次尝到死亡的滋味，但死得很不合算。”

然而切仍然很乐观。他在二月份的小结中指出：“虽然我没有得到关于营地所发生的事件的消息，但是整个行军大体上还不错，只是有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起致命恶果的例外。……”

“行军的情况相当不错，但是发生了本哈明丧生的事件；人们还很弱，将来并不是所有的玻利维亚人都能顶得住。最近几天挨了饿，情绪下降了，在分散时特别明显。”

“古巴人当中，帕乔和‘黄头发’这两个没有什么经验

---

<sup>①</sup> 此处日期有误，应为2月4日。——译者

的人还没有起他们的作用,亚历杭德罗全做到了;在老战士当中,马科斯不断使人头疼,里卡多办事不牢靠……

“下一阶段将是进行战斗的有决定意义的阶段。”

这支人马离开营地已经一个月了。食品快要告罄。战士们以鹞鹰、鸚鵡和马肉充饥。大家都因胃失调而感到不适。切下令返回尼阿卡瓦苏河畔的营地。然而要返回营地,谈何容易。部队迷了路。饥饿的战士违背命令,擅自吃了不得动用的储用罐头食物。切在三月四日的日记中讲道:“人们情绪很低,身体越来越坏;我的两腿开始发生水肿。”

三月七日的日记中讲道:“四个月了。看到口粮就要完了,而路走不完,人们越来越垂头丧气。”一周之后,切在日记中讲:“我们猎获四只鹞鹰作为食物,还不象先前预料的那么坏。所有的东西都湿了,而天气还象要下雨的样子。人们士气低落;米格尔两腿肿了,还有好几个人也是这样。”

第二天,切决定让战士们把马吃掉,因为同志们的浮肿现象引起了严重的不安。切在这天的日记中讲:“……浮肿现象严重。米格尔、因蒂、乌尔瓦诺、亚历杭德罗都出现种种症状;我感到极度衰弱。”

就在这些日子里,出了一桩事,切没有予以重视。然而这桩事却给游击队带来了致命的恶果。

三月初,马科斯和几个游击队员离开主要营地去寻找切。马科斯他们路经一个吸油站时,碰到了一个叫做埃皮法尼奥·巴尔加斯的农民。马科斯冒称“墨西哥工程师”,向这个农民打听了路,还表示要购买粮食。巴尔加



斯觉得这个墨西哥人行迹可疑，便把这事告诉了妻子。他妻子把这事告诉了她的女主人——上尉太太，上尉太太又告诉了丈夫。丈夫把这个情报报告了驻在卡米里的第四军区司令部。司令部逮捕了巴尔加斯，迫令他为政府军的巡逻队带路，去追踪马科斯。巡逻队一直追踪到了基本营地。

切率领的那支人马在回营途中也路过了这个吸油站。游击队员们从当地居民那里得悉，有一个扛着枪的“墨西哥”人在这一带荡来荡去。他们立刻猜到这人是马科斯。切在三月九日的日记中提到此事时指出：马科斯又“自行其是”了。他还不知道马科斯的轻率行动已经把士兵引到游击队营地的大门口了。

按照切的原定计划，部队早该回到固定的驻地了。显然在驻地附近迷了路；尽管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能找到尼阿卡瓦苏河畔的营地。

三月十七日，也就是在他们终于走回到他们的“领地”之前两天，在横渡尼阿卡瓦苏河时，木筏翻倒了，卡洛斯葬身鱼腹。切在日记中写道：“由于他的认真、守纪律和热忱，他一直被认为是后卫队伍的玻利维亚人中最好的一个。”除卡洛斯外，河水还吞没了六个背包、六枝枪。

现在这支人马不但迷了路，而且实际上已等于解除了武装。队员们都已精疲力竭。他们忍受着饥饿和肉体上的痛楚，在玻利维亚东南部的穷山恶水之中已经迷路一个半月，陷入了茫无出路的绝境，先后已有两个同志无谓地牺牲了，所有这一切使得许多人士气低落。正如切所指出的，即使在久经锻炼的古巴人中间“牢骚”也越来

越厉害了。切的健康状况并不比别人好些，甚至要坏得多，但是他却绝不能流露出丝毫的怀疑、埋怨和不满。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而且怀疑谁？埋怨谁？对谁不满？难道怀疑自己？埋怨自己？对自己不满？这次行军是对部队的毅力、耐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的一种考验。一场战争即将开始，敌人是强大的，五花八门的，单单是英雄还不足以打败他们，只有能够吃最大的苦、耐最大的劳、甘愿作出最大的牺牲的超英雄，真正的革命者，方能克敌制胜。诚然，他的同志们现在已耗尽了他们的体力和精神的力量，因此发牢骚，说怪话乃至口角争吵，饥饿使得他们贪吃，虫咬使得他们烦躁易怒，眼睛由于失眠和疲惫又红又肿，流露出阴郁的神色。然而他们继续前进，他们并未丧失对于切——他们的领袖——的信任，他们象以往一样，决心掐断帝国主义的脖子，他们毫无愧色地经受了这场考验。这样的战士是不会辜负对他们的希望的！

三月十九日，也就是开始行军后的第四十八天上，这支人马已走近基地了。但是高兴还为时过早。敌军的一架侦察机在队伍上空盘旋。到傍晚时，游击队员终于同前来迎接他们的秘鲁医生“黑人”相遇了。他向切报告了情况。早从三月五日起，德布雷、塔妮亚、由哈瓦那回来的“中国人”、莫伊塞斯·格瓦拉和他的部下以及绰号叫“秃子”的阿根廷人西罗·罗伯托·布斯托斯等人，就已先后来到了基地。这不消说是好消息。然而坏消息却更多：“卡拉米那”已被玻利维亚政府当局发现；莫伊塞斯·格瓦拉手下的两个人：维森特·罗加瓦多·特拉萨斯和帕斯托尔·巴雷拉·金塔纳开小差跑了；看来，如果不是

邻舍阿加尼亚拉斯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告了密，那么准是他们两个把所有的事向卡米里的地方当局报告的。基地附近已经发现了士兵（就是追踪马科斯的那些家伙）。三月十七日，又有一名莫伊塞斯·格瓦拉手下的人，叫做萨卢斯蒂奥的，被政府军捉去了。后来警察突然来到农庄翻箱倒篋，尽管当初切曾下过一道严格的命令，关照无论如何不得在农庄内留下任何涉嫌的东西，可是看来，还是给他们查获了驻有游击队的证据：政治书籍，可能还有其他东西。警察是在三天之前发动突然袭击的。自那时起，就发现有一支六十人的政府军队在基地附近进行搜索。士兵随时都可能同游击队员遭遇，并向他们开火的。

形势如此险恶，而切又不在，这使得当时聚集在基本营地内的三十个左右的人，虽然还未吓得魂飞魄散，却已张皇失措了。切在三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讲道：“笼罩着溃败的气氛……一切都给人一种可怕的混乱的印象；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切了解情况后，立即进行整顿，部署了营地的警卫，加强了纪律，并着手准备撤离基本营地，因为既然这个营地已被当局发现，再留在这里，岂不等于坐以待毙。

切一回来，人们的情绪便高涨起来，但还是有不少人，尤其是新战士，由于即将发生非同小可的事情，即使不再胆战心惊，却仍然惘然失措。

三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游击队进行转移前的准备工作，切则同秘鲁人“中国人”、阿根廷人“秃子”、德布雷和塔妮亚谈话。“中国人”由古巴回来后，对在秘

鲁组织游击活动十分乐观。切在日记中讲道：“他想带十五个人在阿亚库乔起义，由他担任领导。此外，我们还达成协议：现在先接受他五个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接受他十五个人，这些人将在战斗中受过训练以后……给他派去……看来他感到很兴奋。”

同“秃子”的谈话同样令人鼓舞，如切在日记中所讲的，“秃子”愿意听切的命令；切向他建议，由他来领导切在阿根廷的一批拥护者，他们应当在阿根廷北部开始活动，“秃子”都同意了。

德布雷也得到了相应的指示。起初他宣称打算留在游击队里，大概是想充当游击队的编年史家，但是切跟他说，他回法国去组织对游击队的援助网，将给游击队带来更大的好处，他立刻就同意了，并且承认，他朝夕思念的是“结婚并且生个儿子”。可以看出，切是用讥讽的笔触记下这句话的。说实在的，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或者说，由伟大变成可笑，仅一步之遥。不过，我们也不必对这位年纪轻轻的法国人类学家责之过严，要知道，也快要轮到他去喝他那杯苦酒了……

同塔妮亚的谈话是不怎么愉快的：这次她违反了秘密工作的规定，毫无必要地来到营地，而且耽搁之久，出乎切的意料。见到她的人过于多了，其中就有开小差的那两个人。这不仅危及她个人的安全，而且还危及了她在拉巴斯所担负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对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切还不知道塔妮亚停在卡米里的那辆吉普车已经被警察缴去，而且在汽车里查获了各种各样的笔记和地址，从而使塔妮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秘密组织毁于一旦。

目前有一件事已经明确。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基本营地，因为营地随时都可能遭到政府军的包围。但愿修筑在营地内的秘密仓库不致被政府军发现。现在游击队的成败取决于它的机动灵活。它应当在一段时间内，消声匿迹，化整为零，成为一支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游击队。如果游击队要重新显示其存在的话，那么也只能选择敌人最意料不到的地方。切精通游击战艺术，他深信他的机智必能胜过玻利维亚那些几乎目不识丁的将军们；这些将军拿手的只不过是残杀手无寸铁的人民。

然而队伍中出现了神经质的现象，战士们发生口角的情况多起来了，有些人甚至不执行切的命令。切在三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气愤地记下了这些事：“因蒂到来时向我提到了马科斯一系列的无礼言行；我大为生气，我向马科斯说，如果上述情况是确实的话，他将被开除出游击队，他回答说，他宁愿死，宁肯被枪毙也不走。

“……去侦察的人到晚上才回来（他们没有执行命令。——作者），我把他们训了一顿。奥洛反应很激动，不肯接受批评。会议是爆发性的而又不合时宜的，不欢而散。”

但是指挥员还是在会上对他的激动而疲惫的战士们讲了必须讲的一切。队伍已准备就绪，连同新队员和来访者一起共计四十七人。应当出发了。

### 3. 战斗又打响了……

住口，演说家！

该是你

讲话，

毛瑟枪同志。

——马雅可夫斯基

我是美洲的儿子；我在一切方面都要感谢它。美洲是我的祖国，我把一生献于它的发展、更新和刻不容缓的加强。娇嫩的嘴唇是尝不得一杯苦酒的。蛇蝎也咬不到勇士的胸脯。

——何塞·马蒂

三月二十日，“鸚鵡”在“卡拉米那”附近打死了一名士兵。这事惊动了军方，他们决定在这一带搜索游击队。三月二十三日，那支追踪马科斯的巡逻队，陷入了由罗兰多指挥的一组游击队所设下的埋伏圈，他们只打了几次排枪，巡逻队便名存实亡了。和政府军首次交锋的战果，超出了游击队最美好的希望。共计击毙七人，其中包括巴尔加斯（这就是叛徒的下场），生俘十四人，内中四人受伤，游击队的医生马上给他们医治。俘虏中还有两名军官：一名少校和一名上尉。

缴获的战利品，使每个游击队员都感到有些飘飘然

了。意想不到会有这么多：十六枝毛瑟枪和两千发毛瑟枪的子弹，三门迫击炮外加六十四发迫击炮弹，两枝 BZ 枪，三枝自动步枪，每枝上有两个子弹盘，此外还有一挺三十毫米的机枪和两条子弹带。切命令向战俘训话，进行政治教育，然后释放他们。两名被俘军官的表现是耐人寻味的，正象切在日记中所讲的，他们象鹦鹉一样唠叨个不停，把什么都说出来了。有人建议少校参加游击队，他没有同意，但是答应退出军队。而那名上尉呢，原来是一个同游击队几乎志同道合的人。他担保说，他是应共产党人士的要求加入军队的，又说他有一个兄弟在古巴学习。此外，他提供了另外两个准备同游击队合作的军官的姓名。这两名俘虏还交出了一项作战计划，按照这项计划，政府军应从尼阿卡瓦苏河两端向前推进，包抄游击队的营地。

这么说来，游击队和政府军第一次交锋就打了胜仗？是的，但这也使游击队的处境复杂化了。这次战斗标志着战争的开始，而游击队对战争还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根据切的战友们提供的某些情况判断，切原来打算在尼阿卡瓦苏河地区一直隐蔽到一九六七年底，到那时再开展军事行动。根据他的估计，那时秘鲁的游击根据地和阿根廷北部的游击根据地都可以开始行动了。可是现在，这些未来的根据地的组织者，却还在他的部队里；如今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这里的希望已经不大了。

而且，首次战斗，第一次流血，就把莫伊塞斯·格瓦拉手下的某些政治上不坚定的玻利维亚人吓坏了。他们如此贪生怕死，使切大为震怒。三月二十四日，他在日记

中讲道：“‘塌鼻子’和科科带了这一批累赘到上游去搞‘辎重’，但是不得不把这些人送回来，因为他们不想走路。应该把他们打发走算了。”第二天，切解除了四个玻利维亚人在游击队内的军职，没收了他们的个人所有物，停止发给他们烟丝，并且警告他们，不执行命令就不得食。

但是不管怎样，同当初马埃斯特腊山最初的日子相比，现在的开端是多么顺利啊！当初，在古巴，游击队刚一登陆，便被击溃，死伤逃跑的将近六十人，全部武器几乎丧失殆尽。而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第一次出战，就使敌人遭到惨败。现在切手下共有三十五名以上装备良好的战士，而当初菲德尔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一仗之后，召集拢来的残部仅十二人。

是的，这个开端确实叫人振奋。

如今，敌军势必要进行报复。果然，他们没有延误时间。战斗刚一结束，立刻就来轰炸营地了，切在日记中指出，营内有人“表现害怕轰炸”。两名战士受伤。直升飞机也来了。

三月二十五日，召开了全体战士大会，会上决定命名游击队为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同时决定发布战报<sup>①</sup>。

到三月二十七日，在尼阿卡瓦苏地区与游击队交战的消息便轰动起来，充塞了太空。政府企图“保全面子”，造谣说游击队比政府军“多死了一人”，游击队把政府军

---

① 切写了四份关于游击队军事行动的战报，起草了《民族解放军告玻利维亚人民书》以及《致玻利维亚矿工的信》。这六个文件中，只有一份战报在玻利维亚报纸上登载过。其余均落入当局之手，直到切牺牲后才发表。——原注



的伤兵都枪毙了，还谎报战果，说政府军俘虏了四名游击队员，其中有两个外国人。不过从政府发表的许许多多公报中，可以看出：政府当局对游击队的组成情况十分清楚，显然，那两个开小差的和那个被俘的人向警察当局讲了不少情况，塔妮亚完全“暴露”。

切在当天的日记中说道：“一切迹象似乎表明塔妮亚已经被辨认出来，这样，两年有效的耐心的工作白做了。现在人们要出去是很困难的；我的印象是，我向丹东（德布雷）说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使他高兴。”

此后几天，比较平静地过去了，只有各家电台的激动的报导仍然活跃于太空之中，政府军眼下并不急于投入战斗，看来，他们正在调兵遣将。

在游击队中，违反纪律的现象以及古巴人和玻利维亚人之间发生冲突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切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抱怨说：“最近几天他们屡次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三月三十一日，切又同玻利维亚人“鸚鵡”作了一次谈话，而“这次谈话很不好”，“鸚鵡”甚至说到游击运动“正在瓦解”。就在这一天，政府军又发动了攻势：他们炮轰和空袭了游击队的空空如也的农庄之后，就占领了这个农庄。

切在三月份的小结中说：“本月事情很多，但是总的形势具有如下特点：

“这是一个彻底巩固和纯洁游击队的阶段；是一个随着某些从古巴来的成员和格瓦拉的人的加入而缓慢发展的阶段，古巴来的人看来不坏，格瓦拉的人总的水平很差（两个逃兵，一个“多嘴”的俘虏，三个胆小的人和两个不

过硬的人)；是一个开始斗争的阶段；其特点是搞了一次准确而引人注目的行动；然而行动的前后却犹豫不决(马科斯的撤退和布劳略的行动)；是一个敌人反攻开始的阶段，其特点到现在为止，是：(1)有把我们重重围困起来的趋势；(2)在全国和国际上大叫大嚷；(3)至今仍完全不见效果；(4)动员农民。

“显然，我们必须在我所预定的时间以前上路，我们要先走，留下一批人以防万一，并且由他们带着那四个可能告密的嫌疑分子。形势并不好。”

对切来说，德布雷和阿根廷人布斯托斯留在游击队内是莫大的累赘。他们两人，哪一个对游击队都没有用处，而况他们又都毫不讳言想及早“获得自由”。但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切打算袭击古铁雷斯村，在那里弄一辆吉普车，让这两个来访者驾着这辆车子，顺着通向圣克鲁斯的公路跑掉。

但是在去古铁雷斯途中，游击队碰到了政府军的巡逻队。巡逻队是政府当局从农民处得悉游击队行动的详细情报后派到这个地区来的。于是切不得不放弃原定计划，向主要营地方向折回。四月三日，切向德布雷和布斯托斯提出了三个方案：或者留在游击队内，或者单独出发，或者去占领古铁雷斯，在那儿相机碰碰运气。两个客人选择了第三个方案。在这个方案实现以前，又和政府军打了两仗，其结果也象几天前的初战一样，游击队大获全胜。两次战斗都是发生在四月十日。象初战时一样，两支敌军先后陷入了埋伏圈。这天第一次战斗的结果是：政府军死三名，受伤多名，被俘六名，其中包括一

名军士，此人是小队长。第二次战斗也同样以胜利告终，敌人的损失是：七个人被击毙，二十四个人被俘，五个人受伤。两次战斗，歼敌总数如下：击毙十人，俘虏三十人，其中有一个是少校，叫鲁文·桑切斯，此外还有几个是军士。这样辉煌的战果，即使当年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也是罕见的。然而在这天的第一次战斗中，古巴人“黄头发”（即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上尉）头部中弹而死，他的牺牲给胜利抹上了一层阴影。这一回，同样向全体俘虏，其中包括鲁文·桑切斯少校在内，作了谈话，进行了相应的政治教育，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

然而电台广播了一则叫人不怎么愉快的消息。据政府电台报导说，在起义者的营地内发现了切的一张没留胡子、抽着烟斗的照片，并且还发现了一个贮藏着东西的山洞。

尽管打了胜仗，但是切为了使玻利维亚人和古巴人团结起来而作的努力，却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四月十二日，切在日记中讲：“为了简单地追悼一下‘黄头发’，并表明第一次洒下的鲜血是古巴人的，六点半我召集了除那四个成为累赘的人以外的全体战士开会。我批判了先头队伍中出现的一种瞧不起古巴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昨天充分暴露出来了，当时坎巴说……他……越来越不信任古巴人了。我再次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这是发展我们军队的唯一办法，我们的军队火力增强了，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但是人数没有增加，近日反而减少了。”

四月十五日，收到了“马尼拉”来的一封密信，告诉切，胡安·莱钦在哈瓦那；他已经知道了切的行踪，答应写一

个支持的声明,并打算再过二十天秘密回玻利维亚,以便同游击队进行合作。

游击队继续在尼阿卡瓦苏地区流动,没有离开他们储存物品的秘密山洞和地下粮仓。然而战士们基本上是吃马肉度日的。四月十六日,塔妮亚和亚历杭德罗发烧发到三十九度。莫伊塞斯·格瓦拉胆绞痛发作。面对这样的情况,切于四月十七日断然决定把一部分战士,共计十三名,其中包括被革去军职的四名玻利维亚人以及亚历杭德罗和塔妮亚在内,留在这一带,由华金统一指挥。切在日记中说道:“我已命令华金在这一带露露头以便阻止过多地调动,并要他们等我们三天,三天过后,他仍应在这个地区留下来,一直到我们回来前都不进行正面战斗。”

切是出于迫不得已才走这一着棋的。为了使德布雷和布斯托斯得以离开这里,他必须尽快地撤离尼阿卡瓦苏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有被玻利维亚军队合围的危险。从此以后,华金和切就再也没有见面……

虽然战斗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游击队总的来说,取得了良好战果,但农民还是不和游击队合作。切对这一点不能不加以注意,尤其是在运动战的情况下,农民的支持对他来说更是举足轻重的因素。就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他在日记中说道:“在所有我们看到的农民中有一个叫西蒙,他有合作的表示,尽管他害怕。”

就在切记这一天的日记的时候,哈瓦那电台广播了他那封致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的著名的信,题为《创造两个、三个……乃至许多的越南——这就是口号》。在这封

信里，切以他特有的激情，主张在拉丁美洲建立一系列斗争中心，其使命就是把帝国主义的炮火吸引过来。既然美国连一个越南都对付不了，那么它就更难对付两个或三个——这就是切的论据。他预言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浴血的武装斗争，因此他号召革命者停止派别斗争，团结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与共同的敌人战斗。

这封信的结语讲道：“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呼声，都是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人类的大敌——美利坚合众国——的呼声。只要我们斗争的呼声能为人们听到，另有人伸出手来接过我们的武器，另有人在机枪的扫射声以及号召战斗并夺取胜利的崭新的呐喊声的伴奏下高唱悲壮的颂歌，那么不管死亡在什么地方碰到我们，我们都欢迎它。”

同这个文件一起在哈瓦那发表的，还有切经过化装后拍摄的照片和在游击队营地上拍摄的、胡子已经长出一半的照片，共计七张。这些照片大概是“中国人”带到古巴去的。后来切在月度小结中提到：“我的文章在哈瓦那发表后，我是否在这儿就毫无疑问了。”

四月十九日，游击队抓到了一个叫乔治·鲁斯的英国人，他一会儿冒称是新闻记者，一会儿又冒称是摄影师。鲁斯很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至少他曾经在波多黎各当过“和平队”队员。据鲁斯称，他是从智利到玻利维亚来的，想写篇描述游击队的能够引起轰动的报道，以便捞一笔钱。玻利维亚的军官们曾把他们在在一个秘密山洞里查获的布劳略的日记给鲁斯看过。布劳略在日记中叙述了他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由哈瓦那出

发，取道莫斯科、布拉格、布宜诺斯艾利斯抵达拉巴斯的情况。这件事使切大为震怒。他在日记中指出：“还是老问题，处处都是不守纪律和不负责任。”鉴于布劳略在日记中提到切时用的是拉蒙这个化名，切从此就改用另一个化名：费尔南多。德布雷把鲁斯当作一根救命稻草。他建议切不妨答应给鲁斯一些有关游击队的资料，条件是这个英国人必须帮助他和布斯托斯突出重围。切在日记中讲：“卡洛斯（即布斯托斯。——作者）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我没有过问这件事。”当天，鲁斯、德布雷和布斯托斯便离开了游击队。

次日，切从收音机里听到他们三人统统被玻利维亚当局抓住了。他们的被捕，对切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在日记中讲道：“丹东和卡洛斯由于匆匆地、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要冲出去而陷入敌手，而我又未能坚决地阻止他们的行动。这样，与古巴的联系中断了（丹东），也丧失了阿根廷的活动方案（卡洛斯）。”

在以后的数十天内，切的游击队继续向北转移，离开原来的驻地愈来愈远了。游击队经过村庄时，村民们都很害怕，疑虑重重。罗兰多在同政府军的一次交火中牺牲了。当年进军拉斯维利亚斯时，他是切的通讯员。切对他的感情是很深的。切在日记中说道：“对于他默默地死去，只能在将来有朝一日这样讲：‘你这个勇敢的上尉的小小尸体，已把你钢铁般的形象扩展到整个宇宙中。’”在此期间，“鸚鵡”也失踪了。游击队正在缓慢地、不停地减员，又没有任何希望补充新的兵员。游击队经过不少村庄，却没有一个村民参加游击队。在附近美国

人的油田内干活的工人也没有一个来参加游击队的。游击队每到一个村庄，都要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呼吁村民起来造反，开展反帝斗争，但是村民显然不相信他们的话。然而切坚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

四月份的小结，虽然极其冷静地指出并分析了游击队的缺点和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下面就是小结中最值得注意的几段：

“一切都很正常，尽管我们遭到了两宗严重的损失，即‘黄头发’和罗兰多的牺牲。罗兰多的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原来想让他领导可能成立的第二战线。我们搞了四次运动，总的来说，结果都很好，其中取得了很好成果的一次是‘黄头发’牺牲的那次伏击。

“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疾病损坏了某些同志的健康，迫使我们分散力量，结果削弱了效能；目前我们还未能与华金取得联系；在农民中的基础仍然没有发展；不过，看来是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恐怖行动使大部分农民保持中立。将来他们会支持我们。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除了阵亡者外，‘鸚鵡’也……失踪了。……”

“总之，如果把这些都看作是游击队必然会遇到的事情，那么，这一个月一切都可说过得很正常。所有的战士精神状态都好，他们都在游击队员的预备考试中及格了。”

在五月份，游击队继续沿着第一次行军的路线行进，在这条路线沿途，当初曾筑了些秘密的洞穴，藏有一些粮食和其他物品。但是，食物数量既少，质量又差，尤其是

这一带水非常之缺，再加上疲劳和神经紧张——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游击队员其中包括切本人在内的健康状况。几乎所有的人都上吐下泻，许多人患了疟疾。切健康状况的不佳，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出来。

切在五月九日的日记中讲：“我感到我要昏厥过去了，只好睡两个小时，然后以缓慢的摇晃的步子继续前进。”五月十三日的日记中讲：“我很不舒服，直到吐了以后才好了。”三天后，切又在日记中诉说自己剧烈肚痛，上吐下泻。尽管这样，切还是每天记日记，而且也没有忘记在日记中注明自己的子女和至亲的生日。

五月份内又与政府军发生过两次新的冲突，结果与以前几次一样，游击队取得了胜利。五月八日，有二十七名士兵陷入了埋伏。双方开起火来。战果是：击毙三名——其中两名是士兵，一名是少尉，生俘十名，其中两名受伤。对两名受伤的人进行了治疗，然后释放了全部战俘。被击毙的那个少尉叫拉雷多，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本日记，他在日记里骂自己的士兵是胆小鬼，骂工人是二流子和寄生虫。在拉雷多的身上，还搜出了他妻子的一封信，要她的丈夫寄些“游击队员的头发”给她和她的女友，好用来装饰客厅。天下的阶级敌人何其相似：纳粹分子把被他们杀害的人的皮剥下来做灯罩，美帝国主义者喜好收藏越南爱国者的耳朵，而玻利维亚的“突击队”则梦想把游击队员的头发献给自己的太太。

据因蒂讲，切把这封信和拉雷多的日记本收到他的背包里，跟他自己的日记本保存在一起……

五月三十日，游击队同政府军又一次遭遇，政府军有



三人被打死，一人被打伤。在五月份的两次战斗中，游击队均无伤亡。

行军途中，游击队曾开进两个大村庄——皮里伦达村和卡拉瓜塔伦达村。在这两个村庄里，游击队接触了村民，向他们介绍了游击队的纲领和意图，号召有志者投身游击运动。但是村民们不知是出于害怕呢，还是由于对游击队不了解，或者因为受了官方宣传的影响（官方的宣传把切的战友们描绘成外国侵略者、强盗和暴徒），反正对游击队抱着极不信任的态度。诚然，农民们的表现已比较友好，然而却不肯参加游击队。

使切深为不安的另一个情况是华金小组象石沉大海一般音讯全无。切料想华金迷路了。游击队和拉巴斯的一切联系都断绝了，而恢复联系的希望又一点也没有。不仅如此，五月十六日，切还收到了“马尼拉”打来的一份密电，正象切在日记中说的，密电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这句话的意思只可能是：拉巴斯的地下支援机构，由于塔妮亚的暴露，已处于瘫痪状态。而要建立新的机构则需要时间……

胡安·莱钦和其他答应支持游击队的政治领袖也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六月份内，切的游击队仍然在圣克鲁斯和卡米里之间的这个地区活动，因为他们不能离开秘密仓库，同时还指望能够碰到华金的小组。六月十四日，是切的生日，他在日记里说道：“我已三十九岁了，促使自己考虑游击生涯前途的年龄正在无情地逼近；目前我还是‘完整的’。”

当时，他倒的确是“完整的”，而且完整得无以复加。

虫子把他咬得遍体鳞伤，哮喘病弄得他呼吸困难，腹泻使他痛苦不堪。这位火热的革命者正是凭了他的意志力才使得他病弱的、疲劳不堪的身躯没有垮倒，没有发过一句怨言，没有些微示弱的表现。他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他的日记就是显证，在日记里他以一种毫不文过饰非的态度，精确地记下了斗争的优缺点、行动、条件和前景。他把这一斗争的旗帜插到了玻利维亚的山区，还想把它胜利地插遍他的故乡拉丁美洲的平原和山岭。他以满腔的热忱和无比的勇敢率领着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向前挺进，这不但使他的战士们感到惊奇，甚至赢得了他们近乎迷信的崇拜。

而且不只是他的战友们对他无限尊敬。游击队每经过一个村落，村民们都把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当作先知来看待；这个蓄着大胡子、穿得破破烂烂、脸孔白白的外国人很喜欢他们的孩子，而且还给大家医治牙病，农民都管他叫费尔南多牙医生。但是，总还是有一道无形的墙把他和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隔开，而他和他的战友们却正是为了这些人的幸福才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战斗，来夺取胜利或者献出生命的。

切在六月份的小结中讲道：“仍然感到缺少农民的参加。这是个恶性循环，为了争取他们参加，必须经常地在一个有人居住的地区活动，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则需要更多的人员……”

“陆军的军事行动仍然等于零，但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在农民中所进行的工作，因为这使整个村社的农民由于害怕或受到了歪曲我们的宗旨的欺骗宣传而变成告密

者。”

切在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讲道：“要同居民谈话，就得猎获他们，他们好象小动物似的。”纵然如此，仍然不时能在农民中间碰到一些愿意和游击队合作的人。例如，有个青年农民是一个结核病患者，叫保林诺，切于六月二十日在一个村庄里遇到了他，他帮助游击队识破了伪装成猪贩子的警方密探。因蒂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他，因蒂讲道：“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新兵。”其实他还可以加上一笔，这也是最后一个。切派保林诺到科恰班巴去见因蒂的妻子，把一封给“马尼拉”的信带给她，因为这时发报机坏了。现在无线电台只能收“马尼拉”发来的电报了。切还叫保林诺把游击队的四份战况公报带出去。保林诺虽然想尽力完成任务，但是他没有能到达科恰班巴。他在半路上被捕了，切的信件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七月二十六日，在同政府军交火时，庞博受了伤，古巴人图马被打死。切一向把图马这个谦逊、勇敢的战士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所以他的牺牲使切非常悲痛。敌人也有损失：四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但是他们的损失是容易弥补的，然而，对游击队来说，正象切在日记中所讲的，每损失一个游击队员都等于一次严重的失败，尽管政府军还不知道这个情况。

切总是仔细地收听政府广播电台的报导，电台依据德布雷的供词，肯定说游击队里有曾经在越南击败了“美国精锐部队”的经验丰富的越共指挥员。切在日记中指出，看起来德布雷讲了一些不必要讲的事情。

六月三十日，“马尼拉”通知切说，在秘鲁虽然已建立

了游击组织，但暂时还没有开展游击活动的希望。切把这一情况不加评论地记在日记里。

七月份，游击队的处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诚然，同政府军发生了多次战斗，起义者仍然每战必胜。然而起义者的损失也是惨重的：有两人阵亡，一人是古巴人里卡多，他曾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战斗过，切在日记中提到，里卡多还在刚果打过仗，另一人是玻利维亚人劳尔；此外还有两个人负伤，无法自己行走。切的哮喘病不断发作，却又缺少治疗哮喘的必要药品。而且祸不单行，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又丢失了十一个背包，里面装有药品、望远镜以及一件最重要的东西——用来录下“马尼拉”发来的电报的录音机。现在即使是和哈瓦那的单方面联系，事实上也中断了。一般的电台广播成了唯一的消息来源，但是这些消息混乱不堪，矛盾百出。玻利维亚电台非常重视即将开始的对德布雷和布斯托斯的起诉。切以严厉的批判态度评论了他们被捕后的行为。七月十日，切在日记中讲：“德布雷和‘秃子’的讲话不太好，特别是他们不应该供认游击队有进行洲际行动的企图。”

切在七月份的小结中说道：

“上个月的缺点照旧存在，即：无法同华金、同外界接触，以及损失了人员……”

“目前最重要的特征是：

“第一、仍然无法（同外界）接触。

“第二、尽管旧相识的农民接待我们时表现出一些使人鼓舞的迹象，然而仍然感到缺乏农民的参加。

“第三、关于游击队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陆……”

“第四、通过保林诺进行联系的尝试失败了。”

“第五、游击队的士气和战斗经验每经一次战斗都有提高。但坎巴和查帕科不怎么样。”

“第六、陆军仍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有些部队看来是比较能打的。”

“第七、政府(指玻利维亚政府。——作者)的政治危机在加深，但是美国给了一些小额贷款，从玻利维亚的水平来看，这是一种可以安抚不满情绪的巨大援助。”

“最迫切的任务是：

“恢复联系，吸收战斗人员，以及搞到药物。”

八月份，切由于哮喘病发作而影响了工作，从而使游击队的情况更趋复杂了。要制止哮喘的发作，只有依靠药物，可是在附近的一些村镇上，根本没有这类药品。八月七日，切在日记中说道：“我们来这里建立游击队到今天已经整整九个月了。最初到这里来的六个人中两个人死了，一个失踪了，两个受伤了；我呢，有哮喘病，到今天还不知怎么才能止住它。”

八月八日，游击队象平常一样，在山地行进。切骑着一匹小母马，母马又累又饿，勉强挪动着四条腿。切觉得头晕眼花，哮喘病弄得他透不出气来，发炎的脚后跟又痛得要命。他不停地赶马，想叫它跑得快一点。可是母马不听他的话，他便拔出刀子，在马脖子上扎了一刀，伤口很深。待到清醒过来，他把自己的战友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我却成了废物，在小母马身上发生的那件事证明，有的时候我已失去了控

制力。其他同志的行为并不见得好些。<sup>①</sup>这是一个应该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这种斗争，使我们有机会成为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品级，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合格的人，如果有谁到达不了这两个梯阶中的任何一个，他就应该说一声，并且离开斗争。”

接着，切在日记中指出：“所有的古巴人和一些玻利维亚人提出要坚持到最后。”

于是切决定孤注一掷：回老营去，在那里一个秘密山洞里藏有止喘药品和无线电台。他派了八个人为前导，他自己和其他人则在后面缓缓前进。他至今还期望能碰上华金小组，至少能了解到这个小组的下落。

游击队避开居民点，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去。饥饿折磨着他们。玻利维亚人查帕科出现了精神失常的症状。切的脚后跟上生了个毒疮，而且发烧了。同志们给他割开了毒疮，想减轻他们的指挥员的疼痛，然而他的自我感觉却依然很坏，关于这一点他在日记里有所记载。

正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日子里，在遥远而亲切的哈瓦那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还有其他大陆各国的观察员。会议成立了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并赞同在这一区域开展游击运动的方针。在会议大厅主席台上悬挂着切的大幅肖像。仿佛他担任了这次会议的主席。

---

<sup>①</sup> “其他同志的行为并不见得好些”这句话，《日记》原著中没有，是本书作者自己加进去的。同时，本书作者在这里删去了原著中的这样一句话：“这种情况将来会改变的，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情况有明确的了解，谁感觉无法熬得过这段时期，就应当说出来。”——译者

会议通过了《致切·格瓦拉少校的贺信》，信中表示完全同意他主张造成几个越南的那一文件，并预告拉丁美洲将出现一系列新的游击中心，而这些中心将使拉丁美洲成为埋葬“美帝国主义的坟墓”。

会议主席团根据许多代表团的建议，宣告象征性地成立“拉丁美洲国”，并宣布“敬爱的游击队员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为我们共同的祖国——拉丁美洲——的荣誉公民”。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还通过了声援玻利维亚游击运动的决议。但是这项决议，无论就其篇幅还是就其内容而言，与声援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的游击运动的决议没有特殊的差别。所以把声援玻利维亚的决议写成这个样子也许是出于秘密工作上的考虑，尽管切在玻利维亚这一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哈瓦那举行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有许多戏剧性的插曲。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四个特务向到会代表原原本本地供述了他们如何受美国谍报机关之命准备谋杀菲德尔·卡斯特罗。这几个破坏分子的供词是美国罪恶地干涉古巴内政的又一铁证。要知道，美国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已经派遣了好几十个这样的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到古巴来！古巴人理所当然地在道义上有权参加解放斗争，说得确切点，有权参加拉丁美洲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游击行动。

不仅哈瓦那电台，而且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电台，都对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作了广泛的报导。华盛顿对会议参加者大发雷霆。美洲国家组织宣布召开会议，以商

讨对策，反对革命古巴。巴里恩托斯叫嚣要入侵自由之岛。太空中充满了有关哈瓦那会议的各种各样的报导和声明……

切力图尽快地赶到他朝思暮想的秘密山洞。那儿存有救命的药品和粮食。但是，就在他已经接近目的地的時候，敌人却捷足先登了。

切在八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道：“黑暗的日子。活动无起色，一切照旧，到了晚上，新闻节目广播说我们派人去的那个山洞被占领了，特征描写得很精确，不容怀疑。现在我已注定要遥遥无期地忍受哮喘病了。我们的各种文件和照片也被抢走了。这是我们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一定是有人供出了。谁呢？是个未知数。”

第二天，电台广播说，政府军在基本营地附近又发现了四个秘密山洞。现在游击队的全部储备，都落到敌人手里了。

游击队同整个世界——同“马尼拉”、同华金、同玻利维亚各联络点都断绝了联系，而处于抱敌视态度的居民的包围之中；他们被驱入一个近乎蛮荒的地区，不但水源奇缺，连可以充饥的禽兽也很难觅得；他们失去了藏有食物和药品的所有山洞，从而也失去了有朝一日时来运转的希望。纵然如此，游击队员们在他们指挥员的钢铁意志的指引下，仍然徘徊于林莽之中……

切的日记是一面真实而无情的镜子，反映了这支游击队一如法捷耶夫笔下莱奋生的那支队伍，正踏着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走向无可避免的覆灭。

切在八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日记，第一句话就是：“万



事不如意”。这一天，他失去了克制自己的能力，安东尼奥忘了执行一项命令，他便在盛怒之下动手打了安东尼奥。

次日的日记是这样开头的：“今天一天在拚命地寻找出路，结果如何，尚不清楚”。

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开头第一句是：“一天都是阴沉而且有点苦闷。”

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开头第一句是：“沉郁而且相当苦闷的一天。”然后还讲到人们由于缺水而情绪低落。

八月三十日的日记讲道：“情况已开始变得使人烦恼；用砍刀开路的人常常晕倒。米格尔和达里奥喝尿了，‘中国人’也如此，结果不好，泻肚和抽筋。乌尔瓦诺、贝尼尼奥和胡利奥从一个峡谷下去找到了水。他们通知我说骡子下不去，我就决定同‘塌鼻子’留下来，但因蒂带着水上来，于是我们三人留下来，吃母马肉（即切用刀扎伤的那匹母马。——作者）。电台留在下面，所以没有听到消息。”

这个月在军事行动方面也是最不得手的一个月。在同敌人的唯一一次战斗中，游击队只打伤了一个士兵。

一个月结束了，照例应当小结一下，对形势作出估计。切一如既往，十分精确地、实事求是地作了总结：

“毫无疑义，本月是作战以来最糟的一个月。一次沉重的、尤其是心理上的打击，是失去了藏有文件和药品的所有山洞。月底失去了两个人，接着是吃马肉行军，这使人们的士气低落，第一次有人提出要离开我们，这个人就是坎巴……与外面和华金失去联系，再加上敌人从华金

那儿俘虏去的人招供了，这两件事也使部队士气有点低落。我的病使更多的人失去信心。这一切反映在我们在本月的唯一的一次战斗里，这次战斗本应造成敌人的一些伤亡，但结果只打伤了一个人。另外，在山沟里困难地行军，又缺水，暴露了人们的一些消极面。

“本月最重要的特点有：

“一、仍然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没有多大希望能在最近联系上。

“二、仍然没有农民参加我们的队伍。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很少与农民来往。

“三、士气低落，但愿是暂时的。

“四、政府军的作战效力和进攻能力没有增加。

“目前正处在我们的士气和革命意志低落的时候。最迫切的任务仍然与上个月相同，即：恢复联系，增加战斗人员，补充药品和装备。

“应该看到，因蒂和科科越来越明确地显示出他们可以成为革命干部和军人。”

当切在写这几行日记的时候，华金和他的战友们正在离切几十公里的格兰德河畔，靠近基本营地的地方，同包围他们的玻利维亚士兵作最后一次殊死的战斗。

自从和切分手以后，华金和他的战士们始终在基本营地一带转圈子，等待他们的指挥员回来。华金小组的处境并不轻松。顺便提一句，在这个小组里有四个病号，其中包括塔妮亚和莫伊塞斯·格瓦拉。不错，小组里有三个医生：古巴人马科斯、秘鲁人“黑人”和玻利维亚人埃内斯托，但是，没有药物他们也无法使病号恢复健康。

玻利维亚人塞拉皮奥的处境也很不妙。他瘸着一双腿，常常掉队。另外一个大问题是那四个玻利维亚人——帕科，佩佩，钦戈洛，欧塞维奥，这四个人因为贪生怕死被切革去了军职，现在必须监视他们，如果叫他们逃跑了，敌人就会获得关于游击队的重要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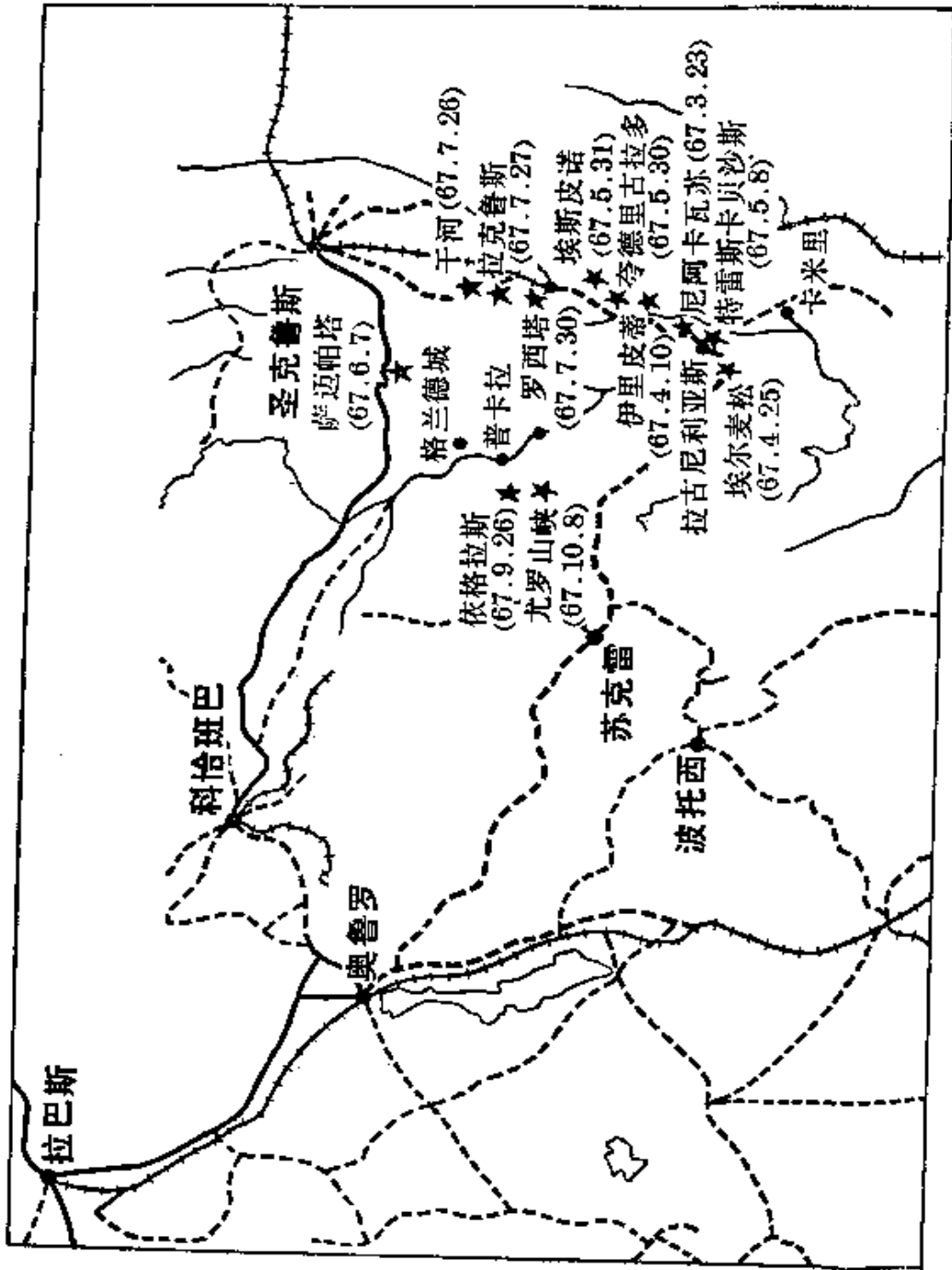
玻利维亚当局觉察到华金小组比切的队伍人数来得少，便决定先把华金小组收拾掉。为此制定了围歼华金小组的作战计划，为了对巴里恩托斯将军的女儿表示尊敬起见，特地用她的名字“辛蒂亚”作为这个计划的代号。负责追击华金及其战士的，除了罗克·特兰上校和森特诺·安纳亚上校指挥的军队而外，还有第四师和第八师的部队以及空军部队。空军经常派出飞机侦察和轰炸游击队员出没的地区。

五月二十三日，玻利维亚人佩佩开小差潜逃，投降了当局，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有关游击队的全部情况，但是这并没有能救他的命。狂怒的士兵把这个逃兵打死了。

六月四日，华金小组在与敌人交火时，古巴人马柯斯（安东尼奥·桑切斯·迪亚斯少校）和玻利维亚人维克多（卡西尔多·孔多里·巴尔加斯）饮弹身亡。七月中旬，华金又失去了一位战士，他是玻利维亚人塞拉皮奥，他的真实姓名至今还未查明。

一个月以后，在同政府军的一次新的接触中，玻利维亚人欧塞维奥和钦戈洛逃跑投敌。两个叛徒向当局报告了他们所知道的秘密仓库的地点，详细地提供了被饥饿和疾病折磨得濒于绝境的华金小组的情况。

政府军加紧了追击，但是他们的行动仍然迟缓不



切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的行军路线

力。大概是因为担任指挥的军官们对于此道并不在行，或者是生怕碰上可能隐蔽在这一地区的别的游击队，或者是故意如此，以便可以向美国主子捞取更多的与游击队作战的经费。

尽管政府军的行动迟缓不力，但是他们靠了当地农民做向导，重又咬住了华金小组。八月九日，华金小组在同政府军遭遇时，玻利维亚共青团的领导人之一，二十六岁的玻利维亚人佩德罗（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被政府军的子弹打中，牺牲了。

现在华金小组，连他本人和塔妮亚在内，一共只有十个人了。他们已被敌人团团围住，既无粮食又无药品，完全陷于孤立。但是他们不想投降。他们还希望与切会合。

八月三十日，华金小组转移到格兰德河畔，来到了农民奥诺拉托·罗哈斯家附近。罗哈斯就是切当初在行军训练时遇见过的那个农民。当时切就指出，罗哈斯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然而，华金小组的游击队员们和他相处得比较熟悉以后，却叫他替游击队工作。罗哈斯家庭负担很重，他有八个孩子。他就象这一带所有的农民一样，生活极端贫困。一九六三年，罗哈斯杀了当地地主的一头牛，给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充饥，为此坐了六个月的监牢。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对当局抱有好感，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他也的确为游击队作了奔走，他受游击队之托，到格兰德城替他们购买粮食、服装和药品。一九六七年六月，他和其他四十个农民一起被捕，解往格兰德城。一个专门对付游

击队员的特务队，对被捕者进行了审问和拷打。他们特别注意罗哈斯：用木棍拷打他，还上了电刑。但罗哈斯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这次他经受住了考验。敌人把他放了，却继续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不仅如此，政府军还在他的小屋左近设立了岗哨，甚至建筑了士兵住的营棚。过了一段时间，警察局又逮捕了他，把他解往圣克鲁斯，在那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老牌特务欧文·鲁斯审问这个农民。他没有拷打罗哈斯，却向他许诺说：“你帮我们抓住游击队，就可以得到三千美金；另外，我们把你和你的全家送到美国，给你土地，你就可以象富翁一样在美国过日子了。”罗哈斯也象当年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欧蒂米奥·格拉一样，在拷打面前经受住了考验，但是却经受不住当一名富翁的诱惑，便答应和鲁斯合作。现在只待华金小组的游击队去和这个叛徒联系了。为了使他便于执行任务，政府军撤走了设在他小屋附近的岗哨。

就在华金和他的战士们到达罗哈斯的小屋之前几小时，政府军的卫生员福斯蒂诺·加西亚由一名叫做菲德尔·雷亚的兵士护送，先行来到了罗哈斯家。他们为什么要到罗哈斯家来？大概是来听取关于游击队的情报的吧。在加西亚同罗哈斯交谈的时候，兵士雷亚就出去打猎了。

就在这当儿，游击队已接近了小屋。加西亚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扑到吊床上，抓过些破布片来盖没了身子，吩咐罗哈斯把他的身份说成是生了病的短工。

华金小组听到了雷亚打枪的声音，唯恐碰上士兵，因此极其小心地向罗哈斯的小屋走近去。他们在茅屋附

近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终于还是冒险走进了屋去。

罗哈斯接待游击队员时态度之热情，仿佛他们是他们翘首以待的客人一样。他一口答应去给游击队员弄粮食，并去探寻一处能够渡过格兰德河的浅滩。他担保说，游击队在河对岸一定可以找到万无一失的隐蔽所。

游击队员交给了罗哈斯一些钱，讲好第二天来取粮食，然后就走了。

未待游击队员走远，罗哈斯就叫他八岁的儿子去报告士兵：游击队已来到这一地区，请他们把这个消息告诉驻扎在拉洛赫村的陆军分队。拉洛赫村离罗哈斯家最近，只有十三公里左右。

马里奥·巴尔加斯上尉一得到消息，便找了一个叫何塞·科尔多内·托莱多的当地农民作向导，立即率领部队向罗哈斯家进发。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巴尔加斯的部队便到达了罗哈斯家。这时罗哈斯虽然已经准备好了给游击队的粮食，但不知是不想参与他自己设下的圈套，临时变了卦呢，还是害怕了，反正当巴尔加斯来到他家时，他正在准备带着一家老小逃离小屋。巴尔加斯吩咐他留在家里接待游击队，然后把他们领到离他家一公里半远的浅滩去，士兵们将在那里设下埋伏，等待游击队自投罗网。

当天傍晚五时左右，华金和他的战士们来到了罗哈斯家。罗哈斯重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殷勤的主人，款待游击队员们吃东西，把粮食交给了他们，然后就把他们带到了他同巴尔加斯约定的那个地点，就是所谓的耶索渡

口。游击队员开始渡河。布劳略头一个走下水去，倒数第二个是塔妮亚，华金走在最后。

当游击队员都已走进河里，把武器高高地举在头上的时候，巴尔加斯和他的部下立即从两岸向游击队猛烈开火。布劳略虽已负伤，仍旧开枪回击，打死了一名士兵，但自己也牺牲了。他的六位同志，包括塔妮亚和莫伊塞斯·格瓦拉在内，都英勇地牺牲在格兰德河滔滔的浊水之中。他们每个人都中了七八颗子弹。“黑人”（秘鲁医生何塞·雷斯蒂图托·卡夫雷拉·弗洛雷斯）死里逃生，躲进了灌木丛。几天后，士兵们还是搜到了他，用枪托把他活活打死了。政府军只生俘到两个人：一个是被革去了军职的帕科（玻利维亚人何塞·卡斯蒂略·查维斯），他身上有三处地方被子弹打伤了；另一个是医生埃内斯托（玻利维亚人弗雷迪·迈穆拉），他是在打算给帕科包扎时被俘的。

士兵们象群野兽一般扑向俘虏：死命地拷打他们，要他们供出切在什么地方。弗雷迪·迈穆拉视死如归，拒不招供，甚至一枚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肩，他还是英勇不屈。气疯了的士兵从他背后打了两枪，结束了他的生命。这样就只有帕科一人活着了。他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从而救了自己的一条命。后来政府军释放了他。帕科是华金小队唯一活下来的人。

经过这么一番屠杀之后，士兵们把尸首从水里捞了起来，运往格兰德城，合埋在城郊的一个坟坑里。

塔妮亚的遗体，直到一个星期后，才在离战场三公里远的地方发现。巴里恩托斯总统亲自坐直升飞机来到现



场，把塔妮亚的遗体拴在直升飞机上，运往格兰德城，秘密地埋葬了。至今还不知道她葬在什么地方。

不用说，罗哈斯这个叛徒并没有拿到人家答应给他的三千美金，也没有让他到美国去。巴里恩托斯赏给了他一个小型农场，位于圣克鲁斯城郊，他就带着一家子人搬到了那里。一九六九年，他被一个来历不明的人一枪打在脑袋上，结果了性命。巴尔加斯上尉因在耶索渡口屠杀有功而晋升为少校，但不久就发了疯……

关于华金小组毁灭的情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一九七一年“拉丁美洲通讯社”驻玻利维亚记者找到了帕科和当时的向导何塞·科尔多内·托莱多，并且有机会看到了在华金小组覆没后落到敌人手里的布劳略的日记之后，才把情况弄清楚。这个调查结果，发表在《古巴国际》杂志一九七一年九月号上。

何塞·科尔多内·托莱多是一个贫苦的农民，有五个孩子，曾给巴尔加斯当过向导，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替军方做事。

科尔多内回答说：“我希望能得到一笔报酬，结果我从巴里恩托斯将军那里只拿到了两百个比索。他请我到拉巴斯去，答应给我个农场。我去了，在首都待了一个月，花了七百个比索，但一直没能见到总统，只好空手回来了。”

“您知道游击队是为了什么战斗的吗？”

“军方跟我们说，游击队要搞共产主义，军方又给我们解释说，真搞成了共产主义，所有的人就要变成国家的奴仆，大家都要穿一模一样的衣服，家庭就要消灭。他们

对我们说，游击队奸淫妇女，到处抢劫，凡是不给游击队办事的人，游击队就统统把他们枪毙。而最主要的是，游击队要把我们变成奴隶。可我是喜欢自由的……”

在整个这场悲剧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华金小组覆灭后的第二天，即九月一日晚上，切和他的战友们竟然来到了罗哈斯的小屋里：屋子空空的。游击队在屋里屋外都未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他们在罗哈斯家里找到了吃的，做了一顿相当丰盛的晚饭，吃好后，就继续上路了。假使切早一天到达这里，也许今天对华金及其小组的历史就会有另外一种写法了……

第二天，切和他的战友们在罗哈斯家附近碰到了几个农民，但是这几个农民一字也没有提到华金小组覆灭和罗哈斯参与其事的情况。

切当晚收听“美国之音”时，听到该台广播说，据玻利维亚军事当局透露，在卡米里地区消灭了一个名叫华金的古巴人率领的十人游击小组。但是他觉得这条消息是不值得相信的。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不愿相信华金小组已全部被歼，一直到九月底，当玻利维亚电台广播了华金小组被歼和塔妮亚牺牲的详情后，他方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然而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华金小组中“也可能还有一小股人在四处流动，避免同陆军接触，因为有关七人一起被打死的消息似乎是假的，至少也是夸大的。”

\*

\*

\*

根据切八月份的日记看来，他的身体很不好：哮喘病不时发作，肠胃也经常不适。可是在罗哈斯家里吃了一

点热的东西以后，他又觉得气力充沛，精神饱满了。九月一日，他在日记中说道：“医生尚未恢复健康，但我已恢复了。我带着母骡子走路走得很好。”

与八月份不同，他在九月份的日记中只有三次提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

在九月份内，切的队伍转移到了人烟较多的地区活动，经常路过农舍和耕地。这样，游击队就有可能改善伙食和找到饮水。但是另一方面，和农民的接触无异于自取灭亡。农民不但不协助游击队，相反却为政府军效劳。切对农民已不抱任何幻想。在九月份的小结中，他以他特有的诚挚和坦率的态度说道：“农民群众一点也不帮助我们，而且变成了告密者。”

切在九月份好象已起死回生，不再抱怨自己健康状况不佳，可是他的战友却一个接一个垮下来了。九个月来的超乎人力的奋斗，不但使他们的肉体，而且使他们的精神都到了再衰三竭的地步。不，他们对最终目的并未失去信心，他们仍然愿意手持武器进行战斗，但是目前，他们所最为渴望的是休息、睡眠、消除饥饿。切在九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说安东尼奥有些不正常……查帕科则公然违反命令。九月十三日，切建议有神经失常症状的达里奥离队。九月十六日，安东尼奥和查帕科大吵了一场；欧斯塔基奥揭发“塌鼻子”比同志们多吃了一些东西；胡利奥则指责医生装病。十八日，贝尼尼奥行动不慎，没有遵守命令。切狠狠地批评了他，他就大哭了一场。切担心今后一与政府军接触，威利（玻利维亚人西蒙·库瓦）就会乘机逃掉……

但是切在九月小结中还是说：“剩下来的人们的士气仍然相当不错。”是的，切热爱这些英勇顽强的人，这些人……贝尼尼奥、小巴勃罗、安东尼奥……为了伟大的解放事业这一理想，甘愿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他们有些人的生日是在这些日子内度过的，切特地关照煮些大米饭，给他们过生日……

为了让战士们哪怕稍微休整一下和储备点食物，切不得不冒险到村镇上去。农民抱着怀疑、恐惧，乃至敌视的态度对待游击队。许多人甚至不肯把粮食卖给他们。战士们想从政治上同居民们谈谈，但是枉费气力。

九月二十二日，游击队开进了阿尔托赛科村。在这个村子的五十幢简陋的农舍里，居住着讲克丘亚语的印第安农民。游击队在学校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先是因蒂，接着是切向那些一声不响的农民讲了话。农民怀着戒心，注意地听着这两个异族人讲话。因蒂谈了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谈了地主的剥削、抨击了贪官污吏。因蒂说明了游击队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命运而斗争的。切提醒他的听众，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贫苦。他说：“你们会看到，我们来过以后，当局将破天荒第一次想到你们。他们会答应给你们建造医院或者别的什么。他们所以会许下这个诺言，唯一原因，就是我们在该地区活动，如果诺言变成了事实，那么你们就会体会到，游击运动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好处，虽然这种好处不是游击队直接给你们的。”这是切最后一次的公开讲话。

九月二十六日，游击队攀登到了位于拔海二千二百八十公尺高处的依格拉村。离开这个村庄后，游击队中

了埋伏。这是一场短促的战斗，结局是近乎毁灭性的。科科、米格尔和胡利奥三人牺牲，贝尼尼奥受了伤，小巴勃罗的脚受了伤，玻利维亚人坎巴和莱昂逃跑投敌。其余的人好不容易才脱险。

政府军已经控制了这一地区及其周围各地。所有的交通要道上都有政府军的部队在调动。如今休想再进村了，每一座村庄都成了陷阱。

九月二十八日，切在日记中说道：“苦闷的一天，有时简直象是我们的末日。”四面八方都是敌军。游击队只消同他们发生一次小小的战斗，就有毁灭之虞。电台广播的战报声称，切已陷入包围，他的部队在最近期间就将被消灭。

九月三十日，切在该月小结中指出：

“(这个月的)特点同上个月一样，只不过现在陆军的行动表现得更加扎实……”

“最重要的任务是溜出去，寻找更加合适的地区；其次是设法接上关系，尽管在拉巴斯的整套机关都被打散了。我们在那里也受到沉重的打击。”

十月份的第一天平安度过。拂晓时，游击队到达了一片稀疏的小森林。在那里驻扎下来。在通向森林的接近地上设立了几个岗哨。下面有个河谷，士兵们沿着河谷走掉了。近处有几幢农舍，被几名士兵占用着。直到深夜游击队才弄到了点水，凑合着吃了点东西。次日，一整天没见到士兵的踪迹，游击队就转移到下面的河谷去，想在那里宿营，但是“塌鼻子”失踪了。大家决定回到原处，半路上又迷了路，结果饥渴交加，通宵未睡。

十月三日，游击队设法弄到了水，吃了点东西，还煮了些鹿肉米饭，作为备用，就又上路了。电台广播说，坎巴和莱昂被俘。切在日记中说道：“两个人都供出了费尔南多(切的最后一个化名。——作者)、他的病情和其他许多事情。他们可能已经说出更多的事情，只是没有发表罢了。”

在以后的三天中，游击队继续行军，从一个峡谷转移到另一个峡谷，不时看到农民和陆军的巡逻队，但竭力避免同他们照面。战士们口渴得要命。贝尼尼奥的伤口化脓了，医生叫苦说，他背部仍然疼得厉害。十月七日，游击队进入了尤罗山峡<sup>①</sup>。更准确地说，这是两个山峡，一个叫尤罗，另一个叫圣安东尼奥，两者之间的通道也有自己的名称，叫菲洛。切在这天的日记中说道：

“今天是我们游击战开场满十一个月的日子，过得很安稳，有田园风味；到十二时三十分时，一个老太婆放着山羊，进入了我们驻扎的山谷，只好把她抓起来。她没有提供有关政府军的任何可靠的消息，问她什么都说不知道，说什么很久都没有到这里来了。她只是提供了有关路途的情报；按照这个老太婆提供的情报，我们离伊格拉斯约一列瓜远，离哈奎也约一列瓜远，离普卡拉约两列瓜远。十七时三十分因蒂、阿尼塞托和小巴勃罗到那个老太婆的家去，她有一个卧病的女儿和一个发育不全的女

---

① 与切的玻利维亚经历有关的许多地名，玻利维亚的地图和书籍中，各有各的叫法，很不统一。例如尼扬卡瓦苏也有称作尼阿卡瓦苏的(切在日记中采用后者，但前者是比较准确的)；再如依格拉有称伊格拉斯的；尤罗有称丘罗的。——原注

儿；给了她五十比索，叫她一个字也不要吐露出去，她虽然满口答应，但是履行诺言的希望不大。我们十七个人出发时，月亮很小，行军很累，在我们所在的河谷里留下了很多痕迹，附近没有房屋，但是有种上了土豆的地，由一些水渠引用小溪的水来灌溉。二时停下来休息，因为不再需要继续前进了。每当要夜行军时，‘中国人’（他患有高度近视。——作者）就成了道道地地的负担。

“陆军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消息，说有二百五十人在塞拉诺堵截为数三十七人的被围困者的去路，并说我们藏身之地在钢河与金河之间。这消息看来是为了转移视线的。”

这段日记是在十月八日凌晨二点到四点之间写的，到此，切的《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就戛然而止了。

十月八日是星期天，这天所发生的事，我们是从因蒂、庞博、贝尼尼奥、乌尔瓦诺那里得悉的。切的十七人的游击队休息了两个小时，在凌晨四时又出发了。

突然，前卫发现了亮光。象是有人在打着手电筒走路。他们开始观察，但亮光消失了。他们认为这是幻觉，就继续行军。直到事后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是当地的一个农民，大概他是听到了游击队员的讲话声，走过来看看动静的。他一发现是游击队，就马上去向士兵报告，指望拿到当局对提供切的游击队的情报的人所许下的那一大笔赏金。可是早在他之前，在十月七日遇见过游击队的那个老太婆，就已经向士兵报告了游击队的行踪。

随着天渐渐放亮，游击队员们看到山峡里只长有一些矮矮的灌木林，周围的山丘上也树木稀少。游击队无

从隐蔽。切明白他的队伍已处于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之中，便连忙派出几个战士顺着山峡到前面去侦察情况，同时派了几个人到左右的山丘上去侦察。不久，从右翼回来的人说，山峡已被政府军包围。这时是早晨八点三十分。

切无法断定，政府军是否已经知道了游击队在这个山峡里，或者他们只是盲目行动。因此他命令他的战士作好伪装，绝对不要暴露自己，指望天黑以后能够冲出重围。

切把他的兵力作了这样的配置：派达里奥、因蒂和肩部负伤的贝尼尼奥扼守右翼，派庞博和乌尔瓦诺扼守左翼。他本人则和其他十一个战士留在峡谷中。大家约好，如果被冲散了，到皮德尔帕戈河边集合。

十三点三十分，切派“塌鼻子”和阿尼塞托去替换庞博和乌尔瓦诺。当他们去执行命令时，一声枪响，把阿尼塞托打死了。“塌鼻子”在离庞博和乌尔瓦诺不远的地方卧倒了下来。

士兵们用步枪、机枪、掷弹筒向游击队猛烈开火。射击一直持续到天黑。待在上山的人无法望见山下峡谷里的情况。晚上七时许，射击停止了，两翼的战士们等了一会儿后，就到山下峡谷里去，希望在那里与切会合。但是他们既没有找到切，也没有找到其他同志，只有背包还留在原地，然而其中的文件和钱已被取走。他们以为切已撤向约定的集合地点，便也出发上那里去。途中，因蒂发现切的那只铝制的饭盒，已经压瘪了，和食品一起掷在路上，面粉洒得一地都是，这特别引起了因蒂的注意，因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切都不会允许浪费粮食的。在通向碰头地点的路上，战士们一下子就认出了切的脚印，因为他穿的鞋子与其他同志穿的不同，是用生皮做的软底皮鞋。因此大家还存着能与切会见的一线希望。可是到了约定的地方，既没见到切，也没见到他率领的其他同志。因蒂和战友们不安起来。他们沿着切的脚印继续往前走，脚印把他们引到了依格拉村，他们便到离乡村小学不远的一座灌木林里小休，他们怎么也料不到受了伤的切这时正被敌人关押在这所小学校的一间教室里。

那么，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在尤罗山峡里，切和他的同志们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庞博、贝尼尼奥和乌尔瓦诺根据现在已掌握的材料，恢复了这个事件原来的面貌：枪声刚一响，切就把手下的战士分成两组。所有的病号：医生、欧斯塔基奥和查帕科编成一组。切把小巴勃罗作为完好无伤的战士编进了这个组，命令他们立即向皮德尔帕戈河撤退。他自己则率领威利、安东尼奥、阿图罗和无法独立走动的“中国人”掩护第一组撤退。为了首先救出病号，切和他的同志们就这样把敌人的火力引到了自己身上。待到射击停止，安东尼奥、阿图罗和帕乔已经牺牲了，切的一条腿受了伤。他的步枪枪筒被敌人的子弹打坏了，手枪里也只剩了个空弹夹。必须从速撤离这个地方。威利把受伤的切背到最近的山坡上，躲进了稀疏的灌木丛。“中国人”想跟着他们走，但是他的眼镜掉了，他扑到地上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隔了一会儿，一群士兵来到切和威利藏身的那个山坡上，准备架设掷弹筒，却听到了灌木丛里有窸窣窣窣的声音，就立即冲了进去，见到

了切正在包扎腿上的伤口。士兵们开了枪。片刻以后，切和威利就落到他们手中，被绑送到依格拉村，关进学校。不久以后，被俘的“中国人”也押解到了这里。

但这一切，庞博和他的同志们是在事后很久才知道的。而当时，十月九日，一俟天亮，他们就急忙离开依格拉地区。这天白天，他们看见有一架直升飞机停到依格拉村，后来又起飞飞走了。这架直升飞机是来把切的遗体从依格拉运走的。但是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

贝尼尼奥身边还藏有一只小型的收音机。游击队员靠它收听到了切被俘和牺牲的消息。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想到过这件可怕的事情，可他们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件事竟然会真的发生。

次日，即十月十日，所有的电台都广播了切被俘和就义的详情，直到这时，怀疑的余地已经没有了，因蒂和他的同志们不得不承认，切已确实不在人间了。领袖的死亡，虽然使他们悲痛欲绝，但并没有动摇他们继续战斗到底的决心……

同一天，他们从电台的广播中得悉，政府军继续在追捕幸存的十名游击队员。他们由此断定，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个四人小组保全了下来，而和切一起牺牲或被俘的共有六个人。

十月十二日，他们从广播中听到，古巴医生莫罗、玻利维亚人小巴勃罗（弗朗西斯科·乌昂卡·弗洛雷斯）、秘鲁人欧斯塔基奥（卢西奥·加尔万·伊达尔戈——无线电技术员）和查帕科（海梅·阿拉纳·孔佩罗），在米斯克河源附近同政府军的接触中，全部阵亡。如今，剩下

的只有他们这个六人小组了。然而他们还有武器，还有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的钢铁意志。

幸存的战士们推举庞博为指挥员。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冲破了敌军的两层包围圈，于十一月十三日，转移到了科恰班巴—圣克鲁斯公路沿线。在这个地区，游击队同跟踪追击的政府军又发生了一次接触，在这次接触中，大家所喜爱的、三十岁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员“塌鼻子”（胡利奥·路易斯·门德斯）牺牲了。但现在游击队已经不是在人地生疏的地区活动了，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朋友。而且，虽然玻利维亚政府悬赏一千万玻利维亚比索（约四十三万美元）捉拿他们，但凡是游击队去求助过的农民，没有一个人出卖他们。切这位英勇的游击队员为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玻利维亚的各个角落。如今，许许多多农民都把帮助切那传奇性的游击队中幸存下来的英勇战士，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因蒂和他的战友已来到科恰班巴—圣克鲁斯公路沿线的消息，传到了居住在这两个城市中的同志们的耳朵里。他们想方设法要救援这些被追踪的游击战士。朋友们驾着汽车在公路上来往行驶，以期与游击队员取得联系。因蒂遇到了这样的一辆汽车。这就有了生路。不久，五个人全部都转移到了科恰班巴，躲藏在可靠的同志家里。一九六八年二月，古巴人庞博、贝尼尼奥和乌尔瓦诺到达玻利维亚西部边境，越界进入了智利。

在智利，他们被捕了，但不久便被送往复活节岛。三个古巴人从那里乘飞机沿着太平洋航线飞往巴黎。几天

之后，他们回到了故乡——哈瓦那。

因蒂和达里奥留在玻利维亚。他们忠于他们的指挥员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遗训，决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警察在拉巴斯猝不及防地袭击了因蒂藏身的住所。切的这位忠实战友在同警方交火时，饮弹身亡。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达里奥（戴维·阿德里亚索拉）也在同警察交火时牺牲了。

那个负责剿灭因蒂小组的警察局特务，名叫罗伯托·金塔尼利亚，因此而飞黄腾达，升任玻利维亚驻汉堡领事。但是他并没有逃脱应得的惩罚。一九七一年四月，警察发现了一具尸首，身中三弹，死者就是金塔尼利亚。

费尔南多——他也就是拉蒙，也就是蒙戈<sup>①</sup>——的游击队的参加者们的命运就是这样。至于切本人的历史并没有到此结束。

#### 4. 在街垒的那一边

他在他所蔑视的敌人手里最后几个小时的生命必然是十分痛苦的；但谁也比不上切那样做好了准备来经受这样的考验。

——菲德尔·卡斯特罗

---

① 前文从未提及格瓦拉曾用过“蒙戈”这个化名，只提到他还有个化名叫做“梅纳”。此处可能是作者之误。——译者

玻利维亚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但是……

——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

玻利维亚的新统治者雷内·巴里恩托斯·奥图尼奥，是个以善于翻云覆雨而出名的、老奸巨猾的政治谋略家，一向以倒戈为能事，并靠此上了台。他以一九一九年生于科恰班巴市近郊，父亲是西班牙移民，母亲是印第安人。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丰富的克丘亚语知识。这个未来的总统，还在军事航空学校求学时，就参加了地下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因而被学校开除。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以及一九五〇年间，他曾两度被捕坐牢。但是一九五二年他又被吸收进空军，军衔是中尉。就在这一年，玻利维亚发生政变，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上台执政，巴里恩托斯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迎接该党领袖——未来的总统帕斯·埃斯登索罗回国。

这名青年中尉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又这样热心，玻利维亚新统治者埃斯登索罗自然要对他论功行赏。巴里恩托斯先则晋级，继而又得到了更高的奖赏：长期留学美国。因此，切于一九五三年到拉巴斯来了解玻利维亚革命的“成就”时，他未来的敌人正在美国的俄克拉何马州学习飞行技术和英语。留学扬基国（这是拉丁美洲人对美国的叫法）这段经历，对巴里恩托斯是大为有利的：他在那里找到了可靠的庇护人，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很注意他。他回国后青云直上，成了将军，当上了空军司令。他还缺什么呢？不消说，只缺总统的宝座了。可是帕斯·

埃斯登索罗的地位，却象存心作难似的，十分稳固。帕斯·埃斯登索罗保牢了宪法所规定的总统任期，足足当政了四年。一九五六年，他把下四年的执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伙伴埃尔南·西莱斯·苏亚索。使全国上下惊异不止的是，这一位居然也在总统的宝座上坐满了四年。到了一九六〇年，他又把政权交还给帕斯·埃斯登索罗。然而，这时所有的政党对于这种在玻利维亚来讲史无前例的政治稳定已厌恶到了极点。甚至连帕斯·埃斯登索罗自己的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也分裂了。其左翼在工人领袖胡安·莱钦领导下成为该党的反对派。连帕斯·埃斯登索罗原先的忠实伙伴西莱斯·苏亚索也起来反对他了，至于其他政派就更不用提了。为了保住政权，帕斯·埃斯登索罗只好乞灵于军界，把巴里恩托斯将军拉进了自己的班底。当年，巴里恩托斯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用飞机将他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到了首都，从那时起，他就把巴里恩托斯视作为自己在军队中的心腹。于是巴里恩托斯便当上了玻利维亚的副总统。现在他离总统的宝座只有一步之差了，这位勇敢的将军决心跨出这一步，更何况还有美国的庇护人给他撑腰。玻利维亚的矿工使这些美国人愈来愈坐立不安，因为矿工们手头保存着帕斯·埃斯登索罗从前发给他们的武器。两千名武装起来的矿工，虽说拥有的是些老式的蹩脚武器，但毕竟是武器，而且他们的嗓门愈来愈高，大谈什么要把他们的矿场宣布为“玻利维亚的自由区”，这可是闹着玩的吗！只要稍不经心，玻利维亚就会变成第二个古巴。现在只有指望军队了，只有军队才能够挽回大局，用一只可靠的“大猩

猩”换掉帕斯·埃斯登索罗这个“懦夫”。这就是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的看法，他们决定提拔对政权垂涎已久的巴里恩托斯充任“大猩猩”。但是要作这样的更换也并不是易如反掌的。巴里恩托斯控制的只有空军，陆军是听命于奥万多·坎迪亚将军的，他认为自己同巴里恩托斯一样有资格当总统。奥万多是一个刚愎自用到了罕见地步的人。为了取得他的支持，只得答应把总统这个位子由巴里恩托斯同他坐地分赃。这样，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帕斯·埃斯登索罗被推翻，并且被驱逐到秘鲁，于是政权落到了两个“联合总统”——巴里恩托斯和奥万多手里，这甚至在无奇不有的玻利维亚也是罕见的事。怪不得人家要说，在这个国家里，样样事情不仅可能发生，而且正在发生。

不消说，即使对玻利维亚而言，两只“大猩猩”也嫌多了点。他们之间争夺第一把交椅的内讧，几乎持续了一年半之久。巴里恩托斯声称，在这期间，曾有人八次企图谋害他。但是他不仅安然无恙地活着，而且还把他的劲敌奥万多排挤到了次要的地位上去，至少暂时是如此。巴里恩托斯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派、改革家、革命者。他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玻利维亚革命阵线”。他正如约翰·根室在其名著《拉丁美洲内幕》一书中对他所下的评语那样，是个“有活动能力的”将军，讲起英语来就象讲克丘亚语一样流利，他显然赢得了美国佬的欢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奥万多在中央情报局驻玻利维亚的特务机关头目兼美国驻拉巴斯大使馆武官爱德华·福克斯上校的压力下，只得让位，不过巴里恩托斯和福克斯信誓旦旦地

向他保证：四年之后让他执政。他们保留了奥万多武装部队司令这个职位，作为担保。

一九六六年七月，巴里恩托斯和他的竞选伙伴，过去也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活动家西莱斯·萨利纳斯，当选为总统和副总统，同年八月正式就职。然而，国内紧张的政局并未因此而缓和。报上公开讲奥万多“心怀不满”，随时可能把巴里恩托斯“赶下台”。正因为所有的玻利维亚问题观察家都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于是就出现了第三个争夺总统宝座的人：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马科斯·巴斯克斯·森佩特吉上校。巴斯克斯·森佩特吉警告说，如果奥万多夺得政权，他很快就会把奥万多赶下台，由他自己取而代之，“绝不能让神圣的位置空着”。奥万多受不了这种威胁：他将巴斯克斯·森佩特吉撤职，任命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接替他。奥万多根本没有料到任命托雷斯是在为他自己掘坟墓……

正在这几个人为争夺玻利维亚头号“大猩猩”的位置闹得不亦乐乎的当儿，关于即将爆发游击运动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已来到玻利维亚的传说日甚一日。极其自信而又爱吹大牛的巴里恩托斯，断然驳斥说，这一切纯属谣传。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他在拉巴斯向新闻记者宣称：“我不相信鬼魂。我确信，切·格瓦拉早已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见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以及卡斯特罗制度的其他受害者了。”

但是，正是在三月十一日这天，维森特·罗加瓦多·特拉萨斯和帕斯托尔·巴雷拉·金塔纳从“卡拉米那”开小差跑了。后来才弄清楚，前者本来就是警察局的密探，



后者则是一心想投敌的逃兵。他们两人指望能到拉巴斯去以高价抛出他们所掌握的情报，要知道他们的情报非同儿戏，他们确切知道游击队里有古巴人，而且领导游击队的是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本人！他们固然还未见到格瓦拉，但是有人给他们看过他的照片，他们知道他化名“拉蒙”，甚至知道他到达玻利维亚的日期。此外，他们在营地内，还看到过德布雷、布斯托斯、塔妮亚、“中国人”，总而言之，他们样样都知道。但是这两个叛徒没有到得了拉巴斯。他们在格兰德城被捕了。军方的侦察机关在三月十四、十五两天对他们进行了审问。<sup>①</sup> 不难设想，那些军人听了这两个叛徒的供词后，是何等的吃惊。他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切，竟在玻利维亚，就在他们身旁！如果这两个误入歧途的矿工不是在胡说八道，那么事情是极端严重、万分危急的！他们已经吓得草木皆兵了。神通广大的切，并不是到玻利维亚的丛林中来散散步的，鬼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说不定他的营地里不但有古巴人，而且还有中国人、俄国人和来

---

① 也许中央情报局从其特务机关处获得切在玻利维亚活动的情报要早得多。至少，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断定，中央情报局早在1967年2月20日就知道此事了。1969年1月14日，阿格达斯在法庭上受审时宣称：“我有足够的理由猜想：美国情报机关获悉在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一事，早在我国当局得到第一批有关这方面的情报之前。当中央情报局的文件传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发现其中有一份报告所注明的日期比尼阿卡瓦苏河上第一次冲突（发生在3月23日。——作者）早三十四天。这份报告汇报了有关达格尼诺·帕切科一切活动的情报，他是游击队的财务主任……”达格尼诺·帕切科就是切·格瓦拉日记中的桑切斯。——原注

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共产党人！那些军人不寒而栗了。

格兰德城方面立即向在拉巴斯的巴里恩托斯拍去了电报。最初，有关切已到达尼阿卡瓦苏河地区的这一消息，政界中没有一人相信，都认为是无稽之谈。不过还是下令立即占领“卡拉米那”，核实两个叛徒的口供。

三月十六日，一队士兵奉命占领了“卡拉米那”，查获了不少东西，无不证明这个地区确实有游击队存在。不久，留下来担任巡逻的一组士兵中，有一名士兵不知给什么人打死了。是给游击队打死的吗？一点也不错。在这名士兵丧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七日，有一名游击队员，叫萨卢斯蒂奥·乔克·乔克的，被政府军俘虏了，这个家伙象那两名叛徒一样“多嘴”，他证实了那名士兵是游击队打死的。这时农民巴尔加斯又提供了有关游击队的新的情况，他发现了马科斯，便引着士兵，沿着马科斯的足迹，追踪到了游击队的营地。

然而有关罗加瓦多、巴雷拉、乔克·乔克三人叛变投敌，供出了一切，以及巴尔加斯充当讨伐队的向导等情，直到对德布雷提出诉讼时，方为世人所知。在这次诉讼中，“卡拉米那”的邻居阿加尼亚拉斯的告密者的嘴脸也暴露无遗了。德布雷揭露了他们，说得确切点，提到了他们，因为无须再由他来揭露了，这些家伙和德布雷一起坐在被告席上时，自己就曾提醒法庭他们曾为消灭切的游击队立下过“功劳”。

那么这几个叛徒和向警察局告密的人，怎么会和德布雷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呢？再过一会儿，读者就会知

道的。而现在,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这些告密者的告密行动,导致了三月二十三日玻利维亚政府军第一次与游击队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政府军在这次冲突中,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六人被打死,十四人被俘,八人逃跑。这八名士兵,吓得魂不附体,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卡米里,向第四师师部报告了他们所遭遇到的不幸,同时把游击队的人数夸大了好几倍。

卡米里方面急忙向拉巴斯发出了密电,收到电报的人把密电的内容报告了参谋长胡安·何塞·托雷斯少将,后者立刻向武装部队司令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和军方情报机关首脑费德里科·阿拉纳作了报告。奥万多把这一消息通知了巴里恩托斯总统,而阿拉纳则把这一消息报告了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美国军事使团的值日美国顾问。

巴里恩托斯和美国顾问,又把所发生的事件告知了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道格拉斯·亨德森,后者迅即向华盛顿发出了相应的密电。在华盛顿首先看到这份密电的是约翰逊总统的拉丁美洲事务顾问威廉·鲍德勒,其次是总统处理国外特别重大的紧急事务的顾问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罗斯托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协助下着手准备向美国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

五角大楼,以总参谋长约翰逊将军和南方司令部(即设在巴拿马运河区的所谓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罗伯特·威·波特将军为代表,坚决主张立即武装干涉玻利维亚,并建议为此成立突击部队司令部,取名“区域性军援司令部”。而情报机关则以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

尔姆斯为代表,力主由他们去干掉切的游击队。

当时华盛顿究竟作出了什么决定,它对唯主子之命是从的“大猩猩”巴里恩托斯究竟作了些什么指示,究竟叫他采取什么对策,只要根据巴里恩托斯此后的行动和他在白宫的靠山的行动,就可判断出来。

华盛顿以及追随其后的玻利维亚当局,千方百计地对舆论界封锁他们于一九六七年三月所获得的消息,不让人们知道威名赫赫的游击队指挥员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正率领着一支国际性的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地区活动。无论乍一看来他们这么做是多么的不合情理,但事实总是事实。

哈瓦那对切去玻利维亚一事严加保密,切本人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不想让美国和巴里恩托斯知道这件事。而美国和巴里恩托斯在得悉此事之后,也装出一副样子来,仿佛他们并不知道切在玻利维亚似的。甚至当玻利维亚各报已纷纷报导游击队是由切率领的时候,玻利维亚当局还故作姿态,连忙出来辟谣说,领导游击队的不是切,而是一个和他同姓的人——矿工领袖莫伊塞斯·格瓦拉。

按理说,这些人既然掌握了切在玻利维亚领导一支游击队的可靠情报,势必要把这事捅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的,可是他们却采取了一反常态的奇怪做法,这该怎么解释呢?

而且,对美国统治集团来说,切在玻利维亚领导游击队一事,本可用来作为他们出兵玻利维亚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的,可是他们却不予利用,事情之怪就在于此。为了

不想利用这事作为借口,他们就必须秘而不谈这事本身,否则他们就不得不作出解释为什么要放过这个机会。说实在的,美国这一次为什么要放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呢?

其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在于:如果武装干涉玻利维亚,势必就会应了切的一句话,在拉丁美洲造成“第二个越南”。而且,紧跟美军之后,阿根廷军队就会立即从南面开进玻利维亚,巴西军队就会从东面开进玻利维亚,因为这两个国家早已在为控制玻利维亚而明争暗斗了。美国、阿根廷、巴西三国出兵玻利维亚,势必会引起种种麻烦。三国的武装干涉将使得玻利维亚群情激愤,起而反抗;至于智利和秘鲁,由于担心事情可能以阿根廷和巴西瓜分玻利维亚为结局,必然会极力反对这种干涉。

所以华盛顿如果决定出兵玻利维亚,就等于被切牵着鼻子走,去帮切的忙了。对约翰逊总统来说,一个越南已经使他焦头烂额,因此他根本不想再去制造“第二个越南”了。对他来说,当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已经够他受的了,不但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大洲,而且在美国国内都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因此他无意再命令军队开往玻利维亚的丛林中去了。

既然这样,他就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切在玻利维亚,否则的话,美国的极右派仍然会迫使他派遣海军到玻利维亚去的。再说,如果证实了切在玻利维亚的话,就会推波助澜,加速这个国家革命风潮的发展,导致巴里恩托斯的倒台,而这也是白宫的居住者所不意见到的事情。

因此,只能用其他各种办法除掉切,而上策是借玻利

维亚当地人之手把这人干掉，就象秘鲁、危地马拉、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当年对付游击队时那样。只有到了实在万不得已、确实已经别无他途了，才能派美国兵到玻利维亚去，到了那时如果不能把玻利维亚变成第二个多米尼加共和国，至少也要将其变成“第二个越南”。

不用说，采取这样的对策，不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巴里恩托斯来说，都是一种冒险。要知道，切是很可能培植起一股雄厚的力量来的，以至于此后再怎么发动武装干涉也奈何他不得了。不过这也没有有什么关系，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苗头，另取对策也还来得及。

而目前应当保持沉着，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切总共只有几十个人，不错，比十年前菲德尔的人要多一点，但是这一次历史未必会重演，正如在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历史并没有重演一样；在这些国家，美军并没有直接参与作战，地方当局照样扑灭了游击队。

德布雷、布斯托斯和鲁斯在四月份被捕入狱，只不过证实了切所拥有的手段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使玻利维亚命运的主宰者们及其在华盛顿的主子益发认为，没有必要去提起切这个人。再说，那些随着美国的指挥棒打转的卖身投靠的报纸，已不知多少次报导过切被枪决或打死的消息，而且把他的死地一会儿说成是古巴，一会儿说成是秘鲁，一会儿又说成是刚果，甚至说成是苏联。连巴里恩托斯本人也说过他不信鬼魂。现在要他们改过口来，由他们使切复活，并且还要让切领导一支游击队，说不定还是一个游击兵团，这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困难的，甚至是可怕的。

对切是要忌讳的，不得提他，但是对于德布雷，非但不必忌讳，而且应当放手大做他的文章，俗话说，在没有鸟的地方，连鱼也是夜莺。德布雷这个人既然不无自负地自命为丹东<sup>①</sup>，那就注定要当上一个时期这样的“夜莺强盗”<sup>②</sup>了。

玻利维亚当局于四月二十日抓到了他，就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凶犯”。甚至给他特制了一件条纹囚衣，背部缀有特大的号码“001”，大概是“第一号敌人”的意思。

如果听信玻利维亚政府的宣传的话，那就当真会以为游击行动精神上的感召者，杀死玻利维亚士兵的“凶手”，不是切，而是德布雷这位法国人，说得确切点，这位“法国的古巴人”。如果听信他们的宣传的话，那就当真会以为“老百姓”（其实是警察局的便衣特务）包围了关押德布雷的卡米里城军官俱乐部，一致要求处决他。虽然玻利维亚已经取消了死刑，但是巴里恩托斯却要求唯他的意志是从的议会恢复死刑法，并希望把通过恢复死刑法的日期说得早一点，以便使这项法令能适用于他的那个犯人。本来，这位将军出身的玻利维亚总统，只消把“企图越狱潜逃”的罪名加之于德布雷，也可将他结果掉的。但是这时戴高乐出面来为德布雷请命了。巴里恩托斯不得不考虑法国总统的愿望。他记得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件事情，在上世纪，他的一位先辈，梅尔加雷霍总统，生了英国

---

① 丹东，请参看 54 页注①。——译者

② “夜莺强盗”系俄罗斯古代壮士歌中半人半禽的怪物，专事以哨声和嗥叫声杀害去基辅的旅人。后壮士伊里亚·穆罗密茨将其击败，押至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宫中处死。——译者

大使的气,就把大使驱逐出境,叫他乘着驴子从拉巴斯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维多利亚女王为了报复起见,下令把玻利维亚这个国名从所有的地图上勾掉。巴里恩托斯不想同戴高乐将军闹翻,便打算“文明地”、“合法地”处死德布雷。

巴里恩托斯及其华盛顿的主子们所拟定的惩治德布雷的计划大致上就是这样,与此同时,他们全力以赴地准备对德布雷进行公开诉讼。由于德布雷“顽固不化”,他们便决定让百依百顺的布斯托斯也和德布雷一起坐在被告席上,布斯托斯不仅供出了他所知道的有关切和尼阿卡瓦苏河的全部情况,甚至还把他在游击队营地内所见到过的和打过交道的人的相貌全都画了出来,而且画得相当逼真,一个业余的美术爱好者能画到这样的地步,水平算是不错的了。跟布斯托斯一起坐在被告席上的,还有警察局的密探:罗加瓦多、巴雷拉、乔克·乔克和西罗·阿加尼亚拉斯,这些人奉命装扮成“已经悔改的”游击队员。列入被告人当中的,还有豪尔赫·巴斯克斯·马奇卡多·比亚尼亚,就是头一次认识切的时候差点儿昏倒的那个“小胡子”,但在开庭时他“因病”没有出庭,其实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是给警察严刑拷打而死的。但是政府“羞于”承认这一点,在审讯期间,检察官曾不止一次答应把他提交法庭,不消说,他无从履行自己的诺言,因为玻利维亚暗探虽然能够杀死不合他们口味的人,但是却无法使他起死回生。他们后来只得宣布他“越狱潜逃”了,这样他们就可以“缺席”判处死者以徒刑。

对德布雷的起诉准备了五个月之久。但无论是起诉



的准备也好，或者是诉讼本身也好，并不能把切消灭掉。然而至关重要的却是从肉体上消灭切和他的游击队，可是巴里恩托斯恰恰办不到这一点。

直到八月份华金小组在耶索渡口附近惨遭杀戮之前，玻利维亚军队同游击队交战，每次都吃败仗。这就给人一种印象，游击队的确是不可战胜的，很有可能成功，至少能促使巴里恩托斯政府垮台，这不仅是游击队所希望的，也是这个将军出身的总统的许多政敌所求之不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当权派以外，玻利维亚舆论对于切所领导的游击队的出现都极为赞赏，特别是在头几个月游击队屡战屡捷时，更是如此。只要引几句维克多·帕斯·埃斯登索罗讲的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他讲道：“游击运动是玻利维亚事态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代表，对起义者抱同情态度……”诚然，这种同情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但是这些话表明，连帕斯·埃斯登索罗这样一些老奸巨猾的政客都认为游击队有成功的可能性。

甚至奥万多将军也想利用游击运动的存在，来证明巴里恩托斯总统没有能力把游击队镇压下去，从而加强他同巴里恩托斯争权夺利时的地位。

巴里恩托斯害怕他属下的武装部队司令甚于害怕游击队，但又不能撤他的职，因为美国驻拉巴斯大使亨德森反对。

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门迪埃塔虽然对游击队大声恫吓，声称要在“最近期间”将他们剁成肉酱，但

是据我们现在所知，主要不是出于好战，而是想借此掩盖他同游击队的联系。由此可见，在政府的三个主要成员中，只有巴里恩托斯一人力求尽早除掉游击队。奥万多在这件事上并不特别热心，而阿格达斯则用杀气腾腾的讲话作掩饰，在当时的情况下尽其所能，极力打乱另外两个人的行动。

八月份以前，政府虽然在追击游击队方面没有什么显赫的战功可以夸耀，可是在打击其他反政府力量方面，情况就不一样了。罢工以及大学生反政府的示威游行，都被迅速而坚决地镇压了下去。“罪犯”有的被关进监牢，有的被流放，有的干脆就被枪杀了。

六月二十五日，政府军对卡塔维—瓦努尼矿区发动进攻，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大屠杀。有八十名矿工被杀害，数百名受伤。矿工们被解除了武装，“自由的矿区”还未给切的游击队以丝毫援助，就不复存在了。事实证明，矿工们非但没有能力采取进攻的行动，甚至都没有能力抵御政府的军队。他们实际上没有对讨伐队进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就让人家击溃了。矿工“共和国”的倾覆壮了巴里恩托斯的胆，他终于批准第四师师长路易斯·雷克·特兰于七月五日宣布切在其地区内，并大大地夸大了切的兵力，说游击队有四百人左右！同一天，巴里恩托斯还允许新闻记者去采访德布雷，德布雷也证实切在那个地区“待过”。这个回答很可能使人认为切已经不在那里了！

但是没过几天，却传来消息说，距卡米里三百五十公里的苏迈帕塔镇曾一度被游击队占领，这使当局的乐观

情绪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游击队乘上一辆大卡车就开进了苏迈帕塔镇，而由一个中校带领的当地警备队竟未作任何抵抗，这种情况使政府及其美国主子大为泄气。亨德森大使在华盛顿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发言时宣称，要靠玻利维亚政府来除掉游击队将是很困难的；而《纽约时报》在这些日子里发表文章说，从军事观点来看，游击队正在积聚力量，有理由怀疑巴里恩托斯政府能否消灭他们。

与此同时，国内大学生的反政府行动并未停止，教师纷纷罢教，到处有谣言说国内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游击中心。八月，人们等待已久的对德布雷的诉讼，终于在卡米里开始了。政府本想利用诉讼煽起超民族主义的狂热，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却未能如愿。社会舆论对政府是不利的。结果，由形形色色的政治集团组成的大杂烩，即支持巴里恩托斯的所谓玻利维亚革命阵线，土崩瓦解了。

那么在此期间，美国人究竟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比以往更其狂热地阻挠本大陆反帝革命运动的发展，无耻地干涉拉丁美洲各国的内政。华盛顿继续用封锁来扼杀古巴，并通过中央情报局，不顾一切地准备行刺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代表大会在哈瓦那召开期间，就曾揭露过华盛顿的这一企图。同时，五角大楼则力主建立统一的泛美武装力量，打着这个幌子，就可以对“桀骜不驯”的拉丁美洲各国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

至于玻利维亚，则到处都是美国特务，他们收集各种

各样的情报，密切注视着这个国家事态的发展。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专门对付切的游击队的特别行动小组。领导这个小组的是，巴拿马运河区美国南方司令部情报机关头子空军准将威廉·斯克尔，这人精通西班牙语，先后镇压过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游击运动，是这方面的一个老手。他的副职是驻巴拿马运河区特种部队（即“突击队”）第八团团团长雷蒙德·韦伯中校。韦伯从他手下的特工“专家”中，选拔了五十人，组成了一个巡回教导队，由拉尔夫·谢尔顿少校充任队长。谢尔顿绰号叫“老头子”，曾经当过设在老挝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反游击战训练营”的主任。现在他受命在两个月的时间内，选拔六百名玻利维亚人，组成一支“突击队”，加以训练。与此同时，“老头子”还要组织对三个步兵连的为时一个月的紧急复训，使他们能够适应同游击队作战。四月底，这些部队急行军至“希望”甘蔗种植场。这个种植场位于圣克鲁斯以西一百公里，如今成了军事训练的营地。待到部队赶到种植场时，老头子和他手下那批专搞杀人勾当的专家已经在那里了。他们立即着手对这些将要杀害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凶手进行训练。

在对这些部队进行反游击战训练的科目中，情报工作据有重要地位。这项工作指定由特种部队“突击队”所属的那些特别情报小组负责。它们结业后的任务不仅要到当地居民中去搜罗特务，还要向当地农村派遣职业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将伪装成卫生工程人员、猎人、商人、教师、当地居民的亲戚、收税人、农艺师、大学生，或者旅行者。在圣克鲁斯附近的基地内教授这些“学科”的，是

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古巴的反革命分子费利克斯·拉莫斯上尉、爱德华多·冈萨雷斯上尉和波多黎各人马尔加里托·克鲁斯上尉。

到八月初，由“老头子”训练出来的“突击队”，便已在切的游击队活动的地区配置停当。而拉莫斯、冈萨雷斯和一个叫做加夫列尔·加西亚的内政部“顾问”（三人都是古巴人），则由巴里恩托斯、军事情报机关首脑费德里科·阿拉纳和中央情报局驻玻利维亚的间谍头子威廉·库尔亨联合举荐，冒充是什么博士之类，到卡米里的第四师师部临时任职，掌管全部情报工作。他们亲自审讯德布雷和其他因有串通游击队的嫌疑而被捕的人，亲自指挥情报人员，还从事其他诸如此类的工作。后来，当玻利维亚法院审理前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一案时，第四师的情报处长阿诺尔多·森特诺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三日出庭作证说：“在反对游击队的全部活动中，我们与费利克斯·拉莫斯和爱德华多·冈萨雷斯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为美国服务的，而美国是我们反对游击队的斗争中的盟国。”

曾同切的游击队打了最后一仗的“突击队”第三营营长安德烈斯·塞尔尼奇·肖恩中校在同一庭上指出：“在战区活动的中央情报局的谍报人员完成了重要的工作。我要特别指出，他们向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每个游击队员的照片以及各人的特征，这样，在游击队员还未落网之前，我们就能认得出他们所有的人了。”

玻利维亚情报机关的一名军官迈塞斯·巴斯克斯曾就其所了解的情况，向同一法庭作证说：“内政部的一切

情报,在尚未送交军队的情报处以前,就已有人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休戈·默里上尉之手,送到了美国大使馆。这个情况是由在内政部工作的默里手下的谍报人员透露的。”

内政部情报局局长罗伯托·金塔皮利亚上校也证实说,拉莫斯、冈萨雷斯和加西亚,“绕过内政部将情报,首先是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送交他们的大使馆。这是他们瞒着我们,自己干的”。

如果认为在玻利维亚,中央情报局特务们的这种无礼举动,仅仅是在扑灭切的游击队时才开始的,那就过于天真了。据前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的供词称,早在一九五七年,亦即在古巴革命胜利前两年,玻利维亚爆发游击战之前十年,中央情报局的魔爪就已伸进玻利维亚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发动尤罗山峡一战来袭击切及其战士的,是属于“突击队”的几支部队;这几支部队是由中央情报局特务谢尔顿和古巴反革命分子拉莫斯、冈萨雷斯以及加西亚亲自加以严格训练并亲自指挥的。

早在九月二十九日,美国通讯社就由卡米里发出消息说,玻利维亚军队已经发现切·格瓦拉的游击队转移到了该城西北一百二十八公里的狭谷中。为此“突击队”便由圣克鲁斯火速调往该地。

美国人深信,他们的帮凶们这次一定能够十拿九稳地把他们的死敌收拾掉,因此,《纽约时报》十月七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切·格瓦拉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言格瓦拉已死在旦夕了。

十月八日，一名叫做文卡的中士，在俘获了切和威利以后，便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正在尤罗山峡中的“突击队”的一个分队的队长加里·普拉多上尉。这是第一批俘虏（“中国人”是在几小时之后被捕的）。不消说，普拉多赶紧跑去看俘虏。他一下子就认出了伤员中有一人就是切。这个赳赳武夫后来向记者们承认说：“我当时大吃一惊，几乎昏了过去。”普拉多立即通过无线电向第四师师长森特诺上校作了报告，报告时用的是暗语：“口径五百”，意思就是：“切已俘获。”

接着，切和威利由一队加强了警卫队押着，被解往依格拉村。切由两个士兵扶住，一瘸一拐地走着；威利的双手给反绑了起来。他们在夜里到达了依格拉村，就被关进学校。这个学校是一所只有两间小小的教室的陋屋。切被缚住双手，关在其中的一间里，威利则被关在另一间里，双手自然没有松绑。几小时后，政府军的卫生兵费尔南多·桑科跑来用水洗净了切腿上的伤口，还消了毒。

天刚亮，一架架载着要人的直升飞机便陆续在依格拉村降落。首先来到的是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和情报机关的米格尔·阿约罗亚上校，随后是森特诺上校、武装部队司令奥万多将军、乌加特切海军少将、冈萨雷斯“博士”以及中央情报局的其他特务。他们全都走进了切的房间，想和他谈话。

切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小时内，向他的敌人讲了些什么，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知道他曾同这个学校的二十二岁的女教师胡莉亚·科尔特斯谈过一次话。在教室的黑板上有一句用粉

笔写的西班牙文：“我已经会读书了。”

切微笑着对女教师说：

“写错了，‘会’字上不该标重音的！”

然后他向她介绍了古巴发展教育的情况。甚至在临死前的几小时，他都没有忘记进行革命宣传。

冈萨雷斯“博士”妄图审问他，但是切一声不吭。

“你在想些什么？”敌人问他。

“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很可能，这就是他最后的一句话。

整个早晨，奥万多和其他的高级官员一直通过无线电同巴里恩托斯商量，而冈萨雷斯和他的同事们，也就是说，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们，则一直在同美国大使馆商量。

冈萨雷斯拿起无线电话来，向他的上司，即绰号叫做“老头子”的拉尔夫·谢尔顿少校夸耀说：

“‘老头子’，他已经落在我手里了。”

是的，切现在的确已经落在他的死敌的手里了。

到中午时，除了塞尔尼奇和阿约罗亚两人外，其余的人都飞离依格拉村到格兰德城去了。他们带走了切背包里的文件，其中包括他的著名的日记。

这时“中国人”也已经关在威利的那间教室里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下午一时半光景，几名“突击队员”走到威利和“中国人”跟前，用冲锋枪把他们两人杀害了。威利在临刑前还来得及高呼道：“我能同切一起就义，我感到自豪！”

马里奥·特兰少尉立即冲到切的跟前，用枪口顶着切的身躯，连发数枪，把切打死了。



## 5. 革命事业永垂不朽

我的失败并不表明不能取胜。很多人在努力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都遭到了失败，但最后珠穆朗玛峰还是被征服了。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

敌人杀死了切。他们匆匆忙忙杀死了他。为什么？

非常明显，他的敌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杀死象他这样一个负了伤的、被缚住了双手的战俘，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满足他们强烈的复仇欲。杀害切不是一般的罪行，而是具有政治用意的罪行。因为切即使已经被俘，即使已经戴上脚镣手铐，即使已经遍体鳞伤，只要一息尚存，对他的敌人来讲，仍然是莫大的危险。

巴里恩托斯如果让被告人切在法庭上发表痛斥他的演说，他就未必能保牢总统的位子，连他的美国主子也未必能顶得住。如果不经法院审判而把切囚禁于狱中，同样也是危险的。整个世界都可能起来捍卫切，只要切在狱中一天，那么无论是拉巴斯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大猩猩”，无论是华盛顿驯猩猩的那帮驯兽师，都休想太平平地睡觉。只有切死了，他们才能指望重新获得安宁和自信。

他们所以敢于杀死切，还因为他们深信：他们的滔天罪行是不会败露的。

也就在十月九日那天，切尸骨未寒，就由一架直升飞机将他空运到格兰德城，交给当地医院的医生去验尸。同时，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部的代表则对新闻记者宣布，切是在尤罗山峡一战中受伤而死的。

但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们却出来拆台，揭穿了这一弥天大谎。

他们首先发现了这样一个破绽，即：还在这个弥天大谎出笼之前，奥万多曾向记者们吹牛说，切在被俘时声明：“我失败了。”然而在格兰德城检验切的尸体的医生们、获准采访验尸的新闻记者们，以及他们所拍摄的照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切身上有九处枪伤，其中至少有两处是致命的：一处心脏的部位，另一处在脖子的部位。由此可以推断出：如果切的这两个部位是在交火时中弹的，那么他就根本不可能发表那个声明了，因此所谓声明之类无非是奥万多编造出来的；反之，如果切真的发表过那个声明的话，那就意味着他是在被“突击队”俘虏以后，再被杀死的。

记者们找到了几十个证人。这些人证实切被押到依格拉村时只有一条腿上有一处弹伤；证实军方曾企图在那个村子里审问他；证实切曾和一位女教师谈过话；还证实了切是被马里奥·特兰杀死的。虽然当时报刊上很少提到威利和“中国人”，但是谁都不怀疑他们两人是在切隔壁的教室里被枪杀的。

记者们便根据所有这些事实，“毫不客气地”诘问玻利维亚当局的代表。后者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根本无法自圆其说，而且每作一次新的“解释”，每进行一次新的

“辟谣”，就愈加破绽百出，把那些双手沾满了切的鲜血的人，都一一暴露了出来。

自然，大家都认为，在玻利维亚人当中，总统巴里恩托斯将军是杀害切的元凶，而后者为了推托罪责，特地向《华盛顿邮报》记者作了如下声明：“士兵们抓到切以后，并没有向拉巴斯请示，也没有从我们这里接到处死切的命令。因为无须请示，军队早已有令不要抓俘虏。游击队往往一面答应投诚就俘，一面却乘机向我部队开火。至于我个人，倒宁愿有格瓦拉这么一个俘虏，以便一劳永逸地粉碎格瓦拉的神话。再说，我身为总统，有责任为玻利维亚筹集款子。如果有人建议，比方说，以两千万美元的代价，把活着的格瓦拉出让给菲德尔·卡斯特罗或者旁的任何人，我是会考虑这个建议的。”

这篇懦弱而无耻的声明，没有一字不是谎言。

等到显然很难再向世界舆论隐瞒杀害切的真相的时候，玻利维亚当局又犯下了一桩新的罪行：他们把切的遗体隐藏了起来。

十月十日，切的遗体从格兰德城消失不见了。巴里恩托斯和奥万多一会儿声称，切的尸骨已迁葬到玻利维亚一个只有他们知道的地方，一会儿又声称，切已被火化，骨灰已经埋掉。同时还有消息说，切的遗体已转到中央情报局手里，由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将其运到了美国霸占的巴拿马运河区。<sup>①</sup>

<sup>①</sup> 巴里恩托斯唯恐切以及他的同志威利和“中国人”遇难的那所小学成为人们前去朝参的圣地，悍然下令将其拆毁，在其遗址上另盖了一幢同样简陋的房子，作为“卫生所”。直到巴里恩托斯死后，才又将其拨归小学。——原注

不管怎样，反正有一点现在已经查明：凶手们在把烙下了他们罪证的切的遗体搞走以前，曾拓下了切的石膏面型，还砍下了他的双手，浸在酒精里保存着。他们要靠此证明，他们所杀害的确确实实是切。他们担心，人们会不相信他们这伙侏儒竟能战胜象切这样的巨人。

然而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切已经牺牲，他已不在人世，这是无可置疑的了。在玻利维亚之外，最先承认这一事实的，正是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

早从十月十日起，古巴报刊就已天天报导在玻利维亚发生的这一悲惨事件的各种不同的消息了，其中包括有关切牺牲的详情细节的各种不同的说法。虽然在发表所有这些消息时，未加任何评论，但是人民懂得，这些消息包含有多么可怕真实性啊！

十月十五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发表电视和广播演说，证实切已牺牲。古巴革命的领袖详细地谈了切牺牲的经过，一一揭露了杀害切的凶手，指出这些家伙正在拚命地掩盖他们的罪迹。在结束演说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宣读了古巴部长会议的决议。决议表彰了切在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而进行的斗争中所建树的功绩。宣布志哀三十天，并将十月八日定为“英雄游击队员日”。成立了切的治丧委员会和纪念委员会，由胡安·阿尔梅达领导。

十月十八日晚八时，在当年人民多次欢迎过切的哈瓦那革命广场上，古巴首都的数万居民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倾听菲德尔·卡斯特罗讲述这个为拉丁美洲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生活、而斗争、而捐躯的人的英雄业绩和

惨痛牺牲……

切的牺牲使各国的劳动人民都感到悲愤和震惊。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的唁电、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唁电象潮水一般涌到哈瓦那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唁电内容如下：

“苏联的共产党员惊悉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同志英勇牺牲，无不感到万分悲痛。

“切·格瓦拉同志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摆脱压迫和剥削的伟大事业而牺牲的。他作为一个大无畏的革命者，一个具有崇高而纯洁的心灵和无比的忘我精神的人，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十月十八日，《真理报》刊载了这个唁电，同时还发表了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署名的悼念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悼文。

至于拉丁美洲，切的牺牲在那里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玻利维亚仆从的怒潮，激起了人们对于切的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的衷心拥戴。这种拥戴之情，就其热烈和激动的程度而言，只有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席卷拉美大陆的支持古巴的运动才能与之比拟。

切的死亡使拉丁美洲各国诞生了成千上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使这些国家的阶级矛盾更其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日子内，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拉丁美洲，连许多资产阶级报刊也都发表文章说，杀死切并没有解决任

何问题。因为只要拉丁美洲的人民还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么拉丁美洲就必然会产生新的社会动荡，就必然会出现新的革命运动，而其声势也必然比当年在依格拉村一所没没无闻的乡村小学里被枪杀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其浩大。

下面我们还要谈谈跟切在玻利维亚打游击有关的一些事情，其中也包括跟他的死有关的一些情况。

在切惨遭杀害的同时，德布雷、布斯托斯和其他参加游击运动的人，仍然还在卡米里受审。而现在切既然已经死了，对玻利维亚当局来说，再把这出闹剧演下去，就没有必要了。于是，军事法庭便于十一月十七日判处德布雷和布斯托斯三十年徒刑。那几名奸细也被判处“有期徒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立刻获得自由。

德布雷和布斯托斯在卡米里一直服刑到一九七一年一月。在一月份，他们获得大赦，被驱逐到智利。一个月后，德布雷到达古巴。古巴报刊报导说，德布雷将向新闻记者介绍他在玻利维亚狱中的遭遇，可是结果并没有举行这样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不久后，他就离开古巴，回欧洲去了。在那里出版了一本书，记载了他同智利现任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谈话。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条轰动一时的消息传遍了全球：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宣布，古巴领导人从玻利维亚一个同情者那里获得了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日记的照相复制本；经检验确定，这个复制本并非贗本，因此决定在古巴大量发行，免费赠送。古巴领导人还决定无代价地把日记的复制本交给外国的出版社，使之能在国

外出版。

在拉巴斯，巴里恩托斯总统犹图对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反击。他宣称切的日记的所有复制照片至今由他亲自监管着，因此菲德尔·卡斯特罗能够拿出来无非是伪造的日记复制本，要不就是根据玻利维亚政府零星公布过的日记片断拼凑起来的東西。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发表电视演说，当众展示了切的日记和他被俘时为玻利维亚当局搜去的其他文件的照相复制品。古巴政府首脑在演说中揭露，玻利维亚的高级官员们竟然无耻到了在过去八个月的时间内，多方奔走，想以一百万美元的价格，将死于他们之手的切的日记，出售给外国的出版社。

毋庸置疑，在此之前，一直严严实实地锁在玻利维亚总统和华盛顿中央情报局的保险柜内的切的日记和他背包里的其他文件，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哈瓦那手里。如今将由革命的哈瓦那而不是由拉巴斯和华盛顿来发表这些文件了。

过了几天，巴里恩托斯总统不得不承认，哈瓦那确实掌握了切的各种文件原件的照相复制品。既然如此，就必然产生一个问题：是谁把这些文件交给哈瓦那的？毫无疑问，只有地位很高的人才能办到这件事。那么这人是谁呢？

没有多久，这个问题的答案便见分晓了。就在同年的七月十九日，巴里恩托斯总统最亲信的人之一，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从玻利维亚逃亡到了智利。他告诉智利的新闻记者说，长年来他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间

谍，但是他决意同这伙“阴谋反对全人类的凶恶匪帮”一刀两断。他还告诉记者们说，把切的那些文件交给哈瓦那的就是他。

继此而发生的事情，就象侦探影片一样。阿格达斯由智利前往伦敦，接着去纽约，然后又去秘鲁首都利马。他到处发表各种声明，而且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他到利马后，突然发表声明说，他准备回拉巴斯出庭受审，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

阿格达斯果然回到了拉巴斯。他在拉巴斯被捕入狱。由最高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讯，但是审讯时不准旁听，审讯内容有一段时间，外人一无所知。人们只知道法庭对此案没有作出任何判决，就把阿格达斯释放了。

一年后，在拉巴斯，有几个身分不明的人企图暗杀阿格达斯，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从一辆疾驶的汽车中，用机枪向他扫射。阿格达斯中弹负伤，住进了医院，伤愈后，由医院直接去墨西哥大使馆避难。

一九六九年九月，玻利维亚政府当局允准阿格达斯离开玻利维亚，他便携带家眷前往墨西哥。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举家迁往哈瓦那，从此便在那里定居了下来。

不久之后，秘密审讯阿格达斯的审讯记录的照相复制品——计两百五十张照片——流到了玻利维亚国外，拉丁美洲和欧洲各国的报刊纷纷发表了此案审讯记录的摘录。<sup>①</sup>后来，阿根廷政论家格雷戈里奥·塞耳塞尔在其所著的《中央情报局在玻利维亚》一书中，全文公布了

<sup>①</sup> 1970年6月，K·卡列尼内在《文学报》第25和26两期上，发表了此案审讯记录的摘录。——原注



此案的审讯记录。本书也援引了此案审讯记录中的某些部分。阿格达斯在他的供词中，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及其在玻利维亚的特务机关的破坏活动。他在为自己辩护时，向法官们讲道：“我所以离开本国，是因为我自从担任内政部长以后，在履行职责时，亲身体会到我的祖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国家的主权，美国设在玻利维亚的机关拥有无上的权力。我成了美国政府的牺牲品。”

阿格达斯供认，是他把日记交付给哈瓦那的，但没有索取任何经济报酬，他做这件事完全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他对法官们说：“我曾同不少美国官员交谈，得悉美国政府首先打算激起人们对埃内斯托·格瓦拉少校的军中日记的强烈兴趣，然后将他们自己的说法塞进日记中去，对日记原文进行大幅度的篡改，其目的是想借这部日记来证明他们对古巴进行多方面的武装侵略以及在国内实行大规模的镇压都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他们阴谋要出版一部伪造的或者与原文有很大出入的日记。”

审讯阿格达斯的记录，大大有助于人们了解玻利维亚悲剧中这位不同凡响的人物的真实的政治面貌。

“您是共产党员吗？”庭长问阿格达斯。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被告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您对格瓦拉有什么看法？”

“他是英雄，是整个美洲的榜样。”

“您向各位法官说说，您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和佩雷多兄弟俩是否熟悉，您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这个荣幸亲自结识埃内斯托·格瓦拉少校。

我跟因蒂·佩雷多少校是点头之交。至于罗伯托·佩雷多(科科)少校,我个人非常尊敬他,虽然跟他从来没有政治上的联系。”

由于哈瓦那发表了切的日记的真本,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计划便破产了。

然而阿格达斯送交古巴人民的不仅仅是切的日记以及他背包中的其他文件。阿格达斯在做这些事情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他在没有迁居哈瓦那以前,无日不是如履薄冰,冒着生命的危险。那么他究竟还送交古巴人民些什么呢?一九七〇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纪念七月二十六日的群众大会上,谈起了这事。

古巴政府首脑在那天的大会上讲道:“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件事,继日记之后,阿格达斯博士继续进行斗争,又设法把切遇难那天从他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型送到了我国,除此之外,他还妥善地藏起了切的两只手,也将它们送到了我国。

“切的双手保存得很好。古巴的专家们为了保存好这一双手,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国家的风俗大家都是知道的。她总是将她儿子的遗体埋葬掉。这就是我国的风俗。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相沿成习的风俗。马塞奥和马蒂的遗体就是埋入土内的。今后,我们仍然要永远遵守这个风俗。但是我们现在要提出一个问题:‘切的这双手怎么办?’

“这双手是他躯体上唯一留在我们这儿的 部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哪年哪月才能找到他的遗骸,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却有他的一双手,

而这双手是完整无损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打算向人民提出个问题，依你们看这双手该怎么办？（喊声：“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吗？既然这样，我们有个建议，提请人民决定：我们已制成切的石膏面型的复制品，我们可以照此办法大量复制切的石膏面型，而将原来的石膏面型妥善地保存起来。把切的双手也同样妥善地保存起来，安放在一个玻璃容器中，每年到了切的遇难日，就把这个玻璃容器移放到这儿来，移放到马蒂的雕像旁边来，或者某个礼堂里去。切曾经用这双手紧握武器，进行解放斗争，曾经用这双手撰写文章，表达他的光辉思想，曾经用这双手在甘蔗种植场、港口和建筑工地上劳动。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个切的博物馆之类的场所，某种临时的博物馆，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愿望的话。

“切不是属于我国的。他是属于美洲的。总有一天，这双手将根据美洲各国人民的愿望，移放到他们的国家里去。而目前，则暂时由我国人民来保存它们，来悉心地照料它们……

“总之，在今年切·格瓦拉遇难的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将开放陈列着切的石膏面型和双手的场所，人民可以自由地进去瞻仰它们。不过应当承认，在瞻仰这些遗物时，每个人都会感到难受的。我知道，甚至连这个打算本身，都会震惊许多同志，使他们感到强烈的悲痛。我知道，你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是同样感到悲痛的。

“在今天的大会开始以前，阿莱迪塔（即格瓦拉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作者）到这儿来过。我跟她谈了

话，并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她，免得她措手不及。她听了之后，眼睛有点发红，落下了眼泪，但是她说：‘做得对。’

“所以切的妻子事先是知道这个打算的。他父亲事先也知道。事先总共只有几个人知道。比如说，他的孩子们就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将永远万分感激阿格达斯博士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他们杀害了切，但是他们却无法阻挠切的日记回到古巴。他们千方百计地藏起了切的遗体，但是却无法阻挠切的双手回到古巴。他们拓下了切的石膏面型，虽然用意何在不得而知，反正他们也同样无法阻挠它回到古巴人民的手里。

“切的正义的思想、他的事业、他的美德、他的伟大，使得看来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也出现了。与切不共戴天的玻利维亚政府中的一个正式成员，竟然为了救出切的日记，把它交给古巴，继而又为了救出切的双手和石膏面型，把它们交给我们，不惜去冒生命的危险，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地去冒这样的危险。

“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讲的。”

\*

\*

\*

当我们回顾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牺牲后拉丁美洲所发生的事件时，不由自主地就会想起本书曾提起过的特德·舒尔茨这个人的劝告，他是《革命风暴》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规劝他的同行在分析拉丁美洲的现实时，千万不要遵循理性或逻辑的规则。舒尔茨警告说，如果你

们不想出丑的话，那么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试图去预言事件的进程：舞台上塞满了演员，他们都由力量巨大的明的发条和暗的发条所推动，动作之快，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的确，即使是研究拉丁美洲政治舞台形势的最有经验的观察家，也未必能在切牺牲的那些日子里就逆料到若干时间以后这个大陆上会发生下面的这些事件。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日终之后至三日凌晨以前，秘鲁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接管了秘鲁的政权，成立了以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为首的军政府。最初，进步舆论界对秘鲁的军事政变抱审慎态度，但是未隔多久，这个国家新成立的军政府便以它的行动表明，他们夺取政权，根本不是为了保护地主和外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相反，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的政府在短期内把美国“国际石油公司”的财产收归国有，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两年后，在智利，联合了本国一切进步革命力量的人民联盟在总统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联盟的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总统。在拉丁美洲，革命力量以民主的方式，通过选举在一个国家内取得政权，这还是第一次。反动派对于人民联盟所取得的不流血的胜利非常恼火，企图以暗杀国防部长施奈德将军以及采取其他活动来挑起内战，但是他们的阴谋遭到了失败。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政府依靠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劳动人民的支持，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实行预定的改革：对本国的主要财富——铜矿实行国有化，加速进行土地改革，执行独

立的对外政策，同古巴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

秘鲁和智利所发生的事件，对阿根廷也并不是毫无影响的。由拉努塞将军领导的阿根廷政府，违背五角大楼的计划，表示愿意同秘鲁和智利在互不干涉内政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这几年，在玻利维亚也发生了同样值得注意的事件。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巴里恩托斯总统因飞机失事而毙命。<sup>①</sup>他的位子由副总统西莱斯·萨利尼斯继承。五个月以后，即当年九月二十六日，又一次发生军事政变，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将军被宣布为总统。但是他已经不能用他前任们的那套传统办法来统治国家了。为了保住政权，奥万多不仅迫不得已地谈到要保护民族利益，而且还迫不得已地真的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

他仿效秘鲁的将军们，把美国大石油公司“海湾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玻利维亚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他也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甚至想把杀害切·格瓦拉的全部罪责都归之于已经死去的巴里恩托斯，声称当年玻利维亚政府在决定切的命运的时候，他，奥万多·坎迪亚将军，是投票反对杀害这位英勇的游击队员的。不仅如此，奥万多还大谈其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对玻利维亚革命的发展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奥万多在他的一次演讲中

---

<sup>①</sup> 1971年，胡安·何塞·托雷斯政府对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提起诉讼，控诉他制造飞机失事谋害巴里恩托斯。但对奥万多未能进行审判，因奥万多当时在西班牙，拒不返回玻利维亚受审。——原注

说，格瓦拉“为伟大拉丁美洲祖国的理想进行了斗争，我们也同样在为这个理想进行着斗争，只不过他所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斗争手段罢了。”

奥万多的言行引起了华盛顿卡皮托利山上的神庙<sup>①</sup>的强烈不满。美国政府在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秘密报告时，把奥万多称作为“缺乏意识形态和政治信念的机会主义者”。玻利维亚政府获悉了这件事，便借它们的情报部长阿尔维托·拜利之口谴责卑鄙的美国佬搞破坏活动。拜利宣称：“凡是将本国利益置于美帝国主义大公司利益之上的一切政府，美国人都把共产主义的罪名加到这些政府的头上。美帝国主义的大公司夺去了我国这么多的财富，使我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贫穷了。”

奥万多的言行，虽然激起了华盛顿的不满，却并没有在玻利维亚人当中，特别是在他首先指望取得他们支持的军官当中赢得好感，并没有给他增加朋友。

军队中的美国特务，尤其是那些直接参加过镇压游击队的军官们，都几乎把奥万多当作叛徒看待，而在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军官看来，奥万多是巴里恩托斯的左右手，是个令人反感的家伙，他的双手沾满了切的鲜血。

奥万多由于得不到这两者的支持，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六日被推翻。有一段时间，国内陷于一片混乱。同时有六个军人声明，他们是国家总统。直到在巴里恩托斯任内当过总参谋长的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在拉巴斯的总统府内站稳了脚跟，才结束了这种混乱的局面。

<sup>①</sup> 卡皮托利山上的神庙是古罗马宗教中最高神宙比特的神庙。——译者

托雷斯提出了进步的社会改造的纲领，他得到了劳动人民——矿工和农民——的支持。托雷斯恢复了民主自由，释放了政治犯，德布雷也在其内。但是连他也没有能够保住政权：一九七一年八月他也被推翻了。玻利维亚的民主力量已陷于七零八落的境地，丧失了有效地抗击反动派的能力。有一桩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在争夺政权的这些日子里，鲁文·桑切斯上校始终勇敢而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这人就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在一次战斗中被切的游击队俘虏的那个鲁文·桑切斯。显然，那次被俘的经历，在这位军人的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成了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最亲密的助手之一。

尽管托雷斯失败了，但是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进程，自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牺牲后，始终是顺利地发展着的。

的确，五年之前，很少有人能够料到那些身居高位的军人，甚至连某些曾经同切及其英勇的战友们打过仗的人，也都会成为这一革命进程的积极参加者。

当时同样很难料到，在某些地方，反帝力量可以通过较为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就象智利那样。

但是如果把问题考虑得深些，就可以发现这些事件中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革命的进程在发展、扩大，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日益激化，社会的阶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投身反帝斗争的居民阶层越来越多。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担心他们会陷入更其可悲的处境，开始走上层改革的道路；另一些人打进了革命队伍，以期阻挠革命或者把革命引入歧途；还有一些



人，确实是出于爱国主义思想，同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有些军官和教会人士也开始宣传起革命改造的必要性来了。因为所有的人都很清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不管革命的敌人是否愿意，革命总是要发生的。

这一切使革命进程复杂化了，使革命往往采取一些异乎寻常的形式；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形式同通常的方式、公式和概念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主要的不在于事件的形式，而在于事件的内容，在于革命运动的实际成就。现在，这个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拉丁美洲大陆南部的圆锥形地带；五年前，那位深信革命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人，那位深信革命终将战胜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人，就是在这个地带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的。他的鲜血，他的战友们的鲜血，正象他们先驱者的鲜血一样，正象所有革命者、所有共产党人的鲜血一样，并没有白流。革命之所以正在取得胜利，原因之一就在于有象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这样水晶一般纯洁的革命者在为革命开辟道路，为革命的崇高的、不朽的理想进行战斗。

拉丁美洲革命的成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阵地。“就整个来说，拉丁美洲大陆革命运动的高涨对世界革命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久前，拉丁美洲似乎还是美帝国主义的可靠后方，可是曾几何时，却成了反帝革命的巨大中心。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就在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美国的身旁，开展了起来。毫无疑问，革命的这些进展，正在并且将要进一步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产生作用，使之有利于国际工人阶级，有利

于社会主义。”<sup>①</sup>

\*

\*

\*

切的死，使数十本乃至数百本用世界上许多种语言写成的书籍和小册子相继问世。有许多的短诗、叙事诗、剧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影片专门描写了他。不用说，写他的不仅有同情者和朋友，而且还有阴险狡猾的敌人。他们，就是这些敌人，从肉体上把切消灭以后，现在又企图从政治上消灭他，因为革命者切的形象，在他们看来，同活着的切本人一样危险。这些出卖灵魂的无聊文人对切极尽污蔑之能事……有的人把他丑化为单干的超英雄、悲剧性的人物、自寻死路的革命者，另外一些人则把他歪曲为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毛泽东的追随者，例如，丹尼尔·詹姆斯受中央情报局的委托，在他所写的切的传记中就是这样歪曲切的。

但是造谣专家们所玩弄的这套骗人的把戏，并不能掩盖事实的真象。切一贯讨厌装腔作势的革命姿态和逞英雄充好汉，讨厌各种宗派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谎言家和极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内奸。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仇恨才使这伙人纠集在一起的。不管诽谤者怎么费尽心机，都无法“偷换”切这位共产党员、战士和苏联的朋友的真实的光辉形象，他的形象早已永远留在全世界所有进步人类的记忆中了。

---

<sup>①</sup> 苏共中央书记鲍·波诺马廖夫：《世界革命进程的迫切的理论问题》，载《共产党人》1971年10月第15期，第62页。——原注

\*

\*

\*

当我写完本书的最后几行时，我想去见见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跟他一起回忆革命古巴及其领导人的情况。他对古巴领导人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我深信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一定会告诉我不少关于切·格瓦拉的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同切·格瓦拉是很熟悉的。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到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去访问了他。

我们沿着花园里精心修整过的小径信步走着。暮色慢慢降临了。

我向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转达了他的古巴朋友——劳尔·卡斯特罗、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和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对他的问候，不久以前我去古巴时曾经见到过他们。从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问我的一些话来看，他对革命古巴的情况仍然非常注意。他对古巴的人民，它的领导人，它的事业、困难和成就都非常关心。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要知道，早在两国恢复外交关系之前，即一九六〇年，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就访问过革命古巴，他是苏联第一个访问古巴的党政活动家。

我要求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讲讲他首次访问革命古巴时的印象。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讲道：“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我们飞抵哈瓦那，出席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

览会的开幕式。到机场欢迎我们的有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当时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同志、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同志以及革命古巴的其他活动家。机场上还聚集了许多劳动人民。欢迎是热烈而亲切的。我马上就感觉到我已置身在朋友和同志们中间。古巴领导人的年轻、他们的革命激情、他们的革命热忱、待人的真挚，对自己事业的信念，以及对广大人民阶层的革命事业的热忱和信念，这一切都说明了古巴革命是符合劳动群众的心愿和期望的。

“古巴革命领导人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受到极大的爱戴，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不能不觉察到的。古巴人民是第一个在美洲，而且是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大国的鼻子底下，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民族的自豪感。

“我们在古巴的那些日子里，气氛是炽热的，无论就炽热这个词的原意还是转意来说都是如此。革命政府实行了重大的、深刻的社会改造，首先是土地改革。这些改造遇到了剥削集团和外国资本的代表人物的顽强反抗。在国内发生了尖锐的阶级搏斗。但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都拥护革命政府的进步政策，拥护使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完全独立的方针。这就保证了它能够不断地取得成就。”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您觉得一九六〇年的革命古巴跟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头几年相象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象的。凡是真正的社会革命都是有共同点的。它们总是能唤起劳动群众的力量和热

情，大大增强他们斗争的决心和意志。革命使群众成为有政治觉悟的、能够作出自我牺牲、能够去建立英勇业绩的人。马克思把社会革命叫做真正的历史火车头。确实是如此。而同时，每个国家的革命又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可以说有它自己的民族色彩。当地的条件、民族的历史经验、民族传统、民族心理、经济的发展程度、经济对国外资本的依赖情况、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威信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使得每个国家的革命具有某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革命的特点。同时，一切社会主义类型的革命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性：它们都是在劳动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下进行的，都把生产资料 and 土地收归公有，都把压迫劳动人民的旧政府机关更换为由劳动人民行使权力并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新的政府机关，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伟大的列宁教导说，各国人民都要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具体的历史条件，通过自己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说过，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但同时他又警告说，要反对机械地搬用这个经验。其实，凡属真正的人民革命，都不会盲目搬用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每个国家的革命首先都是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的，所以说到底，是无法重演的。这既适用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适用于古巴革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革命也象同一个家庭中的孩子一样，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与他的兄弟姐妹不同的特点。同时，他们之间又有许多共同点，许多相似之处，许多亲缘关系，正是这些东西使他们成为同胞手足，结成一

个统一的家庭。

“革命的力量就在于此。如果每个国家的革命都是按照同样的公式发展的，那么资本家对付革命倒比较容易了。然而历史不但很聪明，而且也很狡猾：它有时给革命穿上这样的外衣，使得剥削者必须花一番时间才能认出革命的真面目，可是待到他们识别出来时，已经不能改变事态的方向，革命已经胜利，无法挽回了。

“也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就是革命本身也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了解自己，来寻找通向胜利、通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偶然也有这种情况：在世界革命进程的某一阶段上，革命实践超过革命理论。这好不好呢？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古巴革命证实了这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您当然会见过切·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请您谈谈，这些会见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回忆，您对切作为一个人、一个国务活动家、一个革命者可以谈点什么吗？”

“提到切·格瓦拉，连他的外貌也是引人注目的。他虽然身材不高，但体格匀称，有其特有的优美的风度。他的脸威武而又文雅。他那有魅力的微笑深得人们的好感。他的谈吐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各方面的知识都很丰富的、有修养的、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使切·格瓦拉成为杰出人物的并不仅仅是这些长处。在他身上主要的当然不是他的仪表，也不是他的渊博，而在于他是一个对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具有钢铁一般的，我是想说，坚定不移的信仰的革命者。他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忠于劳动人民为了摆脱一切压迫、贫穷以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其他

祸害而进行的解放事业。切·格瓦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彻底的革命者。他的主要的爱好、他的幸福、他的最高理想，就是为革命而忘我工作。他具有高度的革命荣誉感和革命责任感。因此，一切艰难险阻都不能使他畏缩不前，恰恰相反，倒使他知难而进。他是无所畏惧的，随时都准备为自己的信念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时，他没有丝毫炫耀、吹牛、逞英雄充好汉、自我吹嘘和夸夸其谈的习气。他的出言吐语、行为举止，乃至他的手势，全都充满着真诚、谦虚和淳朴。

“一望而知，这个知识分子，这个‘书迷’并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工作者，不是一个遁世的博学者。他向往着斗争、激烈的战斗、英勇的业绩。然而并不是幻想着与风车、与虚构的敌人搏斗的唐·吉珂德。他的敌人是非常具体的，就是帝国主义。切·格瓦拉认为同帝国主义战斗是革命的荣誉所在、革命的职责所在。

“切是不是浪漫主义者呢？这是不待言的。然而他是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列宁的话：‘……不言而喻，我们没有浪漫主义精神是不行的。浪漫主义精神有余总比不足要好。我们总是同情革命浪漫主义者的，即使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时也是这样。’

“我和切交谈过多次，常常同他争论。他的特点是急躁、直来直去、相信革命行动具有神奇的力量、对斗争不讲策略。所有的革命者，特别是年轻的革命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这样的通病。只有生活经验，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而且也包括失败的经验，方才能使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逐步具有清醒的头脑。直到有了生活经验之后，革命

的热情才会有所制约,从而有可能积聚必要的力量,重新投入战斗。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极其丰富的经验证明这一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

“我曾同切·格瓦拉谈起过这一点。在许多问题上他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也有许多问题他持完全相反的意见。有一次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他的个性与他的名字很相符合,‘切’在亚美尼亚语中是‘不’的意思。他听了之后,由衷地、善意地大笑起来。要说服切·格瓦拉是件困难的事,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要说服我也不容易。只有生活,只有革命进程的发展本身才能恰如其份地解决我们间相持不下的争论,指出他错在哪里,我错在哪里。但是我们的争论是两个同志之间的争论,而不是两个敌人之间的争论。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彼此互相尊重,决定了我们间的友谊关系,这种友谊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我还想着重地谈一谈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之间的关系给我留下的印象。我曾同他们多次相聚,如果不把翻译算在内,有时只有我们三个人。因此我得以发现他们两人之间有某种非比寻常的特殊友谊,彼此绝对地信任和谅解。这两位古巴革命家的性格显然不同。但是热情奔放、颇易激动的菲德尔和看起来冷静沉着的切却相处得融洽无间,彼此都极为尊重对方,其中也许还恰恰包括尊重对方身上与自己不同的那些素质。

“格瓦拉去世之后,我没有再见到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不过他弟弟劳尔来莫斯科时,我曾和劳尔会晤过,因



而知道这一损失使他们兄弟俩多么悲痛，我和他们一样也感到非常沉痛。”

“您对切的《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可以谈点什么吗？”

“当我阅读这本日记时，我感到，这本日记是这位崇高的革命家用鲜血写成的。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阅读着日记的最后几页，想象着切生前最后几天的情况。在这几页上所记是如此之少，革命战斗中出现的险象却又是如此之多！日记中所表明的他的英勇气概、坚韧不拔的精神、斗争到底的决心，激发起人们对他的无限崇敬。日记更其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位英勇不屈的战士的性格，即使他所寄予厚望的游击队遭到了失败，他仍然是不屈不挠的。象切那样的人是不会无声无臭地死去的。他们即使死了，但并未离开战斗的队伍，继续以自己的生平事迹鼓舞着一批又一批新的战士为共产主义而进行斗争，为把全人类从剥削和压迫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进行斗争。共产主义者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民的记忆中，活在他的朋友们和战友们的心里，活在所有见到过他的人们的心里。”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沉默起来。夜幕早已四合。我们还默默不语地在花园里走了一会儿，然后进了屋子。

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请我到屋里去坐坐。我们又就别的话题谈了一会儿。最后，向亲切地接待了我的主人道谢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同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告别，忽然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张照片，年轻的切正在含

笑地俯视着我们。他周围是砍甘蔗的工人，他们高举着红旗，旗上写着两句话：

“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

##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生平事业年表

1928年6月14日，埃内斯托·格瓦拉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他是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和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的长子。

1946—195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系读书。1950年，在油槽船上当水手，漫游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

1951年2月<sup>①</sup>—1952年8月，偕同阿尔维托·格拉纳多斯漫游拉丁美洲各国。游历了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然后由委内瑞拉乘飞机途经美国迈阿密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1953年，大学毕业，获得医生证书。

1953—1954年，第二次漫游拉丁美洲各国。游历了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在危地马拉参加了保卫阿本斯总统政府的活动，在阿本斯失败后移居墨西哥。

1954—1956年，在墨西哥行医，后又在心脏病学研究所兼职。

1955年，遇见菲德尔·卡斯特罗，加入他的革命队伍，参加“格拉玛”号远征的准备工作。

---

<sup>①</sup> 此处与正文有出入，据正文交待，格瓦拉是在1951年12月而非2月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智利等国旅行的。——译者

- 1956年6月—8月，因加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部队被捕，囚禁于墨西哥城监狱。11月25日，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八十二名起义者中的一员，乘“格拉玛”号游艇从图斯潘河口出发，前往古巴。“格拉玛”号于12月2日抵达古巴。
- 1956—1959年，参加古巴革命解放战争，在战斗中两度负伤。
- 1957年5月27—28日，参加乌维罗之战。6月5日，晋升为少校，被任命为第四纵队司令。
- 1958年8月21日，奉命率领“西罗·雷东多”第八纵队进军拉斯维利亚斯省。10月16日，切的纵队抵达埃斯坎布拉伊山。12月攻打圣克拉腊市。12月28—31日，切指挥夺取圣克拉腊市的战役。
- 1959年1月1日，圣克拉腊解放。1月2日，切的纵队进入哈瓦那，占领卡瓦尼亚要塞。2月9日，总统法令宣布切为古巴公民，享有与出生古巴的人相同的各种权利。6月2日，同阿莱达·马尔奇结婚。6月12日—9月5日，受古巴政府委派，访问了埃及、苏丹、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日本、摩洛哥、南斯拉夫、西班牙。10月7日，被任命为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工业司司长。11月26日，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
- 1960年2月5日，出席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技术和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第一次同米高扬见面。5月，切的《游击战》一书在哈瓦那出版。10月22日—12月9日，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捷克

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961年2月23日，被任命为工业部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该委员会也归其领导。4月17日，雇佣军入侵吉隆滩。切负责指挥驻防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6月2日，同苏联签订经济协定。6月24日，在哈瓦那接见尤里·加加林。8月，代表古巴出席在乌拉圭埃斯特角举行的泛美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在会上揭露了美国所建立的“争取进步联盟”的帝国主义性质。访问了阿根廷和巴西，同弗朗迪西总统和夸德罗斯总统进行了会谈。

1962年3月8日，被任命为全国领导成员；3月2日，被任命为革命统一组织书记处书记和经济委员会委员。4月15日，在哈瓦那古巴劳动者工会会议上发言，号召开展社会主义竞赛。8月27日—9月3日，率领古巴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继访问莫斯科之后，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10月下半月至11月初，负责领导比那尔德里奥省的部队。

1963年5月，由于革命统一组织改组为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切被任命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7月，率领政府代表团赴阿尔及利亚，庆祝该共和国独立一周年。

1964年1月16日，签署古苏技术援助议定书。3月20日—4月13日，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4月15日—17日，访问法国、阿尔及利亚、捷克斯洛伐克。11月5日

—19日，率领古巴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11月11日，出席友谊之家苏古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演说。12月9日至17日，率领古巴代表团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代表大会。12月下半月访问阿尔及利亚。

1965年1月—3月，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马里、刚果(布)、几内亚、加纳、达荷美、坦桑尼亚、埃及、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了亚非团结组织第二届经济讨论会。3月14日返回哈瓦那。3月15日，向工业部的工作人员报告国外之行的情况，这是他在古巴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4月1日，写了给父母、子女、以及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告别信。10月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切的告别信。

1966年2月15日，寄信给女儿伊尔达，向她祝贺生日。11月7日，到达玻利维亚尼阿卡瓦苏河畔的游击队营地。

1967年3月23日，切(拉蒙、费尔南多)所领导的游击队(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4月17日，切致三大洲团结组织的信在哈瓦那发表。4月20日，德布雷、布斯托斯和鲁斯被玻利维亚当局逮捕。7月29日，拉丁美洲团结组织成立大会在哈瓦那开幕。8月31日，华金小组全组覆没，女游击队员塔妮亚同时罹难。10月8日，尤罗山峡战斗，切受伤被俘。10月9日，切在依格拉村被“突击队”杀害。

10月1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证实切在玻利维亚牺牲。

1968年6月，切的《在玻利维亚的日记》第一版在哈瓦那出版。

## 主要参考书目

Эрнесто Че Гевара, Партиз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иностр. лит-ры, 1961.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游击战》，译自西班牙文，外国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1年版。

Эрнесто Че Гевара, Боливийский дневник.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 42 журнала «Новое время» от 18 октября 1968 года.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新时代》杂志1968年10月18日第42期附刊。

Фидель Кастро, Речи и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иностр. лит-ры, 1960.

菲德尔·卡斯特罗言论集，译自西班牙文，外国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

Фидель Кастро, Речи и выступления. 1961—1963.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иностр. лит-ры, 1963.

菲德尔·卡斯特罗言论集（1961—1963年），译自西班牙文，外国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版。

Фидель Кастро, Наше дело побеждает. Речи и выступления. 1963—1964.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Прогресс”, 1965.

菲德尔·卡斯特罗：《我们的事业必胜》。言论集（1963—1964年）。译自西班牙文，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



版。

Фидель Кастро Рус, Пусть вечно живет бессмертный Ленин.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愿不朽的列宁永生》，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70年版。

《От Сьерра-Маэстры до Гаван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ид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куби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65.

《从马埃斯特腊山到哈瓦那。古巴革命的著名参加者回忆录》，译自西班牙文，军事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版。

《Памяти Эрнесто Че Гевары». «Правда» от 18 октября 1967 года.

《悼念埃内斯托·切·格瓦拉》，1967年10月18日《真理报》。

Родней Арисменди, Проблемы латин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Прогресс”, 1964.

罗德内·阿里斯门迪：《拉丁美洲革命问题》，译自西班牙文，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版。

Альфредо Варела, Куб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соц.-экон. лит-ры, 1962.

阿尔弗雷多·巴雷拉：《古巴是革命的》，译自西班牙文，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版。

Ванд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 Архипелаг Свободы. М., изд-во “Правда”, 1962.

纹达·瓦西列夫斯卡：《自由的列岛》，真理报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版。

Тимур Гайдар, Из Гаваны по телефону. М., изд-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7.

- 提穆尔·盖达尔：《来自哈瓦那的电话》，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莫斯科，1967年版。
- И. Р. Григулевич,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на Кубе. М., изд-во “Наука”, 1965.
- 格里古列维奇：《古巴的文化革命》，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5年版。
- А. М. Зорина, Камило Сьенфуэгос — герой куби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 изд-во “Наука”, 1966.
- 左里纳：《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古巴人民的英雄》，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6年版。
- 《Куба. Истори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М.,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1961.
- 《古巴。历史和民俗文化概观》，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61年版。
- Хулио Ле Риверенд,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Кубы.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Наука”, 1967.
- 胡利奥·莱·里韦兰德：《古巴经济史》，译自西班牙文，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7年版。
- Хулио Ле Риверенд, Куби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революция.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Прогресс”, 1970.
- 胡利奥·莱·里韦兰德：《古巴共和国。依附与革命》，译自西班牙文，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70年版。
- Хосе Марти, Севе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сцены.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Гос. изд-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ры, 1963.
- 何塞·马蒂：《北美的舞台》，译自西班牙文，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版。
- Роберт Мерль, Монкада. Первая битва Фиделя Кастро.

Пер. с франц. М., изд-во “Прогресс”, 1968.

罗贝尔·梅尔:《蒙卡达。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第一次战斗》,译自法文,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68年版。

Антонио Нуньес Хименес, География Кубы.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иностр. лит-ры, 1960.

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古巴地理》,译自西班牙文,外国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版。

Антонио Нуньес Хименес, Империя янки—враг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соц.-экон. лит-ры, 1962.

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美帝是拉丁美洲的敌人》,译自西班牙文,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

Эмилио Роиг де Леучсенринг, Кубинский народ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ША.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Наука”, 1968.

埃米略·罗伊格·德·莱乌奇森林格:《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古巴人民》,译自西班牙文,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68年版。

Блас Рока, Куба—свободн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 Америки.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иностр. лит-ры, 1961.

布拉斯·罗加:《古巴——美洲的自由国土》,译自西班牙文,外国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1年版。

Рауль Руис Гопсалес, Боливия—Прометей Анд.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иностр. лит-ры, 1963.

劳尔·鲁伊斯·冈萨雷斯:《玻利维亚——安第斯山的普洛米修士》,译自西班牙文,外国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63年版。

Л. Ю. Слезкин, История Куби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 изд-

- во “Наука”, 1966.
- 斯列兹金: 《古巴共和国史》, 科学出版社, 莫斯科, 1966 年版。
- В. Е. Тихменев, Куба—да!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1.
- 提赫美涅夫: 《要古巴!》, 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莫斯科, 1961 年版。
- В. Чичков, Заря над Кубой. М., Изд-во ИМО, 1960.
- 契奇科夫: 《曙光照耀着古巴》, 国际关系出版社, 莫斯科, 1961 年版。
- Вильма Эспин де Кастро, Куба борется—Куба победит. Пер. с испан. М., изд-во соц.-экон. лит-ры, 1960.
- 比尔马·埃斯平·德·卡斯特罗: 《古巴在战斗, 古巴必胜》, 译自西班牙文, 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 莫斯科, 1960 年版。
- Журнал «Куба»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1965—1971.
- 《古巴》杂志(俄文版), 1965—1971 年。
- Е. Che Guevara, Obras. 1957—1967. V. I—II. La Habana, 1970.
- 埃·切·格瓦拉著作集(1957—1967 年), 1—2 卷, 哈瓦那, 1970 年版。
- Che, Una vida y un ejemplo. Recopilación e introducción por J. Soto Acosta. La Habana, 1968.
- 《切。生活和榜样》, 索托·阿科斯塔编纂并作序, 哈瓦那, 1968 年版。
- “Tania—la guerrillera inolvidable”. La Habana, 1970.
- 《令人难忘的女游击队员塔妮亚》, 哈瓦那, 1970 年版。
- “El Diario del Che en Bolivia. Noviembre 7, 1966 a

Octubre 7, 1967". La Habana, 1968.

《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1966年11月7日至1967年10月7日》, 哈瓦那, 1968年版。

Fidel Castro. Octubre 15 y 18. "El Orientador Revolucionario" 1967, №. 26.

菲德尔·卡斯特罗: 《10月15日和18日》, 《革命向导》1967年第26期。

Rodney Arismendi. Lenin, la Revolución y América Latina. Montevideo, 1970.

罗德内·阿里斯门迪: 《列宁、革命与拉丁美洲》, 蒙得维的亚, 1970年版。